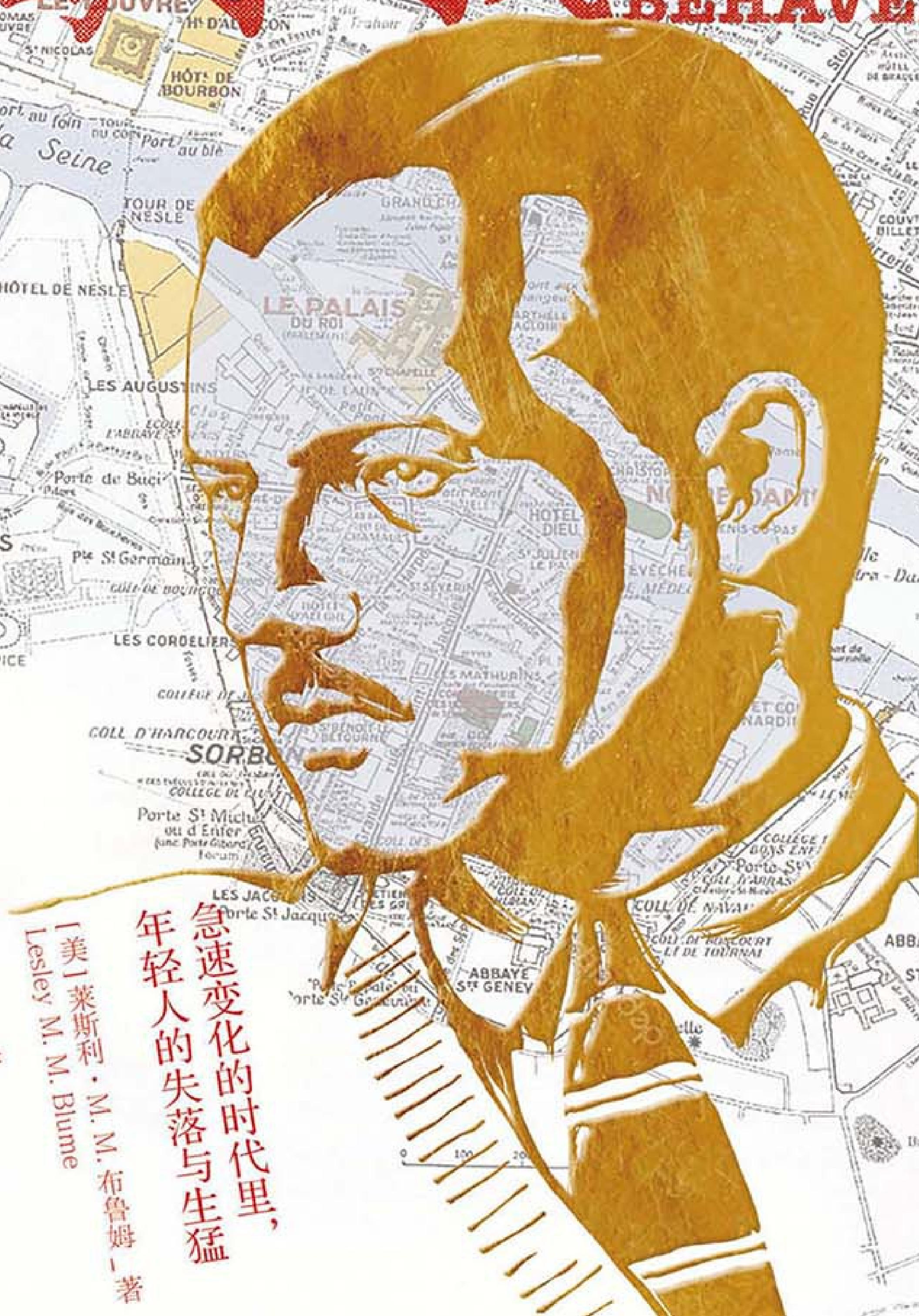
整个巴黎属于我

The True Story Behind Hemingway's Masterpiece *The Sun Also Rises*

EVERYBODY BEHAVES BADLY



急速变化的时代里，年轻人的失落与生猛

[美] 莱斯利·M. M. 布鲁姆 著
Lesley M. M. Blume

袁子奇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整个巴黎属于我

作者:[美]莱斯利·M.M.布鲁姆

译者:袁子奇

ISBN:978750869120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海明威1923年拍摄的护照照片。对于这位年轻的记者和作家来说，去往巴黎是他周游的开始：《多伦多星报》和其他新闻机构很快将把他派往欧洲各处，追逐轰动的故事。

You are so brave and quiet
I forget you are suffering.

- Ernest Hemingway

导言













Ernest Hemingway, America's own literary cave man; hard-drinking, hard-fighting, hard-loving—all for art's sake

Vanity Fair's own paper dolls—no. 5

1934年3月，《名利场》杂志刊出了一版幽默漫画：一整页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各式纸偶，展现了他最著名的几个形象。画中有：斗牛士海明威，拎着一只砍下来的公牛头；整日泡在酒吧里沉思的作家海明威（他面前的桌上放着四个酒瓶，而一位招待又拿来了三个）；参加了血腥战争的老兵海明威。“欧内斯特·海明威，”漫画的标题写道，“美国自己的文学野人，用力喝酒，用力战斗，用力爱，一切都以艺术之名。”[注]

在海明威的一生中，不断有新形象找上门来：钓深海鱼的硬汉、大型动物猎人、“二战”中巴黎丽兹酒店的解放者、白胡子老爹。所有这些身份，他都很享受，媒体同样津津乐道。就书的销量来看，海明威是美国最多才多艺的畅销书作家，也是美国人最喜闻乐道的文娱人物。

此时，已经没有人记得他最初的角色：没有任何作品出版的无名小卒——海明威有过几个从来不适合他的形象，这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初，海明威身无长物，渴望出名，疯狂地想摆脱小人物的身份。甚至在文学生涯初期，他似乎就有无边的壮志。不走运的是，文学殿堂的“看门人”[注]们起初似乎并不买他的账。海明威准备好要统治文学世界，但其中的公民却还没有臣服于他的意愿。他的短篇小说纷纷遭到了主流出版社的冷遇；寄出的稿件被拒绝，又退回到他手里，从他公寓门上的投信口塞进来。“饥肠辘辘的时候，收到退稿信是件非常难以接受的事，”后来海明威对一位朋友说，“有好几次，我坐在那张旧木桌前，读着那些随信寄来的语气冷漠的小纸条。那些小说都是我的挚爱，我曾经呕心沥血，信心满满。我就是忍不住落泪。”[注]

失望之时，海明威可能还意识不到，他其实算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比较幸运的作家了。冥冥之中他如有神助，他在正确的时间刚好碰上了所有正确的事：几位孜孜不倦的导师，慷慨相助的出版社，几任慷慨的妻子，以及一系列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的写作素材。最后这一条，其实是他那帮朋友难登大雅之堂的行为，很快被海明威转化成了他的第一

本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并在1926年出版。书中，早已存在的一系列主题——饮酒寻欢、宿醉、偷情、背叛，在一种新的面貌、更高尚的伪装下出现：实验文学。这些被高尚化的不良行为震动了文学界，进而定义了海明威这一整代人。

人人都知道后来的事：单说海明威最终获得了名誉与成功，都未免太小看他了。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时被公认为“现代文学之父”，作品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全球广为流传。即使在他死后半个多世纪，他仍然能成为媒体头条，占据八卦专栏。

接下来的问题是，海明威最初是如何成为海明威的——本书要呈现的正是所有这些往事。《太阳照常升起》背后的故事就是其作者的发迹史。批评家向来把海明威的第二本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当作确立其文学巨人地位的登堂入室之作，但是《太阳照常升起》从很多方面来讲更为重要。从文学意义上说，它实质上带领着它的大众读者们来到了20世纪。

“《太阳照常升起》的影响不仅仅是打破了坚冰，”《巴黎评论》的编辑洛林·斯坦（Lorin Stein）说，“它标志着现代文学完全被大众所接受。一个小说家如此张扬地成了一整代人的引领者，我想这在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吧。只需读上一句话，你就知道，它和之前的文学都不一样。”[注]

不过这也并不是说，这次“文学地震”是毫无先兆的。作家们曾发起过一场小规模的运动，想把爱德华时代[注]的陈腐氛围从文学中祛除，让文学得以呼吸现代世界的新鲜空气。问题是，谁能率先取得这一突破，谁又能让新的写作方式得到主流读者的青睐？此时，大多数人似乎仍对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那种过度雕饰、语言烦琐的写作风格甘之如饴。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激进的新式小说《尤利西斯》让很多“一战”后的小说家眼界大开，但在

最初，很难说这部作品在大众视野中掀起了什么波澜：在美国，它甚至要到20世纪30年代才以书的形式出版[注]。居住在巴黎的实验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注]自掏腰包出版作品，而那些真正读过她作品的人常常表示无法理解。据统计，她的一本书在问世18个月后仅仅卖出了73本。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也试图重建美国小说文坛，随着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出版，他觉得自己获得了成功。不过，他的小说虽然在内容上是彻底现代的——有轻佻女子、私酒贩子，或者其他千奇百怪的城市居民——但他的风格绝对是老派的。

“菲茨杰拉德是一个19世纪的灵魂。”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三世（Charles Scribner III）说道，他是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Charles Scribner's Sons）的一位总裁。[注]该社出版了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文学生涯中的大部分作品。“（他）为一个伟大的传统做了总结，他是浪漫主义最后的拥趸者。他是施特劳斯。”[注]

相反，海明威则是斯特拉文斯基。

“他发明了一整套全新的风格和语调，”斯克里布纳解释说，“而且他完全属于20世纪。”当时一位有名的批评家指出，海明威在写作领域的成就，相当于毕加索和立体主义流派在绘画领域取得的成就：与立体主义“原始的现代语言”[注]相似，在海明威式的短句组成的朴实散文[注]出现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现代性找到了其大众创作的领袖。

《太阳照常升起》立即使海明威成了代表一代人声音、一种生活方式的标志。在这部小说出版之前，菲茨杰拉德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那些年，小说家有一方相当大的舞台。电影还是一种相对新兴的媒体，电视尚有一二十年才会普及，阅读小说仍然是大众主要的娱乐形式。菲茨杰拉德是全美名人；他的每部新作都会遭到疯抢，人们热烈地讨论小说，就像如今大家热衷于猜测热播电视剧的结局一样。耶鲁大学的学生们蜂拥至纽黑文火车站，因为即将进站的火车上载着收录菲茨杰拉德新

作的杂志。㊟

不过，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那是腐化的、喝了过多香槟的一代人。《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了爵士时代（Jazz Age）的圣经——这个时代的诞生有一部分就要归功于菲茨杰拉德。他被看作一位敏锐的时代记录者，同时也激励了人们用生活模仿艺术：很多人根据菲茨杰拉德笔下鲜活的人物来重塑自我形象，或者直接模仿菲茨杰拉德本人和他靓丽的妻子泽尔达（Zelda）。

“司各特为这个时代定下了节奏，”多年后，泽尔达写道，“同时也定下了一个情节梗概，让它得以演绎出自己的精彩。”㊟

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全然改写了这个节奏。《太阳照常升起》告诉这一代人，也许他们并非轻浮，不如说是迷惘的一代。世界大战毁掉了每一个人，所以大家权且今朝有酒今朝醉——并且最好是醉在巴黎。在美国，高等院校欣然接受了“迷惘的一代”这一标签，这个词是海明威从格特鲁德·斯泰因那里借来的，通过自己的小说使之广为人知。《太阳照常升起》实际上成了了解当时青年文化的新指南。巴黎的旅馆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太阳照常升起》中角色的效仿者：豪爽的杰克·巴恩斯和享乐过度、对一切都感到腻烦的波莱特·阿施利夫人，突然成了流行的偶像。在此之后还有许多影响了一整代人的文化运动——垮掉的一代、X世代、千禧世代——但是没有一次像这一代的青年先锋运动一样，被赋予浓厚的浪漫色彩，它的点点光辉至今还吸引着很多人。

当年，最能代表那个时髦的迷惘世界的人，就是海明威本人了。这多亏了当时的公共宣传机器，把海明威与《太阳照常升起》一起宣传，将他推崇为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那些为海明威做营销的人明白，自己这次交了好运：某种程度上，他们拿到的是两个大有可说的故事，却只掏了一份钱。很快出版社便看出，公众对海明威本人的兴趣，与他们对海明威小说的兴趣一样高涨，而海明威和他的营销团队也很乐意满足公

众。就这样，一类新式作家诞生了——头脑发达，四肢也发达，与普鲁斯特和他那些满身灰尘、离群索居的同道截然不同。[注]《太阳照常升起》一经出版，立即有至少一家报社指出，有一种“海明威狂热”已经在欧美两大洲横空出世。

海明威最好的推广者就是他本人。他比自己的大多数竞争对手都更有商业头脑，并且果断到近乎粗暴。1921年底他来到巴黎时年仅21岁，带着新婚妻子哈德莉。用旅法作家、海明威的好友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的话说，那时海明威“在完全默默无闻的时候就已决意当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作家”[注]。海明威并不是想一炮走红：那时他知道自己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但是对于他想达到的成就，他有着强烈的意愿，并将自己的目标精确地执行。

“（他）想做一个伟大的作家，”在海明威当时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中，他这样评论笔下的一个人物，不过，他其实也可以这样评论自己，“他很确定自己的将来……他对此几乎怀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感情。绝不儿戏，绝不含糊。”[注]

对于那些在巴黎初次见到海明威的人来说，他的名字可算起得十分贴切：欧内斯特（Earnest）[注]。而最终，他展示了用不是那么崇高的写法和素材，达成他崇高目标的能力。作者和他的处女作都被一颗破釜沉舟的雄心所支配。甚至在他初到巴黎的那几周、几个月间，海明威也并没有只沉浸在巴黎的奇迹光芒中，仅满足于做城市风景的一部分。他不满足于从他侨居巴黎的美国同胞中脱颖而出，他要的是一骑绝尘。

他的工作准则在巴黎远近闻名。任何来到他常去的丁香园咖啡馆（La Closerie des Lilas），以送祝福之名在他写作时对他“瞎咧咧”的人，都应该去见上帝。[注]他痛斥那些装模作样的“作家”，他们在圆亭咖啡馆（La Rotonde）之类的地方挥霍大量的时间喝酒、说闲话。海明威

把写作放在第一位，此外一切都是次要的——包括哈德莉，以及他们在巴黎之旅开始两年后生下的年幼的儿子。海明威的另一个儿子帕特里克[注]曾说，在父亲看来，“家庭生活是成就的敌人。海明威曾说过好几次，做个好丈夫、好父亲……书评人在评论你的书时，不会（把这些）算作你的成就。”[注]

那时候，很多侨居巴黎的美国人在文学上都有类似的崇高抱负，但是海明威除了好运气、工作准则和不容忽视的才华之外，还拥有另一张别人比不了的王牌：一种特别的人格魅力。他善于交际、天资聪明、外表英俊，因而成了一个社交宠儿。他喜欢固执己见，所以会把不那么坚定的人吸引到他身边去，就像光亮吸引飞蛾一样。不过拥有这些特质，还只能算是人见人爱，不一定称得上有号召力。而海明威初次和人见面，就能唤起对方的盲目崇拜。在同辈人中有如此的吸引力，没人解释得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有人认为，他的魅力可能来自他坏坏的小聪明[注]，能放射出一圈让人兴奋的光环；也可能来自他那种能感染人的热情——冰镇桑赛尔白葡萄酒、英武的斗牛士，或是刚刚从塞纳河里钓上来的鱼，当场下锅油炸，都可以让他高兴不已；抑或是因为他倾听你的方式：认真、从不打岔。

“如果你知道关于玫瑰的一切，他就和你聊玫瑰，直到他学习了你所知的一切，”他的朋友约瑟夫·德莱尔（Joseph Dryer）回忆说，“他会向你鼓励地微笑，问你问题。有人能这样听你说话，真是莫大的恭维。”[注]

直到谈话结束，你可能才会发觉，其实你的那点儿见识他都知道，但他就是很少表露出来。

即使最热衷诋毁海明威的人也无法摆脱他——其中有些人即使为他的进步出了力，也对他最终的成功心怀不快。海明威早期的一位出版商把他称作“聚光灯下的小屁孩”（Limelight Kid）[注]和“传奇的骗

子”（Fabulous Phony），但是最后写回忆录时，还是花了很多篇幅写海明威。

“他让别人乐意去谈论他。”莫里·卡拉汉（Morley Callaghan）回忆说。他是海明威在《多伦多星报》时的一位同事。(注)

事实表明，即使是交际广泛的文学大家，也对海明威没有抵抗力——即使在他什么小说都还没有发表过的时候。到巴黎几周后，他俘获了现代主义的两位巨匠，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埃兹拉·庞德。在众多不遗余力帮助海明威的大师中，他们是最早伸出援手的两个，可能再也没有别的作家会如此受到前辈的青睐。

“这些人初见海明威时，他们不会孤立地看待他的作品，而是同时关注作品和海明威本人。”瓦莱丽·海明威（Valerie Hemingway）说。她是海明威晚年的助手，后来成了他的儿媳。“海明威是魅力非凡的偶像，但他不是那种卖弄魅力、无所事事的人，只有当他有目标时，他才有魅力。”

这些名流把年轻的海明威邀请到自己家里去，把所知的一切传授给他，把他打造成一个小有所成的现代作家的样子，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他与他们一同喝茶、饮酒，自始至终用心看着、听着。很快，在巴黎混得最好的那些美国人，作家、编辑以及文学殿堂的“看门人”，也都纷纷把手中的资源敬奉到他的脚下。他会毫不客气地从中选取需要的，然后不作停留，继续前行。说得委婉点儿，他总是用一些出人意料的方式报答赞助者们的慷慨。

尽管有贵人相助，自己也在努力拼搏，但海明威就是无法取得突破。到了1923年，他快要被逼疯了，似乎每周都会有一篇菲茨杰拉德短篇新作问世，但就是没有人愿意发表海明威的小说。最后，巴黎几家由美国侨民经营的小出版社出版了海明威的两本小书，其中收录了他的一些诗、随笔和短篇小说。这两本小书很好地展示了他革命性的新风格，

但是并没有为他赢得什么读者；实际上，它们流入市面的数量，加起来也没有超过500本。

对于读到这两本书的少数人来说，它们带来了引人入胜的一瞥，让人可以略微猜到海明威的长篇小说会是什么样子。对那个时代的杂志来说，发表短篇小说是重要的业务；但是只要涉及出版社，畅销的长篇小说还是各方孜孜以求的圣杯。那些希望从长远角度获利的出版社，已经在私下里把海明威的未来搬上了谈判桌。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纽约，一个美国出版商满怀希望地在一封信里写道："海明威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可能将震动整个美国。"[注]海明威是时候出一记险招了。

"我意识到必须写一部长篇。"海明威后来回忆说。[注]

坦白讲，他很早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话虽如此，长篇小说可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时，海明威至少有过三次失败的尝试。第一个想法刚成形就胎死腹中；第二次倒是付诸实践了，但是稿子写到27页，就被他放弃；第三次尝试看上去已经到达了相对成熟的阶段，但是一次痛彻心扉的意外使他失去了这部小说，也让他和哈德莉刚刚缔结的婚姻以及誓做一个作家的意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还是决定继续。《多伦多星报》的记者工作占据了他很多可以用来写作的宝贵时间。他大胆辞掉报道工作，得到的回报便是贫穷：没有钱买炭火，家人在室内要多穿一件毛衣保暖。他饱受文思枯竭之苦，有时候整整一上午只能在纸上挤出几句话，同时又担心年轻的文坛新秀会超过他。所以，每当他把自己的散文笔法打磨得更好时，他就如惊弓之鸟，生怕别人会窃走他的新风格，抢在他前面搞出点儿轰动来。

但是海明威也不愿意揠苗助长。写作这部长篇小说是一件瓜熟蒂落的事。"我要拖到忍无可忍时再动笔，"海明威回忆说，"当我必须要写的时候，它就成了当务之急，没有其他选择。"那时在他看来，可走的路只有一条。

“就让压力一点点积聚吧。”注

如果你摇晃一瓶香槟，摇得足够猛，塞子就终将以爆炸般的力量冲出来。当各方面的压力积聚到不能忍受的地步时，造化给了海明威一个最为幸运的突破口。这次机遇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放荡、沉溺酒色的英国女贵族，前来男人圈里寻找临时情人。当杜芙·特怀斯登夫人（Lady Duff Twysden）出现在巴黎时，一切对海明威来说都不一样了。

开始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1925年的夏天，海明威去参加潘普洛纳的圣佛明奔牛节（San Fermín Bullfighting Fiesta）注时，杜芙·特怀斯登夫人跟他一同前往。海明威热爱西班牙，后来他说：“除了祖国之外，我爱西班牙超过了任何其他的国家。”注他从西班牙文化中深受启迪，尤其是斗牛文化：海明威曾写到，坐在场边看斗牛，就像见证一场战争一样。他们抵达奔牛节庆典现场的时候，海明威似乎渐渐迷上了特怀斯登，但是定情并非易事，她另外两个同行的情人让事情更加复杂。其中一个情人，帕特·格思里（Pat Guthrie），是一个永远醉醺醺的、背了一身债的苏格兰人；另一个情人是位作家，哈罗德·勒布（Harold Loeb），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他背后是纽约两个最有声望、最有钱的犹太家族。在特怀斯登前来“搅局”之前，勒布是海明威的网球球友，也是后者最热忱的拥护者之一。现在，他成了海明威的情敌。

这次出行很快变成一场纵酒无度、争风吃醋、同室操戈的闹剧。到了节庆的最后，勒布和格思里公开地互相鄙视，海明威和勒布为了同行的“活耶洗别”注，几乎大打出手，而杜芙夫人自己呢，有一天吃午饭时人们发现，她的一只眼眶被打得乌青，额头上也有擦伤，很可能是在某个深夜被格思里揍的。虽然特怀斯登带来的是殴斗和不愉快的气氛，但她仍然在整场节庆期间熠熠生辉。她成就了一场好戏。

海明威也成就了一场好戏，不过与特怀斯登方式不同。看到特怀斯

登沉溺于享乐主义的颓废，海明威心里有什么被触动了。他立即意识到，自己可以用这些素材写出一个喜闻乐见的故事。当他和哈德莉离开潘普洛纳，去附近各地看斗牛时，他开始把这整场欢闹记在纸上，写作时几乎进入了一种恍惚的疯狂状态。突然，节庆期间发生的每一桩不伦勾当、每一次冒犯、每一次得不到回应的单相思，都获得了严肃的文学价值。海明威夫妇不知疲倦地辗转旅行，同时海明威文思泉涌，有一部分故事是他在巴伦西亚、马德里和昂代伊写成的。

海明威最终返回巴黎，在1925年9月完成了小说的第一稿。很快，他把成稿命名为“太阳照常升起”，这是从《圣经》中借来的一句话。海明威知道他正握着一只烫手的山芋，而这也是他驶出文学死水的船票。

“这真是篇不赖的小说，”他给一位编辑朋友写信时说，并且补充道，“那些杂种评论我时不是常说‘是啊，他能写点儿优美的小段子’吗？让他们看看自己是多么有眼无珠。”[注]

经过数年的挫败和积累，海明威的首部长篇小说从无到有只用了短短六周。他终于加入了长篇小说俱乐部。一夜之间，很多人的财运来了。

一年后《太阳照常升起》出版时，那些书中角色的原型都不相信它竟然会被当作一部虚构作品来销售。

“初读这本书，我并没有看出人们的兴奋点在哪里。”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Donald Ogden Stewart）回忆说。他是一位畅销的幽默作家，也一同参加了潘普洛纳的旅行，海明威把他塑造成了书中的比尔·戈顿。在斯图尔特看来，《太阳照常升起》“只不过是一篇忠于事实的报道罢了。这是新闻写作。”[注]不只斯图尔特一个人认为，海明威除了新闻报道那一套外再没有别的创建。甚至，海明威写下这整件事的方式，就像在及时报道一则有料新闻。

开始动笔的时候，海明威没有预先通知他的几位人物原型，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即将参演海明威的“文学政变”。不过，有天晚上海明威把消息透给了凯蒂·坎奈尔（Kitty Cannell）[注]，后者也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他写进了小说。在巴黎，几个同去潘普洛纳的人曾经聚餐过一次，希望修补他们的友谊。节庆是两个月之前的事，但是大家仍然记忆犹新。晚饭后，众人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海明威和坎奈尔并肩走着，他突然承认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正在写一本书，”他告诉她，“每个人都在里面，而且我要撕了那两个混小子。”[注]他说，暗指哈罗德·勒布和海明威自己的发小比尔·史密斯（Bill Smith），这两个人当时正在稍远一些的地方走着。另外，海明威还向她透露：“勒布那个犹太佬是大反派。”[注]海明威向坎奈尔保证不会把她写进小说里，因为他觉得她是个极好的姑娘。

“但是，他当然还是把我写进去了。”数年后她忧伤地写道。[注]

坎奈尔、勒布、杜芙·特怀斯登夫人，以及其他被海明威写进小说里的人，对《太阳照常升起》的反应都是清一色的愤怒和失落，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这本书不仅把他们从巴黎到潘普洛纳的丑事暴露得淋漓尽致，还毫不避讳地把他们的私人背景直接套在书中人物身上。勒布发现自己成了讨人嫌的倒霉鬼罗伯特·科恩。坎奈尔被写成了科恩的美国女友弗朗西斯·克莱恩，一个因年华渐逝而陷入绝望的女人。特怀斯登变成了外表靓丽但内心苦闷的波莱特·阿施利夫人，小说把她永远禁锢在了“嗜酒的女色魔”[注]这一标签下，而海明威后来也是这么描述特怀斯登本人的。他描绘了朋友们失败的婚姻、大学参加的体育活动、独特的口头禅，还有各种不检点的言行。

“他的记忆滴水不漏，”海明威的儿子帕特里克说，“经历过的事都可以立马回想起来。这是他宝贵的天赋之一。”[注]

因为涉及哈罗德·勒布、唐纳德·斯图尔特、杜芙夫人和另外一些有名气的人，《太阳照常升起》曝出了巴黎左岸咖啡馆、伦敦和纽约的丑闻，使公众哗然。一开始，海明威的美国同胞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本书在文学上的重要性。一些人把《太阳照常升起》当作又一本逗趣的“用假名写真事”的纪实小说（romans à clef），这类书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少见。巴黎的作家区[注]文人们常常把酒友、情人和同僚写进小说，暴露他们的生活，嘲笑他们；这片地方就是一间没有隐私的玻璃房，每个人都在朝别人丢石子。

对《太阳照常升起》的原型人物来说，最倒霉的是另一些人把这本书看作了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甚至认为它可以称得上一部绝对的经典。从前，有不止一位批评家提到过，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和场景描写中有才华的闪光，而现在他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批评家不喜欢《太阳照常升起》，但是很少有人会轻视它的重要性。毕竟小说有个带有圣经色彩的名字，有一句有分量的、从格特鲁德·斯泰因那里“偷来”的卷首语：“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很聪明地为小说加进了这些元素，立竿见影地告知读者：《太阳照常升起》不是一本稀松平常的八卦小说，而是一部意义深刻的文化评论。海明威明确表示，他对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那种爵士时代的愚蠢小短篇不感兴趣。虽然这两位作家笔下的人物都行为放荡，饮酒过度，和不该上床的人上床，但是海明威敏锐地指出，自己的作品探讨的是死亡、重生和人生的意义。（如果这还不能吸引读者的话，他补充说，书里还有“关于上流社会的很多内情”[注]——这一招总能吊人胃口，屡试不爽。）

希望讨好所有人的作品，可能在任何人那里都不落好——《太阳照常升起》也冒着这样的风险。不过海明威避开了这种情形，他那种雅俗共赏的散文风格为他守住了阵地。精英阶层的批评家接受它，认为它令人信服地展现了战后的焦虑，预示着文学新风格的到来。另一方面，正如海明威希望的，书中所有关于光鲜亮丽的上层社会、性和酒的内容，也成功地引诱了不那么精英的读者。似乎一夜之间，海明威就从一个有

潜力的新手变为一个呼风唤雨的重磅作家。

那些充当了《太阳照常升起》角色原型的人，他们的生活被小说的成功打乱了，再也无法回归过去。于是小说出版前的岁月“被我们中的一些人称作‘B.S.’（指Before *The Sun Also Rises*，在《太阳照常升起》之前）”，凯蒂·坎奈尔回忆说。[注]“A. S.”（指After *The Sun Also Rises*，在《太阳照常升起》之后）纪元到来后，一些人的生活成了海明威雄心壮志的牺牲品。小说中的人物将像鬼影一般终生纠缠着坎奈尔、勒布等人。不过对海明威来说，和几个朋友翻脸，都是成功附带的损失，没什么大不了。

毕竟，他要掀起一场文学革命。革命嘛，不掉几个脑袋那还叫什么革命。

90年以后，《太阳照常升起》忽远忽近的塞壬[注]之声仍然吸引着读者。另外几部赢得了“代表一代人”地位的小说，比如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On the Road*），相比之下就不如《太阳照常升起》那样青春永驻。现在看来，《太阳照常升起》依然新潮，在世界各地仍然畅销不衰。海明威的后人握有这本书准确的销售数据，却没有公之于众；不过据斯克里布纳一家人估计，仅在美国国内，该书每年会卖出12万本，海外的销量当然还要翻倍。出版社知晓的翻译市场至少有18个。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三世说，该书全球每年至少会卖出30万本。[注]

《太阳照常升起》有两块基石，使它一经出版就引起轰动，并且今天依然是它立足的文学基础：它既是一部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之作，也描写了包容各种轻薄行为的花花世界——书里描绘的人类本性中的缺陷，多少年来都没有改变。

“谁都免不了当过人渣，”小说主人公杰克·巴恩斯评论道，“只要机

会合适。”[注]

这在当年和今天都千真万确。《太阳照常升起》透着小资产阶级的道德，小说揭示了这样一个世界：人们总是追求自己的欢愉，虽然他们的实际作为并不能为自己带来多少乐子。对于一些有社交恐惧的读者，这本书始终是满足偷窥癖的上选。在《太阳照常升起》的世界里，稳定、忠诚、平凡，这些价值观仿佛是来自一个清教国度的老古董，遥远而陌生。

当然，小说的相当一部分魅力来自它所描绘的那个特别的时代，即使在现实生活中，海明威身处的巴黎可能比《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巴黎更放荡、更黑暗，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潘普洛纳之行可能也比虚构故事里的更纵欲、更紧张、更迷茫。艺术家和斗牛士一样，为了登上职业生涯的巅峰，不惜赌上自己的性命，夺去别人的活路。这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注]，毕竟赌注太大了——对海明威来说尤其如此。他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阻挡他。

---

1. “Vanity Fair's Own Paper Dolls — No. 5,” *Vanity Fair*, March 1934, 29.

2. 这里指较权威的批评家。他们认为没有太多文学价值的作品会被主流文学和批评圈子拒之门外，所以就有了“看门人”的比喻。他们对于文坛新人和实验作家可能并不友好，所以“看门人”是一种略带贬义和戏谑意味的说法。“看门”现象在文学和社科领域是普遍存在的，常常是“思想狭隘、缺少包容精神”的代名词。——译者注

3. A. E.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57.

4. orin Stein,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anuary 28, 2013.

5. 这里指英王爱德华七世统治的时代，即1901年至1910年。——译者注

6. 《尤利西斯》此前是以报刊连载的形式发表的。——译者注

7. 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海明威的一位重要导师。1903年后生活在巴黎，直至去世。——译者注

8. 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是由查尔斯·斯克里布纳（1821—1871）创立的一家

出版社。特别的是，他之后的几代子孙都取名“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因此以“世”相区分。此处提到的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三世是创始人的玄孙，也是该家族第五位取名“查尔斯”的人。——译者注

9. Charles Scribner III,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March 11, 2014.

10. Paul Rosenfeld, *The New Republic*, November 25, 1925, 22-23.

11. 在英语文学中，prose（散文）代表一种语言的形式，而非一种文体。它指的是没有韵的文学语言，与verse（诗、韵文）相对。小说在语言形式上也属于prose。——译者注

12. 文学编辑路易斯·拉帕姆（Lewis Lapham）回忆说，他的父亲在20世纪20年代是耶鲁大学的学生，曾在火车站等待最新一期的《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运来，上面刊登了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几十年后路易斯也在耶鲁大学读书，他和同学们在火车站等的是印有J. D. 塞林格小说的《纽约客》。Lewis Lapham,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February 22, 2014.

13. Zelda Fitzgerald to Sara and Gerald Murphy, 1940, quoted in Honoria Donnelly,*Sara & Gerald: Villa America and After*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4), 150.

14. 普鲁斯特一生体弱多病，很少出门，而海明威从小热爱户外运动，早年在“一战”中负伤并成了美国的战争英雄。开始写作生涯后，他亲身尝试过斗牛，热衷打猎，还以一系列非常有个性的方式加入了“二战”中反法西斯的战斗。海明威的硬汉形象和普鲁斯特式的文弱作家形象形成了鲜明反差。——译者注

15. Archibald MacLeish, *Reflection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6）, 44.

16. Omitted passage from “Big Two-Hearted River” by Ernest Hemingway, quoted in Carlos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9), 132.

17. Earnest在英语中有“郑重其事”的意思。——译者注

18. 在《流动的盛宴》“一个新流派的诞生”一章中，海明威讲述了自己早年工作时被打扰的烦恼。在丁香园，任何打断他工作的人都会得到类似这样的统一回复：“你这狗娘养的傻瓜，滚回臭狗窝里去，来这里做什么！”Ernest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restored ed.（New York: Scribner, 2009）, 170.

19. 帕特里克·海明威（Patrick Hemingway）：欧内斯特·海明威与宝琳·菲佛的第一个儿子，生于1928年。——译者注

20. Patrick Hemingway,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uly 30, 2014.

21. Email from Valerie Hemingway to the author, May 26, 2015.

22. Joseph Dryer,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May 16, 2014.

23. Robert McAlmon, quoted in John Glassco, *Memoirs of Montparnasse* （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 Classics, 2007）, 43-44.

24. Morley Callaghan, *That Summer in Paris: Memories of Tangled Friendships with Hemingway, Fitzgerald, and Some Others*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3）, 26.

25. Alfred Harcourt to Louis Bromfield, fall 1925, quoted in Ernest Hemingway to F.Scott Fitzgerald, December 31, 1925-January 1, 1926, reprinted in *The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vol. 2, *1923-1925*, ed. Albert Defazio III, Sandra Spanier,and Robert W. Trogd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459.Bromfield apparently transcribed the contents of the Harcourt letter in a missive to Hemingway.

26.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71.

27. Ibid.

28. 这是西班牙潘普洛纳市的一项传统庆祝活动，在每年的7月6日至7月14日间举行，其间每天都有公牛追逐着上百名壮汉奔跑，穿城而过，直奔斗牛场。——编者注

29. Ernest Hemingway, *The Dangerous Summer* （New York: Touchstone/Simon &Schuster, 1997）, 43.

30. 耶洗别（Jezebel）是《圣经·旧约》中的一位王后，因为企图推广异教、杀害犹太先知而留下骂名，后用来代指恶毒、荒淫的女人。——译者注

31. Ernest Hemingway to Jane Heap, ca. August 23,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83.

32. Donald Ogden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Paddington Press, 1975）, 156.

33. 坎奈尔是一位旅居巴黎的美国时尚记者，对海明威的生活产生过深远影响。她的全名是凯瑟琳·伊东·坎奈尔（Kathleen Eaton Cannell），但是本书使用了她的昵称“凯蒂”（Kitty，也有“小猫”之意）。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她对应的人物是弗朗西斯·克莱恩——小说前半部分与罗伯特·科恩在巴黎生活了三年的女人。科恩一直想摆脱她，在追求波莱特夫人时把她完全抛在了脑后。这一情节和现实情况基本一致，本书后文会讲到。——译者注

34. Kathleen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reprinted i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ed. Bertram D. Sarason （Washington, D.C.: NCR/Microcard Editions, 1972）, 149.

35.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54, citing an interview with Kathleen Cannell, October 13, 1963.

36.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50.

37. Ernest Hemingway, *Death in the Afternoon*（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2）, 383.

38. Patrick Hemingway,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uly 30, 2014.

39. 巴黎的作家区：即左岸。——译者注

40. Ernest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early handwritten draft, item 193,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41.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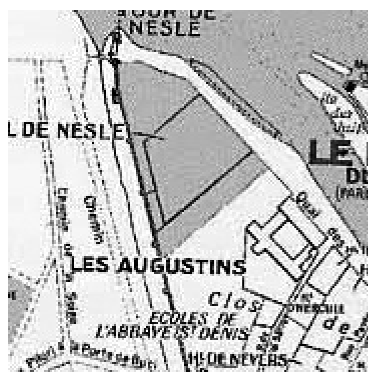
42. 塞壬是希腊神话中的海妖美人鱼，常常坐在礁石上唱歌，海员听到歌声后会情不自禁地将船驶向塞壬，直到船只触礁沉没。——译者注

43. Email from Scribners representative to the author, April 25, 2014; *shocked* :Charles Scribner III,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April 23, 2014.

44. Ernest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Hemingway Library ed. （New York:Scribner, 2014）, 145.

45. 零和博弈：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令一方的损失，不存在合作的可能。——编者注

壹


NESLE
L DE NESLE
Chemin
LES AUGUSTINS
Clos
ECOLES DE
L'ABBAYE ST DENIS

1
巴黎是个婊子

1921年，每个美国人都在谈论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年轻小说家。他有一颗冉冉升起的小说新星应有的一切：勃勃雄心（他曾对一个朋友说：“我要当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注]），风华正茂（出版第一本书时只有23岁），朝气蓬勃，位于争议的中心。对于他的出版社来说这再好不过了：这家伙不久以后就能胜任战后一代人的发言人，而且是位有利可图的发言人。他既能警醒老一代，又能引得同龄人的崇拜与跟从。年轻一代的社会节拍，已然顺从地随着他的笔尖一起律动。这个人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在美国中西部——准确地说，在芝加哥——菲茨杰拉德酝酿了一场他本人并不知情的竞争。一个有着凌云壮志的未来小说家正注视着菲茨杰拉德的成功，同时筹划着某种文学政变。菲茨杰拉德获得的名誉确实令人鼓舞，但是这位小说家认为他的作品太肤浅，人物轻佻，小说充斥着名校书生的烦杂琐事，就像香槟中的气泡。再说，他的风格新在什么地方？菲茨杰拉德写的可能是新一代人，却是通过老一代的口吻实现的。所谓的“一代人的发言人”，难道不应该使用一种真正全新的口吻吗？不应该使用新式的手法来遣词造句吗？菲茨杰拉德使用的形容词已经是明日黄花了，满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味道。

革命的时候到了，至少这是菲茨杰拉德当年还默默无闻的那位竞争对手的想法。不久，他便抓住机会，亲自引领了那次起义。这个年轻人的观点并非无人响应，他很快就收获了死心塌地的追随者。诚然，追随者的队伍很小，只有他未婚妻一人。外面的广阔世界里，没有人听说过

哪个名叫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的作家。他连一篇短篇小说都还未曾发表。

但是他的未婚妻哈德莉·理查森（Hadley Richarson）——一位坚定、极其乐观的红发女人，比海明威大8岁——确信他注定会成为一个声名显赫的作家，甚至一位文化偶像。起初，她还没有感到那种不可抑制的“对光辉前程的笃信”[注]，但海明威很快坚定了她的信念。夫妻的共同生活很快驶上了追求他事业腾飞的轨道。哈德莉写给海明威的信里洋溢着崇拜之情，使他未酬的壮志有了点儿着落，并且，她还实打实地请求做他的“助手”[注]。

对于海明威的远大前程，没有人比他自己更为确信。他不仅自信有能力创作现代文学中的大师级作品，很可能也认为自己就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大师，一个现代传奇。他的魅力无可非议。他的帅气在于棱角分明，而非性感：厚嘴唇，面部令人愉悦的对称感，专注的眼神透出某种特别的精明。他有“那种能够直视太阳的眼睛”[注]，这是菲茨杰拉德后来形容自己书中人物的话。

他遇到的都是不凡之事，即使是坏事，也能被写成相当不错的故事。聚光灯追寻着他，就像被磁力吸引一般。3年前，海明威还有几天就满19岁时，他在意大利前线给士兵分发香烟和巧克力时被敌军的炮火炸伤。[注]这让他成了“一战”中第一个在意大利负伤的美国人，他吸引了全美媒体的目光。《纽约太阳报》报道了击中他双腿的弹片数量：“227处，每一处伤都是一枚奥地利弹片造成的。每枚都有0.22英寸（口径）手枪的子弹一样粗、1英寸[注]长，相当于一截电缆打进了他的腿里。”[注]芝加哥的报纸上也登满了海明威的新闻。在米兰的医院恢复时，总有一群崇拜者围在他身边，带给他带各种各样的礼物。

“大家爱他。”他的护士阿格尼丝·冯·库洛斯基（Agnes von Kurowsky）[注]回忆说。[注]

而且他也喜爱得到人们的关注，他的真实想法，正如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除了在牺牲之后读到自己的讣告，这是最好的事了。”[注]但是，几篇头条文章，军队里几位战友的仰慕，不是海明威想象中的命运归宿。虽说吸引同辈人成为追随者的能力是他日后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他热望着在更高的水准上得到关注。然而，一个人不可能无所事事，然后就一跃成为世界闻名的革命性作家。他仍需真正写出能为他赢得名誉、使他成为现代世界真正的文学发言人的作品。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但又是必经之路。

他确实在努力。到1921年夏天，他已经构思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哈德莉对此欣喜若狂。

“你要写小说，这太好了。”她对21岁的未婚夫说。只要能看到他完成小说，她可以帮忙做任何事。“我可以特别特别开心地陪你写完它，或被你踢出门、塞进某个角落里，只要你愿意。”她向他保证。[注]她已经看得出，海明威的第一本书将是一部纯现代的作品，简单、凝练。他的写作手法“精简了除必要和结构性内容之外的所有东西”，她如是赞许。它简约得令人叹为观止，“却又和精细的护身铠甲一样经过了千锤百炼。”[注]

当时她和海明威分居在不同城市，正在计划他们的婚礼。哈德莉想在她长大的城市圣路易斯举办婚礼；而海明威的大本营在芝加哥，他在那里为一份名叫“合作共赢”（*Cooperative Common-wealth*）的杂志做记者，业余时间为《多伦多星报》撰稿，勉强以此谋生。[注]在伊利诺伊州橡园镇（Oak Park）上高中时，他就开始锻炼自己做一名记者的能力，当时他为校报《秋千》（*The Trapeze*）写稿。那些年，他也尝试过虚构写作，已经有了一些文学的冒险经历。

“西塞罗[注]就是个传声筒，”1915年他写道[注]，“我双手捆在背后都能比他写得好。”[注]

虽然海明威家确实有一些艺术创造的氛围，但他的家族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文学传统可供借鉴。他母亲是一位非常有抱负的歌剧演员，常常带着孩子们去芝加哥周边的音乐会，看戏剧和画展。海明威十几岁时，他在文学上的天分开始显现，而在视觉和表演艺术上倒是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得到老师的表扬，作文总是被当着全班朗读。他的高中文学杂志《泥版书》（*The Tabula*）中刊有他最早期的短篇小说——和他后来的一些作品一样，涉及拳击、林中野营和自杀的主题。那时，他的作品模仿多于原创，经常借用林·拉德纳（Ring Lardner，一位流行的体育和幽默作家）的风格。不过1917年高中毕业时，海明威被提名为“班级先知”——这一称号本身就带有未卜先知的意味，考虑到他后来昭示并亲自迎来了现代文学的时代。

但是，自从海明威离开了橡园镇的高中，他就再也没有得到文学上的鼓励。海明威做医生的父亲希望他去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注]读书，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正在欧洲熊熊燃烧，海明威和他那一代的无数年轻人一样，不满足于道听途说，想亲眼见证这场战争。后来他承认，自己就像看体育比赛一样看待这场大战，年轻时的自己就是一个“蠢蛋”。[注]海明威因为视力问题不能参军，但在1918年，红十字救护车队认定他的资质足够去开车，很快将他派往意大利。没几周，他就负伤了。

回到美国之后，海明威找了一份记者工作，但是没有杂志对他的短篇小说感兴趣。一些专家认为，现存的海明威早期的小说确实无聊而缺少新意，那时候的海明威距离日后他所成为的“英语文学伟大的革命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他早期遭受的大量拒绝是完全有道理的。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是20世纪20年代初那些杂志编辑的错——是他们没有伯乐的眼光。

“我读过（海明威）1920年的作品，觉得它们写得非常好，”海明威儿时的好友比尔·史密斯回忆说，年轻时他们交往甚密，“唯一的问题

是，他把作品投错了杂志。”史密斯说，像《星期六晚邮报》（一份非常受欢迎的小说报纸）这种刊物，“永远不会采纳他的实验写作作品……他在去巴黎之前就已经开始实验写作了”。[注]

毕竟，菲茨杰拉德早期的短篇小说也曾被人弃如草芥。在文学生涯早期，有一段时间，菲茨杰拉德特意把100多封退稿信贴在他卧室的墙上。[注]只有借助首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的火力，菲茨杰拉德才得以突破困境。首部长篇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都是从他们熟悉的生活背景着手的。菲茨杰拉德把他战前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生活用一种乡村酒吧式的场景在小说中呈现出来；海明威在构筑他的第一部长篇时，明显把背景设在了密歇根北部——他小时候的夏天都是在那里度过的，而且书中充斥着钓鱼和打猎的故事。[注]这部小说在1921年时写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无从知晓，海明威甚至可能同时在写好几部。在与哈德莉的闲聊中，他显然说起过好几种想法，因为她曾写信告诉他，自己“由于这些小说而感觉飘飘然！”她还说：“我们无法自由地让你把所有最好的时间都用来写作，真是罪过。”[注]

不过，想写出期待中的大作，海明威至少要待在一个更适合捕捉灵感的地方。当时，海明威正寄宿在比尔·史密斯以写广告为业的哥哥Y. K.史密斯（Y. K. Smith）那里。他家同时收留了一群房客。哈德莉去芝加哥时也住在那里，她就是在那儿第一次遇到海明威的。他们一见倾心，毫不顾忌年龄的差异。他喜欢她的红发和她弹钢琴时的样子，她认为他“大块头，有男子气概”[注]。他们互相起了外号。在他们共同的好友圈中，海明威被叫作“Oinbones”、“Nesto”、“Hemingstein”和“Wemedge”。哈德莉管海明威叫“Erniestoic”，而她的绰号是“Hash”。甚至公寓本身都有个诨名：长住所（the Domicile）。[注]

很快Wemedge和Hash订了婚，开始筹备婚礼——并不是圣路易斯的社会新闻预告的那种大场面，仅仅是密歇根州霍顿港（Horton Bay）的

一场乡村小婚礼，这个镇子是海明威小时候消夏的地方。婚礼最终在1921年9月3日举行，教堂位于镇上的百货店隔壁。新婚夫妇接下来打算前往意大利，可能要在那儿待上一两年，蜜月之旅的首站将是那不勒斯。

这次旅行倒像一场回归之旅，海明威以自己在意大利的英雄事迹为傲。他还用当年从腿里取出来的弹片打了一枚戒指，这个可以戴在身上的纪念品，见证了他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以及他第一次名扬四海。海明威急切地想向哈德莉炫耀这个国家，他开始兑换意大利里拉。哈德莉早就想向他证明自己不是碌碌无为之辈，她也准备“勇敢地、身无分文地向意大利佬的土地冲锋”[注]。

这一场冲锋确实勇敢，但并非身无分文。哈德莉有一个信托基金，是她的银行家祖父为她投的，被她称为“我亲爱的一小袋果仁”[注]。基金每年为哈德莉提供2000到3000美元[注]的零花钱。海明威认为自己在《合作共赢》没有前途，辞去了那里的工作。哈德莉的“黑心钱”（用海明威的话说）[注]成了他们这次海外探险的主要动力。

“有人认为哈德莉被称作‘Hash’，是因为她继承了一笔遗产，可以让海明威不工作也有肉吃。[注]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比尔·史密斯后来说，“‘Hash’只是对‘哈德莉’这个名字的嘲弄。”[注]

不管“Hash”和“Cash”有没有关系，哈德莉确实让海明威吃上了白食。虽然不是什么大餐，但是油水也足够了。她的钱会被汇到欧洲去，接下来的5年里，这个信托基金将是他们唯一稳定的收入来源。此前，海明威已然在担心他的报道工作会把其他的写作都“推到一边”[注]，他那没日没夜的工作节奏，让他“又忙又累，无心他顾”。他必须摆脱这种拔河一般的生活。这场由圣路易斯银行家赞助的意大利之旅可能正是他需要的喘息。

“想想看吧，意大利能让你摆脱一切，只留下爱与宁静作为你写作的布景，”哈德莉在给海明威的信中写道，“让你的写作像壮阔的海风，一扫内陆各种奇怪角落里的怪味。”[注]

即使在新婚时期，哈德莉也知道她的地位让海明威盖过了，不过她似乎并不在意。她满足于做一个天生英才背后的女人，甚至对此欣喜若狂。她所有的资源都听任海明威的差遣。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安然地“去写生命中那些最好的事”，她对他说，“欧内斯特，你做的是非同凡响、惊天动地的事……让我们永远不要分开。让我们一起向前”。[注]他们打算那年11月出发去欧洲。

若不是因为“长住所”的一位常客干预，可能接下来出现的就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海明威的巴黎时期”了，而是“海明威的那不勒斯时期”。

如今，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已经有些被人遗忘了，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是位名人。虽然不是那种家喻户晓、畅销书大作家似的名人，但确实有不错的口碑。他的作家之路还是一段蛮曲折的经历。有一个时期，他担任过一家公司的老板，公司业务是邮购油漆。据传在1912年，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精神崩溃了，走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他选择了文学，想以此治愈心疾。到了1914年，他已经开始在杂志上发表小说了。1921年见到海明威时，他正处于事业扶摇直上的时期，他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小城畸人》（*Winesburg, Ohio*）正在热卖。他被授予1921年的“日晷奖”[注]，以表彰他对美国文学的贡献。短篇小说是他的强项，而他的长篇小说也被批评家和公众欣然接受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就将被人淡忘，但20年代的舍伍德·安德森是个名人。他在芝加哥广告圈认识了Y. K.史密斯，和后者住得很近，每次他前来史密斯的公寓都是件激动人心的大事。

初次见面的时候，安德森没有理由听说过海明威，但海明威是知道

安德森的。他和别人一样，认可安德森的短篇小说，却觉得他的长篇“贫乏得出奇”[注]——这一先知先觉的评价（按照安德森儿子的说法，这是个近乎恶毒的评价）几年后受到了人们的很大重视。

安德森走进公寓的时候（很可能是一副衣装不整的样子，因为他常常像位不修边幅的教授，一柜子的好衣服都不合身），海明威以礼相待，周到又不过分殷勤。[注]这将是他对待潜在的大牌导师的惯常方式。海明威后来说，他和安德森当时“绝口不谈写作的事”[注]，即使这是真话，他仍然成功地给这位文学老江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安德森和哈德莉一样，很快确信海明威将来会大有作为。

“谢谢你为我介绍那个年轻人，”见过海明威之后，安德森对史密斯夫妇说，“他并非池中之物。”[注]

Y. K.史密斯平常会给男男女女牵线搭桥，这是他做媒经历中最闪亮的一次。“他当时就知道海明威是个天才。”弟弟比尔·史密斯回忆道。那时比尔认为海明威是天才吗？“当然不，”比尔后来承认，“这家伙不是什么天才。”[注]不过Y. K.史密斯很高兴两位作家能情投意合，并且立即看出海明威见过安德森以后的变化。后来他写道：“此时海明威开始严肃地把自己的才能当作一种诱人的可能性。我想这是他与大作家的第一次接触，给了他一次衡量自我的机会。”[注]

海明威把自己和安德森比对了一番，似乎认定自己处于一个可以后来居上的位置——或者至少，他自觉足以批判这位老到的作家。在后来的几次回访中，安德森不时向“长住所”中的众人朗读自己的作品，其中一字一句海明威都会仔细体味。他可能对安德森很客气，但是据说他私下里“完全敌视”[注]安德森的写作手法。

一次朗读会结束，安德森离开后，海明威宣称：“你不可能写句那样的话就完事了。”[注]

安德森把海明威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Ludyard Kipling）相比较，这也得罪了哈德莉。“那是愚蠢的比较，”她在一封信里对海明威抱怨道，“我为什么不喜欢把你比作任何人……你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注]

不过，安德森确实为他不太明智的冒犯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补偿。每次来做客，如果不朗读自己的文稿，他就常常向“长住所”的住户大谈巴黎的种种神奇。这个城市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全美国从事各种创作的人。1921年早些时候，安德森跨越大西洋来到巴黎。在那里他见到了活生生的格特鲁德·斯泰因，她是美国侨民[注]、实验作家，众所周知，她在近20年前移居法国。他也见到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那时乔伊斯正忙着在一本美国杂志《小评论》（*The Little Review*）上连载《尤利西斯》，挑战读者大众的道德底线。身处巴黎的安德森需要抬高一点儿姿态，不然谁能一出现在蒙帕纳斯[注]，就被无缘无故地邀请到斯泰因传说中的会客厅中，或是乔伊斯家的晚餐桌上呢？

为了得到这些机会，安德森来到了莎士比亚书店。虽然当时创立未久，但它已经是一家在左岸名声响亮的英文书店了。书店的创立者和经营者是美国旅居者西尔维娅·毕奇（Sylvia Beach），她和城里的很多艺术家都有交情。有一天，毕奇发现一个男人站在书店门前的台阶上寻寻觅觅，一直不进店。终于，他笨手笨脚地走进来，对毕奇展示在橱窗里的一本书表达了敬仰之情。他赞不绝口，说巴黎没有别的书店有如此高雅的品味，会出售《小城畸人》。接着，他表示自己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毕奇立即对安德森兴致大发。“我看他像一个诗人和传教士的混合体，可能还有一点儿演员风范。”毕奇后来回忆说。[注]安德森停留了一会儿，向她大讲自己从油漆行业弃厂出走的传说。毕奇颇有好感，把情人安德琳·莫尼耶（Adrienne Monnier）引荐给他。莫尼耶也一样兴味盎然，邀他一起吃晚餐。安德森知道，至此他已被正式纳入巴黎文学客居

者的一座大本营中。

这座大本营又连着另一座。很快，安德森敦促毕奇把自己介绍给格特鲁德·斯泰因，后者的作品令安德森无比惊叹，深受影响。毕奇爽快地同意了。他们来到斯泰因的会客厅，安德森由衷高兴地亲吻了斯泰因的手。

“舍伍德表达了他对斯泰因作品的尊敬与仰慕，这让她十分高兴，”毕奇回忆说，“她明显被感动了。”[注]这次见面开启了一段延续数十年的文学友情。可能安德森本可以留在巴黎，幸福地成为海派精英圈的一员，尤其是他如今已经吃定了圈子里最为德高望重的两位老祖母，但他还是回到了美国，在整个文学生涯中都是一位忠于祖国的本土作家。这着实是逆潮流而动的做法，让人不能理解。但是面对旅居生活种种好处的诱惑，安德森就是不为所动。

他对斯泰因解释说：“你瞧瞧，我的朋友，我诚恳地相信着我们这个大杂烩国家。奇怪了，我就是喜欢它。”[注]

话虽如此，安德森仍然会热心地鼓励其他热衷创作的人到大西洋彼岸去。他发现他的话，海明威和哈德莉听得进去。在芝加哥，一次晚餐席间，他建议他们立即把手上的意大利里拉换成法国法郎。巴黎绝对是有实验写作意图的有志青年应该去的地方。那里物价不高，再说了，安德森认识如今的“看门人”，可以为海明威铺路。

他确实有说服力：没到感恩节，海明威夫妇就收拾了原本去那不勒斯要带的行头，转向法国。两人放弃了重温海明威的当年之勇，转向另一个舞台，一份新的、更大的、命中注定的荣耀。毕竟，巴黎如今是一个写作创新的实验室，是人们心目中的宇宙艺术中心。不过，即使这座城市吸引了无数即将成为现代小说家的人——海明威也将成为竞争者之一——其中的机遇也不可小觑。尚未有人创作出一部真正“巴黎”的小说，或是一部为战后旅居作家立言的作品。菲茨杰拉德已经在关注战后

纽约的不满和堕落情绪了。在巴黎，空气可能会好一些，资源也当然更丰富。

夫妇俩离开芝加哥的前一天晚上，海明威去了安德森的住处一趟，留下了一件礼物以示感激：一个超大容量的军用背包，里面装了100多磅[注]从自己公寓拿来的罐头食品。安德森对此举十分感动。

“我记得他上楼来的样子，一个肩膀宽阔的大男人，一边进屋一边嚷嚷。”他回忆说，“这是个好主意，把他带不走的食物送给同样卖字为生的穷酸作家。”[注]

安德森颇为用心地回礼。第二天，当海明威登上横穿大西洋的轮船时，已拥有了一张从哪个银行都拿不到的硬通货：安德森提供的一封私人介绍信，把他介绍给了巴黎最有威望的人物。

海明威夫妇在圣诞节之前到达了巴黎，这并非是认识这座城市的最佳时间。这就好像在一个貌若天仙的女子宿醉未消、妆容不整时拜访她。即使是最穷的旅居者也会想方设法逃离巴黎阴冷难熬的冬天，海明威夫妇很快也会加入这个行列[注]。他们从船舱里走出来，首先去的是圣日耳曼区的雅各-丹格列特酒店（Hôtel Jacob et d'Angleterre）。此前安德森来巴黎时住的就是这个地方，并且向海明威夫妇推荐了它。安德森甚至提前往酒店里寄了一封信，欢迎两位的到来。酒店便宜得很——一天12法郎[注]，相当于不到1美元——并且在圈子里声名狼藉。“维吉·鲍姆的《大酒店》（*Grand Hotel*）[注]所讲的故事都不及这家酒店里发生的那般曲折。”一个曾在巴黎工作过的编辑回忆说。[注]在那个地方，艺术名流的缤纷往事和店内枯燥的装潢形成了鲜明对比。

和所有最近到达巴黎的美国人一样，海明威夫妇放下行李后直奔多摩咖啡馆（Le Dôme），那是个以流言蜚语和茴香酒为养料的地方，是左岸旅居者殖民地的神经中枢。多摩是一剂治疗孤独的特效药：人们会

集于此，开怀畅饮的酒客似乎让新来者相信，自己在巴黎终将找到立足之地，融入歌舞升平之中。之后不久，海明威就越发看不起这样的咖啡馆和里面的侨民“难兄难弟”（原文为inmates，这是海明威给咖啡馆顾客起的绰号[注]）；不过初来乍到时，他俩曾把多摩咖啡馆当作自己的基地，逐渐摆脱了刚踏上陌生土地时的晕眩与迷茫。海明威和哈德莉啜着热朗姆宾治，将他们对巴黎的最初印象写在信中，寄给家人和朋友。

“我们日日夜夜在街上散步，手挽着手。”他写信告诉安德森。天气太冷了，他抱怨说，他们的心情一直有些低落。[注]“我虽然对巴黎没有什么期盼，但它也不能是那个样子的。”后来他说。[注]

多摩咖啡馆里面暂时是温暖的，但它外面是掉光叶子的树，公交车冷峻的影子穿梭在灰暗的雨中。海明威和哈德莉在街上走着，看着冷色石板铺成的院落，商店的窗子，马身上冒着热气。在巴黎，大街小巷都存在突兀的景色。黎明时分，整夜狂欢的旅居者在回家途中，可能会遇上吹着哨子的牧人正在将黑脸羊聚拢成一群，甚至可能会遇上一辆满载萝卜的马车，搭上他们一程。这座城，以及它大多数的居民，身上都还带着战争的伤疤。“我观察（老兵们）是怎样灵巧地适应残障生活的不便，观察他们假眼球的光泽，或者他们接受的面部重塑手术效果如何。”海明威写道。[注]对哈德莉来说，巴黎是一个“奇怪的城市，惊奇而怪异”[注]。

夫妇俩有一些花费不多的奢侈和消遣。蒙帕纳斯区很小，这颇令人安心。区内的社会生活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家咖啡馆和酒吧里，相互之间并没有几条街的距离。这对新婚夫妇散步时总会走很长的路，但总有一家港湾欢迎他们停靠，令人安心。哈德莉喜爱法国点心，海明威喜欢书写的快意，给亲友写信讲这里的每个细节，食品和酒的价格是多么便宜，垃圾箱里扔着各种烈酒瓶子，酒店房间又是怎样的。多亏了战后法国的通货膨胀，美国人在巴黎几乎什么都可以支付得起。[注]美元就是王道，1美元值12块半法郎；1加元也颇为值钱，可以换11法郎。甚至美国

的乞丐到了法国都会被生意人奉为上宾，不论是遇到旅馆、饭店老板，还是“母鸡”（poules）——法语中“母鸡”一词有妓女的意思。几乎每位美国来客都要做好心理准备，“被当作一个百万富翁对待，同样也因此被敌视”，阿尔弗雷德·克莱姆伯格（Alfred Kreymborg）写道，他也是20世纪20年代早期到那里的一位美国作家。[注]

也许巴黎对海明威夫妇来说就像一个低物价的天堂，不过最初他们还没有发现这座城市里更腐朽、更复杂的享乐。此时他们很难想象，未来的自己将成为20年代的巴黎一切浪漫和刺激的缩影。

尽管海明威抱怨过，记者工作让他无心顾及严肃的文学追求，但他还是谋得了《多伦多星报》驻巴黎记者的职位。这是个自由的职业，主要写反映巴黎风物的文章。这意味着他只要好好观察新的生活环境，就有钱拿。

美国的编辑[注]很快发现，美国国内对关于巴黎的小说胃口极大。美国的富人一向对巴黎时尚心驰神往，不过新近时期，美元的强盛让广大美国平民都能负担得起巴黎的奢侈享受了。初识上流社会的少女、食不果腹的艺术家，甚至中西部的中产市民都开始兴致勃勃地关注一切关于法国的东西：从法国侨民社区的社会新闻，到巴黎咖啡馆和沙龙中各种艺术运动迸发出的星点火花。记者亚瑟·鲍尔（Arthur Power）开始在《巴黎先驱报》上连载一个名为“画室内外”[注]的栏目，专门记录蒙帕纳斯画家们的生活。羽翼渐丰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邀约作家珍娜·弗兰纳（Janet Flanner）[注]主笔一个名为“巴黎来信”的双周专栏，从巴黎的政治传言到枕边八卦（这两个领域的重合总是最让人喜闻乐见的），无所不谈。《时尚》（*Vogue*）杂志对于巴黎的报道与推崇，甚至到了实实在在赠送读者“巴黎游”的地步，《时尚》驻巴黎的信息局会为读者提供服务。“巴黎可能是世界上最慷慨的城市，这里最充裕的就是纯粹的欢愉。”《时尚》的一位作者惊叹道。[注]

相比之下，海明威的新闻报道并没有许多惊人之语。他很快摸清了同时代美国旅居者们的底，在《星报》上大谈他们的短处。

“巴黎是造假和虚张声势之人的圣地。”他在到达巴黎不久后所写的一篇报道中说。三教九流的美国人纷纷来到这里，把自己打扮成非比寻常的人物，从假冒的“舞蹈明星”，到扮成职业拳击手的无名小卒，这些自以为是的美国人能够全身而退的唯一原因，据海明威说，是法国人极度“没见过世面”。对于任何想在巴黎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大人物的人，他给了一些指导：“你必须选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自称是那里最好的，然后别遇见从那里来的人。”[注]

他也朝群聚在蒙帕纳斯咖啡馆里的客居外国人射出了一支锋利闪亮的箭。“纽约格林威治村[注]的渣滓被撇出来，大瓢大瓢地泼在巴黎圆亭咖啡馆附近的街区里。”（圆亭咖啡馆是客居者的另一个主要聚集地，和多摩咖啡馆隔蒙帕纳斯大道相望。）在海明威看来，这些装腔作势的旅人和客居者，大批地涌入圆亭，“无不努力造出漫不经心的衣着风格与个性，结果却统统是一派怪异的作风。”他们很难成就不朽的创作，他断言说，“美好的旧时光已经一去不返了，那时夏尔·波德莱尔曾用绳子牵着他的紫色宠物龙虾，在这个古老的拉丁区遛弯[注]，可在那之后这些咖啡馆里就再也没诞生过多少好诗。”[注]

海明威的话题选得颇为精明，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战争结束后，左岸的咖啡馆和酒吧就成了外国旅居者喧闹聚会和纵酒狂欢的处所，其中处处是不成文的规矩。当新客来到蒙帕纳斯，他们要小心地选择自己应该隶属哪家咖啡馆，因为从此人们就会依此评价他们。多摩是美国侨民的官方流言集散地：想传播一桩风流韵事、炫耀新的情妇或是有一本新上架的小说要吹嘘，都得去多摩咖啡馆，那样，流言就便于在人群中以令人满意的速度飞传。多摩的主顾嫌恶圆亭的顾客，文学圈里的人也不喜欢圆亭咖啡馆的老板，他被称作“凹凸有致、一脸死相的猪”[注]，或是简单的一句“杂种”。（是他冒犯在先：他命令女士不能在咖啡馆里吸

烟，坐下的时候也不能摘帽子。美国人不能接受，他们去咖啡馆就是放松的。）幸运的是，中间的蒙帕纳斯大道足够宽，否则“多摩帮”和“圆亭帮”就会互相丢椅子。不过叫骂声还是会穿过喧嚣的街道，清楚地传到对面去。

这里人的行为与美国西部荒野小酒馆中的顾客无异。“很多客居者在本国是非常彬彬有礼、脾性温良的公民，一踏上蒙帕纳斯，却立马变成了野蛮人。”当时一位酒吧招待回忆说。[注]不过比起有些咖啡馆老板的黑心手段，主顾们醉酒之后的滑稽作态真的不算什么。老板们互相之间会暗中使坏。举个例子，希莱尔·希勒（Hilaire Hiler）是一家颇受欢迎的酒吧——骑手酒吧（Le Jockey）——的老板，一次他发现酒吧卫生间里有一位顾客正打算服毒自杀。[注]他设法让顾客把毒药呕吐出来，然后让这人说出个中缘由。

“希勒，我不行了，我真的过不下去了，”顾客说，“别拦我，我马上就会再服一次毒的。”

“那你坑我干吗？你为什么要坏骑手的生意？”

“我不是有意的，先生，真的不是。”

“那好，”希勒说，“下次你想死，找别的地方去。”顾客问他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推荐，希勒想了想说：“嗯，你懂的，多摩是我最大的对手。”

第二天，那个人被发现死在了多摩咖啡馆的厕所里。任何敏锐的作家都能很快意识到，有的事恰能透出人性不那么光彩的一面，这种情况在巴黎极为常见——而海明威比多数作家还要敏锐。这件事立即被海明威拿来给报纸投稿，好赚点稿费补贴家用。但是巴黎蕴藏着能够成就更大规模、更重要作品的无限潜质，只要各种前提条件都能遂人心意，写出深刻的文学是有可能的。

其他作家肯定也感受到了，巴黎是文学潜能的宝库，但是太多的可能性都在纵酒狂欢中被挥霍掉了，来不及清楚地记录。一些客居者把他们的巴黎生活比作一场无休无止的毒品派对。诗人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将这里的生活描述为一曲没完没了的欢乐颂：“晚宴，聚会，诗人，腰缠万贯的怪人，画家，翻译，龙虾，苦艾酒，音乐，漫步，蛤蜊，头痛药，画作，迷恋同性的富家千金，编辑，书籍，水手。”[注]对于美国作家马尔科姆·库利（Malcolm Cowley）来说，巴黎就像可卡因，当他想振作起来开始工作时，巴黎就让他动弹不得。[注]一些客居者很快领教到，巴黎的魅力并不那么有利于身体健康，与它保持一点儿距离十分明智。

“（一开始）我兴奋到无法平复。”罗伯特·麦克阿尔蒙（Robert McAlmon）说。他是一位美国来的编辑，人生即将与海明威发生交集。“但是我完全明白巴黎就是个婊子——人不能在妓女那里陷得太深，尤其当她们冷酷无情的背后，还有聪明才智、想象力、经验和传统撑腰。”[注]海明威是聪明人：他从来没有陷得太深，即使刚到巴黎漂泊的时候也没有。放荡享乐渐渐让一些不怎么有毅力的作家山穷水尽，而海明威却把巴黎愉快地描述成一个“秩序刚刚好的城市，作家只要照实写就可以了”[注]。因为能抗拒诱惑，海明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一优势让他得以成为局外的观察者。后来，他小说里的很多主人公也具有这种秉性。

在海明威把蒙帕纳斯的气氛和人物正式写进文学作品之前，他用一系列“巴黎生活”小短文来记录它们。我们能从一些投给《多伦多星报》的稿件中，感受到他做的文学实验，有的文章甚至包含对话。一则稿件详细描述了一段偷听来的对话，说话者是两个法国男人，他们的老婆坚持要给他们的发型把关：

“你的头发怎么了，亨利！”一个说。

“我老婆，老的那个，让她给理了。但你的头发呢，怎么也这样？这可不潮啊！”

“也是我老婆干的。她也给我剪了。她说理发师都是死猪，但看她理的，我也会给她一样的评价。”注

他的稿件还讲了一个俄国贵族去当铺典当珠宝的故事。十月革命迫使这位贵族流亡海外，如今他整日“在巴黎游荡，怀着一种孩子般的希望——他的国家终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复原如初”注。在海明威的叙述里，读者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失败的欧洲政客；心黑到不可救药的卖假阿拉伯毯的商人；法国的制帽人为了装点他们的帽摊，招来一群麻雀落在上面；一位资深刽子手拥有一大一小两套断头铡刀，一套适合正常大小的断头台，另一套出差的时候用。

不过，海明威还是一次次把目光转向了客居巴黎的美国人。关于他们，他就是有讲不完的话。他明确说自己最擅长从这些自我流放的同胞中识别虚伪小人——显然，这涵盖了除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这些人都是他观察的对象：一个丑陋的美国游客希望“巴黎成为一座超级索多玛，一个更大的蛾摩拉”注，并且“乐意花钱实现他的理想”；一个戴金色假发的胖女人瘫坐在圆亭咖啡馆的椅子上，嘴里叼着一支两英尺注长的香烟嘴；一个康涅狄格州的家庭主妇，在咖啡馆里为各种奶油小生买单。海明威写道，他们是讨人嫌恶、毫无价值的一群人，其中还有人坚持装作艺术家，尤其恶心。

“他们基本都是二流子，”他的一篇《星报》文章说，“问题是人们在游览拉丁区的时候，从圆亭的窗外望进去，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巴黎最伟大的艺术家们的集会。我想以一种非常官方的姿态回应这种观念：真正有好作品的巴黎艺术家对圆亭的这群人深恶痛绝。”

显然，海明威和那些鄙视冒牌货的真正作家站在一起。他还尚未公

开加入那些受到认可的真艺术家圈子，但是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里，有一种暗含的期许：他很快会加入他们的阶层。

---

1. F. Scott Fitzgerald to Edmund Wilson, quoted in Edmund Wilson, *Classics and Commercials: A Literary Chronicle of the Forti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110.

2. Alice Hunt Sokoloff, *Hadley: The First Mrs. Hemingway* （New York: Dodd, Mead &Company, 1973）, 19.

3. 比如，哈德莉在一封写给海明威的信里说："我把你的志向视为至宝，我希望成为你的助手——而不是你的障碍——我会做任何事，只要能对你的志向有些许贡献。" Hadley Richardson to Ernest Hemingway, January, 13, 1921, quoted ibid., 21-22.

4. F. Scott Fitzgerald, *The Last Tycoon*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2010）, 23.

5. 关于自己一点儿也不光荣的负伤，海明威在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中讽刺地再现了这个场景，让男主人公在吃干酪时被炸伤。

6. 1英寸=2.54厘米。——译者注

7. "Had 227 Wounds, but Is Looking for Job," *New York Sun*, January 22, 1919,reprinted in *Conversations with Ernest Hemingway,* ed. Matthew J. Bruccoli（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6）, 1.

8. 阿格尼丝·冯·库洛斯基为众人所知，因为她是《永别了，武器》的女主人公凯瑟琳·巴克莱的原型。——译者注

9. Agnes von Kurowsky, quoted in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49.

10. Ernest Hemingway to his family, August 18, 1918, reprinted in *The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vol. 1, *1907-1922*, ed. Sandra Spanier and Robert W. Trogd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0.

11. Hadley Richardson to Ernest Hemingway, August 18, 1921, quoted in Sokoloff,*Hadley*, 27-28.

12. Hadley Hemingway to Ernest Hemingway, date unspecified but said to be in response to an April 1921 missive from Ernest Hemingway, quoted in Raymond Carver, "Coming of Age; Going to Piece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7, 1985.

13. 依据卡洛斯·贝克（Carlos Baker）所说，海明威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4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30美元（*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76）。

14. 西塞罗：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编者注

15. 此时海明威16岁左右。——译者注

16. Ernest Hemingway, quoted ibid., 21.

17. 欧柏林学院是一所顶尖的美国私立大学，有一定的人文底蕴，位于俄亥俄州。海明威高中毕业后去了“一战”战场，没有上过大学，只有高中文凭。这也就是他后来和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哈罗德·勒布等名校毕业生心存隔阂的渊源之一。——译者注

18.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May 30, 1942, quoted ibid., 38.

19. Donald St. John, “Interview with Hemingway's ‘Bill Gorton,’” *Connecticut Review* 1,no. 2（1968）, and 3, no. 1 （1969）, reprinted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174-175.

20. Malcolm Cowley, *A Second Flowering: Works and Days ofthe Lost Genera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3）, 22.

21. Hadley Richardson Hemingway Mowrer to Carlos Baker, quoted in Gioia Diliberto,*Paris Without End: The True Story of Hemingway's First Wife*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11）, 133.海明威最早构思的长篇小说可能还是一个爱情故事，至少作者本人是这么说的。几十年后在《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为这部不幸夭折的作品添上了一点儿柔和的颜色，说自己在写它的时候还怀有“男孩时代的诗情”（*A Moveable Feast*, 71）。在1921年写给哈德莉的一封信中，海明威提到了这部长篇可能的情节（信中的信息太含糊，不禁令人生气），说它“包含真实的人，谈论、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Quoted in Peter Griffin, *Along with Youth: Hemingway, The Early Yea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69.

22. Hadley Richardson to Ernest Hemingway, 日期未知，但估计为1921年8月，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Library and Museum。这个时期海明威写给哈德莉的信内容是什么，我们已无法确知。据说，在他们的婚姻破裂后，这些信件被哈德莉付之一炬。（Diliberto, *Paris Without End*, xix.）两人的通信量很可能是巨大的：从1920年11月到1921年9月初，哈德莉给海明威写了将近200封信，都被海明威保存。（Sandra Spanier, “General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the Edition,” i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1:xxiii-xxiv.）

23. Hadley Hemingway Mowrer, quoted in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75.

24. 除非是完全的局内人，否则很难解释这些绰号的具体含义。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其中一些绰号的大致含义。比如，“Hemingstein”大概和爱因斯坦有关，“Erniestoic”和海明威的名字“Ernest”、形容词“stoic”（坚忍的、理智的）等词有关。“长住所”一词是常见的法律、公文用语，这也许是海明威和哈德莉在自嘲简陋的栖身之所。——译者注

25. Hadley Richardson to Ernest Hemingway, January 13, 1921, quoted in Sokoloff,*Hadley*, 21.

26. Hadley Richardson to Ernest Hemingway, April 1, 1921, quoted ibid., 25.

27. 1921年的3000美元大致相当于如今的40000美元。

28. Ernest Hemingway, quoted in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78.

29. “Hash”一词意为肉丁，也与“Cash”（现金）一词发音相似。——译者注

30. St. John, “Interview with Hemingway's ‘Bill Gorton,’” 160.

31. Ernest Hemingway to Grace Quinlan, July 21, 1921, quoted i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1:290.

32. Hadley Richardson to Ernest Hemingway, undated, quoted in Sokoloff, *Hadley*, 2728.

33. Hadley Richardson to Ernest Hemingway, April 1921, quoted in Carver, “Coming of Age.”

34. 《日晷》（The Dial）在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一本较有影响力的现代文学杂志。——译者注

35.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60.

36. 这里参考了查尔斯·芬东（Charles Fenton）的记载。他曾采访过海明威早期在芝加哥的朋友和同事，并在1954年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海明威传记。

37. Robert Emmett Ginna, “Life in the Afternoon,” *Esquire*, February 1962, eprinted in Bruccoli, *Conversations with Ernest Hemingway*, 155.

38. Fenton, *Apprenticeship of Ernest Hemingway*, 104.

39. St. John, “Interview with Hemingway's ‘Bill Gorton,’ ” 179.

40. Y. K. Smith to Donald St. John, excerpted ibid., 179.

41. Fenton, *Apprenticeship of Ernest Hemingway*, 104.

42. bid.

43. Hadley Richardson to Ernest Hemingway, date unidentified, quoted in Sokoloff,*Hadley*, 41.

44. 近代巴黎是世界文学艺术之都，前往巴黎朝圣的别国艺术家会在这里获得超越自己国家水平的艺术技能、视野、关系与声望。这些人于是与他们各自国内的文艺圈形成了非常复杂微妙的关系。研究这种关系的历史和学术作品浩如烟海，这里不再赘述。20世纪初的中国也不乏赴巴黎取经的作家和艺术家，比如施蛰存、徐悲鸿等。总的来说，法国巴黎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在此长期居住，这类人被统称为“expatriate”或“expat”，可直译为“侨居外国者”或“流亡者”，本书中的“侨民”“旅居者”“客居者”或“海派”等称呼，指的都是这些人。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虽然以巴黎左岸的文人圈为大背景，但讲述的故事大部分以美国旅居作家为中心。虽然说美国旅居者在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十分活跃，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就是那个时代巴黎的全部。作者也提到了“美国人的独来独往”（American insularity），明确指出美国旅居者缺少和本土法国人的交流。实际上，同时代的法国本土艺术家也十分活跃，例如此时由法国作家、艺术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领军的超现实主义运动正如日中天，吸引了大批国际艺术家齐聚巴黎，其中包括毕加索、达利、胡安·米罗等，海明威的写作也受到了这些艺术家风格的影响。——译者注

45. 蒙帕纳斯：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个区，是著名的文人、艺术家聚集地。——译者注

46. Sylvia Beach,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0）, 30.

47. Ibid., 31.

48. Sherwood Anderson to Gertrude Stein, spring 1923, reprinted in *Letters of Sherwood Anderson*, ed. Howard Mumford Jones （New York: Kraus Reprint Co.,1969）, 95.

49. 1磅约为0.91斤。——译者注

50. Sherwood Anderson, *Sherwood Anderson's Memoi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42）, 473.

51. 在这之后，几乎每年冬天，海明威都不在巴黎。——译者注

52. Ernest Hemingway, “Living on $1,000 a Year in Paris,” *Toronto Star Weekly*,February 4, 1922, reprinted in *Ernest Hemingway: Dateline: Toronto: The Complete Toronto Star Dispatches, 1920-1924*, ed. William Whit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5）, 88.

53. 维吉·鲍姆（Vicki Boum,1888—1960）：奥地利作家。她的小说《大酒店》发表于1929年，并于1932年被改编为影响巨大的同名电影（女主角是葛丽泰·嘉宝）。鲍姆小说中的酒店位于柏林，并不是雅各-丹格列特酒店。但小说（以及由它改编成的电影）奠定了一种“大酒店主题”，这类文学、影视作品有多条独立线索，人物在大酒店、轮船一类的繁忙场景中活动，并发生戏剧冲突。——译者注

54. Robert 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1920-1930*, rev. with supplementary chapters and an afterword by Kay Boyle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 1984）,31.

55.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83.

56. Ernest Hemingway to Sherwood Anderson, ca.December 23, 1921, reprinted i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1:313.

57. Ernest Hemingway, “Notes and Fragments,” version two of *A Moveable Feast*,item 186,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58.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74.

59. Hadley Hemingway, interview with Alice Sokoloff, November 27, 1971, quoted in Sokoloff, *Hadley*, 43.

60. 于巴黎的低物价，海明威的朋友、从律师改行做旅居诗人的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后来的一段描述令人难忘：“这场毁灭着法国人的通货膨胀，却让我们从中获利。”他还提到，“你实际上可以指望法郎兑美元的汇率那个月掉两个百分点”，这样手握美元的美国人就可以每三十天“阔气两个百分点”。MacLeish, *Reflections*, 26.

61. Alfred Kreymborg, *Troubadour: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1925）, 372.

62. 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设立记者站的美国媒体包括路透社（Reuters）、合众国际社（the United Press）以及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地方媒体也会往巴黎派遣记者，包括《费城记事》（*Philadelphia Ledger*）、《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布鲁克林之鹰》（Brooklyn Eagle）。《巴黎先驱报》（Pans Herald）尤其乐于把有抱负的小说家召为记者。（《巴黎先驱报》后来成为《纽约时报》旗下的报纸。——译者注）

63. William Wiser, *The Crazy Years: Paris in the Twenties*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83）, 24.

64. 珍娜·弗兰纳在本书中露面不多，但是她和海明威的终生友谊确实值得一提。20年代她也是巴黎客居作家圈的一员。“二战”期间，她和海明威一样是活跃于战场的传奇作家，曾和海明威一同参与了1944年同盟国解放巴黎的战斗。——译者注

65. “All Paris for the Asking: When to Come, What to See, Where to Conquer,”*Vogue*,January 1, 1925, 68.《时尚》驻巴黎通讯部位于爱德华七世路（rue Édouard VII）2号；当时的读者“如果在巴黎有任何需要，或者想在巴黎寻找他们找不到的东西”，通讯部乐于提供帮助。Ibid., 100.

66. Ernest Hemingway, “The Mecca of Fakers,”*Toronto Daily Star*, March 25, 1922.

67. 格林威治村是纽约作家、艺术家的聚居地。——译者注

68. 夏尔·彼德莱尔是法国19世纪著名诗人、批评家，代表作为《恶之花》。据说他的宠物是一只龙虾。——编者注

69. Ernest Hemingway, “American Bohemians in Paris,” *Toronto Star Weekly*, March 25, 1922.

70. 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38.

71. Jimmie Charters, *This Must Be the Place: Memoirs of Montparnasse,* ed. Hugh Ford（New York: Collier, 1989）, 102.

72. Ibid., 119.

73. Hart Crane, postcard to a friend, quoted in Tony Allan, *Americans in Paris* （Chicago:Contemporary Books, 1977）, 95.

74. Malcolm Cowley to Harold Loeb, July 14, 1922, Broom Correspondence of Harold Loeb,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75. 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114.

76.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156.

77. Ernest Hemingway, “Wives Buy Clothes for French Husbands,” *Toronto Star Weekly*, March 11, 1922.

78. Ernest Hemingway, “Paris Is Full of Russians,” *Toronto Daily Star*, February 25,1922.

79. 索多玛和蛾摩拉均为《圣经·旧约》中记载的城市，因为其中的居民太过淫乱、堕落而被上帝毁灭。——译者注

80. 两英尺约为0.6米。——译者注

2
席卷奥林匹斯

多年后，海明威一位同在巴黎的记者同事回忆说，“他是一位行为古怪但显然聪明过人的青年”[注]。另一位美国记者认为海明威是“某种阁楼上的天才[注]”[注]，不过他隐隐带着轻蔑的暗示说，即使海明威在自己的文章里鄙视咖啡馆中的那些人，他结交的也还是那些人。在巴黎的媒体圈里，没有人对海明威持中立态度——终其一生，人们对他不是崇拜，就是反感。但是每个人似乎也能察觉到，他会有不凡的人生。[注]

虽然海明威在同事中树立了不错的口碑，但到了1922年春天，他就厌倦了外国记者的生活方式。虽然这份工作比《合作共赢》的记者工作更光鲜，但是和那时一样累。

“我在这条文字流水线上挣每天吃的面包钱。”他对舍伍德·安德森讲——并未提及妻子的信托基金，其实那才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他还向另一位朋友抱怨，他已经辛苦得快把打字机的色带磨穿了[注]。[注]海明威担心的不仅是新闻工作会让他没有时间写作具有革命意义的小说，他甚至担心新闻报道本身会损害他写出像样散文的能力。诚然，身为记者，旅行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潜在写作素材，从事新闻写作也教给了他如何在纸上有效地传达观点。他坦言：“在《星报》，你必须学会写简单明了的句子。”[注]但是除此之外，新闻报道工作带来的只有破坏性的干扰。“这该死的报纸活计正在一点点毁掉我，”他在写给安德森的信中说道，“但是我打算很快把这些全都抛开，花三个月做点儿别的。”[注]

不巧的是，《星报》的编辑此时对海明威的工作印象深刻，开始派给他更重要、也更费时间的选题。他们把他派到欧洲的各个地方。那时的欧洲仍然没有走出上次大战的余波，同时也在积极地筹备下一场战争。在海明威立誓“把这些全都抛开”后不久，他便踏上了日内瓦采访之旅，奔走了将近一个月。接着，他开始了持续一年的采访旅程，工作繁重而冗长，把他像乒乓球一般打来打去——他从米兰被调到日内瓦，接着又到了法兰克福。单单是日内瓦那一次，《星报》上就登出了至少23篇海明威所写的报道和文章。在伊斯坦布尔，他目睹了一支难民大军：25万色雷斯农民“浩浩荡荡，衣裳被雨水打湿，脚步蹒跚而沉重”[注]，他们“在雨中迈着步子，离家越来越远……他们机械地向前走着，垂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路面”，拖着脚步向马其顿进发[注]。[注]在米兰，他采访了墨索里尼（Mussolini），并警告读者，法西斯主义将带来一场灾难。他将“领袖”（Il Duce，这是法西斯主义者们对墨索里尼的称呼）的追随者们描述为“一群身着黑衫、腰佩尖刀、挥舞大棒、走路迅疾、年方十九、口无遮拦的爱国青年”[注]。[注]他为墨索里尼本人扣上了一个“欧洲牛皮大王”（Europe's Prize Bluffer）[注]的称号，还说这位独裁者有一张不可信的嘴，尤其善于“用大词装饰小概念”。况且，“他穿黑衬衫的时候配白鞋罩，这似乎不太合适吧？即使历史上的人也不这么穿”。[注]鉴于海明威非常年轻（此时他年仅23岁），见识尚浅，他语中的自信着实令人惊讶，没有人把他当作一个毛头小子。[注]

实际上，《星报》的编辑总是为海明威的选题留出很大的版面，并意识到这位记者本人也逐渐成了读者感兴趣的对象，于是着手为他打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公众形象。当年（1922年），报纸刊出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题目是“欧内斯特·M.海明威二三事：正在揭开欧洲盖头的人”，文章介绍了这位最近正在写作“非常有趣的文章”的人。这类文章中的信息也并非完全属实——有一篇告诉读者，海明威“在世界大战中和意大利军队搏斗”——但这并不是问题。现在，讲故事的人已经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初抵巴黎时，海明威写信给舍伍德·安德森，说一旦夫妻两人安顿好了，他就会把那几张直通文学圈的“车票”寄给几位作家。“（它们）就像一支启航的船队。”海明威说。不过给那些最为重要之人的信，仍然握在他手里。

多数有志向上攀登的作家，可能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这些介绍信，以便被介绍给侨民作家中的“奥林匹斯诸神”——这是马尔科姆·库利给20世纪20年代巴黎核心创作圈中的作家们起的名字。[注]西尔维娅·毕奇把这一群带着光环的人称为“这伙人”（the Crowd）[注]。他们是“某种贵族，在某种魔力的环绕下，几乎不会被推翻”，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后来评论说。[注]

美国人源源不断地来到巴黎，争相想被介绍给“奥林匹斯诸神”，但在后者的眼中，这些人大多“并不值得搭理，除非你偶然想找点乐子”——一位先锋侨居记者、“圈内”的编辑哈罗德·斯塔恩斯（Harold Stearns）这样说。[注]“这伙人”通常在私人住所或工作室里聚会，不去公共咖啡馆。对于很多有志成为作家的人、不顾一切想变得“值得搭理”的人，“这伙人”统统不屑一顾。舍伍德·安德森通过西尔维娅·毕奇敲开了通往旅居作家核心圣殿的大门，但毕奇并不总会如此慷慨地开放自己的社交圈：她甚至曾经拒绝把乔治·摩尔[注]引荐给詹姆斯·乔伊斯，即使当时这两位小说家都在她的书店里，相聚咫尺。[注]来访者冒冒失失地来到格特鲁德·斯泰因家中，希望被接纳进她的聚会沙龙，却被看门者拦住，用法语或者英语简短地问：“请问谁是您的介绍人？”[注]

在“这伙人”中，即使有些人的作品其实在商业上并不成功，却也知道自己被奉为神明，或者至少摆出了相应的举止。大西洋两岸的媒体常常把他们树立为现代性的前驱。如果你想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你应该去看看斯泰因女士、巴勃罗·毕加索、曼·雷[注]和他们的同道都在干什么。“这伙人”清楚地知道他们享有的历史地位，所以持续记录着他们圈

子内部的世界以及每个人的动向。众所周知，毕加索为格特鲁德·斯泰因画过像，而斯泰因给友人画过“文字像”，她声称这是一种先锋创作。曼·雷和贝伦尼丝·阿伯特[注]给每位先锋人士都拍了照。“如果你入了曼·雷和贝伦尼丝·阿伯特的法眼，就说明你被当作了一个人物。”西尔维娅·毕奇回忆道。[注]她的书店同时也被用来展览这些照片，虽不太正规，却足够让人心生敬畏。

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伙人”将巴黎生活视作他们种种文艺革新运动的底色，但是这些革新仍是主要属于美国人的运动。[注]他们的共同体本质上（如一位旅居作家所言）是一个“位于欧洲的美国”[注]。他们在巴黎出版了自己的英语杂志和书籍，这些出版物通常由美国资本运作，且意在赢得美国出版社的关注，以此获得一方美国舞台。“在巴黎，我从未见过哪个美国人不是在为美国的计划、目标或资源忙碌。”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说道。[注]

和不少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一样，海明威降落在一场反叛的中心，维多利亚时代过分雕饰的散文风格成了众矢之的。凯·博伊尔（Kay Boyle）回忆道：“美国没有大众实验性质的、激烈反抗权威的写作流派，这也就是我们想要创造的。‘打倒亨利·詹姆斯！打倒伊迪丝·沃顿！……’那些自愿流亡的革命者高喊着。”[注]博伊尔是一位作家兼编辑，1923年来到巴黎。当然，对于像詹姆斯和沃顿这样统治文学界已久的君王，把他们拉下王座也就意味着要有新任君主荣登大宝。作家圈里处处都是勃勃野心和激烈的争夺。“城中最紧俏的是声名。”迈克利什在一首记录巴黎疯狂气氛的诗中写道。[注]

当然，声名有的是，然后就有了名作。格特鲁德·斯泰因出名了，詹姆斯·乔伊斯也出名了。乔伊斯的先锋小说《尤利西斯》改变了很多“一战”后的作家。“1922年，我们还是流浪巴黎的青年，它就在我们的头顶绽放开来，那些词语和文句洒落在我们身上，就像送给语言的礼

物。”《纽约客》的作家珍娜·弗兰纳回忆道。[注]

但是，这部小说因为其中的色情内容（从手淫到通奸）而被认为是一本淫秽之书，在美国被禁止以书的形式出版发行[注]，直到1934年才解禁。（《尤利西斯》最终发售时，《纽约时报》的记者若有所思地评论道，“正当乔伊斯在青年作家群体中的影响力减退时”，这本小说的禁令解除了——真是有些讽刺。[注]）实验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有自己的忠实读者，但是没有哪家美国商业出版社愿意碰她的那些大部头著作。

与他们不同，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真的出名了。数以万计的人购买他的书。纽约一家最大、最有声望出版社——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负责菲茨杰拉德作品的出版发行。他衣食无忧的妻子、金发女郎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已是流行文化的偶像。据说，泽尔达是“飞女郎”文化（flapper culture）[注]的代言人。相比流行文化，她在“飞女郎”文化中的地位可能是海明威更想要的。不过，他打算把两者都收入囊中：既要对潮流中人的吸引力，又要大众的追随。

这是一个义无反顾、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是海明威看到了机遇，怀抱着取胜的意志。

到了深冬时节，海明威觉得寄出舍伍德·安德森介绍信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首先找到了作家路易斯·加朗蒂耶（Lewis Galantière）。这是一位博学的美国人，戴着一副眼镜，当时供职于巴黎的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早在海明威夫妇动身去欧洲之前，舍伍德·安德森就给加朗蒂耶写过信，向他保证，海明威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一个天赋超群的小伙子”[注]。

加朗蒂耶非常好心，给海明威和哈德莉找了一处适合初来者居住的公寓。公寓在一栋四层楼中，租金一个月只要18美元，地址是乐牧安红衣主教路74号（74 rue du Cardinal Lemoine），位于拉丁区的一处高地

顶端。每层楼都有一个难闻的小便池。楼下有一家喧闹的供工人跳舞的舞厅（bal musette），河边的小路上挤满了乞丐。这是一个脏乱贫穷的街区，但是物价实惠，周围的文学氛围也不错：《尤利西斯》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乔伊斯在71号房里写的，法国诗人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也在这条街上的2号房里住过。礼尚往来，海明威邀请加朗蒂耶到雅各酒店打了几轮拳击，趁对方还没来得及防备，在他脸上打了一拳。加朗蒂耶的眼镜都碎了，但眼睛和脸却没有受伤，哈德莉觉得这真是个奇迹。[注]

海明威接着联络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埃兹拉·庞德，这两人都是过度修饰的老派文学的敌人。用西尔维娅·毕奇的话说，庞德是“现代主义运动公认的领导者”[注]。他总是围着一条绣有“MAKE IT NEW”[注]字样的围巾，骑着自行车穿过城市时，围巾就像旗帜一样在他身后飘扬。斯泰因和庞德都是非同凡响的人物，会让软弱的人们惊惧不已。而对于那些心智成熟、意图严肃并且足够有天赋的人来说，他们都是诲人不倦的导师。[注]

海明威首先找到了庞德。庞德有“文学助产士”之名。20世纪几部最具爆炸性的文学作品，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开花结果的，比如T. S.艾略特1922年发表的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就是经他之手编辑的。他也会促成那些天才之作的出版，并亲自为门徒呐喊助威、制造轰动。从1920年起，他就成了《日晷》的代言人和稿件收集者——《日晷》是一本总部在纽约的文学杂志，自称为“英语世界中文学批评的领导者”[注]。正是通过庞德百折不挠的斗争，《日晷》的编辑斯科菲尔德·塞耶（Scofield Thayer）才同意发表《荒原》，最终该诗在1922年11月的杂志上刊出。庞德也帮助过詹姆斯·乔伊斯，使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和第一部长篇小说《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得以在各种杂志上发表。也是庞德把乔伊斯介绍给了西尔维娅·毕奇，而毕奇勇气可嘉，在1922年把伤风败俗的小说《尤利西斯》以书的形式出版。另外，庞德还是《小评论》杂志的驻外编辑。这是一份展示实验写作和新兴国际艺术的重要杂

志，它曾经连载过《尤利西斯》，也发表过舍伍德·安德森、格特鲁德·斯泰因和温德汉姆·刘易斯[注]的作品。

安德森的推荐使海明威得以受邀去庞德的工作室喝茶。工作室位于田园圣母路（rue Notre-Dame-des-Champs），庞德和妻子多萝西住在这里。海明威夫妇对这里印象深刻：屋里陈列着大量的日本浮世绘藏品，以及庞德妻子的画，这些艺术品都沐浴在柔和的阳光里。

初看上去，时年46岁的庞德不太可能会成为海明威的知心好友。海明威的童年是在钓鱼、打猎和野营中度过的，所以他散发着久经风吹日晒的男性气息。庞德则相反，几乎把时髦公子的作风当成了自己的常态。他总是穿着棉绒质的套装，以及花哨的、拜伦风格的衬衫，顶着恣意不拘的头发，最为显眼的“配饰”是又平又细的髭须、尖尖的山羊胡，还有一根手杖——他会用这三件东西强调自己所说之话的重要性。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聊了很长时间，有点儿像海明威和舍伍德·安德森在芝加哥初次会面时的情形。多萝西在一边忙来忙去，为他们上茶。海明威安静而专注地听着庞德的长篇大论。哈德莉估计海明威那天至少喝了17杯茶。[注]这次会面为接下来的许多次会面拉开了序幕：可以聊的话题很多。关于创造惜字如金的语言，庞德有很多事情要叮嘱海明威。众所周知，庞德对于形容词的态度很严苛——形容词不可信赖。他还坚持认为，作家无论如何都不能使用多余的语词，也不能纯粹耽于描写。“别搞那么多场景”（Don't be viewy）[注]，这是典型的庞德式告诫。[注]

第一次见面后，庞德向海明威开放了他的海量藏书。对于那些即将成为作家的人，庞德会提供一份通用书单。古代名家的作品是必须读的，尤其是荷马和孔子，必须“通读”。[注]但丁和伏尔泰也要研究——但是人们也有理由无视伏尔泰“在小说和戏剧上的几次尝试”。而且，当然咯，任何严肃而有抱负的作者，都应该阅读庞德的门生T. S.艾略特和詹

姆斯·乔伊斯的作品，并且真诚地欣赏他们的天赋。

海明威表现出了很愿意成为庞德学生的样子，但是第一次见面后，他对庞德满心鄙视。之后不久，海明威给路易斯·加朗蒂耶看了一篇自己新写的文章：一篇出言不逊、嘲笑庞德的小短文，把他的山羊胡、头巾和一身行头——他那套放荡不羁的作风——都嘲弄了个遍。

加朗蒂耶看着海明威，问他要拿这篇文章做什么。海明威说，他打算直接将文章寄给《小评论》。

这可能不是个好主意，加朗蒂耶告诫他。庞德是这家杂志的老牌驻外编辑，难道海明威忘了吗？美国那边的编辑肯定也不会欣赏这种无厘头的批评。于是海明威把文章撕毁了。(注)

不久，庞德拜访了海明威夫妇在乐牧安红衣主教路的新居。很快，海明威和庞德两个人就开始一起出席城中的各种社会活动。在其他左岸人士看来，他们仿佛一对老朋友。众人带着兴致和好奇观察着这两个人。“欧内斯特每走进一家咖啡馆，就成了那里的运动健将；庞德留着一绺小胡子，明显是精心修剪过的。”珍娜·弗兰纳回忆道。(注)

随着两人的关系逐渐密切，庞德也走入了海明威的世界。不久，海明威告诉舍伍德·安德森，他正在教庞德打拳击。他说庞德并没有取得多大进步——也许庞德是位杰出的诗人，却只有小龙虾一般虚张声势的男子气概。不过话说回来，庞德这老兄也不赖，“能拼上自己的尊严和盛名来做一件他根本不懂的事”。(注)

海明威认为庞德也有别的优点，包括他让人仰慕的辛辣语言。显然，庞德对海明威也有类似的感觉，因为他很快就开始向《小评论》的编辑“推销”海明威的几首诗和一篇短篇小说了。海明威在“奥林匹斯山”上获得了第一次胜利。

海明威征服“这伙人”的下一个举动带他来到了萨福(注)的领地。这似乎不像是海明威的目的地，毕竟他是一个即将以男性气概和极限运动闻名世界的人。舍伍德·安德森向格特鲁德·斯泰因写了一封尤其饱含赞誉的介绍信。他向斯泰因保证，“这位美国作家可以本能地领悟这里发生的所有了不起的事情”(注)。

受邀进入斯泰因位于花园街27号的豪华公寓，可是人们争先恐后求之不得的事。通向大宅前院的宽敞通道，相比海明威公寓中每一层都要路过一间骚臭厕所的楼梯，真是差若天渊。海明威和哈德莉来到斯泰因家门口，一位戴着白帽、系着白围裙的女仆领他们入内。接着，一位小个子女士走上前来向他们问好。她看上去瘦得就像“一小截电线”(注)，哈德莉回忆道，“她娇小可人，脸长得很像西班牙人，有古铜色的皮肤，目光炯炯的黑眼睛。”(注)她就是爱丽丝·B.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斯泰因多年的情人和伴侣。（哈德莉的描述算是同代人中比较客气的了；有人说，托克拉斯长着鹰钩鼻和扫帚一样的髭须——这是非常刻薄的评价了。）在客厅最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壁炉旁坐着格特鲁德·斯泰因。托克拉斯有多瘦小，斯泰因就有多丰满。那次拜访之后，海明威就开始琢磨斯泰因的每只乳房有多少斤。

“我觉得每只能有9斤重，你觉得呢，哈德莉？”他问妻子。

斯泰因硕大的体型和显赫的声名，为她在左岸赢得了一系列称号：“苏美尔石碑”、“大佛陀”，而最有意思的要数“尊驾”。(注)她和埃兹拉·庞德一样特点鲜明（庞德在一次热情洋溢的自说自话中意外砸坏了斯泰因最爱的一把椅子，从那时起，他就被禁止再次踏入斯泰因家）。(注)斯泰因的典型装束是一条拖地的麻布长袍，海明威后来形容她的衣橱有一个鲜明的“掌舵”主题。(注)

能找斯泰因单独谈心，保住自己在她家中的一席之地，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荣誉。西尔维亚·毕奇曾写到，很多斯泰因的仰慕者“来找我，就

好像我是旅行社的导游，求我把他们领到斯泰因那里去”[注]。会客厅中的多数客人只能和其他凑热闹的人同时受到斯泰因的接待。到访者参与的常常是这样的集会，看到斯泰因端坐在屋子中央一把又高又大的椅子上，做好了讲道的架势。很快她就会开始“独白，强调，絮絮叨叨，仿佛她说的是唯一的真理”，麦克阿尔蒙回忆说。[注]当她说话的时候，在场的人最好保持肃静。

“不要吓到她，否则她就不会说话了，”他提醒道，“她是个内向的人，很不自信。”[注]

格特鲁德·斯泰因确实“内向”，但这不是人们形容她时首先会想到的词。按照圈子里某位成员的观点，说她“妄尊自大”或是个“臆想狂”可能更准确。[注]“天才”是斯泰因喜欢用来形容自己的词。

“自莎士比亚以来，没人再对英语的发展做出过什么贡献，除了我，”她曾说，“可能亨利·詹姆斯也做过一点儿贡献。”她慷慨地补充道。[注]

这句话还有不少版本：“犹太民族中只产生过三个具有创造力的天才：耶稣、斯宾诺莎和我。”[注]在《爱丽丝·B.托克拉斯自传》中，斯泰因以托克拉斯的口吻写道：“我一生中可能只遇见过三个天才。”这回的“三圣人”是格特鲁德·斯泰因、巴勃罗·毕加索和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注]

海明威夫妇第一次来斯泰因的公寓做客时，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正要开演。斯泰因示意海明威坐在她旁边的一把椅子上，而托克拉斯赶忙上前把哈德莉拉到了屋子的另一侧，岔开话题，和她大聊特聊。对斯泰因来说，艺术家的妻子是不受欢迎的人，会打断她与伟大之人的谈话。托克拉斯精湛的“防妻手段”（用西尔维娅·毕奇的话说[注]）在巴黎的老街坊中都是出了名的。海明威则大方地在斯泰因身边落座。

他们周围的墙上挂着几十幅现代画作，铺满了墙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毕加索的画、布拉克的画[注]、塞尚的画，就像进入了私人博物馆。[注]海明威开始和斯泰因聊起了写作上的事。

正如与安德森和庞德会面时那样，海明威全身贯注地看着斯泰因，并侧耳倾听。这让斯泰因惊异地觉得他“看起来有异国相，尤其是因为他热情充沛、兴致勃勃，而且也有一双探寻的眼睛。”[注]

先前庞德教导海明威要精简语言，斯泰因则展示了有意龃龉的价值。她的文风基于自由联想和词语的重复，正如她在1913年的诗作《神圣的艾米丽》（*Sacred Emily*）中所展示的那样：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Loveliness extreme.

Extra gaiters.

Loveliness extreme.

Sweetest ice-cream.

Pages ages page ages page ages.

（萝丝是玫瑰如玫瑰是玫瑰。

可爱到极致。

高高的筒靴。

可爱到极致。

冰激凌的甜。

如书页般翻过的年华如书页的渐老如年华般翻过。[注]）

正如没有哪个人会对斯泰因女士抱有不褒不贬的态度，也没有谁能不带感情色彩地看待她的英语语言实验。[注]从“一战”前开始，她的写作风格就吸引了大西洋两岸的关注，不过出版社和读者并没有迫不及待地想读她的书。1908年那会儿，斯泰因只能自掏腰包出版她的第一本书《三个女人》（*Three Lives*），据说，这本书问市的头一年半只卖了75本。[注]一位作家在回顾当年的巴黎时说，斯泰因“在任何人看来都不算一个受欢迎的作家”。[注]

不过，海明威却在斯泰因的风格中看到了机遇。他已经在初次见面时给她留下了足够好的印象，因此不久之后，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回访了他们，光临了海明威夫妇在乐牧安主教路上的寒舍。斯泰因非常给面子，亲自爬上了公寓的四楼。到了地方，她撑上了海明威家的床，在那里把海明威的早期作品耐心地翻了个遍。她边看边思考，然后做出评判：不足很多，同志尚需努力。

斯泰因告诉海明威，他首先应该停止记者的工作。如果他想在真正的写作之路上取得任何进步，这是必要的牺牲。她说的话海明威早就知道了。

第二，他的作品主题太过淫秽。“你不能拿任何‘挂不出去’的事情做文章。”斯泰因告诫他——也就是不能写太过色情的东西。她尤其批评了短篇小说《在密歇根北部》(“Up in Michigan”)[注]，它以一场笨拙的酒后诱奸为结局。海明威欣然接受了她的建议，但没过多久就弃之不顾了。

接着他们谈到了海明威早期的长篇小说——内容更多的是关于密歇根的事。斯泰因对此没说出什么褒扬的话。

“这里面有大量的描写，”她说，“而且不是很好的描写。你要集中精力重新写[注]。”[注]

就算海明威受到了挫败，他也并没有朝斯泰因发火——不过，他只是暂时没有发火罢了。从她那里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他更加频繁地出入她的客厅，喝茶、喝果酒，同时仰望塞尚的画。从塞尚厚重、有条不紊的笔法中，他发觉了一些可以汲取之处，那些重复出现的笔触中有一些可以使他的写作得益的东西——某些深刻的内涵。斯泰因在写《三个女人》的时候，曾经深受这位画家的影响。在某些风景画中，她也发现了塞尚对毕加索的影响："用空间而非方块分割天空。"[注]毕加索曾经把塞尚称为"我独一无二的导师"，还说："当他说'绘画是一种用真胆量进行的活动'时，塞尚比任何人都更接近真相。"[注]不久，去卢森堡博物馆看塞尚的作品就成了海明威的日常活动。"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表达不出来，无法向别人解释我的所得。"海明威写道，"再说，这也是个秘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正在打造"简约、实在的句子"。[注]

最开始几次到访斯泰因家时，女主人异常健谈，不知疲倦。他们谈论了许多其他的作家，斯泰因的话中充满了竞争意识。海明威后来透露，她拒绝给予那些从未公开支持她的作家正面的评价。西尔维娅·毕奇也有同样的看法："当然，对于别人的书，她从来兴趣不大。"[注]

不过斯泰因对海明威很感兴趣；她甚至承认自己因为他而有了"弱点"[注]。后来她解释说，当她谈论自己的写作原则时，海明威听得太专注了。他是这样一位用心的学生，如此热情地聆听教导，让人感觉受到了莫大的恭维。第二位大神已经加入了海明威的"武器库"。

"格特鲁德·斯泰因和我，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海明威向舍伍德·安德森回信说。[注]

那年冬天，海明威在笛卡尔路39号（39 rue Descartes）的旅馆顶层租下了一间阁楼。正如乐牧安红衣主教路上的公寓，这栋楼也有它的文学史：诗人保罗·魏尔伦死在这里。到达那间冰冷的阁楼要爬很多层楼

梯，海明威每次去那儿都会带一捆树枝去烧，好让那个地方暖和一点儿。如果烟囱通风不好，屋里就充满了烟，他就得再一次跑下那么多层的楼梯，去附近一家咖啡馆中暂避。

但是，这间房间的好处足够抵消它的缺点：从那里可以看到周围建筑的屋顶，烟从其他屋顶的烟囱中袅袅升起，随风飘散在巴黎灰色的天空中。也许更重要的是，这里是海明威私人的保留地：一个把庞德和斯泰因的教导付诸纸端的地方，一个供他将英文语句敲敲打打的僻静之所，而且，他甚至可能会在此创造一部杰作。

不用为《星报》在全欧洲东奔西走的时候，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写小说。他不写作的时候，就是在构思、从写作中恢复元气，或者是在准备下一次的写作。海明威要求吃早饭时安静——“拜托，吃饭别说话”[注]，他对哈德莉说——这样他就可以为接下来一天的工作厘清思路。甚至不为自己的写作操劳时，他也在专注地阅读别人的作品。有时哈德莉和丈夫拥抱亲热，会听到背后有书页翻动的声音，发现海明威一边抱她，一边在她背后看书。[注]

他对下一部长篇小说已经胸有成竹，但并没有再一次全心投入长篇的写作中，而是始终在写短篇小说。他在努力找到自己的语气，打磨自己的风格——来到巴黎之前，他就已经在这么做了。海明威的一些早期作品，包括虚构作品和新闻作品，就暗含了后来将成为海明威之精髓的元素，比如这段写给《星报》的文字，介绍了底层的舞厅文化：

> 去舞厅的人无须爵士乐队鼓舞就能自己跳起舞来。跳舞就是为了好玩，不时拉别人一起跳，也是为了好玩，因为跳舞简单、有趣，回报也不错。他们年轻、不屈，享受而不尊重生活，他们有时候出手太重、操之过急，然后生活就变成了一台冷酷的直立着的机器，投下细长的阴影。这阴影的尽头叫作断头台。[注]

总的来说，他的新作风格确实和塞尚直率的笔触类似。他的作品变得更精瘦、更简约，也更有节奏感。不过在庞德和斯泰因看来，他仍然只是个有前途的新手。海明威把作品交给庞德看，庞德非常严厉：拿回稿件时，海明威发现上面满是蓝色铅笔修改的痕迹，大片的形容词被画去。不过庞德也鼓励了海明威，甚至把他的六首诗寄给了《日晷》的编辑斯科菲尔德·塞耶，把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寄给了《小评论》。

“庞德认为我是一个臃肿的诗人。”海明威在写给舍伍德·安德森的信中说。他还说，自己不清楚庞德的话在塞耶那里有多大分量，但是无论如何，海明威迫切地盼望庞德的出面能让自己的诗发表。[注]

但塞耶没有发表他的诗，也没有索要别的作品。[注]《小评论》也拒绝了海明威的小说。不过庞德对他的支持到底没有白费。

斯泰因的教诲也是要遵守的，这很有难度。

“写作毕竟不是易事，对吗？”海明威问她，“在我遇见你之前，写作曾经很容易。”[注]

斯泰因不仅在自己的会客厅里教导他，还借给他很多自己的手稿，亲身示范写作方法。[注]她的叠词法得到了海明威的认真对待，作品很快开始呈现出斯泰因风格的影响，包括那些被她批评为“挂不出去”的短篇。

“利兹很喜欢吉姆，”海明威写道，“她喜欢他的胡子。她喜欢他微笑的时候白亮的牙。她很喜欢他看起来不像一个铁匠。”[注]

他开始尝试一些意识流的手法，把习作写在法国小学生做习题时用的那种蓝色本子上——这也是他从斯泰因那里学来的习惯。其中一次尝试是这样的：“流经岁月而下。为何流经岁月而下？流经岁月而下。流经岁月而远。流经岁月而逝……”[注]

在这段时间，海明威小心地遵从着他的导师。斯泰因承认自己日益苦闷，为“所有她没有出版的手稿，为没有被出版和严肃认可的希望”[注]。她开始极其看重作品的出版。最终，海明威帮她实现了这一目标，但与此同时他也发现斯泰因的风格在自己将来的作品中明显可以得到应用。[注]她不能依靠自己的写作风格取得成功，不代表他不能。早在来到巴黎之前，海明威就开始关注“节奏、语调和句子”了（这是哈德莉的说法）[注]，而斯泰因对于节奏的关注比他更早。他公开地从她那里借鉴，却着手将她的理念化为自己的，使之更加微妙、更加动人、更加可读。毕竟，写出的作品再精巧、再新鲜，如果没人愿意看，那还有什么意义？在笛卡尔路冰冷的阁楼里，海明威手拿铅笔，在一笔一画中，平静地把斯泰因从他的女神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先行者。

海明威知道，他迟早会把这些教导和演练凝结为一部重要的作品。也许他可以重写他最初的那部长篇小说，就像重写《在密歇根北部》那样。的确，斯泰因曾让他扔掉这部小说，另起炉灶，但海明威并不打算遵从她的所有指示。

此时他还无从得知，很快他就不得不按斯泰因的忠告行事了，从零开始——无论他是否真心愿意。

---

1. Hearst correspondent Basil Swoon to Charles Fenton, quoted in Fenton, *Apprenticeship of Ernest Hemingway*, 143.

2. “阁楼上的天才”指身居陋室、不被人注意的天才。此词最初用来形容英格兰的天才诗人托马斯·查特顿。1770年，17岁的查特顿因为抑郁不得志，在自己居住的阁楼中自杀。——译者注

3. *New York Tribune* reporter Wilbur Forrest to Charles Fenton, quoted ibid., 144.

4. 传记作家查尔斯·芬东追踪采访了海明威的一些前媒体同事，他们说海明威在圈内被视作异类，常常被特殊对待。Ibid., 143.

5. 打字机工作时，机头内的点阵撞针或英文字母撞件会撞击色带，从而在纸上印出文字。——编者注

6. Ernest Hemingway to Howell G. Jenkins, March 20, 1922, reprinted ibid., 334.

7. George Plimpton, “The Art of Fiction: Ernest Hemingway,” *Paris Review* 18 （Spring 1958）: 70.

8. Ernest Hemingway to Sherwood Anderson,March 8, 1922, reprinted i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1:331.

9. Ernest Hemingway, “A Silent, Ghastly Procession,” *Toronto Daily Star*, October 20,1922.

10. 这说的是1919—1923年希腊-土耳其战争之后的人口交换。土耳其为了保持自身的民族纯粹性，把境内的希腊族裔遣送回国。——译者注

11. Ernest Hemingway, “Refugees from Thrace,” *Toronto Daily Star*, November 14,1922.

12. 墨索里尼的追随者也就是所谓的“黑衫党”。——译者注

13. Ernest Hemingway, “Italy's Blackshirts,” *Toronto Star Weekly*, June 24, 1922.

14. “Prize Buffer”一词原指赌博中用提高筹码的方式吓走竞争对手的人。——译者注

15. Ernest Hemingway, “Mussolini, Europe’s Prize Bluffer,” *Toronto Daily Star*, January 27, 1923.

16. 意大利是“一战”中海明威参战和负伤的地方，他对这里有一定的记忆和归属感。这也是他能够自信地评论意大利时事的部分原因。——译者注

17. Cowley, *A Second Flowering*, 54.

18. Beach,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25. 毕奇的这种称呼其实是从旅居作家、出版商罗伯特·麦克阿尔蒙那里借来的。毕奇在回忆录中通篇使用了这个词，指代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核心旅居作家圈。

19. F. Scott Fitzgerald, “Babylon Revisited,” in *Babylon Revisited and Other Short Stori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8）, 213.

20. Harold Stearns, *Confessions of a Harvard Man: Paris and New York in the 1920s &30s* （Santa Barbara: Paget Press, 1984）, 209.

21. 乔治·摩尔（George Moore, 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译者注

22. 毕奇在回忆这一事件时表现得很不好意思，却又忍俊不禁。她指出自己对乔伊斯的保护是一个“错误”，这两位作家终究还是在伦敦相识了。摩尔宽宏大度，“没有拿书店里发生的事找我算账”，她说。Beach,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72-73.

23. Gertrude Stein, *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0）, 13. 格特鲁德·斯泰因解释说：“按理说每个人都能参加沙龙，但是总得有一个介绍人吧，不然成什么体统？每个人只要提及是谁介绍他们来的就行。”

24. 曼·雷（Man Ray，1890—1976）：著名美国旅法视觉艺术家，达达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25. 贝伦尼丝·阿伯特（Berenice Abbott, 1898—1991）：美国摄影师。——译者注

26. Beach,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112. 海明威最终也加入了这些被遴选之人的行列。曼·雷（一位传记作家戏称他是“这伙人”的“宫廷摄影师”）在1923年8月为海明威拍了一张“正式”的照片。

27. 在很多人看来，美国人的独来独往已经不限于艺术创作领域。“这些区内的英美作家法语说得很流利，但我觉得很奇怪，他们为什么坚持只和本国人来往，”英国艺术批评家克里夫·贝尔（Clive Bell）评论道，“他们中有的人有法国情人——包养的情人，但他们很少结交法国朋友。” Allan, *Americans in Paris*, 7.

28. Kreymborg, *Troubadour*, 364.

29. MacLeish, *Reflections*, 66.

30. 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336.

31. Archibald MacLeish, “Years of the Dog”（1948）, reprinted in *Archibald MacLeish:Collected Poems,1917-1982* （New York: Mariner Books, 1985）, 376.

32. Janet Flanner, introduction to *Paris Was Yesterday*: *1925-1939* （New York: Harvest/HBJ, 1988）, x.

33. 禁止以书的形式出版发行，也就是说《尤利西斯》在报纸、杂志上还是允许被连载的。——译者注

34. John Chamberlain, “Books of the Time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1934.

35. “飞女郎”文化：20世纪20年代的一种亚文化。“飞女郎”指那些穿短裙、留波波头、听爵士乐的年轻女孩。——译者注

36. Sherwood Anderson to Lewis Galantière, November 28, 1921, in Jones, *Letters of Sherwood Anderson*,82.

37. 哈德莉对这次拳击赛的回忆详见Sokoloff，*Hadley*，44-45。人们很快发现，海明威喜欢测试将要结交之人的勇气——可能是通过一场即兴的拳击赛、在西班牙的斗牛场上和公牛对峙，或者是用小刀玩游戏。玛利亚·库珀·詹尼斯（Maria Cooper Janis）是演员加里·库珀（Gary Cooper）的女儿，后者曾和海明威有过几十年的友谊。她曾回忆父亲与海明威在晚餐席间的一次勇气测试，“你把手摊在桌子上，他（海明威）拎起一把猎刀，然后松手让它坠落，但愿它扎下来的时候会避开你的手指”。然后他们增加了难度：把刀子举到更高的位置再松手。幸运的是没有人因此受伤。Maria Cooper Janis,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May 20, 2014.

38. Beach,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26.

39. MAKE IT NEW：意为“求新”。——译者注

40. 斯泰因和庞德都“鼓励年轻的艺术家们鄙夷传统的形式与内容，去反抗，去决裂，去勇敢开拓”，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如是说。Lincoln Steffens, *The*

Autobiography of Lincoln Steffens （Berkeley: Heyday Books, 2005）, 833.

41. Nicolas Joost, *Scofield Thayer and The Dial: An Illustrated History* （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4）, 47.庞德在1920年初受到委托负责《日晷》杂志约稿工作，到1923年4月截止，此后他仍然向《日晷》投递过稿件。Ibid., 166.

42. 温德汉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 1882—1957）：英国作家、画家。——译者注

43. Sokoloff, *Hadley*, 49.

44. 关于庞德的这些信条，参见Ezra Pound，“A Few Don'ts by an Imagiste,” March 1913, *Poetry* magazine, reprinted on the website of the Poetry Foundation, October 30, 2005, http://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trymagazine/article/335。

45. 从描写到叙事、从注重形容词到注重动词，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显著趋势，这里不再赘述。熟悉海明威的读者可能感受得到，相比形容词、场景和描写手法，他作品中的叙事与动词元素处于更加核心的地位。——译者注

46. Ezra Pound, *How to Read/The Serious Artist*, reprinted in Ezra Pound,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1968）, 38.

47. 1963年，海明威的传记作者卡洛斯·贝克采访加朗蒂耶时，得知了此事。参见Baker,*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86。

48. Flanner, introduction to *Paris Was Yesterday*, xviii.

49. Ernest Hemingway to Sherwood Anderson, March 9, 1922, reprinted i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1:331.

50. 萨福（Sappho，前630或612—前592或560）：古希腊女诗人，据说是同性恋。这里意指格特鲁德·斯泰因。——译者注

51. Sherwood Anderson to Gertrude Stein, December 3, 1921, reprinted in Jones,*Letters of Sherwood Anderson*,85.

52. Sokoloff, *Hadley*, 50.

53. Ibid.

54. “苏美尔石碑”是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出于奉承给斯泰因起的外号（“the Sumerian monument”， 可能是指刻着《汉谟拉比法典》的那块石碑。——译者注）。海明威给斯泰因起的外号是“大佛陀”（“the great god Buddha”, according to Hadley Hemingway,quoted in Sokoloff, *Hadiey*，50）。“尊驾”这个有趣的外号出自哈罗德·斯特恩斯之口，他曾经是《日晷》的编辑、后来海明威以他为原型创作了《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一个人物（“the Presence”这个词兼有“大驾”“到场”“不容忽视”“现代”等含义，并颇具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意味。——译者注）。Stearns, *Confessions ofa Harvard Man*, 151.

55. Stein,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202.在上述这本传记中，斯泰因用第三人称谈到自己，说她第一次见到庞德是在一场晚餐会上，“喜欢他但是并不觉得他有趣。她说他

就像一个乡村讲解员，如果你是一个村民，就会觉得他很优秀，如果你不是则不会这么想。”Ibid.,200.

56.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26.诗人约翰·格拉斯科（John Glassco）形容斯泰因是一个“菱形身材的女人，身上的拖地长袍显然是某种麻布材质的”。[Quoted in Anton Gill, *Art Lover: A Biography of Peggy Guggenheim*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2003）, 96.] 虽然如此，斯泰因的长袍肯定不是随便缝制的。记者林肯·斯蒂芬斯称，斯泰因有不止一件“粗质长袍”其实是由伟大的设计师精心制作的。“伊冯娜·戴维松（Yvonne Davidson）是那时最富创造力的法国服装设计师（couturières）之一，受格特鲁德·斯泰因之托，为她设计了一件飘逸、宽大的长袍。” *Autobiography of Lincoln Steffens*, 834.

57. Beach,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29.

58. 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205.

59. Ibid., 228-229.

60. Ibid., 206.

61. Ibid., 228.

62. Ibid.

63. Stein,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5.

64. Beach,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31. 虽然毕奇声称，对于那些不以妻子身份到场的女性，斯泰因会欢迎她们加入谈话，但反例是存在的。能否加入斯泰因的谈话，显然因人而异。女作家凯·博伊尔记得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场聚会上，她被贬到了“妻子组”。一位男性朋友带她去斯泰因家做客，一进门她就立即被爱丽丝·托克拉斯缠住了，后者“立马开始谈论如何做饭，还要和她交换菜谱”。显而易见，博伊尔对托克拉斯和斯泰因的印象都不好。那位男性朋友过后告知她，她被斯泰因禁止再次来访，因为她认定博伊尔“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一样，是无可救药的中产阶级”。（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295296.）相反，巴勃罗·毕加索的女友弗朗索瓦丝·吉洛（Fran Çoise Gilot）表示，她第一次造访时不仅有幸成了斯泰因的听众，而且是单独和她谈话的，毕加索甚至没有和她俩一起聊天。Françoise Gilot and Carlton Lake, *Life with Picasso* （New York: McGraw-Hill,1964）, 68-71.

65. 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 1882—1963）：法国画家，野兽派和立体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66. 斯泰因和托克拉斯所住的花园街27号是现代派艺术的豪华圣殿。20世纪30年代，珍娜·弗兰纳曾受斯泰因之托统计后者的收藏，弗兰纳估计斯泰因当时的藏品中有“131幅画，包括5幅挂在瓷器陈列柜里的毕加索作品”。“单单是挂在会客厅里的画就有4幅杰作”，1幅塞尚的画，1幅毕加索画的斯泰因肖像，“外加19幅更小尺寸的毕加索画作”。（Janet Flanner, “Letter from Paris” （1938）, reprinted in Flanner, *Paris Was Yesterday*,187.）毕加索、马蒂斯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艺术家都是斯泰因家的常客，不

过“一战”后上门的作家多过了艺术家。

67. Stein,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212.

68. Gertrude Stein, “Sacred Emily” （1913）, reprinted in Gertrude Stein, *Geography and Play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2）, 187.

69.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批评家，关于斯泰因的写作风格，他认为：“大家往往会避开她那催人入睡的冗长废话、鹦鹉学舌般的反复念唱、像智障一样列出来的数字。”娜塔莉·巴尼（Natalie Barney）也是一位举办沙龙的女作家，她倒是愿意相信“斯泰因的大脑是一座推陈出新的磨坊”，但是她怀疑斯泰因可能只是让自己“染上了结巴的毛病”。Natalie Clifford Barney, *Adventures of the Mind* （New York:University Press, 1992）.对于报纸编辑来说，斯泰因的写作风格有时会成为讽刺的绝好素材。一家报纸在报道斯泰因来到美国旅行的消息时，标题是这么写的：格蒂·格蒂·斯泰因·斯泰因回家啦回家啦（“格蒂”是“格特鲁德”的简称。——编者注）。Allan,*Americans in Paris*,66.斯泰因当然也有铁杆支持者。林肯·斯蒂芬斯认为她“不仅是一个天才，还是一个拥有智慧的女人”，是一个女先知，“让你一窥佛在静坐、凝视时的样貌”（*Autobiography of Lincoln Steffens*, 834）。珍娜·弗兰纳在《纽约客》上告知美国读者：“没有任何美国作家像斯泰因女士这样，获得了巴黎现代派如此认真的关注。”（*Paris Was Yesterday*, 9.）

70. 根据托尼·艾伦（Tony Allan）说法，斯泰因的第一本书在出版后18个月内只卖出了73本（*Americans in Paris*, 64）。她唯一的一本畅销书《爱丽丝·B.托克拉斯自传》直至1993年才出版，并且是用传统风格的散文写成的。

71. Ibid.

72.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25.《在密歇根北部》确实色情得太露骨（不过这是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说的），海明威的好友比尔·史密斯因此“曾开他的玩笑，说他的下一部短篇可以叫‘在密歇根更北部’”。St. John, “Interview with Hemingway's ‘Bill Gorton,’”175.

73. 联系第61页注释，现代主义文学不推崇描写。——译者注

74. Stein,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213.

75. Ibid., 90.

76. Gilot and Lake, *Life with Picasso*, 284.

77.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23.

78. Beach,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28.

79. Stein,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216.

80. Ernest Hemingway to Sherwood Anderson, March 9, 1922, reprinted i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1:330.

81. Sokoloff, *Hadley*, 48.

82. Ibid., 51.

83. Ernest Hemingway, “Wild Night Music of Paris,” *Toronto Star Weekly*, March 25,1922.

84. Ernest Hemingway to Sherwood Anderson, March 9, 1922, reprinted i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1:331.

85. Joost, *Scofield Thayer and* The Dial, 248.

86. Ernest Hemingway to Gertrude Stein and Alice B. Toklas, August 15, 1924,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141.

87.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26.

88. Ernest Hemingway, “Up in Michigan,” reprinted in *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Ernest Hemingway* （New York: Scribner, 2003）, 59.

89. Ernest Hemingway, unpublished fragment （1923）, reprinted in Michael Reynolds,*Hemingway: The Paris Year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38.

90. Stein,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197.

91. 用海明威的研究者H·R·斯通贝克（H. R. Stoneback）的话说：“海明威明白，他想要的是商业上的成功。斯泰因也想要这个，可她那一套东西是获得不了成功的。她是现代主义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但是你会读她的书作消遣吗？而庞德呢，他是诗人，他知道一首长诗是卖不出两万本的。” H. R. Stoneback,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une 2, 2014.

92. Hadley Hemingway to Ernest Hemingway, 1921, quoted in Carver, “Coming of Age.”

3
焉知非福

1922年，海明威离开巴黎，去报道希腊军队撤离东色雷斯一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希腊试图扩张领土，侵占先前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土耳其坚决反对，并以军事反击打碎了希腊的征服梦想。[注]海明威告诉《星报》的读者，反抗情绪始终在积聚，“直至希腊这场‘伟大的军事冒险’宣告结束”。[注]

之后，他改道瑞士洛桑，那里正在召开一场解决希腊-土耳其领土纠纷的会议。在洛桑，海明威遇见了调查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或者说，根据斯蒂芬斯的回忆，海明威是在“一天晚上突然降临”的。他还说，在报道那场冲突的各国记者中，海明威“有最可靠的前途”。[注]

海明威给斯蒂芬斯看了一份他正在写的电报。他越发对“电报略语”的艺术着迷——这是一种根本没有形容词的表达方式。没有什么比这种文体距离维多利亚式的俗艳文风更远了。即使处理公务时，海明威依然在探索精简交流的艺术。他后来举例解释说，一条电报——“凯末尔揭士麦那遭焚罪希腊”（“KEMAL INSWARDS UNBURNED SMYRNA GUILTY GREEKS”）[注]，可以被后方的编辑翻译成：“穆斯塔法·凯末尔今天在接受一位重要新闻频道（Monumental News Service）的记者的独家访谈时，坚决否认土耳其军队与士麦那城被焚毁一事有任何关系。凯末尔强调，该城被焚是希腊后卫部队的纵火者所为，他们在土耳其的先头部队到达之前放火烧城。”

他给斯蒂芬斯看的电报，描述的是被赶出土耳其的大批希腊难

民。“一幅生动、细致的图画，描绘了他看到的饥饿、恐惧、居无定所的人潮，”斯蒂芬斯回忆说，“我仿佛看到了这一画面，我将这番感受告诉了他。”[注]

“不不，”海明威反驳道，“读读那些缩略语，别管其他的。这真是一种了不起的语言，不是吗？”

斯蒂芬斯想看更多。“我请求拜读他所写的每份新闻稿，只为欣赏那逼真的场面。”他之后写道。[注]

海明威身边还带了一篇《我的老头儿》（“My Old Man”），这是一部关于赛马的短篇小说，情节跌宕。斯蒂芬斯拜读之后很喜欢；这篇小说再加上通讯稿，让斯蒂芬斯确信海明威实非池中之物。他热切地希望自己能在海明威文学生涯的起飞之路上占有一席之地，于是把小说寄给了纽约《大都会》（Cosmopolitan）杂志的一位编辑，当时这份杂志是刊载小说的。

与此同时，哈德莉待在巴黎，正和一场严重的流感做着斗争。海明威发电报告诉她，请她一旦又“活蹦乱跳”了，就来到他身边。[注]后来她自觉恢复得差不多，可以启程了。整理行装时，她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她把海明威的所有手稿——包括他的短篇小说、诗歌和那部长篇小说，以及这些作品的全部副本——都放进了一只手提箱里。他那时为止几乎所有的文学产出，都将随着她的衣物和化妆品一起踏上旅程。据她后来解释，海明威在写给她的信中对斯蒂芬斯“大唱赞歌”[注]，所以她认为丈夫一定希望斯蒂芬斯能再多看一些他的作品。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给海明威夫妇的整个余生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到达巴黎里昂车站时，哈德莉把箱子堆在巴黎-里昂专列的一节车厢里，然后下车去买了一些水、一份报纸。她有一点儿富余的时间，所以在站台上停留了一会儿，和几位同赴洛桑会议的旅人聊天。哈德莉最

后回到车厢时，发现装有海明威手稿的箱子不见了。

无论如何，她还是在极度的慌乱与绝望中到达了洛桑。海明威正在站台上等她，林肯·斯蒂芬斯也站在他身旁。哈德莉哭着走下火车。

“她哭个不停，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海明威回忆道，“她告诉我东西丢了，除了丧亲者和苦难深重的人，我还从未见过有谁伤心成这个样子。”[注]

海明威雇了一个人帮他照管着会议这边的事，然后返回巴黎。起初，他不愿相信哈德莉是带着他的全部“家当”来的，但是回到公寓后，海明威意识到她确实拿上了他所有的作品。“我走进公寓，发现那是真的，我至今仍记得之后的那天夜里我做了什么。”他后来写道。[注]不过他从未透露过自己究竟做了什么神秘的、可能见不得人的事。

“再怎样侦查搜索那只小箱子也找不回来了，”哈德莉后来说，“欧内斯特写这些作品时投入了那么多精力，我觉得他再也没能从这场无法弥补的损失中恢复过来。”他第一部小说（哈德莉曾把它称为“圣物”）的丢失对他的打击尤其大，哈德莉说。[注]

如果这是真的，在“火车大盗案”（这是比尔·史密斯的说法）[注]上，海明威对哈德莉的态度友善得几乎不可思议——至少书面记载上是这样的。多年后海明威不时重温那场可怕的意外，他写道，可怜的哈德莉是一个“可爱的、一心一意的女人，在保存手稿方面运气不好”[注]。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声称自己从未真正怪罪过她。毕竟，“她不是我雇来专门看守稿件的，”他继续写道，“她的本职工作——当一位妻子——做得真的十分好。”[注]（公正地讲，这些宽容大度的话，是海明威让心情平复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才讲出来的。）

将海明威拉出悲痛的是一个黑色幽默。当《我的老头儿》被《大都会》拒绝并退稿后，他开始把这篇短篇小说称作“资本”（Das Kapital）

[注]，说它突然成了自己全部的“文学资本”[注]。这也不全对——那篇“挂不出来的”《在密歇根北部》也保存下来了。出于某种原因，它被塞进了“别的什么地方的抽屉里”[注]，和其他的文稿分开存放。

海明威寻求新导师们的同情，却没得到什么关爱。“我想你听说了吧？我早年的所有作品都丢失了。”被窃几周后他写信给埃兹拉·庞德，“自然，你会说‘很好’之类的话。但是别对我说这些，我还没有心情听。那些破玩意儿是我三年的心血。”[注]庞德回信说，这是“上天的旨意”[注]，海明威也许应该重新创作他丢失的作品。毕竟，记忆是最好的编辑，再说，格特鲁德·斯泰因原先就不喜欢他的长篇小说。

最后，海明威开始极不情愿地相信，“早期作品的丢失可能对我是有好处的”[注]。从零开始重写，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空无一物的书桌给他压力。不过，任何再写出来的东西，几乎都将比丢失的文稿更好。毕竟新的作品会在巴黎的人文环境中写成，融入所有海明威从庞德和斯泰因那里所学的东西。现在，他的“早期作品”就远不是那些青涩的早期作品了，它们会像宙斯脑中生出的雅典娜，一问世就是完美的。事实上，海明威不仅吸纳了导师们强大的影响力，也做好了准备超越他们，用自己的新声写作。

“在散文写作上，我知道自己的方向，”他在给庞德的信中写道，“如果她屌都不是，我会心里有数的。”[注]

1923年1月底，他告诉庞德自己已经着手新的创作了。

多年后，海明威在生前未曾发表的短篇小说《陌生的国家》里塑造了一个名叫罗杰的人物，妻子弄丢了罗杰早年的所有作品。他极度想念那些丢失的作品，但他说：“正如风暴来临时，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强风把它推向大海，我现在也已经可以看到，我能够写出一部更好的长篇小说。”[注]

1923年2月，海明威夫妇去意大利拉帕洛（Rapallo）旅行，埃兹拉·庞德和多萝西·庞德在那里有一处住所。那里的住宿条件令人心旷神怡：有新鲜的无花果、上好的红葡萄酒和热腾腾的意大利面包，还能和庞德夫妻两个一起远足散步、打网球。

不过，更让人心驰神往的是海明威一批即将问世的全新作品。工作开始的时候很痛苦，海明威强求庞德和斯泰因给他鼓励。他告诉斯泰因，自己一直在埋头写作，并且完成了几篇新作。写作时，海明威在心里遵从着斯泰因的教导，但是他也提出，如果斯泰因有另外的建议，希望她能写信告知。[注]与此同时，他与哈德莉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和：他在私下里写到，他们在床上从未如此快活过。[注]

但是，当哈德莉告知海明威她怀了孕，快活就到此为止了。她到达洛桑的时候，既丢了手稿，也丢了避孕药。对此，她事先给了海明威充分的警告，但是他们还是铤而走险了。显然事情的结果仍然震惊了海明威，一回巴黎，他就去斯泰因的住所寻求安慰。

斯泰因回忆说：“大约上午10点，他来了，留下来吃了午饭。他留下来待了一下午，他留下来吃了晚饭，他留下来，一直待到了大约晚上10点，然后他突然宣布妻子怀孕了。”

“我不能这么早就当父亲。”他对她们说，语气中透出无比的苦恼。[注]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尽我们所能安慰了他，送他出门回家”[注]，不过斯泰因的同情心也就到此为止了：她觉得这场造访非常有趣，还兴致勃勃地把它讲给了哈德莉听。[注]后者估计并不觉得可乐。

无论别人怎么想，这是几个月来哈德莉遭受的第二次打击。他们很快定好计划，夏天结束就回到加拿大，海明威会在《多伦多星报》总部做记者，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为新家庭提供一份稳定的收入。他似乎

把“成为父亲”和“重新做回全职记者”看成了双重徒刑。对于从欧洲转移到多伦多，他也并不十分兴奋。还好《星报》给了他优厚的工资，周薪125美元。[注]不过，任何程度的逆境都不足以让他完全把文学志向放在一边。1922年的冬天至次年春天，他夜以继日地写作，用他新提炼的精简、集约、有节奏感的风格写了很多的故事梗概和短篇小说。

“我死都想发表一篇作品。”他在给一位编辑的信里这样说。[注]

运气终于来临，一位出版人出现了——很快他就“死都想”出版海明威的作品了。他就是罗伯特·麦克阿尔蒙，一位语言犀利的旅居作家、居住在巴黎的编辑。麦克阿尔蒙创办了联络出版公司（the Contact Publishing Company），一家走精英路线的精品出版社，致力于以非常有限的发行量出版实验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由于商业或法律原因，作品不太可能被其他出版社出版”[注]。他出版了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注]、格特鲁德·斯泰因、伊迪丝·席特维尔[注]、米娜·罗伊[注]，以及那一代一些文学名流的作品。[注]

那年冬天麦克阿尔蒙也出现在拉帕洛。他之前从来没听说过海明威，而且对这位年轻作家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麦克阿尔蒙后来回忆说，海明威有一种“小男孩和粗汉般的虚张声势，面对他不确信的陌生人，一种时刻会爆发的轻蔑，跃然写在他那张嘴唇厚实、没有把门儿的嘴上。”[注]

麦克阿尔蒙当时27岁，他和庞德一样，似乎是一位海明威不太可能去征服的名士。[注]他从前当过模特，有时戴着绿松石耳钉，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双性恋，而且据说相当自恋。“鲍勃[注]麦克阿尔蒙一两杯酒下肚后，似乎就开始认为每位貌美的公民，不论男女，不管是送报的小哥还是女公爵，都会想和他来点儿暧昧。”一位和他同属一个圈子的作家写道。[注]

麦克阿尔蒙和英国的一个女“富二代”结了婚。[注]旅居者群体中，大多数人都认为后者是一个女同性恋，他们结婚，其实是在为各自的性取向打掩护。这场结合使得麦克阿尔蒙的手头相对阔绰，在城里得到了一个绰号——“Robert McAlimony”[注]。

虽然麦克阿尔蒙和海明威看上去并不志同道合，但实际上，在拉帕洛他们晚上经常一起喝酒。毕竟对于海明威来说，一位潜在的出版者也是出版者。他向麦克阿尔蒙展示了他幸存下来的早期作品和他的新作。麦克阿尔蒙不喜欢海明威的风格，认为那好比“一个成人执意要像孩子一样思考与写作”[注]，是一种不自然的写作方式。此外，《我的老头儿》（“火车大盗案”中幸存的短篇小说之一）在麦克阿尔蒙看来，太像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了。而海明威新近的作品似乎更新鲜、更有原创性。麦克阿尔蒙认定，海明威或许能很好地填补联络出版社书单上的空缺。

与此同时，海明威告诉庞德，他喜欢和麦克阿尔蒙待在一起，这位出版人能“带给我们平凡人身上的灰尘”[注]。初次的相聚是如此融洽，以至于几个月之后的1923年6月，两人决定一起去西班牙旅行。麦克阿尔蒙执意为此次旅行买单。和他们同去的还有旅居记者比尔·伯德（Bill Bird），他是一家叫作“团结社”（the Consolidated Press）的通讯社的创始人之一，是海明威在媒体圈子里认识的。不像有时会引发“讥讽和公开敌意”[注]的麦克阿尔蒙，和蔼的伯德在巴黎旅居圈里广结善缘[注]——考虑到“这伙人”中一言不合就翻脸的习气，这确实是值得称道的成就。而伯德正巧也在巴黎拥有一家新成立的小出版社。对于一位雄心勃勃的新兴作家来说，这两个人都是最有利可图的旅伴。

也多亏了格特鲁德·斯泰因，海明威开始培养对斗牛的热情，而且盼望着能亲眼目睹斗牛盛况。斯泰因20年前和她的哥哥利奥第一观次看了西班牙斗牛，10年前她和爱丽丝·托克拉斯重访西班牙。托克拉斯当时穿了一套典雅的观摩斗牛的服装，包括一顶带羽毛的黑帽子，一件黑

绸袍，一把黑扇子，以及一副黑手套。（“我把这套装备称作我的‘西班牙伪装’。”托克拉斯在一本确实是她本人所写的自传中回忆道。[注]）

花园街27号的两位女士把她们的经历讲给海明威听，他被这一话题深深吸引。在手稿失窃后他为了恢复元气而写的新作中，就有一段风格独特的故事描述了一场完全乱了套的斗牛比赛（海明威仅仅是通过二手材料了解这项运动的）：

> 第一位斗牛士用执剑的那只手抓住了牛角，引得观众大声叫骂。第二位斗牛士一个闪失，被牛角洞穿了腹部，他用一只手死死抓住戳入自己腹中的那只角，另一只手撑住另一只角。公牛顶起他，将他重重地撞在墙上，把角抽了出来。他倒在沙地上，又像喝得烂醉一般站起来，还要打那两个上前把他扛走的人，大声索要他的剑，然后昏了过去。[注]

海明威显然对这项运动很感兴趣，这样的盛况他必须亲眼目睹。很快他就会发现，观看斗牛犹如在前排观看一场血腥的战斗。

他已经等不及了。

1923年6月1日，麦克阿尔蒙和海明威坐火车离开巴黎，前往西班牙。

“啤酒大叔（Beery-poppa，指海明威）向羽毛小猫（Feather-kitty，指哈德莉）亲切地道了别，”麦克阿尔蒙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用上了夫妻俩那时新起的外号，“然后他和我喝饱了威士忌，上了车。”[注]

比尔·伯德计划在马德里和他们相会，但还没等他们到达那里，麦克阿尔蒙就已经进了海明威的黑名单。进了这个名单的人，就几乎不可能再出来了。

甚至在火车穿过西班牙的国境线之前，海明威和麦克阿尔蒙就闹起了别扭。火车停在法国境内的某一站时，他们车厢旁边的铁轨上停着一辆平板货车，上面摊着一具腐烂的、爬满了蛆虫的狗尸。麦克阿尔蒙脸色惨白，望向了别处——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海明威的反感。他劝说麦克阿尔蒙，类似的场景他在战争中也见过；人们只要用超然一点儿、客观一点儿的态度看待这种事情就好。

麦克阿尔蒙记得："他温和地解释，我们这代人，尤其是我们，必须适应冷酷现实的景象。我想起埃兹拉·庞德有一次谈到了海明威的'自我硬化过程'。"[注]看来麦克阿尔蒙是太"软"了，不符合海明威的口味。

一到西班牙，三人就着手准备，去看人生中的第一场斗牛。他们灌了很多酒给自己壮胆，在看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身上还带了更多的威士忌，这样万一看慌了神还可以喝酒压惊。上场的第一头公牛向一匹马冲去，用角把它掀上了头顶。后来，另一匹被顶伤的马"发疯一般地在场中乱跳乱踢，踩着它自己的肚肠"，麦克阿尔蒙回忆道。[注]他感到反胃——不仅是因为斗牛场里发生的事，他感觉观众们太粗鄙、太残忍了。麦克阿尔蒙说，比尔·伯德没有那么害怕，"但是他和我都没有经历什么'自我硬化过程'"。[注]然而，海明威立即被吸引了。"这是一出壮丽的悲剧——是我见过最美的东西。"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在他眼中，斗牛需要"比任何事情更多的技巧、胆量——还是胆量"。他还说，这就像"坐在前排观看战争，同时又没有中枪之虞"。[注]

比尔·伯德发现，海明威立刻表现得像刚刚加入了什么秘密社团一样，开始装成一夜成才的专家。[注]（"如果你想知道关于斗牛的任何事，尽管问我好了。"几个星期后海明威写信告诉父亲，并且补充道，这次旅行的素材能写出"非常好的故事"。[注]）与此同时，海明威正在失去对麦克阿尔蒙的耐心，毫无顾忌地冒犯他[注]，即使是麦克阿尔蒙为这趟旅行买了单。麦克阿尔蒙不能直面残酷的景象，无论是一条正在腐烂的狗，还是一匹被刺伤了的马，这让海明威感到厌恶。海明威还感觉麦

克阿尔蒙把他当作了一个喜欢装模作样的人[注]，而这远非真相。但海明威对斗牛的一片热忱是千真万确的，他将会证明这一点。

出人意料的是，等到三人最后回到巴黎时，海明威已赢得了不是一位，而是两位出版人：伯德和麦克阿尔蒙都决定通过各自的出版社出版海明威的作品。麦克阿尔蒙计划抢在伯德之前下手，他们从西班牙回来不久后，麦克阿尔蒙就公开宣布，他会第一个出版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书。毕竟，才华就是才华，不管它是亲吻了你的手，还是一口咬了上去。

海明威将要出版的第一本书很薄，我们能从它的标题上感觉出来：《三个故事和十首诗》（*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三个故事中的两个是“火车大盗案”的幸存者：《我的老头儿》和《在密歇根北部》。

第三个故事是海明威在拉帕洛之行结束后的春天写的，当时他和哈德莉在科尔蒂纳滑雪。对他来说，《禁捕季节》（“Out of Season”）是一次风格上的突破。这篇小说不仅节奏鲜明，而且示范了他一向宣扬的“冰山理论”。他不仅希望简化语言本身，还主张削减故事材料，鼓励读者推测作品中没有明白讲出的事件。在文字上，一个有天赋的作者可以只通过展示冰山的尖顶写就一部作品。后来他解释说：“如果一位作家的笔法真的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读者对那些作者避而不谈之事的感受将会和他们对作者写到之事的感受同样真切。”[注]这种写作方式会使读者更深地融入故事中，成为故事的积极参与者。

《禁捕季节》在许多方面都很典型。后来海明威承认，它几乎是他和哈德莉科尔蒂纳之行中发生之事的真实文字记录。[注]故事的核心是一对年轻男女岌岌可危的婚姻，其中的女人名叫“小小”（Tiny）——这是海明威给哈德莉起的一个绰号。故事中的两人在度假，他们不停地吵嘴。争执期间，他们不顾法律，在禁捕季节跟随一位嗜酒的年迈向导佩

杜兹踏上了一场渔猎之旅。因为佩杜兹不称职，这场远行无果而终。作者在故事最后撇下读者独自揣摩，两口子为何吵架？不幸的佩杜兹后来怎样了？

现实中，海明威夫妇踏上了一场相似的远足，而且远足之后，海明威曾向他们旅馆的经理抱怨“有一位向导喝得太醉”[注]，经理听后立即解雇了那位年迈的村民。这位“非常绝望”的老人于是在马棚里上吊自杀了。虽然在老人的死上有推波助澜的嫌疑，但后来讲述这场意外时，海明威却丝毫没有悔恨之意。他只是以“事实如此”的姿态，解释了在故事中向导的自杀为什么不能作为一个文学要素。他只是“认为这个故事不需要它”[注]。显然他的“自我硬化过程”正在发挥作用。

海明威的新闻写作功底也派上了用场，“佩杜兹事件”是众多他当作“独家报道”写在虚构作品里的真实事件之一。他会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现实事件的文学效力，然后付诸行动，毫不沉溺迟疑，把事件转变为纸上的文字——通常稍稍加以虚构，用高度风格化的形式写成。他是以记者疯狂赶稿子的状态写出《禁捕季节》的，从那场不愉快的捕鱼之旅一回来，他就开始了写作。他声称自己写得非常快，以至于连标点都没用。

“当你被任何一种争吵破坏了兴致时，耳朵总是会更加敏锐。”后来他解释说。[注]

海明威同样需要为伯德的出版计划提供些新作品。和麦克阿尔蒙的出版社一样，伯德的三山出版社（Three Mountains Press）[注]也是一家新近成立的以小发行量出版实验作品的出版社。不过和麦克阿尔蒙出版的书（有些旅居者形容它们是“一摞丑陋的印刷品”）不同，伯德的书都是工艺精良的艺术品，是用一套18世纪的手工印刷机印出来的，整个作坊都挤在一间先前的酒窖里。[注]伯德最近与庞德合作，希望出版一部六卷本的《英语散文现状探究》（*The Inquest into the State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Prose）。(注)伯德想在这套书的第六卷中放入海明威的作品，也就是最后一卷。他提议海明威写一系列短故事，就像那篇由183个英文单词组成的受伤斗牛士的故事。碰巧，海明威已经下功夫写出了一些，其中六篇在那年春天的早些时候还发表在了《小评论》上。其中有一则关于战争的故事，仅仅由75个英文单词组成：

> 我们守在蒙斯(注)的一座花园里。年轻的巴克利带着手枪渡河过来。我看到了第一个翻过花园围墙的德国人。等他一条腿迈过墙头时我们开了火。他背了那么多装备，看起来吃了一惊，就这样栽进了花园里。接着又有三个德国人从稍远处的墙上翻过来。我们再次开火。他们同样栽了下来。(注)

海明威接受了伯德的建议，将最后这一卷小故事合集命名为“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注)。这是一个宣言一样的标题，意在表明，读者也许能在这些粗糙的书页中找到文学的时代精神。(注)

这本书的厚度（或者该说是“薄度”）让它显得很不起眼，但事实上它打眼极了。《在我们的时代》仅有3500个单词，包含18个章节，多数章节不比《蒙斯的花园》更长。但是每一个单词都经过了呕心沥血的筛选与编排。《在我们的时代》中的每一篇小说都编织出了一方引人入胜的小天地，很多故事都取材于海明威在欧洲各地的采访。

罗伯特·麦克阿尔蒙虽然即将赢得“海明威首位出版者”的殊荣，但是《三个故事和十首诗》主要在炒海明威“年轻时代”丢失作品的冷饭。比尔·伯德则不然，他得到了真正的好东西。《在我们的时代》预示了未来的愿景——不仅是海明威的未来，也是文学的未来。海明威的新程式正在成型，其中交织着受庞德启发而来的精简，以及斯泰因式的叠词意识流元素。不过这些短篇本身也很独特——靠动词推动的情节，和海明威的很多报道一样引人入胜；和庞德或斯泰因所写的任何东西一样具

有文学意味，同时更加易懂。

对于伯德和其他《在我们的时代》的早期读者来说，它给人的感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事业渐渐有了起色，哈德莉的肚子也渐渐变得像满月一样圆：宝宝将在1923年10月的某一天降生。夫妇俩不久就必须启程去加拿大了——正值海明威开始在巴黎文学界小有建树之时。他当然不开心。其他满怀希望的外国人正成群结队地来到巴黎，来追寻那个他已稳操胜券的目标，而如今，他把自己放逐出了这个宇宙的文学中心。他苦恼地向朋友抱怨自己的处境——即使移居加拿大是他完全自愿的。

虽然海明威起初满腹牢骚，但他也曾设法与怀孕的妻子感同身受。7月份，两人一起去了西班牙的潘普洛纳，参加为期一周的圣佛明奔牛节：这是斗牛狂热者们一年一度的朝圣。海明威觉得这会给他尚未出生的孩子带来很好的影响，而事实证明，这场庆典不只如此。对海明威自己来讲，这次神启一般的经历陶醉着他，改变了他的一生。在像别人描述这场节日盛会时，他激动得头晕眼花。“持续五天没日没夜的斗牛和舞蹈，”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音乐棒极了——鼓、簧管、横笛——委拉斯开兹画作中喝醉之人的脸，戈雅和格里柯画中那种疯狂的脸，所有人都穿着蓝衬衫，挥舞着红手绢，转圈，踮脚，飘飘然地舞蹈。”[注]

不仅如此，在一位记者看来，它更加彻头彻尾地意味着第一手独家资讯。这其实就是一系列未经删减的素材，堕落、高雅艺术、仪式、轻浮之情、深刻之理，同时充斥着这个世界——而且他说，他和哈德莉是那里唯一的外国人。（这一盛景并没怎么打动哈德莉，在观看斗牛的时候，她只是高兴地坐在海明威身边，为他们的宝宝织衣物，“把所有那些粗野都编织进去了”，后来她这样说道。[注]）

首次参加的庆典立即启发了他：《在我们的时代》中，接近四分之一的章节描写的都是斗牛场景。整个夏天他激情澎湃地加工这些素材，

同时向埃兹拉·庞德询问丛书的编辑事宜。不过现在学生也开始指导导师了：关于小说在书里最终该以怎样的形式呈现，海明威给出了严格、详尽的指示。针对《三个故事和十首诗》的校样，海明威也对罗伯特·麦克阿尔蒙提出了同样精确的指导，顺带在美学问题上套用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观点，加强自己的论证火力。他甚至在比尔·伯德的建议下亲自设计了书的封面。“我喜欢它的外观。可能你不喜欢，”他写信给麦克阿尔蒙，并且大度地说，“你才是出版人。”[注]不过海明威最看重谁的意见，已经很明白了。

麦克阿尔蒙在1923年8月13日出版了《三个故事和十首诗》，海明威正式成了一位发表过作品的作家。

两周之后，他和哈德莉迁往加拿大。到达没几天，海明威最坏的恐惧就被证实了。

“不能再坏了，”他写信告诉庞德，“你甚至无法想象。”[注]

夏末，《多伦多星报》的办公室里传来了海明威即将到来的消息，渐渐洋溢起了兴奋的空气。当9月份他终于抵达时，他立即占据了舞台的中心。谈及自己和格特鲁德·斯泰因、埃兹拉·庞德的友谊，海明威的口吻几近随意——对很多报社员工来说，这两个人几乎像外星生物一样神秘——他还热切地立志要成为文学万神殿中的一员，加入两位巨匠的行列。

海明威成了报社内外的热门话题，关于他的流言甚嚣尘上。据莫里·卡拉汉（当时还是《星报》的一位年轻记者）说：“他甚至无法在街上行走。如果他被踩到脚趾，旁边总会有记者把这种小意外夸大成一场性命攸关的事故。我仍然不清楚他是如何让自己的传说流行起来的。”[注]

海明威可能会令一些稍微年轻的同事心生敬畏。比如有一天，海明威上班时手里攥着《在我们的时代》的校样，宣布：“我发现了一种新

形式。”[注]他还对卡拉汉解释：“埃兹拉·庞德说这是他40年来见过的最好的散文样式。”[注]但是，老一辈的员工并不觉得这有多了不起。

同事们开始不动声色地传看一份《三个故事和十首诗》的稿子。卡拉汉对海明威和他的作品十分崇拜，他问其他两位同事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我仍记得其中那位年长一些的同事脸上耐心的微笑，他说：‘记住，孩子，独燕不成夏。’”卡拉汉说。[注]

没有谁比海明威的编辑上司哈里·欣德马什（Harry Hindmarsh）反应更冷淡了——后者也是这家报纸发行商的女婿。用卡拉汉的话说，这位无所顾忌的媒体人、“专门打击骄傲者精神”[注]的将军前去叫板海明威了。欣德马什非常不喜欢海明威，为了让手下这位新记者谦恭一点儿，不惜大费周章，派给他无关紧要却累人的差使。海明威很快就“被欣德马什牵着缰绳在国内四处奔走”了。[注]采访墨索里尼和报道国际争端的好日子一去不返，欣德马什交给海明威的活儿“琐碎，纯属垃圾差事”，卡拉汉回忆说，他看到流程本上排出的海明威的文章，感觉不可思议。[注]哈德莉同样惊讶，而且告诉海明威的母亲“他完全在超负荷工作”，睡得很少。[注]

海明威丝毫不向巴黎的朋友掩饰自己的苦难，寄往法国的信件越来越绝望。他乞求庞德写信给他。“你可以救一条人命。”他恳切地说。[注]（庞德曾宣称自己“憎恶一切美国的东西”[注]，他显然对海明威迁居加拿大一事稍感鄙夷，他从巴黎寄来的信戏谑地把收件地址写作“加拿大西红市”[注]。）不仅如此，海明威还往自己的伤口上撒盐，拿自己突然中断的创作之路开玩笑。他对一位同事说，自己在多伦多耽误的这段时间，已经抹杀了他10年的文学生命。[注]

欣德马什在哈德莉临产之际把海明威派往纽约，此时记者和编辑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果然，10月10日，正当海明威出差的时候，哈德莉

生下了孩子。海明威立即回到了哈德莉身边；欣德马什则谴责海明威没有第一时间把新闻稿送到编辑室。哈德莉完全理解丈夫的难处：她害怕这份新工作“要是干得太久，会害死我们的小小”，她向一个朋友写道。[注]哈德莉必须“一个人面对”一切，这让海明威怒不可遏。[注]他在庞德那儿发誓说，以后交给欣德马什的稿件，将“全部用鄙视和仇恨”写成。[注]

海明威和哈德莉把他们六斤六两的男孩命名为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尔·海明威（John Hadley Nicanor Hemingway）[注]。海明威在不止一封信里开玩笑说，孩子长得像西班牙国王。哈德莉向她的婆婆解释说，“约翰·哈德莉”是海明威写新闻稿时用的一个笔名。“其中包含了我的名字，”她说，“孩子事实上是以我俩的名字共同命名的。”[注]“尼卡诺尔”则是在致敬西班牙斗牛士尼卡诺尔·比利亚尔塔（Nicanor Villalta），海明威夫妇夏天在潘普洛那见过他。很快，婴儿也获得了一些绰号，父母叫他“邦比”（Bumby）——哈德莉起了这个名字，形容他圆圆胖胖的样子；他的教父母——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爱丽丝·托克拉斯叫他“高蒂”（Goddy）。

在亲友们看来，海明威和哈德莉说起邦比的成长点滴，都带着傻乎乎的骄傲。哈德莉说，“我们本就应该高高兴兴的”[注]，但那正是他们心情沉重的时候。海明威抱怨自己患上了胃病、神经衰弱和失眠症。[注]他写信告诉斯泰因和托克拉斯，他们在加拿大的生活就是人间地狱；他第一次明白了，一个人为什么会被迫自杀。[注]

无论如何，有迹象显示，他的战斗精神并未熄灭，只是受到打击，暂时屈从了。“我会杀回你书架上的。”他向西尔维娅发誓。[注]他写了几篇热情洋溢的关于斗牛的文章，还抽空写了一些同事们的人物速描——他们“都是蠢货”，他向毕奇形容。其中一篇写到，一个同事“大脑干枯得像老妓女的下体”[注]。

他甚至想过写一本向欣德马什复仇的长篇小说，打算将之命名为“女婿”（*The Son-in-Law*）。我们并不清楚这本小说的构思进展到了哪一步；显然，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计划。他向一位同事解释，一位作家不能把小说建立在对一个人的鄙视之情上，因为仇恨会扭曲他的观察。注

不过，什么事都不能让海明威忘记日常琐事的折磨。不久之后，他决定放弃：不仅是放弃《星报》的工作，而且要离开新闻界。不会再有没日没夜的自由撰稿，不会再有截止时间前的彻夜赶工，也不会再接到诱人的采访远行。剩下的只是写作，真正的写作。海明威和哈德莉开始计划逃回法国，他们意识到，在过去的两年间那里已经成了他们真正的家。他们向左岸的很多朋友寻求帮助，想找一处可以让他们在城市中立足的公寓。哈德莉向西尔维娅·毕奇保证，他们对住处不会“太挑剔”；他们只是渴望“巴黎的日光”。注

这次迁移颇有越狱出逃的意味，因为海明威夫妇非法打破了租约，请朋友偷偷帮他们把家当带出公寓。1924年1月中旬的一天，当横渡大西洋的“安东尼亚号”轮船从纽约起航驶向法国时，海明威一家已经在船上了。这时他们已经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了。

海明威如今是正式出版过作品的作家、前记者、自由撰稿人。在他真正靠写小说赚钱之前，全家人都依靠哈德莉的基金生活。他们很快尝到了贫穷的滋味，但是相比他们刚刚经历的痛苦，物质上的匮乏不算什么。那是一个动荡的年月，他们在迷雾中摸索，时刻要迎接骤变。“火车大盗案”和哈德莉“惊喜”的怀孕已成定局，不过经受了加拿大的磨难后，新的希望很快就会来临。正如莫里·卡拉汉说的那样，“如果不是因为欣德马什，海明威可能会在多伦多待一年”注。果真如此，那些为他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不是业余作品，也不是赌气所写的讽刺文字）搭建舞台的事，可能就不会发生。

1. “一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奥斯曼帝国遭到了协约国的瓜分和占领。同时，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国民运动兴起。1922年，土耳其废除苏丹，次年成立土耳其共和国。——译者注

2. Ernest Hemingway, “The Greek Revolt,” *Toronto Daily Star*, November 3, 1922,reprinted in White, *Ernest Hemingway: Dateline: Toronto*, 244.

3. Steffens, *Autobiography of Lincoln Steffens*, 834.

4. Fenton, *Apprenticeship of Ernest Hemingway*, 187.

5. Steffens, *Autobiography of Lincoln Steffens*, 834.

6. Ibid.

7. Cable from Ernest Hemingway to Hadley Hemingway, November 25, 1922,reprinted i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1:369.

8. 这是哈德莉告诉海明威的传记作者查尔斯·芬东的。Fenton, *Apprenticeship of Ernest Hemingway*, 196.但她具体的动机仍是长久以来人们争议的焦点。也有说法认为，是海明威要求她带上所有作品的，他想把这些东西拿给斯蒂芬斯看；她信不过邮政系统，所以将作品随身携带。但是在《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把责任全都推到了哈德莉身上，说她把手稿都搬到了洛桑，“作为一个惊喜……这样我就能在山中度假的时候用它们来写作”（*A Moveable Feast*,69）；他没有提到赞扬斯蒂芬斯的信，也没说是自己让她带稿子来的。也可能是斯蒂芬斯直接联系了哈德莉：1922年11月28日，海明威告知哈德莉：“斯蒂芬斯给你写了一封信。”如果真是这样，那封信可能包含这样一个请求——但斯蒂芬斯在他的自传中并没有承认，而且他寄给哈德莉的信应该已经逸失了。哈德莉的传记作者乔亚·迪利贝托（Gioia Diliberto）称：“斯蒂芬斯寄给哈德莉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Paris Without End*,129）最令传记作者们困惑的是，哈德莉为什么要拿上所有的副本？不过迪利贝托提出了一个“有点道理”的解释：如果海明威需要修改他的作品，他也同样会改动副本（*Paris Without End*,130）。

9.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70.

10. Ibid. 我们难以确定海明威回到巴黎的时间。研究界普遍认为悲伤的哈德莉一到洛桑，海明威就动身返回了巴黎。但是1923年1月23日海明威写给埃兹拉·庞德的信显示，他返回巴黎，是在见到哈德莉几周之后：“我上周回到了巴黎，看看还剩下什么。”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6. 海明威不肯明讲的神秘行径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我们相信，出版于海明威逝世后的短篇小说《陌生的国家》（“The Strange Country”）忠实地再现了手稿失窃案以及其后他回到巴黎确认剩余稿件的事，那么那天夜里，海明威只是钻进了被窝，在两个枕头之间绝望地躺了一晚。接着，小说里这位“倾家荡产”的作家提到了公寓贫贱的门房——看门人出于同情，趴在作家的胸口上哭了，然后劝他去当地的咖啡馆吃点晚餐。Ernest Hemingway, “The Strange Country,” in *Complete Short Stories*,648-649. 一条编者注释说，“《陌生的国家》揉和了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中四个章节的内容，是

海明威在1946—1947年以及1950—1951年间断续写出的。这几幕情节相当于（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岛在湾流中》（*Islands in the Stream*，出版于海明威死后的1970年）一个早期版本的概貌。”（*Complete Short Stories*, 605.）《太阳照常升起》中一条编者给出的尾注指出《陌生的国家》是“海明威死后出版的短篇小说”。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287.

11. Fenton, *Apprenticeship of Ernest Hemingway*, 196.

12. St. John, “Interview with Hemingway's ‘Bill Gorton,’” 175.

13. Ernest Hemingway, introduction to *A Hemingway Check List*, ed. Lee Samuel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1）, 6.

14.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160.

15. “Das Kapital”也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德文标题。——译者注

16. Hemingway, introduction to Samuels, *A Hemingway Check List*, 6. 1923年1月，海明威向埃兹拉·庞德透露，其实就连这篇小说也丢失了：他能找到的一切只有“用铅笔写的三稿垃圾诗”、一些通讯稿和几篇新闻稿的副本。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January 23, 1923,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6.

17.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69.

18. 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 January 23, 1923,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6.

19. Ezra Pound, undated reply, excerpted in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19171961, ed. Carlos Baker （New York: Scribner,2003）, 77.

20.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70.至少有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海明威丢失了早年的作品是一件幸运的事；如今一些学者也认同这一看法。手稿失窃是“海明威一生最好的遭遇”，海明威学社（Hemingway Society）的一位创立者艾伦·约瑟夫斯（Allen Josephs）指出（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April 1, 2014）。研究海明威的学者H. R. 斯通贝克相信，如果那些手稿没有丢失，海明威的早期作品“就都会像《我的老头儿》那样，和舍伍德·安德森之作没有差别”（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une 2, 2014）。

21. 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 November 8, 1922, reprinted i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1:369.

22. Hemingway, “The Strange Country,” 650.

23. Ernest Hemingway to Gertrude Stein, February 18, 1923,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11.

24. 这是传记作者卡洛斯·贝克从一张“档案中日期不明的纸片”上摘录的，但他把这份材料的日期定位于“1923年2月前后”（*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06, 580）。这一材料也被引用于Reynolds, *Hemingway: The Paris Years*, 104。

25. Stein,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213.

26. Ibid.

27. Sokoloff, *Hadley*, 61.

28. 1923年的125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700美元，这意味着海明威的年薪大约有88000美元。

29. Ernest Hemingway to Edward O'Brien, May 21, 1923,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21. 奥布莱恩编订了多部《短篇小说精选》（*The Best Short Stories*）文集。该文集每年出版一部，奥布莱恩曾请求海明威把《我的老头儿》投给1923年的《短篇小说精选》。

30. 在旅居文学刊物《大西洋彼岸评论》中，麦克阿尔蒙曾发表过一篇公告，详述了联络出版公司的目标。西尔维娅·毕奇在她的回忆录中收录了这篇文章。麦克阿尔蒙说："每种书只会印300册。出版的原因很简单，书写出来了，我们足够喜欢，愿意把它们印出来。" Beach,*Shakespeare and Company*, 130-131.

31.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83—1963）：美国意象派诗人。麦克阿尔蒙出版了他的诗集《春天与万物》（Spring and All）。——译者注

32. 伊迪丝·席特维尔（Edith Sitwell, 1887—1964）：英国诗人、批评家。——译者注

33. 米娜·罗伊（Mina Loy, 1882—1966）：英国艺术家、作家。麦克阿尔蒙出版了她的诗集《月亮旅行指南》（Lunar Baedecker）。——译者注

34. 联络出版公司也会出版一些不那么高明的作品，麦克阿尔蒙的有些作者是随便找来的。据西尔维娅·毕奇说："麦克阿尔蒙在多摩咖啡馆收稿，他还告诉我，他的作者都是从这家或者那家咖啡馆中找来的。" Beach,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132.

35. 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157.

36. 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麦克阿尔蒙在大西洋两岸都名声斐然，用凯·博伊尔的话说，"他野性、大胆，硬得像钉子一样"（*Being Geniuses Together*, 23）。在西尔维娅·毕奇的回忆中，他是"'这伙人'中最受欢迎的一员……无论麦克阿尔蒙光顾的是哪一家酒吧或者咖啡馆，你都会发现圈子里其他人也在那里"（*Shakespeare and Company*, 403）。

37. 鲍勃："罗伯特"的简称。——编者注

38. Callaghan, *That Summer in Paris*, 132.

39. 麦克阿尔蒙的妻子名叫安妮·温妮菲尔德·埃勒尔曼（Annie Winifield Ellerman），笔名布赖尔（Bryher），是巴黎当时很有名望的作家、诗人。她出身一个船运大亨家庭，其父约翰·埃勒尔曼（Sir John Ellerman）生前曾是英国首富。她和麦克阿尔蒙一样是同性恋，和诗人H.D.（即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的漫长恋情尽人皆知。麦克阿尔蒙的另一项收入，至少根据约翰·多斯·帕索斯的说法，是通过给一份叫"截面"（*Der Querschnitt*）的德语杂志写"淫诗"得来的。John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New York:

Signet Books, 1968）, 163.

40. “McAlimony”是麦克阿尔蒙的姓氏和“Alimony”（生活费）一词的组合。——译者注

41. 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158.

42. 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 March 10, 1923,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14.

43. Callaghan, *That Summer in Paris*, 81.

44. Karen L. Rood, “William Bird,” in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vol. 4, *American Writers in Paris, 1920-1939*, ed. Karen Lane Rood （Detroit: Bruccoli Clark, 1980）,39.

45. Alice B. Toklas, *What Is Remember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63）, 70-71.

46. Ernest Hemingway, *in ourtime* （Paris: Three Mountains Press, 1924）, chap. 2.

47. 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160.

48. Ibid.

49. Ibid., 161.

50. Ibid.

51. Ernest Hemingway to William Horne, July 17-18, 1923,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6.

52. Bill Bird to Carlos Baker, June 1962, quoted in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10.

53. Ernest Hemingway to Clarence Hemingway, June 20, 1923,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24.

54. 在1962年6月的一次访谈中，比尔·伯德告诉卡洛斯·贝克，当时海明威实际上无礼得离谱（quoted in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11）。海明威对麦克阿尔蒙出言不逊的消息传了出来，也让巴黎“这伙人”中的其他成员愤愤不平。“当然，所有的钱都是鲍勃付的，”凯·博伊尔写道，“但是在斗牛场选座时，海姆（Hem）会……占据最好的位置，坐在紧靠围栏的前排，因为‘他是在研究斗牛艺术’。而鲍勃……我推测，他成了对任何形式的艺术都一无所知的人，在露天场地里随便坐坐就行了。”凯还写到，海明威喝掉的尊尼获加威士忌，也是由麦克阿尔蒙买单的。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313.

55. 在1932年的《死在午后》（*Death in the Afternoon*）中，海明威说麦克阿尔蒙喜爱斗牛的样子显然是装出来的。

56. Hemingway, Death in the Afternoon, 192.

57. 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December 24,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455.

58. Ibid.

59. Ibid.

60. Ibid.

61. “三山”指巴黎的三座高地：圣日内维耶（Sainte-Geneviève）、蒙帕纳斯和蒙马特（Montmartre）。

62. Ford Madox Ford, quoted in Rood, “William Bird,”39.三山出版社的安茹码头印刷总部，空间只够容纳手工印刷机和伯德自己，而他兼任编辑和印刷工。如果要会客，就只能待在外面的人行道上。（*Shakespeare and Company*, 132.）作家兼编辑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后来挤进了这里办公，他回忆伯德把印出来的书堆在一个简易厨房里。Ford Madox Ford, *It Was the Nightingale*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33）, 322.

63. 根据一份材料，伯德能够和庞德合作，海明威也出了力。1922年4月伯德和海明威在前往日内瓦国际经济大会（Conferenza Internazionale Economica de Geneva）的路上相遇，伯德首次向海明威提到了他的新印刷作坊。于是“海明威谈到埃兹拉·庞德可能会让伯德印刷他正在写的长诗。伯德去见了庞德，庞德转而提议让伯德印刷一套六卷的书。1956年伯德向一位传记作家透露：‘他说这整套书需要同时印刷，不能一卷一卷地印。’”Rood,“William Bird,” 39-40. 伯德后来声称，海明威作品的第一位出版者本应是他，而非麦克阿尔蒙。但是海明威因为其作品被分到了这套书的最后一卷中，等得不耐烦，就优先准备出了给麦克阿尔蒙的稿件，因为麦克阿尔蒙保证他很快就能把事情做好。Ibid., 40.

64. 蒙斯（Mons）：比利时城市。——译者注

65. Hemingway, *in our time*, chap. 4.

66. 此处书名首字母均为小写，海明威在1925年又出版过一本In Our Time，两本书内容有区别，详见118页。——编者注

67. 在初期的合作中，麦克阿尔蒙和伯德都不曾劝说海明威将这些片段写成长篇小说或其他长篇作品。

68. Ernest Hemingway to William Horne, July 17-18, 1923,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6.

69. Sokoloff, *Hadley*, 63.

70. Ernest Hemingway to Robert McAlmon, August 5, 1923,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9.

71. 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 ca. September 6-8, 1923, reprinted ibid., 45.

72. Callaghan, *That Summer in Paris*, 26.

73. Ernest Hemingway, quoted in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21.

74. Callaghan, *That Summer in Paris*, 30.

75. Callaghan, *That Summer in Paris*, 26.

76. Ibid., 23.

77. Ibid., 25.

78. Morley Callaghan, quoted in Fenton, *Apprenticeship of Ernest Hemingway*, 246.

79. Hadley Hemingway to Grace Hemingway, September 27, 1923, quoted in Sokoloff,*Hadley*, 63.

80. 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 ca. September 6, 1923,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46.

81. Kreymborg, *Troubadour, 369*; “Tomato, Can”: Fenton, *Apprenticeship of Ernest Hemingway,* 246.

82. 庞德用“西红柿”（tomato）一词打趣海明威所在的多伦多市（Toronto）。——译者注

83. 据传记作者卡洛斯·贝克所说，这番话是海明威向“报社的记者女孩”玛丽·劳瑞说的（*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19）。

84. Hadley Hemingway to Isabel Simmons, October 13, 1923, quoted in Sokoloff,*Hadley*, 67.

85. Ernest Hemingway to Gertrude Stein and Alice B. Toklas, October 11, 1923,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54.

86. 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 October 13, 1923, reprinted ibid., 58.

87. 海明威曾对西尔维娅·毕奇说，如果他生下的是一个女孩，就会给她起名“西尔维娅”。Ernest Hemingway to Sylvia Beach, November 6, 1923, box 22, Sylvia Beach Pap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88. Hadley Hemingway to Grace Hemingway, October 5, 1923, quoted in Sokoloff,*Hadley*, 66.

89. Hadley Hemingway to Isabel Simmons, October 13, 1923, quoted ibid., 67.

90. 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 October 13, 1923,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58.

91. Ernest Hemingway to Gertrude Stein and Alice B. Toklas, ibid., 54-55.

92. Ernest Hemingway to Sylvia Beach, November 6, 1923, box 22, Sylvia Beach Pap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93. Ernest Hemingway, sketch published fall 1923, quoted in Baker, *Ernest Hemingway:A Life Story*, 120.

94. 关于这本“夭折的长篇小说”，可以参看Fenton, *Apprenticeship of Ernest Hemingway*,242. 查尔斯·芬东采访了海明威在《星报》时的同事，发现海明威“几次谈到了

写一部讽刺小说的可能性”，之后海明威又和一位名字已不可查的“多伦多同事”谈论了他放弃这部小说的原因。

95. Hadley Hemingway to Sylvia Beach, November 1923, box 22, Sylvia Beach Papers,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96. Callaghan, *That Summer in Paris*, 22-23.

4 就让压力一点点积聚

海明威夫妇似乎格外擅长在底层有嘈杂生意的楼中找住处。这一回，他们把背景音从舞厅中的手风琴和踏步声换成了无休止的呼哧呼哧的锯木声。他们的新公寓位于田园圣母路113号，俯瞰着一家专做门窗框架的锯木厂。锯木厂每天早上7点开工，院子里很快聚满了工人和狗。

想到以后都要生活在这种底层嘈杂的环境中，很多人会感到绝望，但是海明威夫妇却能让他们的生活罩上一片浪漫的氤氲。哈德莉让海明威的母亲安心，说公寓里只有一些“非常轻的嗡嗡声”(注)，楼下会飘来刚刚切开的木头好闻的味道。但不管说得如何轻松，锯子的嚓嚓声——再加上小邦比的哭声——每每把海明威逼出门去写作。他开始经常光顾蒙帕纳斯大街上的丁香园咖啡馆，并且以强烈的地盘意识保卫自己的领地。海明威每天来到咖啡馆，把一张大理石面的桌子当成办公桌，摆好铅笔、转笔刀和一些法国小学生用的笔记本。

“大理石面的桌子、奶咖的气味、清晨打扫和拖地的气味，还有运气，这就是你所需的全部。”他说。这些东西，再加上一只马栗子和一只已被磨得很旧的兔脚，就是他的幸运符(注)。(注)一个写作者可以轻易地在丁香园待上好几个小时。“没有人会赶你走，也不会有人过来说：‘如果你要待下去，最好再点一杯咖啡。’”旅居诗人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说，“这不是法国人做事的方式。”(注)对于一个资源有限、又需要半私人化办公空间的人来说，这堪称天造地设的好地方。

海明威坐在丁香园的门廊里，铅笔在小小的笔记本上沙沙作响，这种时候知趣的友人就会躲得远远的。后来他开玩笑说，自己工作的时候就像一头“盲眼的猪”[注]。丁香园还没有像多摩和圆亭那样，永远充满了外国来客的喧嚣，这对海明威很有帮助。但不巧的是，那两家咖啡馆和丁香园在同一条大街上，走几步路就能到，海明威偶尔要和那些来客的无礼打搅做斗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打扰是“公共咖啡馆作家”的一种职业风险，但在海明威看来，“瞎咧咧”打断了他的工作，就是挑衅。好事的人就应该“严惩不贷”，任何打断他写出一句精简、富有节奏的话的人，得到的只能是这样的问候：“你这狗娘养的傻瓜，滚回臭狗窝里去，来这里做什么！”[注]

出门就不是去休闲的。海明威从未觉得压力有所减退。如今成了全职作家，他需要尽早靠自己的小说赚钱。和《多伦多星报》的办公室里一样，在巴黎没有人能对海明威的风格无动于衷。马尔科姆·库利回忆，有人觉得海明威的新作品“好极了”，也有人觉得它们“得捏着鼻子看”。[注]无论如何，他正在变为奥林匹斯山上的一位小神。他身后有贵人相助，自己也雄心勃勃。

无论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和比尔·伯德为他出书一事在内行人看来有多么喜人，预示着他前途无量，这两本书并没有为海明威的钱袋做出多大贡献。本来就已捉襟见肘，孩子的降生无异于雪上加霜。海明威在巴黎出版的书，也没有在美国出版商和书评人中激起什么大的波澜。1924年《在我们的时代》发行时，伯德原计划首印300册，但不知怎么，印刷的时候他搞砸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只有170本可以真正供应销售。（说句公道话，是伯德自己先承认印刷对他而言只是一项业余爱好的。）这意味着海明威两本在印的书加起来只有470册可以流通——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何况海明威对商业成功有着远大的抱负。在美国，几乎都没有评论家意识到这两本书存在过。《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一位批评家认为，这两本书大抵是借鉴来的作品，稍有一丁点创新之处，但是还不如没有这些创新

更好。

“你知道伯顿·拉斯科[注]觉得《在我们的时代》受到了谁的文风影响吗？林·拉德纳和舍伍德·安德森。”海明威向埃兹拉·庞德抱怨说。这不是人们第一次把他的风格和安德森的联系在一起了。这样的比较，让海明威十分恼火：毕竟，哪怕是在芝加哥的时候，他对安德森的作品也是持批判态度的。

就好像渴望成功的压力还不够大，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了海明威一家人的头上——这一次瞄准了哈德莉规模不大的信托基金。夫妇俩认定之前的信托公司太过保守，决定把钱转交给哈德莉一位朋友的丈夫管理。这位“奇才”不仅把基金管少了一半，还让海明威一家一连几个月没有任何收入。海明威花了很多宝贵的时间竭力追查失踪资金的去向，但夫妇俩最终还是不明就里，无法摆脱身无分文的境地。

后来海明威对一个朋友说：“那是我的‘赤贫’时期。”家里甚至没钱给婴儿买牛奶。“我向每一个人借钱，甚至从我的理发师那里借了1000法郎。我还去纠缠陌生人。在巴黎，我去讨每一枚没被攥紧的铜子。”[注]他开始整天整天地不吃饭。巴黎对于饥肠辘辘的人来说是种折磨，对喜欢在咖啡馆工作的人尤其如此。海明威后来说，他甚至会偷袭卢森堡公园（Luxembourg Gardens）里的鸽子，逮住了就拿回家炖了吃。

他贫困的消息在城里传开了，有传言说邦比只能睡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注]哈德莉在整座城市里寻找便宜的食物——这是她每日的功课，而鞋底上的洞让这项工作更加折磨人；但换鞋底是他们承担不起的奢侈之举。他们在河边的一家公共浴室洗澡。负罪感让海明威备受煎熬，因为他本可以回去做记者，减轻家里的负担，但是他放不下自己宏大的规划。哈德莉从不抱怨，这让海明威内心更感沉重：“做着自己想做的工作、从中获得满足感的人，却不是那个最受贫穷之苦的人。”[注]

海明威夫妇不接受施舍。比尔·伯德的妻子让她的裁缝给哈德莉做了一件裙子，因为哈德莉的衣服已经开始碎成破布了。哈德莉左右为难地痛哭了一场，但还是没有接受这件新衣。她和海明威不愿承认自己是穷人或者低人一等，海明威后来还说，实际上他们感觉自己比那些生活宽裕的作家更高尚，而后者可能会愚蠢地无视生活中更加简单的乐趣。海明威一家和他们相反，从必需的生活中寻找享受，对自己的贫民食品甘之如饴，在夜晚的被窝中，沉醉在对方身体的温热里。

不过，饥饿的感觉仍旧整日折磨着海明威。即使和哈德莉吃过正餐之后，那种感觉还是弥留不散；黑暗里做爱过后，饥饿仍在那里，让海明威夜不能寐。哈德莉安静地睡在他身边，沐浴在月光里。

他的饥饿和食物无关，直到他在写作上取得突破，这种感觉才可能减轻。

除了精品出版社外，文学评论刊物也被巴黎的一些旅居作家青睐。多数这类出版物，用西尔维娅·毕奇的话说，“颇为短命，可叹！但总是很有意思”。1924年1月，一份新刊物加入了大潮——《大西洋彼岸评论》，管理者是英国小说家和文学编辑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他从伦敦来到巴黎。

福特和埃兹拉·庞德是老朋友了，他们是“现代主义”旗帜下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庞德帮助福特顺利融入了巴黎的圈子，并一起筹备刊物的发行。“我从来没有读过福特的作品，”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回忆说，“但是我乐意相信埃兹拉·庞德的话，福特是‘我们的人’。”海明威在前一年的秋天就听说了《大西洋彼岸评论》即将发行的消息，那时他仍然在多伦多惨兮兮地干活。他写信给庞德，提议杂志发表自己写的一篇题为“哦，加拿大”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加拿大“多么像坨屎”）。而庞德则请求海明威回到巴黎，在《大西洋彼岸评论》做主

编。海明威回到巴黎后，庞德邀请他去自己的工作室，并把他介绍给了福特。

海明威给福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福特回忆，整场会面中，海明威不断比画着拳击动作。[注]庞德向福特介绍说，海明威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体作家。福特被打动了，让海明威做了《大西洋彼岸评论》的副总编。

此次合作从一开始就是有名无实的。首先，福特没有向海明威提供报酬，这一安排肯定会引发仇恨。其次，福特虽是很有名望的作家，但他的古怪也是出了名的。他几乎注定要遭受海明威的嘲弄。[注]因为福特体态圆胖，上嘴唇的边缘垂下两条金色的胡须，所以他常被比作海象。和他拥抱就像“一片吐司被压在了水煮蛋下面”，一位作家如是说。[注]

这些嘲笑似乎没有让福特的自尊受到伤害。福特就像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埃兹拉·庞德那样，把自己看作现代文学运动的导演、年青一代的导师。“他总是宽宏大量，对年轻作家尤其如此。”舍伍德·安德森回忆说。福特也和斯泰因一样，喜欢显耀自己的才华。[注]他有种不可救药的自大倾向。“编辑和出版人排着队向他索要工作，”安德森写道，“他早上醒来，会发现求职者在门前支了十几顶帐篷。确实，他们露宿在福特的想象中。”[注]

福特的“想象”确实为“这伙人”提供了绝好的谈资。他很快就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说谎者，变得家喻户晓。“福特有种把记忆一笔勾销的禀赋：他记得的事情都不是真正发生过的。”一位旅居者回忆说。[注]一般来说，这只是异想天开，无伤大雅。舍伍德·安德森记得，有一次福特邀请他拜访自己在宾夕法尼亚的一栋别墅。“他说那栋别墅前面的走廊上能看到大好风光，能看到花园、四周山坡上种植的苹果树……别墅装修华美，由一帮仆人照管。”不过唯一的遗憾是，这栋别墅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说，即使存在，也不是福特的地产。同一天晚上，福特还

盛情邀请安德森光临了他另外两处虚构的住所，一处在佛罗里达，一处在加利福尼亚。

福特的新任副主编不觉得这些小谎有那么好笑。海明威后来说，福特在钱的问题上撒了谎[注]，这对于一个勉强度日的作家来说可不是小事。海明威觉得这种事伤害了他们的关系。不过他也承认，福特的信口雌黄也不总是伤人的——比如有一次福特努力想让海明威相信，他曾在一只美洲豹的陪伴下穿越了荒凉的美国西南部沙漠。

《大西洋彼岸评论》的办公室设在比尔·伯德位于安茹港（Quai d'Anjou）的三山出版社里，占据了其中一间狭小的画廊。福特办公的地方，地板和天花板之间只有1.5米的距离，他和秘书常常会撞到头。海明威很少委屈在这里——空间狭窄倒不是大问题，关键是福特的口气太难闻。“比任何一种鲸鱼的喷水孔都臭”，海明威抱怨道[注]；不去办公室，他就坐在塞纳河的岸边编订9份稿子。福特显然毫不介意，这个新跟班已经开始让他感觉有些不自在了。“他一来办公室就坐在我脚边，开始赞扬我，”福特向格特鲁德·斯泰因回话说，“我紧张。”[注]

但是，他钟爱海明威的作品。“我读了不到6个字，就决然打算发表他交给我的一切。”福特后来写道。[注]他果然在1924年4月的《大西洋彼岸评论》中刊出了海明威的短篇新作《印第安人营地》（“Indian Camp”）。杂志还刊登了《在我们的时代》及《三个故事和十首诗》的书评——由福特的文秘捉刀，赞扬了海明威简洁的文体风格。

如今，海明威有了新的工作，还收获了又一位热情的赞助人兼出版商，储用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注]的话，他已然成了“出入巴黎文学最高殿堂的人物”[注]。不过，海明威对新领土的征服欲却越发强烈。美国国内的主流出版社仍在拒绝他。后来海明威回忆道：“我终于写出了我向自己许诺过的好作品，但被退回来的稿件每天都会从门上的投信口中被塞进来。”他承认，自己收到退稿信后哭过，他还向福特抱怨过，建

立起一个响亮的名声实在太难了。注

“这真是无稽之谈，”福特安慰他说，“你根本没花什么时间就名声鹊起了。”注

“没花什么时间”对于海明威来说还是太长了。他知道自己有话说，而且用了和其他人不同的说法，更好、更易懂。如今，他需要的只是接触到更广泛的读者。目前为止，他的故事片段和短篇小说虽然精巧，但是没能走入正确的人家。是时候干一票大的了。

“我知道，我必须写一部长篇小说。”回顾当年时，他说。注

他始终知道。毕竟他从前就计划用一本长篇小说放飞他的文学生涯。但是，哈德莉在里昂车站丢失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后，他显然没有费心去重写它，也没有再写一部新的。海明威提醒自己，每一位与他年纪相仿的作者都已经写过一部长篇了。这就是他的处境。24岁已经过去大半，自己名下仍然没有什么“主要著作”。

不过，开始写一本真正的书，这种事情确实有些令人胆怯。仅仅几年前，海明威还对哈德莉大谈长篇小说的思路；现在，突然之间，构思小说成了一种折磨。和初到巴黎时相比，写作变得更困难了。他不再依赖天真的幻想推进自己的思维；他的写作风格已经锤炼得非常深思熟虑，费时费力。每天写几段话就已经够难的了，更别提把这些段落串连成一部称得上大作的现代主义小说了。

“我想尽量推迟，直到我情不自禁、忍无可忍时再落笔，”海明威决定，“当我必须要写的时候，它就成了当务之急，没有别的选择。”

换句话说，他只是打算“让压力一点点积聚”。注

福特很快成了像格特鲁德·斯泰因一样的聚会东道主，不过他的聚会要比斯泰因家的嘈杂得多。西尔维娅·毕奇参加过福特夫妇在一间大工作室中举办的聚会。这是一场盛宴，啤酒和奶酪很有排场地摆了出来，手风琴拉着喧闹的曲子。福特像只海象般拱到毕奇身旁，请她脱掉鞋子，然后拽着她翩翩起舞——不过毕奇觉得，福特“与其说是在跳舞，不如说是在来回地弹跳”[注]。他也在舞厅中举办过晚间聚会，举办地点包括海明威乐牧安主教路那间穷酸公寓的楼下。

每周四，福特都会在《大西洋彼岸评论》狭小的办公室里开茶会。这些茶会要比他的舞会多一些文人的格调，也引得饥饿的艺术家们纷至沓来。“新人们都饿坏了，大吃松饼、三明治、果仁面包和李子蛋糕，这可能是他们当天吃的唯一一顿饭。”一个参加过茶会的人回忆道。[注]福特把自己的文学教导同美食一道施舍出去：“观察，聆听，裁剪，打磨，安置。”他指导他们说。

海明威很少参加茶会，即便哈德莉喜欢福特，而她和福特的画家妻子史黛拉·波文（Stella Bowen）关系也不错。史黛拉画过一幅妙趣横生的肖像画——福特晕倒在椅子里，嘴还大张着。[注]那年春天，海明威还是去了一次茶会，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见了旅居编辑兼作家哈罗德·勒布。这次见面将改变两个男人的一生。

海明威“带着一种羞怯的、令人放下戒心的微笑，似乎对别的客人并不感兴趣”，很多年之后勒布回忆说。在他看来，海明威潇洒、不做作。“那时我想，我还从未见过一个旅居巴黎的美国人如此不受巴黎生活的侵染。”[注]

勒布则不然，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巴黎生活的影响。此时他23岁，来到法国是为了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这一再造历程仍然心不在焉地进行着。勒布是纽约最有钱、最有名望的两个犹太家族——勒布家族和古根海姆家族的后代。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像一个“一贫如洗的吉卜

赛人”[注]一样虚度了几年。再早些年，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在华尔街做经纪人的父亲对他说过一番话，仍然萦绕在他耳际。一天晚上父亲下班后，来到托儿所接勒布，有一些严肃的忠告要对他讲。

“哈罗德，”父亲说，“离华尔街远一点儿……搞点儿创造。别做股票经纪人。我们什么都不是，就是蠹虫。”[注]

勒布没有忘记这些话。念完普林斯顿大学后，勒布并没有径直打入纽约犹太社交圈，而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建筑工地里当工人，领日薪。

放弃了这趟冒险之后，勒布又在“一战”期间入了伍，成为一位军士长，却从未渡过大西洋，踏上欧洲战场。那之后，他投资了纽约的一家先锋派书店，名叫“向阳书店”（the Sunwise Turn）。此时他有了一位妻子，与他来自纽约的同一个社交圈子，世家出身，很快他们就多了两个小勒布要照管。丈夫依然幻想着流浪的生活，妻子因此越发感到失望。

不过勒布并不打算缴械投降。他卖掉了书店的股份，拿到的钱“烫得好像要把我的口袋烧出一个洞”。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他还继承了一笔5万美元的遗产。[注]告别了孩子们和郁郁寡欢的妻子，勒布前往欧洲，用手里的这笔钱创办了一份新杂志，《扫帚》（*Broom*）。正如杂志的名字揭示的那样，他要开始扫清一些东西了。

1924年海明威在那场决定命运的茶会上遇见勒布时，勒布已经又是自由身了。杂志发行21期后，遭遇了财务危机；即便如此，它对当时的文学风景也可谓增色不少。勒布创立《扫帚》的目的，正是针对那些根基更稳固的文学杂志，反其道而行，关注一些新的呼声。即使《日晷》“也在一遍遍重复着几个同样的名字”，他不满地说，“即使发表T.S.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米娜·罗伊或者玛丽安·摩尔[注]的东西，也再没有什么新意可言”。[注]《扫帚》的意图是会集年轻的美国作家，他们的共同点是“不赞同上一代”[注]。结果《扫帚》的作者名单成了大杂烩，其

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弗吉尼亚·伍尔夫、罗伯特·格雷夫斯[注]、格特鲁德·斯泰因，以及一个自称“H.A.L.”的人，也就是哈罗德·勒布。

和很多人一样，勒布也在尝试写出现代的东西。为了给这个时代的实验主义做点贡献，勒布决定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里要略去大多数的定冠词“a”和“the”；而出版商要求把它们全都加回去，否则就不同意将之印刷。

社交方面，业内人士对他毁誉参半：“这伙人”中的部分成员也许期盼过在《扫帚》上发表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喜欢杂志的总编。他身后耀眼的财富似乎让人对他更加疏远。勒布家的亲戚常年奔波，来往于至少两个大洲之间，乘肥衣轻。他的母亲有一次来到巴黎，“带着一个新丈夫、一辆帕卡德和一件礼物……慷慨极了，让我过了好一阵非常滋润的日子”，勒布回忆说。[注]他的舅舅丹尼尔·古根海姆会出现在巴黎，请勒布在丽兹酒店用餐。勒布的表妹佩吉·古根海姆一出现就会震动整个巴黎，她和一位名叫劳伦斯·威尔（Laurence Vail）的超现实派画家兼作家闪婚，闹得城里沸沸扬扬。换句话说，勒布和他的亲戚们是备受富贵之累，他的女儿说他是一个“被惯坏了的男人，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注]

当然，勒布不是巴黎唯一一个独立、有钱的文学金主：格特鲁德·斯泰因也有很多闲钱可烧，她对于现代主义的态度比对钱要严肃太多。她还经营着一家半公共的酒吧，里面的饮品都是免费的。相比之下，虽然《扫帚》自有它的思想性和严肃性，勒布本人在名声上却没有太大分量。一位旅居者说，勒布“没有什么性格，正像一方干净、华贵的毯子，折好了放在咖啡馆的椅子上”。[注]他也不像海明威那样积极地结交“奥林匹斯诸神”。在旅居作家莫里尔·科迪（Morrill Cody）的记忆中，勒布是一个自视甚高却“做着蠢事”的人，冒犯詹姆斯·乔伊斯、惹怒西尔维娅·毕奇都是他所做的蠢事。[注]

文学生涯和文人们对于勒布依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后来他说，在福特的茶会上第一次见面，他就看得出海明威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两个人也切磋了打猎和钓鱼技艺，很快就约定有空再聚。

“欧内斯特让我越瞅越喜欢。”勒布后来写道。海明威如此膀大腰圆，同时又如此敏感，醉心于写作艺术，这令勒布尤其惊叹。“我早就怀疑，美国缺少好作家的一大原因就是一种流行的成见……认为艺术家都是不那么有阳刚气概的人，”接着勒布把奥斯卡·王尔德引作了一个值得批评的例子，“像海明威这样的男人开始从事写作，这是一个好迹象。”[注]

海明威必然要邀请勒布在拳击场上一决高下。勒布在普林斯顿大学学过一点拳击，但后来转去练摔跤了；海明威比他重40磅，但勒布还是戴上了拳击手套。两个男人的较量开始了。幸运的是，勒布很快发现，海明威在出拳之前“瞳仁总会抖一下”[注]——这个破绽让勒布可以和他一战。两人也成了网球球友。第一次对打，海明威请勒布去的球场“旁边就是放置断头台的监狱”。

当两人不在拳击场上互相恐吓，也不在球网的两边卖力时，他们常常光顾咖啡馆和酒吧，边喝边互相讲故事。勒布把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成年的生活经历告诉海明威，他的强大优势正是海明威缺少的——常青藤的教育、似乎取之不尽的资源——而且这种不平等逐渐在两个人之间催生了隔阂。但是，站在海明威的立场，勒布有一项尤其令他忍无可忍的优势：他即将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杜达布》（*Doodab*），由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Boni & Liveright）出版，那是美国著名的出版社。

紧张不断积聚，终于爆发。多年后，勒布回忆起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一个雨夜，两人在蒙帕纳斯大街上喝普伊-富塞葡萄酒、吃牡蛎。几杯酒下肚，勒布走了一步不可挽回的臭棋。他近来在想，海明威为什么一直难以取得突破，他决定提供一点建设性的批评。

“你需要做的就是把女人写进去，”他建议说，“人们喜欢读有关女人和暴力的事。你的小说里已经有不少暴力了，现在你需要的就是女人。”

“女人？”海明威问，此时他可能正死死地盯着勒布。

海明威可能确实没理解，所以勒布继续说了下去。毕竟，“一位已婚的幸福男士的生活是如此不完整”，他说，“缺少挫折”。

接着他注意到，海明威的脸色变得“阴郁且僵硬”，露出了牙齿。

“所以我没经历过挫折，”海明威开口说，“所以，你是这么想的？”

话一出口，勒布立刻反悔了。“要不再喝一杯吧？”他孤注一掷，提议说，“让挫折都见鬼去吧！”

但伤害已经无法挽回了。接下来的一整个晚上，海明威把自己生活中所有的痛苦一股脑地讲给勒布听。勒布把玩着酒杯，硬着头皮听着，茫然不知所措。

“确实，”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本应该知道的。”[注]

这次意外平息之后，又发生了另一次意外。那年10月，两人一起去了巴黎北边一座叫桑利（Senlis）的中世纪古镇。一天晚上，他们在旅馆里打扑克。勒布赢了一局又一局，但海明威就是不愿罢手，他把钱都输光了，并且开始打欠条。勒布不想要他的钱，而且“当然也不想要他的欠条”[注]。海明威欠下的债越积越多，最后，他写了一张100法郎的欠条，然后赢了勒布一局。

局势反转了。勒布的运气突然用尽了，最终他的钱倒是输光了。他站起来，不想玩了。“但是老海[注]还想继续，甚至为此羞辱我。”勒布回忆说。这件事让海明威反欠了勒布一大笔人情债，勒布觉得“我们之间

开始出现阴影”。

不过，两个男人仍然一同交游，而且勒布先前对于海明威的喜爱，演变成了盲目的崇拜。虽然友情之中涌动着嫌恶和嫉妒的暗流，但勒布“欣赏他的真性情和他对生活的热忱”。[注]

不过海明威让勒布最为敬仰的是他“极好的人缘”，他越看海明威就越喜欢。这桩友谊对勒布如此重要，以至于在海明威去别的城市度假时，勒布眼中的巴黎突然就成了空城。

至少有个人对海明威有不祥的预感：勒布的女朋友，生于纽约州由提卡市的凯瑟琳·伊东·坎奈尔，绰号“凯蒂”。

1924年，坎奈尔是一位32岁的旅居时尚记者，一位受人喜爱的名媛。她也是一位舞台之星[注]，做过职业舞女、歌手和演员，有时还会出演哑剧。最近，坎奈尔开始尝试写作，她觉得写作会使她从舞台的紧张感中获得片刻解放，相比唱歌，写作也是一个不那么费力气的工作。

坎奈尔认识巴黎的每一个人，尤其是艺术家群体，因此认识她对任何有天分的初来者而言，都是不错的际遇。勒布创办《扫帚》的那段日子，她也提供了很大帮助，把他介绍给了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并拉人订阅杂志。有人甚至怀疑，她就是坐镇杂志幕后的总指挥。

马尔科姆·库利是《扫帚》顾问团的前成员，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坦言：“勒布情人（的品位）要比勒布好，也更鲜明。”[注]

坎奈尔和勒布的恋情大概是多摩咖啡馆看客们眼中的大戏。勒布是巨额财产的继承人，所以总能吸引女士的青睐；但是据说坎奈尔经常由于嫉妒而发怒，而且明显无法将怒火忍到私下里发泄。那时，他们的恋情悬而未决：坎奈尔一直等着她与意象派诗人斯基普维斯·坎奈尔（Skipwith Cannell）的离婚手续办妥，所以她属于城里的一批名流

——“赡养帮”（the“alimony gang”）注。（众所周知，巴黎是即将离婚和新近解放之人的天堂。）勒布对这种说不清的关系毫不在意，自从他把妻子留在纽约独自离去后，他就算是离婚了，而且不急着回到婚姻的桎梏中去。坎奈尔的离婚案将在法国开庭时，他才开始紧张起来。

“和一个已经嫁了人的甜心在一起有安全感。”他坦言。注

至此，他们之间的浪漫一直有些“相爱相杀”的味道。勒布和坎奈尔甚至住在两间相邻的公寓里，中间只隔了一堵薄薄的墙。就如勒布和海明威的关系那样，他和坎奈尔的暧昧似乎也潜藏着一触即发的危机。

勒布和坎奈尔开始造访海明威和哈德莉位于锯木厂楼上的家。两对男女每周都见几次面，有时出去吃饭，有时去打网球。坎奈尔不像她的男朋友，对海明威的魅力没那么感冒。

“我一眼就看出欧内斯特不可靠、难以捉摸。”她后来说，她能感觉到“他的弱点就从手腕和脚踝间流露出来”。勒布对海明威的英雄崇拜让她颇为不解，她猜测说：“很可能老海代表了他的某种理想。”注

不过坎奈尔喜欢并尊重哈德莉，即使海明威一家的生存状况令她大感意外。坎奈尔魅力四射，这把哈德莉的穷困衬托得更加扎眼。

“她的衣服正在一片片掉下来，”坎奈尔对勒布说，“她甚至无法在街上露面。”注

住在锯木场上面的公寓里，还用纯洁的浪漫主义装点生活，这种事海明威做得出，坎奈尔可做不出。坎奈尔坚持认为，哈德莉衣衫褴褛是海明威的错，而哈德莉本人则是个“逆来顺受的大傻瓜”。毕竟，坎奈尔指出，他们赖以为生的是哈德莉的钱——或者说，是哈德莉余下的一点儿钱。

坎奈尔很快就开始像领着宠物一样领着哈德莉四处溜达、购物，或是去看新奇的玩意儿。“那时所有时尚的女孩都在收集耳环。”回顾当年，坎奈尔说。[注]对哈德莉来说，这种风潮就像在西伯利亚猎虎一样遥不可及。这些出行也是为了暗中捅海明威一刀。坎奈尔满心欢喜，觉得自己“为一位顺从的妻子树立了坏榜样”[注]。

在坎奈尔看来，海明威有一个优点可以弥补他的不足：他喜欢猫。她后来给了海明威家一只，他们叫它“毛毛猫”（Feather Puss）。[注]一段时间后，坎奈尔在咖啡馆遇见海明威，他看起来很颓唐。

“我生命中的慰藉只有一个。”他告诉她。

她等着他往下说，以为他会说出哈德莉或邦比的名字，但他却说：“是我的小猫。”[注]

海明威可能只是在拿坎奈尔的绰号开玩笑，但坎奈尔显然把这件事当作了海明威自私、不顾家的证据。接下来的一整年她都在勒布那里说海明威的不好，但她的看法也改变不了什么，勒布对海明威的感情是无条件的，对“小猫”坎奈尔却不是这样。很快，他就会把自己的资源排在朋友脚前，任海明威挑选——包括他在纽约出版社中强大的人脉。这是一个天大的转机。海明威在巴黎的出书机会正在耗尽，这正是他结识美国国内出版大佬的时机。事实证明，勒布将很快成为海明威的作品到达大洋彼岸的关键。

---

1. Hadley Hemingway to Grace Hemingway, February 20, 1924, quoted in Sokoloff,*Hadley*, 69.
2. 在世界上的很多文化中，兔脚都是能带来好运的护身符。——编者注
3.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169.
4. MacLeish, *Reflections*, 26-27.
5.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81.

6. Ibid., 170.

7. Cowley, *A Second Flowering*, 58.

8. 伯顿·拉斯科（Burton Rascoe, 1892—1957）：《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编辑、文学批评家。——译者注

9.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38.

10. “邦比睡抽屉”传言的散播者之一是霍诺丽亚·唐纳利（Honoria Donnelly，婚前姓墨菲）她是旅居者莎拉·墨菲和杰拉德·墨菲（Sara and Gerald Murphy，他们即将成为海明威夫妻俩生活中的重要人物）的女儿。“有人说海明威夫妇的儿子约翰，或者叫邦比，睡在梳妆台的抽屉里。” Donnelly, *Sara* & *Gerald*, 15.

11.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42.

12. Sokoloff, *Hadley*, 73.索阔罗夫说，哈德莉意识到了自己衣着方面的窘境，但是还没有到接受这种礼物的地步。

13. Beach,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137.

14. 《大西洋彼岸评论》（the *transatlantic review*）这种小写的刊名显然是此时旅居文人中的流行风尚［海明威那本《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用的也是小写书名］，即使福特后来声称自己“仅仅是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看见了一家商店的店名用的是小写字母，很喜欢这种视觉效果”。福特说，《大西洋彼岸评论》，以及E. E.卡明斯（E. E. Cummings）写诗时都对小写青睐有加，这仅仅是巧合，不过小写的刊名确实让《大西洋彼岸评论》激起了一些波澜：“人们怀疑我们砍掉了大写的词头，就好像砍掉了国王的头。” Ford, *It Was the Nightingale*,324.

15. 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116.

16. 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 December 9, 1923,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82.

17. 福特实际上说的是“比画舞蹈动作”，但是传记作家们普遍将之解读为“拳击动作”。Ford,*It Was the Nightingale*, 323; *finest prose stylist: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23.

18. 福特至少被写进了两本海明威的书里——《太阳照常升起》和《流动的盛宴》，一次以假名出现，一次以真名出现。其中，《流动的盛宴》对他的刻画远比前者无情。

19. Rebecca West, quoted in Elizabeth Mahoney, “Radio Review: Ford Madox Ford and France,” *The Guardian*, August 25, 2010.

20. 麦克阿尔蒙在回忆录里写到：“有一次福特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绝对是个天才。他生在天才世家，被当作天才养大。” Robert 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116.

21. Anderson, *Sherwood Anderson's Memoirs*, 479.

22. Harold Loeb, The Way It Was （New York: Criterion Books, 1959）, 203. 另外，福特患有哮喘，这导致他即使在说实话也几乎没人听得懂。左岸的酒吧招待、“吐真言者们的神父”吉米·查特斯（Jimmie Charters）记得有一次在颁发一项诗歌奖时，“福特讲了一番话，叫人完全听不懂，大概是这样的：‘唔呼——唔呼，以及，啊啊啊……唔呼——唔呼的……那个……那哪哪……啊啊啊……唔呼——唔哈——！’” Charters, *This Must Be the Place*, 39.

23.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199.

24. Ibid., 201.

25. Stein,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220.

26. Ford, *It Was the Nightingale*, 323.

27. 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 1896—1970）：美国著名小说家，代表作为“美国三部曲”（U.S.A trilogy），包括《北纬四十二度》（The 42nd Parallel）、《1919》和《赚大钱》（The Big Money）。他在美国本土非常有名，以至于作者并没有专门介绍他。——译者注

28.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72.

29. Hotchnher, *Papa Hemingway*, 57.

30.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26.

31.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71.

32. Ibid.

33. Beach,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137.

34. Kathleen Cannell, “Essay II on Ford Madox Ford,” *Providence Sunday Journal*,September 20, 1964, reprinted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263.

35. Sokoloff, *Hadley*, 72.

36. Loeb, *The Way It Was*, 190.

37. Ibid., 10.

38. Ibid., 18.

39. Ibid., 4. 1912年的5万美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20万美元。

40. 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 1887—1972）：美国现代主义诗人。——译者注

41. Loeb, *The Way It Was*, 6.

42. Harold Loeb, untitled essay, Broom Correspondence of Harold Loeb,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43. 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 1895—1985）：英国诗人、小说家、批评家。——

译者注

44. Loeb, *The Way It Was*, 229.勒布很快又辩解说，自己并不是古根海姆家族极其富有的后人，因为他是族谱树上一朵位置不好的花，也就是说他母亲萝丝·古根海姆的“饰品比姑嫂的那些小，衣服比姑嫂的少，马也没有那么壮实”，勒布说。Ibid., 20. 即使这样，据萝丝的一个孙女说，她仍然“用的是缎子床单，床头挂着自己的肖像”。Barbara Loeb Kennedy,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May 7, 2014.

45. Susan Sandberg,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May 30, 2014.

46. 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86.

47. Morrill Cody quoted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45.

48. Loeb, *The Way It Was*, 194.

49. Harold Loeb, “Hemingway's Bitterness,” *Connecticut Review* 1 （1967）, reprinted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114-15.

50. Loeb, *The Way It Was*, 219-20.

51. Ibid., 217.

52. 由“海明威”一名简化而来的昵称有两个，一个是“Hem”，会按具体语境译为“老海”和“海姆”；另一个是“Hemmy”，这个名字更亲切一些，译为“海米”。——译者注

53. Ibid.

54. 几十年后，坎奈尔的宣传方强调她在职业生涯的最早期曾演过哑剧。不过坎奈尔和勒布的回忆录中都不曾提到这段往事。“Kathleen Cannell: Fashions from Paris to Main Street,[a] Sparkling Talks Feature,” undated press release and biography sheet issued by Lordly & Dame, Boston.

55. Malcolm Cowley to Kenneth Burke, September 10, 1922, reprinted in *The Long Voyage: Selected Letters of Malcolm Cowley*, *1915-1987*, ed. Hans Bak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79.

56. Charters, *This Must Be the Place*, 19.

57. Loeb, *The Way It Was*, 78.

58.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5, 147.

59. Loeb, *The Way It Was*, 207.

60.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5.

61.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24.

62. 据传记作家伯特兰·萨拉森（Bertram Sarason）记录，几十年后坎奈尔和勒布对这只猫的来历各执一词。勒布回忆这只猫是他们在罗马收留的，而坎奈尔只是简单地说那是

她母亲的猫。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19. 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讲了毛毛猫的事，使它因尽职地照顾邦比而名垂青史。

63.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8.

5
通向纽约之桥

不管海明威家里多么困难，他们似乎总有钱去西班牙。1924年5月，海明威写信告诉父母，他和哈德莉打算6月去一趟那个“神奇、美丽的国度”(注)。他们要去比利牛斯山里钓鳟鱼，从潘普洛纳远足到圣让-皮耶德波尔（Saint-Jean-Pied-de-Port）。海明威祈祷他们不会被当作走私犯射杀。(注)为了筹备这次旅程，他开始兑换比塞塔(注)。

同时，巴黎依然在带给他们挫败与欢乐。海明威忍受着作品出版的低谷期，对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也颇有微词。他开始怀疑福特在《大西洋彼岸评论》中用化名赞美了自己的作品（他的怀疑其实是对的）。海明威把这件事反映给了埃兹拉·庞德，还说福特把创办杂志当成了一种“妥协”(注)。福特杂志上的所有作品都可以在其他杂志上轻易找到。他为什么不冒一点儿风险呢？海明威想。毕竟，福特的杂志订阅者和赞助商都少得可怜，特立独行一点儿也不会冒犯到什么人。

“能对福特做的，就是杀了他。”海明威写道。

福特对海明威打磨出来的小故事所做的编辑修改，海明威也不喜欢。他向庞德抱怨，同时却请求庞德不要将此事告诉福特，因为他不愿引起争执——至少目前不愿意。

大概在这个时候，海明威结识了幽默作家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后者那年春天在巴黎名声大噪。斯图尔特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讽刺作家之一，讽刺文学在那时也是一种极度流行的文体。他第一本书的书

名由30个单词组成：《戏仿世界史纲，如果由美国最具个性的当代作家们讲述，也许对美国历史事件有奇妙而无伤大雅的解读》（*A Parody Outline of History Wherein May Be Founda Curiously Irreverent Treatment of American Historical Events Imagining Them As They Would Be Narrated by America's Most Characteristic Contemporary Authors*）㊟。这本书的畅销让他出了名。一两年后当斯图尔特准备去欧洲一游时，一位编辑朋友建议他去巴黎见海明威一面，尽管斯图尔特已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大牌作家，而海明威仍然只是个幼稚青年。碰巧，斯图尔特在勒孔德夫人馆（Madame Lecomte's，这是圣路易岛㊟上的一家餐厅）㊟遇到了海明威。

“他写些什么东西，我一无所知，但是他看上去像是我喜欢的那种人。”斯图尔特回忆说。㊟这意味着他们都喜欢胡吃海喝，而且海明威显然是一位用心的听众，“能够懂得我的那种幽默”，斯图尔特解释说。

他们很快成了朋友。初次见面后，海明威甚至把公寓借给斯图尔特暂住，因为他自己马上要带哈德莉和邦比去瑞士待几个星期。海明威“带着他特有的热情，执意让我在他们回来之前住在他们的屋子里，”斯图尔特后来写道，“第二天我在他的房间里醒来，非常开心，他还给我留了字条，告诉我哪里有牛奶和鸡蛋。”㊟

对海明威来说，结识斯图尔特是意外的收获。比起勒布，斯图尔特在纽约文学圈的人脉更广。他不仅认识城里有影响力的编辑和出版商，而且也是那座城市“奥林匹斯诸神”中的一员——他属于阿尔冈琴圆桌会（the Algonquin Round Table），一个非正式但仅限少数人参加的午餐俱乐部，会员有二十几个，都是纽约城最有才华的人。会上的珍馐自然不在话下，不过马天尼酒才是阿尔冈琴的成员相互之间嬉笑怒骂的最重要动力。

“20世纪初的对话必须妙语连珠，”约翰·多斯·帕索斯回忆道，“段子

要你一个我一个地讲个不停，就像打羽毛球那样。”他还说，斯图尔特“是最擅长这种‘趣味运动’的人之一”。㊟在他的回忆录《神来之笔！》（*By a Stroke of Luck!*）中，斯图尔特声称这个“狗咬狗”㊟的世界总是让他不自在——“我总是在被‘咬’了三四个小时之后才反击”，他说——不过在圆桌上他总是受欢迎的。

遇见海明威后的这一年里，斯图尔特经历了一些挫折。斯图尔特和他作品的经销商都满怀希望，盼着他的第二本书问世。这第二本书是一部冷嘲热讽的时光旅行者宣言——《波利姨妈的人类故事》（*Aunt Polly's Story of Mankind*）。但是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这本书写得相当失败。失望过后，1924年4月斯图尔特躲到了巴黎，冥冥之中和海明威再一次相遇。

两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波利姨妈》的失败让斯图尔特底气不足，而此时的海明威在巴黎已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斯图尔特给他看了自己正在写的新小说的稿子，当海明威提议在《大西洋彼岸评论》上发表书稿的一部分时，斯图尔特很高兴。（当斯图尔特得知《大西洋彼岸评论》不提供稿酬时，这份高兴劲儿泄了一些。）不管怎样，他愉快地接受了海明威的旅行邀请，答应那年夏天和一帮作家、编辑一起去西班牙。

“多带些比塞塔。”海明威建议道，并向斯图尔特解释，那里会有很多plage（海滩）和poules（妓女），都是一流的。㊟

斯图尔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海明威的盛情邀请。

“后来我得知，当海明威热爱一样东西时，抗拒他的任何请求都是极度危险的，尤其是他的友情。”多年后斯图尔特写道。㊟

海明威的第一次潘普洛纳圣佛明奔牛节之旅是一场两个人的旅行，

但是1924年7月第二次去那里时，海明威夫妇把邦比留给保姆照看，带去了一个大型“观光团”，其中包括海明威两本书的巴黎出版商比尔·伯德和罗伯特·麦克阿尔蒙，伯德的妻子萨莉，海明威的战友埃里克·爱德华·多尔曼-史密斯——外号“瞪羚”（Eric Edward “Chink” Dorman-Smith）注，以及约翰·多斯·帕索斯，海明威和他也是“一战”期间认识的。想好好招待客人，就先得有高调的激情。

“海明威有一种类似福音传道者的秉性，无论当时有什么让他发狂的东西，他都能号召朋友们一同皈依他的狂热。”多斯·帕索斯回忆说。注

潘普洛纳仍然和一年前的夏天时一样，淳朴而闭塞，没有被成群涌来的美国或他国游客污染。“整座城都是我们的，”斯图尔特写道，“别人都不曾发现它……它是海明威的珍宝。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那是男人的时光。”注

戴着蓝色贝雷帽的西班牙人在镇上的广场翩翩起舞，城中的当地人成群结队，击着手鼓，吹着口哨。从周围的山区赶来了成百上千的农民，挤满了街道。他们把大蒜串起来挂在脖子上，高举着山羊皮做的酒囊，开怀畅饮。纸糊的巨人有四五米高，随着游行的人群走遍了镇子。晚上，夜空中绽放着礼花，狂欢的人群跳舞到天明。

“大街小巷都传来伴着鼓点的巴斯克横笛声，或者是加里西亚风笛配上响板演奏的乐曲，”多斯·帕索斯写道，“圣佛明是一个精彩的大型秀场。乐队，游行，礼花，让人应接不暇。”注

这种热情几乎是狂野的，“浸入人的血肉与骨髓”注。节庆一旦开始，世界就变成了一场超现实的、无止息的、激荡着肾上腺素和酒精的马拉松长跑。海明威的“观光团”每天早上只有灌下几杯黑咖啡后，才能开始新的一天；但是，他们很快就会重新拿起茴香酒，狂饮起来。狂欢中常常有人掉队，有时直到第二天才会找回队伍。一个人随时会被一群

乐手、舞蹈家或者农民淹没。天黑以后，除非喝到昏厥，饮酒作乐会持续到天亮。甚至“观光团”自己的成员都快聚不齐了：海明威后来说，整个潘普洛纳到处都是唐纳德·斯图尔特的呕吐物。注

斯图尔特不吐的时候，就一心沉浸于狂欢的情绪之中。他在大约200位参加大游行（*riau-riau*）的舞者中间跳了一晚上，他们把他扛上肩头。接下来的庆典中，他都被农夫们当作吉祥物来崇拜。

7月7日的奔牛活动标志着节庆的正式开始，奔牛活动在西班牙语中叫作encierro。这是一个壮观的仪式，当天斗牛用的公牛被从城郊的牲畜栏里放出来，穿过两边有围栏的街道，一路奔向潘普洛纳城中心的斗牛场。凌晨，小乐队开始绕城行进，一边击鼓一边吹奏传统的芦笛。

鼓乐声唤醒了成百上千睡在大街上的人：市政广场上、长椅上和人行道上，都满满地睡着人。早上不到6点，人们就拥挤在街道的围栏边和临街的露台上，希望亲眼见证奔牛的盛况。

7点钟，一发礼炮突然在空中炸开，宣告牛群已经放出；接着又是一声，代表牛群来了。在围起来的街道中，一群人跌跌撞撞地跑在牛群前面。注公牛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尘土飞扬。如果没有人绊倒，半英里注的冲刺只要几分钟就能完成——不过，踩踏事件也是经常发生的。当公牛到达斗牛场时，空中会绽放更多的礼花。接下来是互动环节：任何足够有胆量的人都可以跳入场中，过一把斗牛士瘾。

海明威做好了与斗牛士为伍的准备。如果说一年之前的西班牙之行中他经历了“自我硬化过程”，今年的旅行奏响的就是同一主题的新乐章。

“他总是在讲勇气的事，还有一个男人需要怎样试炼自己，证明自己能够承担。”麦克阿尔蒙回忆说。

当然，此时做男人意味着要在几千人的目光下，引诱一头2000磅重的动物向你冲来。在潘普洛纳的那一个星期，海明威好几次跳入斗牛场中。[注]在其中一次冒险中，他挥舞着自己的外套，试图引起一头阉牛的注意，但是那头牛被其他东西分散了注意力，没有理他，于是海明威抓住阉牛的两只角，想把它甩起来。人群欢呼了。那头牛“跑开了，困惑地‘哞’了一声”[注]。

麦克阿尔蒙不打算和海明威一起跳入场中，但是唐纳德·斯图尔特这么干了。他后来申明，虽然自己一般都是“小心行事”，却不得不跳进斗牛场中，因为“海明威的行为让我感到羞愧”[注]。他不想在海明威面前丢脸，后者的友情对斯图尔特已变得很重要了。

“和海明威在一起，要不就称兄道弟，要不就决裂。”[注]

斯图尔特闷下几口酒，然后跳进了斗牛场。与此同时，一头公牛全力向他冲了过来，把他撞了个“四仰八叉，滚了几滚”[注]。接着他又去惹那头公牛，这一回，它轻易地将斯图尔特挑上了天。当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海明威跑过去拍了拍他的背。

“我感觉自己就像进球得分了一样。”斯图尔特写道。[注]

不过，他得到的只有几根折断的肋骨。他再一次被热情的西班牙人举上肩头，抬离了斗牛场。

海明威“观光团”的这场斗牛闹剧被当地摄影师拍了下来，永远地印在纪念明信片上。[注]海明威和斯图尔特很快名扬巴黎，壮举甚至传到了美国。海明威再一次显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榜样。《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还刊登了一篇文章：《两美国人装斗牛士遭牛顶》[注]，报道说涉事的是一个叫“麦克唐纳·奥格登·斯图尔特”的人和“世界大战英雄”海明威，文章还写到斯图尔特试图“跳上公牛的背，往它的眼睛

上吐烟”，于是公牛顶了他，“把他撞翻了”；海明威想去救斯图尔特，但接着也被牛顶了。报道称，要是牛角没有包着布，海明威就难逃一死。

斯图尔特说，他和海明威都没有向媒体提供这样的信息（“肯定是伯德、麦克阿尔蒙或是多斯·帕索斯说的”[注]）。海明威给《多伦多星报》写过一封信，自顾自地解释了一通那篇报道说错的地方[注]，他还向前同事吹牛，说自己和斯图尔特赢得了一个粉丝团，成天尾随着他俩。显然，海明威深知自己想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在媒体上。大家渐渐发现，危险而富有异域风情的斗牛活动深受美国国内媒体的欢迎，这和巴黎作家群的故事受美国读者青睐是一个道理。美国侨民在那个异域世界里的逸闻随之备受关注。那篇《芝加哥论坛报》的文章说，海明威“观光团”里的所有成员都是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

奔牛节持续了一周，在7月14日主广场上一通齐放的礼花中落幕了。海明威一行人烂醉如泥、筋疲力尽。约翰·多斯·帕索斯的激情在节日结束之前就耗尽了，但每个人都玩得太忘乎所以，无暇顾及他。“一群年轻人努力展示他们的男子气概，让我越看越烦。”他后来写道。[注]他觉得偶尔去看看斗牛还是不错的，但是整整一周每天都看，这就太过了。不过当然，海明威绝对不会这么想。

“他就像一条水蛭那样咬紧事情不放，直到吸干了它所有的血肉，”多斯·帕索斯回忆说，“吸得自己的身体都快胀破了。”唐纳德·斯图尔特是人们最喜爱的丑角；麦克阿尔蒙虽然是个愤世嫉俗的人，不过看起来很可笑。总之，海明威才是“众人瞩目之的”。[注]

醉意未消的“观光团”退居至比利牛斯山区一个叫作“博古特”（Burguete）的巴斯克人村庄[注]。这里安静、偏僻，是在潘普洛纳纵酒狂欢之后理想的休憩之所。一行人住进了一家乡村小酒店，吃的是

农夫的大餐：山羊奶酪、玉米粉圆饼、黑面包，还有兑了山羊奶的咖啡。绵羊和山羊点点散布在山坡上，满是鳟鱼的伊拉蒂河（Irati River）在几公里外流淌。一行人带上食物，到河流那边去远足野餐。

罗伯特·麦克阿尔蒙观察着他的作者。当众人在河中的瀑布前钓鱼时，海明威心里构思着一篇短篇小说，也就是后来的《大双心河》（“Big Two-Hearted River”）。

“他非常投入地思索着一个垂钓者的心里会想什么……他没有钓到很多鳟鱼，但是在本子上写了很多故事思路。”麦克阿尔蒙对海明威的不屑之情正在增长，认定这篇小说“会非常矫揉造作”。而且他很快会得出结论，海明威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生意人，一个追求公众关注的人，他面向未来，精心计算，而且只会毫无敬意地利用人。”[注]

海明威不但没能改变麦克阿尔蒙的看法，反而在他们的乡村漫步中无端大发脾气。他怀疑哈德莉又怀孕了（她其实并没有），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怎么又要当父亲了，而比尔·伯德的妻子萨莉当着其他人的面教训了他。

“你这个浑蛋傻瓜犯什么小孩子脾气！”她痛骂，“你也有责任。要么采取行动，别要这个孩子，要么就接受他！”[注]甚至在哈德莉的怀孕风波平息之后，海明威还是找到了其他烦心的事。他告诉庞德，只有在斗牛场，生命力与艺术才能交汇。他十分嫉妒，那些褒扬可以像雨点般落在斗牛士身上，但年轻的作家们却得不到一丝一毫。斗牛士会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赢得喝彩与尊重。作家们却要等到89岁时才能获得同样的待遇。另外，在文学界，海明威觉得越是“文弱、差劲的人”，就打拼得越成功，詹姆斯·乔伊斯就是一个例子。[注]

经济上的问题很快又来了，沉重的打击令他平添阴郁。他告诉庞德，自己越发难以为继，可能会放弃写作。

“我再也不会出版新作了。”他悲叹道。

他担忧的是，接下来可能会有后来居上的竞争对手把他踩下来，发动一场文风界的政变，占据他素来渴望的先锋位置。接下来的那个春天，他冷冷地开玩笑说：“某个狗崽子会把我写的一切都学走，然后人们就会把我称作他的模仿者。”

是时候回巴黎了，回到那个必须突破的事业中。

也许不出所有人的意料，此时距离海明威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决裂已经不远了。像之前很多野心勃勃却银根不稳的文学杂志一样，《大西洋彼岸评论》在经济上很快捉襟见肘。在海明威筹备西班牙之行的那段时间，福特已经为了给杂志拉赞助回到了美国，把7月刊的收尾工作和8月刊的组稿工作留给了海明威。海明威抓住这次机会，在7月刊里登了一篇匿名的“编者按”，把几位有名的超现实主义作家讥讽了一通，8月刊里排的几乎都是他美国朋友们的作品，全然不顾这期杂志本来计划关注的国际主题。等到福特返回巴黎时，改动8月刊已经太晚了。既然改不了，福特便加了一篇“编者按”，告知读者这期刊物完全是由海明威一手操办的，并表示下一期杂志会“重拾国际主题”[注]。接着，在10月刊中，海明威发表了一篇攻击T. S.艾略特的文章，为此福特又在11月刊里登出了一篇道歉澄清的文章。那时两人已经反目，海明威对格特鲁德·斯泰因说，福特是个“十足的骗子”，是个“无赖”。两人的合作关系就这样结束了，杂志也在几个月后停办。

事情尘埃落定，海明威开始写讽刺作品。正如海明威未来的儿媳所云，对他来说写作就如“箭袋中的一支复仇之箭”[注]。除了创作短篇小说，他还写了一些讽刺左岸同胞的散文，其中就包括一篇不曾发表过的故事，描写福特两口子在图卢兹黑人餐馆（Nègre de Toulouse）中的争吵。[注]还有一篇［后来以“艾略特夫妇”（“Mr. and Mrs. Elliot”）的题目

发表］写了一对夫妇为了要孩子而付出的努力（小说的第二句话是：“他们努力了好多次，艾略特太太都要吃不消了。”[注]），故事的灵感来自作家查尔德·鲍尔斯·史密斯（Chard Powers Smith）夫妇不孕不育的烦恼。他还写了一篇超重少女来巴黎寻爱的故事，灵感来自哈德莉朋友们的烦恼。在这段时间，海明威给每个人都备了一点儿“毒药”，在他的文学磨坊里，他娴熟地研磨、调配着别人的生活与脆弱。

虽说有这些歪曲事实的闲话文章，同一时期海明威也有更高尚的动机与创作。那年夏末，他完成了《大双心河》，在博古特钓鱼时，他就开始琢磨这篇小说了。最后完成的作品分为两段故事，展示了海明威令人震撼的新风格。不仅如此，故事中有一段后来被删去的话，使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的海明威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的：“（尼克）想当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很肯定这会实现……他，尼克，想让这片天地留在自己的文字里，就像它们留在塞尚的画里……他感觉近乎神圣。这绝对是说一不二的。”[注]

《大双心河》是海明威在多伦多的波折后创作的第九篇短篇小说。再加上《三个故事和十首诗》里面的三个故事，足够凑成一本厚度相当的书了。海明威笨拙地凑出了一部书稿，还把《在我们的时代》中的小故事点缀般地插入其中。很快，他开始把这本书称作《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这一回，书名中每个单词的首字母都是大写的了，以区别他在巴黎出版的那本小薄书*in our time*。[注]海明威深知，他依然需要写出那本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它是《在我们的时代》无法取代的。但是要撬开美国主流出版社的大门，让自己扬名纽约，《在我们的时代》也足够了。

新朋老友都严阵以待，准备为海明威的事业而奋斗。没到10月，唐纳德·斯图尔特回到了纽约，待在耶鲁俱乐部（Yale Club）[注]。约翰·多斯·帕索斯从海明威那里接到重任，护送《在我们的时代》的书稿穿越大西洋，亲手将它交给斯图尔特。斯图尔特允诺，要把书稿交给他自己

的出版商，乔治·H.多兰公司。

多斯·帕索斯也将担任大使的角色。根据他后来的回忆，他一读到先前那本《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就“立刻把海明威归入了英语语言天才之列”。由此，他开始“在国际上吹捧海明威”，并用自己的方式品评海明威及其作品。“要我说，只要老海坚守着他电报式的精短语言和詹姆士国王钦定本《圣经》，他就能成为第一位伟大的美国文体家。”[注]

另外，哈罗德·勒布也忙着来帮他。如果说他一直在烦恼（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什么看不到老海的一点儿进步”[注]，现在他终于有了帮助朋友的机会。他立即开始筹划把海明威介绍给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同时也将他介绍给利夫莱特先生本人。

这将是一次最值得铭记的引荐。

贺拉斯·利夫莱特（Horace Liveright）不完全是一位常规的出版商。10年前，他闯入了充斥着门户之见的出版界，至今还令同行们震惊而愤怒。

他的早期履历中，没有一件事预示着他会成为一个文化人。他的很多同行据说都有常青藤盟校的教育背景，而利夫莱特自从读完高中文法学校，就没再经历过正规教育的严格训练。十几岁的时候，他为了赚钱谋生，在宾夕法尼亚的一家股票交易所工作。不过，他对自己的未来有更远大的规划。他最后来到纽约，在历史悠久的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Waldorf-Astoria Hotel）的柱廊里建立了一家工作室，而且雇了一个伙计，让他把自己当作罗斯贝里伯爵[注]来侍奉。[注]他创作了一部歌剧，但只排演了几次，并没有正式演出。接着，利夫莱特在25岁左右创立了匹快纸业（Pick-Quick Paper），一家卫生纸公司。据说，背后撑腰的是他岳父——国际纸业公司（International Paper Company）的副总

裁。利夫莱特骄傲地为公司起了名字。直到公司倒闭[注]，他才开始转向更有精神价值的“纸产品”。

正当他规划着一份新事业时，他遇见了阿尔伯特·博尼（Albert Boni）。博尼用他的哈佛大学奖学金在格林威治村开了一家书店[注]，但他的理想其实是办一家出版社。利夫莱特提议和博尼合伙，两人在1917年宣告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成立。很快，博尼因为一些理念上的分歧离开了公司[注]，但他的名字留了下来。这家出版社常常被同行们称为“疯人院”，而它的经理则被其他出版商视作好大喜功的江湖骗子、没有原则的暴发户，或是不可理喻的黑户。利夫莱特喜欢把日程本和一瓶威士忌一起放在书桌上，出版社的等候室里据称弥漫着一种不寻常的气氛。

“你去出版社见他，会发现外面的大办公室里挤满了合唱团的女孩，”舍伍德·安德森回忆道，“若是那里有位练后手翻的女士踢飞了我的帽子，我也一点儿都不会惊讶。”[注]

如果说利夫莱特只是雇了合唱团来装点门面，那谁也不会惊讶，但这些女孩其实是去面试的，因为敢于尝试创新的利夫莱特也从事戏剧编排。在出版社的等候室里，舞蹈演员和作家要做好准备，要和利夫莱特手下的大批私酒贩子[注]共处。这可不是最体面的环境。

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很快成了格林威治村众多不拘传统的艺术家的非官方出版社，几乎在同一时期，它也成了“那些根基较深厚的出版商眼中的臭水沟之最”，海明威在巴黎的第一位朋友路易斯·加朗蒂耶如是说。[注]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立即对老牌出版社构成了威胁——它很快开始吸引重要的文学天才。例如，创社第一年它就签下了文学巨人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注]。利夫莱特很快也把舍伍德·安德森从B.W.许布希出版社（B. W. Huebsch）挖走，诱饵是一笔持续5年、每周100美元的酬金。[注]所有新签下的合同显示，这家朝气蓬勃的出版社

是真正想做生意的。那些老牌出版社可以尽情仇恨利夫莱特，但是他的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贺拉斯·利夫莱特与其他出版商一样，开始在蒙帕纳斯的旅居作家群中搜寻才俊。出版社的一位副总裁立昂·弗里施曼（Leon Fleischman）肩负了为美国市场寻找适宜出版物的使命，移居巴黎。哈罗德·勒布和弗里施曼在纽约的时候就认识。此时海明威正在准备《在我们的时代》的书稿，勒布介绍海明威来到了弗里施曼的公寓。

还没到会面的日子，凯蒂·坎奈尔便越来越焦虑。她担心海明威有反犹倾向[注]，可能会在弗里施曼和他的夫人海伦那里闹出乱子。她把自己的担忧如实同勒布说了。勒布并不在意。

“那时我不想理会圈内盛行的闲话，”他事后写道，“它们夸大了海明威的坏脾气。”[注]会面的夜晚终于到了。可能是因为好奇难耐，坎奈尔加入了勒布和海明威，一起去了弗里施曼位于香榭丽舍大街的公寓。海伦·弗里施曼给他们开了门。

“今天女佣请假。”海伦一边招待他们进屋一边说。

接着，立昂·弗里施曼迎了出来，身着一件天鹅绒居家服。坎奈尔和勒布都看得出来，海明威一看见弗里施曼就对他不抱好感。

有吃有喝，大家聊着细碎的话题。坎奈尔和海伦谈论着佩吉·古根海姆和她丈夫的八卦。勒布努力活跃气氛，讲了一个故事，关于“两个黑人女孩去科尼岛（Coney Island）照相的事”。

终于，男人们开始谈正事了。弗里施曼开宗明义，海明威渐露锋芒的才华他早有耳闻，但是一位新作家的作品能否畅销，谁也说不好。让大众接受新的文学趋势，总是需要时日。

在勒布看来，这是一番折磨人的讲话。“我就像在用海明威的耳朵

听立昂的话，”他事后写道，“他说的每个字都让人觉得矫饰、高傲、不自然。”

海明威冷漠地喝着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当弗里施曼观察他的反应时，他就象征性地咧嘴一笑。勒布更加警惕了。

“我想读读你的小说。”弗里施曼终于说。如果他觉得它们出色，就会附上自己的推荐语把书稿寄给利夫莱特。“贺拉斯知道我的建议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提建议时也总要讲究些策略，”他说，“贺拉斯觉得他是在自己做决定。”

好在聚会很快结束了。勒布、坎奈尔和海明威一起告辞。[注]

“在街上，我想安慰大家一下，说这是个不错的夜晚，”坎奈尔回忆道，“海明威却直接爆了粗口：‘天杀的犹太傻！’还骂了很多露骨的脏话。”[注]

后来发生了什么，勒布和坎奈尔说法不一。勒布的回忆是，他和坎奈尔去吃晚饭，边吃边聊刚刚发生的事。

“我早就说过了吧？”据说坎奈尔责备了勒布，“你从来就不信我的。幸好他骂了一通，这样下次你可能就听我的了。”[注]

勒布并不在乎海明威的反应，但他还是为海明威的行为找了点儿借口。“他喜欢用过激的方式表达自己。”他对凯蒂说。[注]勒布在另一次回顾此事时说他告诉凯蒂，“就像我也会蔑称爱尔兰人为mick或称南欧人为dago，海明威那样说犹太人说明不了什么”。[注]

而在坎奈尔的回忆中，之后的事情更简单也更直接。她说，勒布就惊愕地站在路上，眼看着海明威走远。

“呐，宝贝儿，这就是你托付终生的朋友。”她记得自己这么说。

“哦不，如果海明威把我当作犹太人，他就不会当着我的面这么说了。”她记得勒布说。㊟

《在我们的时代》如今正奔向两家美国主流出版社——多兰和利夫莱特。㊟现在，海明威只需要坐下，擦干身上淋漓的大汗，耐心等待回复。此时他的信中既有紧张，也有自信。他恳求斯图尔特及时为他更新消息，对斯图尔特的“大恩大德永世不忘”㊟。几天后他写信告诉一个朋友，说来年春天他会在纽约出版一本书㊟，即便此时还没有哪家出版社接下了这单生意，他也没有从出版社那里得到任何回音。

“我觉得多兰会出版的我的书。”他对老朋友比尔·史密斯说，“我们正在具体商议此事。多兰不要，才轮到博尼-利夫莱特，但我会尽可能让稿子离犹太佬远一点。”

可是到了12月中旬，海明威还是没有收到任何确切的答复，无论是多兰出版社、利夫莱特的犹太佬，或是别的任何出版社都没有回复。他投了一则滑稽故事给《名利场》（这是唐纳德·斯图尔特的地盘），名叫“我与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在斗牛场的日子”。稿件被拒，他写信的语调不那么扬扬自得了。他和哈德莉打算去一趟奥地利，用滑雪和大吃大喝来安抚一下受伤的心。

“还不是一切照旧？”他告诉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很高兴能出去避一避。㊟

圣诞节前不久，海明威一家三口前往了施伦斯镇的陶博旅店（Hotel Taube in Schruns），施伦斯是奥地利西部的一个山中小镇。就像去年夏天的博古特，施伦斯偏远、未经雕琢，没有蒙帕纳斯人。即使是寒酸的美国作家，也会觉得奥地利的物价低得不可思议，这和法国类似，一家人的食宿费用大约相当于每天两美元。

在等待纽约的消息时，海明威一刻都没闲着。他和哈德莉去滑雪，把邦比交给了一个漂亮的奥地利女孩照管。当地人很快给了海明威一个称呼 ——“黑基督”，以致敬他在那里蓄起的大胡子。（有些奥地利人觉得这个称呼还不够确切，又把海明威晋升为“喝樱桃白兰地的黑基督”。）陶博的酒吧里有36个龙头，打开后会流出不同的啤酒，海明威整晚整晚地品尝啤酒，在破窗户下面打牌赌博，毫不厌倦。哈德莉则织着她的羊毛衫。

哈罗德·勒布本打算参加这趟奥地利之行，但是他仍需要留在巴黎，就他的小说《杜达布》的修订问题和贺拉斯·利夫莱特讨价还价，所以无法脱身。他推后了赶赴施伦斯的时间——“我想先把书的事情解决了。悬着一块大石头，我不可能玩得愉快”，事后他回忆道[注]——然而最后，他却订了一张回美国的船票，准备新年一过就动身。他也想利用这次离别，摆脱自己和坎奈尔纠缠、暧昧的关系，给她留下一封“措辞艰难而痛苦的信”。这种关系对她不公平，他解释道：“她应该有一个丈夫，而我不想和任何人结婚。三年来我们都是亲密的朋友，结婚行不通。”[注]坎奈尔不能认同。他们最后还是没有分开。

在海明威还不知道勒布要放弃奥地利之行改去纽约时，他写信给勒布，叮嘱他快点把事情办结，带点上好的威士忌，还说：“从弗里施曼那里把我的书稿带回来，可否？”[注]可能海明威默认了自己会被多兰拒绝。不过，一个月之后他又给勒布写了一封信，里面通篇是脏话，倾吐了很多新的消息、对策，以及写信人的愤怒。

多兰拒绝了《在我们的时代》。

海明威那时刚刚收到唐纳德·斯图尔特寄来的一封信，里面塞了一张支票。开始，他以为钱是多兰出版社给的，但其实这是一张个人支票，是斯图尔特开的，算是一件安抚人心的圣诞礼物，毕竟乔治·多兰出版社的退稿信就装在同一个信封里，斯图尔特想让这封信不那么伤

人。[注]

“他们都认同我作品的力量，这也会是一本好书，”海明威转告勒布，“问题仅仅是他们不乐意出版它。”

多兰的编辑团队反对书稿一些篇目中的性爱情节——同时，他们也不想通过出版短篇小说集来推出一位新作家。所以，“要是我有部长篇小说，他们就会奉陪到底了”，海明威对勒布讲。[注]

突然间，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中的犹太佬变得亲切起来了。海明威无从知道内部的情况，但是其实在利夫莱特出版社，编辑们最初也没有对他的书稿表现出多大热情。哈罗德·勒布到达纽约后，去了利夫莱特的豪华办公室，向公司的一位审稿人比阿特丽斯·卡夫曼（Beatrice Kaufman）询问了《在我们的时代》的审阅情况。得知它已经被扔进了废纸堆时，他大惊失色。卡夫曼又把书稿扒了出来，告诉勒布她正准备退稿。

勒布请求她不要这么做：“你会后悔一辈子。你错过的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真的懂得写作，只需看上一段你就会明白。而且他的下一本书会是一部长篇小说。”[注]

显然，他的热切请求奏效了[注]：一周后他再来到出版社时，卡夫曼告知他，社里已经同意出版《在我们的时代》了。舍伍德·安德森也为这本书的出版出了力，努力说服利夫莱特出版社这本书很重要。

勒布回忆说：“安德森当时正处于名望的巅峰，是利夫莱特的明星作者。利夫莱特极想保住安德森这位出版社旗下的畅销文学作家，于是《在我们的时代》就被采纳了。”[注]

出版社开出了200美元的稿费。勒布和斯图尔特各自拍了电报祝贺海明威。收到消息的海明威心中五味杂陈。

“感谢你，感谢这些好消息，感谢贺拉斯·利夫莱特，也感谢整个出版业。”他在给勒布的信中说。书稿能够出版，他自然欣喜若狂，但同时也感觉自己仿佛被“踢中了要害”[注]。显然，为了把书稿推销出去，“全纽约一半的人都出动了”[注]——需要这么多人求情，才能把他的书稿卖出去。

但利夫莱特出版社毕竟是一家美国大社。接到勒布和斯图尔特消息的一周后，海明威给利夫莱特发了一封电报：

欣然接受

——海明威[注]

---

1. Ernest Hemingway to the Hemingway family, ca. May 7, 1924,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120.

2. 海明威在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开了走私犯的玩笑。Ernest Hemingway to Clarence and Grace Hall Hemingway, May 26, 1924, reprinted ibid., 125.

3. 比塞塔：西班牙采纳欧元之前使用的货币。——译者注

4. 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 May 2, 1924, reprinted ibid., 113. 关于福特用假名赞扬自己作品的事，海明威的研究者桑德拉·斯潘尼尔（Sandra Spanier）指出，福特用的假名包括R. Edison Page（R.爱迪森·佩吉）和Daniel Chaucer（丹尼尔·乔叟），署名Daniel Chaucer的文章“简洁明了地赞扬了福特的作品”。Ibid., 116, n. 18.

5. 这本书实际上是对H. G. 威尔斯（H. G. Wells）的名著《世界史纲》的戏仿之作。——译者注

6. 圣路易岛（Île Saint-Louis）：塞纳河上的一座岛。——译者注

7. 海明威后来把这家夜店和它的老板写进了《太阳照常升起》，该小说中的两个人物杰克·巴恩斯和比尔·戈顿在这里吃过饭。勒孔德夫人馆本是一家雅致、私密的小店，但在小说中它已经被游客挤满了——这是海明威惯用的一种暗示，表明蜂拥而至的游客对于旅居先锋作家来说是怎样的一种祸害。

8.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16.

9. Ibid., 116.

10.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57.

11.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06.

12. Ernest Hemingway to Donald Ogden Stewart, ca. early July 1924,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127.

13.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16.

14. 多尔曼-史密斯外号“瞪羚”，因为他两只眼睛分得很开。——译者注

15.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60-61.

16. Donald St. John, “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191.

17.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73.

18. 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243.

19. Ernest Hemingway to John Dos Passos, April 22,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23. 斯图尔特的儿子说，海明威的存在让父亲“更争强好胜”，喝了比往常更多的酒。Donald Ogden Stewart Jr.,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anuary 26, 2015.

20. 詹姆斯·米切纳（James Michener，1907-1997，美国小说家、历史作家。——译者注）在一本书中提到，19世纪时有资格在牛群前面奔跑的只有“屠夫以及那些和牛一起工作的人”，现在这些规则都放宽了。米切纳曾亲眼见证过这样的景象，“好几十号人逐渐叠在一起，难以置信地在四处飞奔的野兽前搭出一堵人墙”，那些牛就踏着他们狂奔而去。James Michener, *Michener's Iberia: Spanish Travels and Reflections*, vol. 2 （New York:Corgi Books, 1983）, 505-6.

21. 1英里约等于1.6公里。——编者注

22. 海明威在1924年12月给《名利场》的编辑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Frank Crowninshield）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两万观众的注视之下先后进了五次斗牛场。不过，他在写给母亲的信里则说是六次。Ernest Hemingway to Grace Hall Hemingway, July 18,1924,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133.

23. 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245.

24. St. John,“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193.

25.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31.

26. St. John,“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194.

27.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33.

28. 海明威寄了一张明信片给斯泰因和托克拉斯，标出了照片中的“观光团”成员；哈德莉则寄了一张给西尔维娅·毕奇，在明信片上记录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海明威和斯图尔

特被顶伤了，麦克阿尔蒙也进了斗牛场……英勇的斯图尔特被狂热的人群扛出了场。” Postcard from Hadley Hemingway to Sylvia Beach, box 22, Sylvia Beach Pap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海明威一行人可能带了一台摄像机，并且拍到了斯图尔特被众人抛到半空庆祝的画面，以及海明威在斗牛场中的活动，但录影似乎遗失了。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December 6,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and Ernest Hemingway to Grace Hall Hemingway,July 18, 1924,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133.

29. “Bull Gores 2 Yanks Acting as Toreadores,” *Chicago Tribune*, July 29, 1924.

30. St. John, “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194.

31. 一位在《星报》工作过的编辑告诉斯图尔特的采访者唐纳德·圣约翰（Donald St. John）：“那封信很久以前就被扔掉了——他们不知道从前的记者同事海米以后会出名。” Ibid., 196. 不过传记作家卡洛斯·贝克总结了这封信的内容，说这是一封“自吹自擂”的信，并且，“欧内斯特毫不谦虚地说他和唐（“唐”是斯图尔特的昵称。——编者注）每天都在两万名粉丝的助威下表演。精彩极了”。（*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29.）

32.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74.

33. Ibid., 173-74.

34. 巴斯克人：居住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比利牛斯山区中的一个族群。——译者注

35. 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246.

36. Ibid., 247.

37. 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 July 19, 1924,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135.

38. Ford Madox Ford, editorial, *transatlantic review*（August 1924）, quoted in Reynolds,*Hemingway: The Paris Years*, 207.

39. Email from Valerie Hemingway to the author, September 21, 2014.

40.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28, 584.

41. Ernest Hemingway, “Mr. and Mrs. Elliot,” in *Complete Short Stories*, 123.

42. Deleted ending to “Big Two-Hearted River,” quoted in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32.

43. 为了简洁起见，后文若不特殊注明，《在我们的时代》指的都是海明威192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In Our Time。——译者注

44. 耶鲁俱乐部是一家由耶鲁大学校友和教员组成的精英俱乐部。该俱乐部在纽约拥有一栋可供住宿和集会的俱乐部大楼，高22层。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是耶鲁大学的毕业

生。

45. Ibid., 159-60.

46. Ibid., 219.

47. 罗斯贝里伯爵（Earl of Rosebery,1847-1929）：英国前首相。——编者注

48. Walker Gilmer, *Horace Liveright, Publisher ofthe Twenties* （New York: David Lewis,1970）, 2.

49. 一位利夫莱特的传记作者称创立匹快纸业是一次“惨败”的尝试。Ibid., 4.

50. 阿尔伯特·博尼和弟弟查尔斯·博尼（Charles Boni）经营的博尼兄弟书店是纽约文人的聚集地。——译者注

51. 两人对公司的前景有着不同的看法：利夫莱特想招揽美国名家，而博尼更愿意吸引具有政治头脑的欧洲作家。两个人通过抛硬币决定谁说了算。利夫莱特赢了，于是博尼离开公司去了欧洲，然后又去了苏联，想亲眼见证那里正在发生的革命。1920年，博尼因为被指控为间谍而遭到监禁，被释放后他回到美国，后来和弟弟创立了另一家出版社。Ibid., 19.

52. Anderson, *Sherwood Anderson's Memoirs*, 356.

53. 20世纪20年代，制作、销售和消费酒精饮料在美国是非法的。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地下制酒、售酒的生意，利润颇高。——译者注

54. Gilmer, *Horace Liveright*, 10.

55. 德莱塞的名著《美国的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就是由利夫莱特出版社出版的。——译者注

56. 1925年的100美元周薪，大约相当于如今的62000美元年薪。

57. 海明威的传记作者卡洛斯·贝克写道：“她想，在他引人注目的外表下，有一种阴险残忍的性格……（但是）勒布在欧内斯特见到立昂之前决不罢休。凯蒂注意到，海姆偶尔会爆发出反犹倾向，她再次满心忧虑。”贝克没有特意罗列这些“爆发”的时间和地点。他援引自己对坎奈尔的访谈（1963年10月13日）作为证明她当年担心的依据。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586.

58. Loeb, “Hemingway's Bitterness,” 119.

59. Loeb, *The Way It Was*, 226.

60.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8. 在勒布的回忆录中，海明威当时骂的是“这下作的——！”，并没有说出最终那个词。（*The Way It Was*, 227）（“那个词”指的应该是“犹太人”。因为勒布和立昂·弗里施曼都是犹太人，所以辱骂犹太人是对勒布的冒犯。——译者注）后来勒布写了一篇文章，很贴切地取名为“海明威的尖酸”。文中写到，海明威当时“喃喃地说：‘那个该死的犹太佬’”。（“Hemingway's Bitterness,” 117.）

61. Loeb, *The Way It Was*, 227.

62. Ibid.

63. Loeb, “Hemingway's Bitterness,” 117.

64.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8.

65. 勒布在回忆录中说，即使海明威在与立昂·弗里施曼会面时怀有激烈的异议，但他还是把《在我们的时代》的书稿寄给了后者。弗里施曼最终把书稿送去了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的纽约总部。利夫莱特的传记作者沃克·吉尔莫（Walker Gilmer）讲到，他不确定这份书稿是否最终被放在了利夫莱特的办公桌上：它可能正是唐纳德·斯图尔特拿给多兰出版社的那份稿子，而多兰拒绝了它。我们能确定的是，对于海明威来说，多兰出版社是远远优于利夫莱特的选择。

66. Ernest Hemingway to Donald Ogden Stewart, November 3, 1924,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173.

67. Ernest Hemingway to Howell G. Jenkins, November 9, 1924, reprinted ibid., 176.

68. Ernest Hemingway to Robert McAlmon, ca. December 18, 1924, reprinted ibid.,196.

69. Loeb, *The Way It Was*, 229.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197.

70. Ibid., 233.

71. Ernest Hemingway to Harold Loeb, December 29, 1924,

72. 虽然斯图尔特有这份慷慨之心，但是我们不清楚他可曾同样大方地推荐过海明威的书稿。“我喜欢他，希望帮助这个朋友，”他之后写道，“（但）事实上，我那时并不确定欧内斯特是位好作者。”关于海明威投给《名利场》的短篇小说，“我认定幽默写作并不是他的专长，所以就任由那篇稿子自生自灭了”。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35.

73. Ernest Hemingway to Harold Loeb, January 5,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199. 斯图尔特后来把遭拒的书稿转交给了批评家H. L. 门肯（H. L. Mencken，海明威管他叫“那个杂碎”），因为后者也许会把这本书推荐给克诺夫（Knopf，对如今的美国人来说，克诺夫出版社比本书提到的所有其他出版社都要有名。该社出版过包括阿尔贝·加缪、加西亚·马尔克斯、托尼·莫里森、V.S.奈保尔、奥尔罕·帕慕克等17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译者注）。海明威觉得走这条战线胜利的希望更为渺茫：门肯甚至都不喜欢他的文风，他说，并且预测这一努力“肯定会碰钉子”。Ibid.

74. Loeb, *The Way It Was*, 238. 在之后的回忆中，勒布每次都会稍稍改动他对卡夫曼所说的这番话，但大致的意思都是差不多的。

75. 多年后，至少有四位海明威的友人声称自己对这件事做出了贡献。除了勒布说自己把书稿从废纸堆里抢救了出来外，约翰·多斯·帕索斯也写到，他“在贺拉斯·利夫莱特同意

出版《在我们的时代》一事中出了一些力”（*The Best Times*, 176）。舍伍德·安德森也声称自己“因为请求贺拉斯·利夫莱特出版这些书，动摇了与利夫莱特的私人交情”，尽管我们不清楚他说的“这些书”还包括哪些书（*Sherwood Anderson's Memoirs*, 476）。旅居作家兼编辑哈罗德·斯特恩斯——他放弃了文学生涯，用“彼得·皮肯”（Peter Pickem）的笔名在《巴黎先驱报》上办了一个评论赛马的专栏——提到他也曾“尽力（向利夫莱特）推销欧内斯特·海明威那本叫‘在我们的时代’的短篇小说集”（*Confessions of a Harvard Man*,251）。最后，1927年海明威曾告诉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编辑麦克斯韦·柏金斯，编辑爱德华·奥布莱恩也参与了说服利夫莱特出版他的书一事。

76. Loeb, “Hemingway"s Bitterness,” 118.

77. Ernest Hemingway to Harold Loeb, February 27,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259-60.

78. Loeb, *The Way It Was*, 246.

79. Cable from Ernest Hemingway to Horace Liveright, March 6,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272.

贰


Montmartre
R. de la Porte Montmartre
Rue Montorgueil
Rue Saint-Sauveur
ST SAUVEUR
R. Quiquetonne
Rue Pavée
R. du Lion d'O
DE BOURGOGNE OU D'ARTOIS
Rue Mauconseil
ST JACQUES DE L'HOP
Grande Truanderie
R. du Séjour
STE AGNES
ST EUSTACHE
MARIE
Platrière

6
摆渡人

1925年3月，当海明威一家从施伦斯回到巴黎时，这座城市似乎突然人满为患。

“好像所有人都打算去往巴黎。”哈罗德·勒布写道。他当月也从纽约回到了巴黎。成群结队的美国旅客挤进了勒布的船，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穿过大西洋驶往法国的轮船。虽然法郎对美元的汇率再次走高，也阻止不了游客大潮。所有关于“奇幻巴黎”的宣传确实卓有成效。有人估算，1925年，每周都有5000名美国游客来到巴黎。兴奋之情仿佛火山爆发一般，使整座城市为之颤抖。

“过度的宣传将那些从‘不拘传统的生活’（la vie bohème）中迸发出的创造力变成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蒙帕纳斯的一位酒吧招待吉米·查特斯回忆道。他感觉，对于最初那些战后来到法国的旅居者来说，时代已经变了。如今，文学圈染上了狂欢节般的氛围，挤满了伸长脖子的看客，急切地想找到一点儿真正不拘传统的风范。

一如往常，想见到詹姆斯·乔伊斯、格特鲁德·斯泰因、埃兹拉·庞德或者其他同一“咖位”的人，介绍信千金难求。海明威如今在这些人中坐稳了交椅。他不再诚惶诚恐地怀揣着介绍信去叩响名流家的门；风水轮流转，那年春天，所有求高攀或者想办事的重要人士，都纷纷被介绍给他了。最近的一年中，海明威在圈内圈外的吸引力与日俱增。有传言说，他现在要在美国出版一部惊世之作。据当时的一个人讲，海明威成了咖啡桌和社交聚会上最受欢迎的人，他的出现就给人惊喜。

“欧内斯特确实有种吸引公众尊敬的天分，”旅居作家马尔科姆·库利回忆说，“后来人们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天分，叫‘个人魅力’（chrisma）。”[注]

海明威的高升让“这伙人”中的一些成员心怀不满，甚至一些曾为他搭桥铺路的人如今也满怀嫉妒。罗伯特·麦克阿尔蒙认定海明威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一天在蒙帕纳斯的一家咖啡馆中遇见海明威后，麦克阿尔蒙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慨：“他就是聚光灯下一夜爆红的小屁孩，过几个月就原形毕露了。只要有聚光灯，他就会露出那种男孩式的讨人喜欢的笑容，赚足眼球……他马不停蹄，天生有种吸引公众注意的能力，有种男孩的气质。”[注]

在海明威看来，巴黎再没有什么神明需要他去征服了。但就在那个春天，一批不同以往的名流开始进入他的生活，他们可能把他的雄心导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那一年有钱人来了。”之后海明威写道。[注]

海明威感到，要是放在一年前，这些名流甚至都不会看他一眼。那时他太默默无闻，而这群特殊的“有钱人”——或者用毕加索一位情妇的话说，他们是“国际社会中的天堂鸟”——只结交极其成功的天才，不然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即使在1925年初，海明威也觉得他们只是徘徊在他家门外，因为他尚未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证明自己的伟大。

海明威是被唐纳德·斯图尔特带进这个新圈子的。约翰·多斯·帕索斯写道：“斯图尔特告诉我们两个，我们应该多见一些‘真正重要的人物’。”[注]斯图尔特尤其经常提到一对美国夫妇：莎拉·墨菲和杰拉德·墨菲。

“他们都很富有，”斯图尔特后来写道，“郎才女貌，生了三个金童玉女……他们有一种天赋，可以让那些有幸和他们做朋友的人感觉生活

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愉快。”[注]

莎拉在美国中西部赚了大钱，而杰拉德的家族拥有马可·克罗斯公司（Mark Cross Company），这是一家高级皮货供应公司。他们身居巴黎艺术圈的核心，和他们共进晚餐的人可能包括毕加索、科尔·波特、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旁边或许还坐着谢尔盖·达基列夫的俄国芭蕾舞团（Ballets Russes）中的舞蹈演员。[注]这是一个“封闭的、精英的圈子，但是在它森严的边界之外，对人的吸引力也是巨大的”，斯图尔特说。[注]

不过，最开始斯图尔特对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的“推销”并不怎么成功。“他近乎把我们说得低墨菲夫妇一等，把他们捧成有钱的社交名流。”多斯·帕索斯回忆说[注]——这种轻浮的分类方式肯定会被海明威嗤之以鼻。不过他俩确实见了墨菲夫妇一面，也不得不承认，墨菲夫妇不是那种俗气、喜好炫耀的有钱人。是的，他们有一间华美的公寓和多样的娱乐，还在法国里维埃拉购买并修缮了一幢高档海滨庄园别墅。

但有意思的是，墨菲夫妇并没有架子。他们比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年长10岁，精心打理着自己的小家庭。他们在巴黎社交生活中扮演的是大家长式的角色。他们的家虽时髦但安稳，足以躲避纷乱、腐化的外部世界。“所有人都希望拥有这样一对父母。”墨菲的一位朋友加尔文·汤姆金斯（Calvin Tomkins）说。[注]

墨菲夫妇的艺术家和作家朋友常常把新作拿给他们看，询问意见，尽管这些朋友“希望得到夫妇赞许的原因，不是自己作品的艺术价值有多高，而是为了得到他们的爱”，汤姆金斯接着说。[注]杰拉德自己也是一位有名望的立体派画家，受到其他艺术大师和立体派名家的敬仰。“在我看来，他似乎在用一种屠夫的方式作画，暴力、熟练、精准，结合了外科医生的细致手法。”多斯·帕索斯说。[注]

墨菲夫妇发现海明威天赋异禀，很快就准许他加入了一小批高级别作家之列，可以随时拜访他们，去诵读自己最新的作品。他和哈德莉也参加了墨菲家更有排场的娱乐活动。虽然海明威夫妇一如既往地穷，但这并不妨事。新朋友“盛情好意，会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吃山珍海味”，哈德莉回忆说。[注]海明威赢得了他们的钟爱，只因为他是海明威。哈德莉并没有特别为场面增色的风采，但她尽全力把自己的戏演好，墨菲夫妇对她也很友善。这一段时间，她会饶有兴致地听丈夫和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对话，两人争相表达自己对物质成功的不屑之情。不过哈德莉指出，话虽这么说，但海明威仍然欣然接受了昂贵、有面子的款待。他也不是“来者不拒、心安理得”[注]，但他常常难以抗拒自己高涨的人气。

海明威和墨菲家的友谊将持续几十年，尤其是和莎拉。墨菲夫妇将在他最私密的事务上扮演核心角色，无论是在职业生涯上还是在私人问题上。但是，相比海明威即将邂逅的三位旅居者中的上层名流，墨菲家就显得太小儿科了。这三人犹如摆渡者，加速了海明威从青涩到传奇的转变进程。第一位摆渡人送来了他渴望已久的财务稳定。第二位激发了海明威之前没有的观点，最后带来了他经久不息的名誉。而第三位——一位活跃却具有悲剧性自我毁灭情结的圣人资助人，将帮助海明威走上他朝思暮想的国际舞台。

一如巴黎本身火山爆发般的吸引力，海明威的文学生涯也正徘徊于爆发的边缘。

哈罗德·勒布一回到巴黎，就去造访了海明威的“锯村阁楼”，两人因为各自在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的胜利而欢欣鼓舞。起初，勒布听说海明威的老朋友比尔·史密斯（在芝加哥，比尔的哥哥Y. K. 史密斯把海明威引荐给了舍伍德·安德森）那年春天也要来巴黎和海明威争宠，很是恼火。史密斯和海明威那一年结交的富贵名流截然相反，他一贫如洗，寄住在海明威家中。原先只说要住几个星期，但他不断拖延时间，

一待就是好几个月。海明威费了一番心思在英文杂志社给他找了一份编辑助理的工作，但是并没有成功。最终，他帮比尔在罗伯特·麦克阿尔蒙的出版社谋得了一个业务经理的职位。

勒布回忆说，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和史密斯“相视间满是怀疑和敌视”[注]。海明威得缓和两人的关系，他向勒布保证，史密斯是个好伙计，也给史密斯讲了勒布的优点，其中就包括后者的拳击、摔跤和网球球技。两人很快消除了最初的龃龉，成为朋友。勒布喜欢史密斯小心、低调的作风，对他愤世嫉俗的俏皮话也赞赏有加——史密斯的这一能力已经让海明威注意多年了，很快海明威就会在文学界广而告之。[注]

此时的勒布和坎奈尔再难破镜重圆。他从纽约回到巴黎时，她满怀乐观与憧憬，到车站接他。勒布这边呢，只是感觉自己对她的感情已经用完了。他们重逢不久，她就因为吃另一个女人的醋而大发脾气，勒布说她“一直闹到清晨鸟叫才罢休”[注]。这件事最终导致了两人的分手，勒布毫不耽误，马上就让全城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个闹掰了。

不过话虽这么说，他和坎奈尔仍然会在社交场合中相遇，其中的一场茶聚为日后海明威与哈德莉的劳燕分飞埋下了伏笔。一天，坎奈尔邀请哈德莉去她家，为她引荐了一对新抵巴黎的美国姐妹，宝琳·菲佛（Pauline Pfeiffer）和昵称“金妮”的弗吉尼亚·菲佛（Virginia “Jinny” Pfeiffer）。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海明威和勒布也加入了聚会，刚刚打完拳击的他们浑身大汗。海明威看到妻子和两个小鸟一样的陌生女子叽叽喳喳，姐妹俩新潮得近乎扎眼，留着波波头和严实的刘海，像极了日本艺伎娃娃。[注]

很难理解坎奈尔为什么会介绍菲佛姐妹——尤其是宝琳——给哈德莉认识。显然她们和哈德莉都住在圣路易街上，相隔不远却从未见过面，或许这足以成为介绍两方相识的动机。不过除了住得近，双方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首先，宝琳和弗吉尼亚腰缠万贯，父亲和叔叔对她

俩宠爱有加[注]，定期把她们的钱包装满美元。其次，宝琳在时尚神坛上万众瞩目，而哈德莉对于时装的态度再冷漠不过了。那一季，宝琳身披巴黎顶级设计师操刀的华贵金花鼠皮大衣，耳垂上时常戴着绿宝石耳坠。[注]她觉得泡咖啡馆“不合她的身份”[注]，喜欢去丽兹酒店胜过多摩和圆亭咖啡馆。甚至她说话时用的词都是时尚而奢华的：她把赏心悦目的人或东西形容为“甘露般的”（ambrosial）[注]，那会儿的时髦女人形容最好的东西时就用这个词。

不过，尽管看似不太可能，但宝琳确有一份事业。一年之前的1924年，她来到法国辅助《时尚》杂志的新晋巴黎主编——优雅的梅因·贝希尔（Main Bocher）。《时尚》是美国的主流时尚杂志。那时的巴黎风尚和“巴黎范儿”，对时尚杂志和出版社来说是巨大的生意，《时尚》驻扎在巴黎的编辑工作都很辛苦。宝琳作为时尚记者，生活围绕着采访、秀场、打字机和交稿期限展开，但哈德莉的生活却献给了照顾邦比、搜寻便宜食品等日常琐事。宝琳报道的是巴黎说不尽的展会和潮流，她的名字会定期出现在杂志上。她是个聪慧的作者，写到潮流中物，哪怕用最短的篇幅也能展现出一种活泼、迷人的机智。

“手绢和名声稍不留意就会丢失，”她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这两种东西每天都会丢失相同的数量。所有丧失的名声，越好就越难以挽回。相比之下，你会更希望丢失的是手绢。”[注]

不过，除了油光水滑的波波头和时尚采访笔记，宝琳显然至少在一个方面很传统：很多人相信她正在寻找一位可以以身相许的夫君。“宝琳年近三十，是一位处女、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坎奈尔后来写道。[注]时间所剩不多，这使得宝琳在求爱战线上比几年前更加主动——对于不那么靠谱的相亲活动也会欣然前往。

海明威正是宝琳眼中不靠谱的男人。事实上，在坎奈尔公寓相遇的那天下午，他令宝琳讨厌。（她妹妹弗吉尼亚则相反，当海明威向大家

讲述奥地利和滑雪的故事时，弗吉尼亚很感兴趣。[注]）海明威也一样，与宝琳互相看不惯。

“我乐意和弗吉尼亚一起外出，让她穿上宝琳的大衣。”菲佛姐妹离开之后他说。[注]

但菲佛姐妹和海明威一家一定是找到了什么共同话题，因为宝琳和弗吉尼亚很快就去锯木厂楼上的公寓拜访了海明威和哈德莉。宝琳住的是右岸的一间豪华公寓，对海明威家的寒酸阁楼完全看不上眼。他们的居住条件之差震惊了她，她不敢相信，哈德莉竟然能忍耐这种贫贱——哪怕是以艺术之名。做客期间海明威始终窝在卧室里，宝琳瞥见他在床上写东西，样子邋遢。她心中一片苍凉。

坎奈尔不久之后遇见了姐妹俩。“她们优雅地讲述了自己的震惊：海明威如此粗鄙，哈德莉这么可爱的女孩怎么能忍得了他？”[注]

尽管居住条件和菲佛姐妹如隔天渊，哈德莉却说她并不感觉羞耻，也不因自己的衣着简陋而烦恼——至少目前是这样。看到丈夫日益频繁地混迹于光鲜、富有的女人之中，她即使感到不安，也不曾承认自己在求爱战线上有任何劣势。她后来声称，海明威让她感觉她是值得为自己骄傲的，而且他经常会变着法儿地说：“看，这就是我那美丽、聪慧、天才、迷人的老婆。”[注]

但这段时间，海明威夫妇一定曾站在他们富有的新朋友的位置上审视自己的生活。很难想象，那层放浪不拘的浪漫纱帐一次都没有被扯下来过，那种苦闷、不得志的挣扎，始终埋在了他们心底。

如果弗吉尼亚·菲佛果真像坎奈尔所说的那样讨厌海明威，她似乎很快就克服了反感。据说两人一度互相调情，甚至有可能私通过。[注]菲佛姐妹从海明威夫妇生活中偶然闪现的新面孔，渐渐变为不可缺少的常客。海明威也渐渐融入了菲佛姐妹优裕的事业和生活中，成为她们人生

故事的一部分。似乎很快就会有人来“换岗”了。

勒布似乎也很快就会有新的艳遇。一天下午，他在多摩和圆亭附近的精英咖啡馆（the Select）中坐下，继续修订《杜达布》的书稿。

“我听到一阵笑声，是那么开心，那么动听，好像照亮了这阴晦的房间，”勒布回忆道，“音调不高，水灵灵的，正是知更鸟对月亮歌唱的声音。”[注]

他抬头望去，看见一个身材修长的女人，被几个男人围着。[注]她亮色的头发剪成男孩的式样；虽然她总喜欢戴着一种新潮的尖顶男式软呢帽（fedora），但那天她戴的是一顶宽边帽（slouch hat）。一件简约的针织衫、一条粗花呢裙，这就是她那天的穿着。她结实、苗条的身材，不需要多余的装饰。总之，她看上去很禁欲，近乎男性，却性感撩人。这个女人有一种“别样冷淡的高贵”，勒布觉得。[注]

勒布一下子被迷住了，含情脉脉地注视了她一会儿，然后定了定神来到罗伯特·麦克阿尔蒙的桌前，后者就坐在不远处，正在接见一群仰慕者。不出所料，麦克阿尔蒙知道内情。这只知更鸟是英国人杜芙·特怀斯登夫人，有30多岁了。她是从丈夫那里获得“夫人”这一头衔的，但是很快就要失去它了：跟凯蒂·坎奈尔和其他蒙帕纳斯“赡养帮”中的人一样，特怀斯登来巴黎是为了度过一段难熬的离婚期。她的贵族丈夫则留在了英国。众所周知，她饮酒海量，能受得了那些烈酒，却不改清瘦、时髦的容仪，着实令人钦佩。

“我想知道，她能撑多久不乱方寸。”勒布写道。[注]

勒布不过是又一个拜倒在杜芙夫人魅力下的男人罢了：她不断在圈子里俘获男人。“我们都对她痴心一片，”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说，“想不被她吸引很难。她出招太老练了。”[注]

特怀斯登吸引人的方式别具一格。虽然人们立刻会注意到她的贵族头衔，但据说她也有野性的一面；有人说她不愿意按时洗澡[注]。她对个人形象的每一分经营，都卓有成效。看似随意的着装[注]，放在别的女人身上会显得粗笨，在她身上却成了身份教养的象征。她常常玩弄男式的物件，像男人一样喝酒，但特怀斯登不知用了什么方法，把她盗用而来的男性气质转化为女性的魅惑力——尽管她头上的尖顶男士呢帽暗示着她要拥有那些被男人独享的自由放浪，比如对欢愉的追求。她乐于交际，却散发着一种无法被私人占有的气息——这是任何一个成功的塞壬必备的特质。

这种不可侵犯的气质，就像猫薄荷一样发挥着作用：无论杜芙夫人去哪里，都会有一群男人坐到她的脚边，毫无悬念，“聆听她说的每一个字，瞻仰她的容貌和才智，以及她对艺术的敏感”[注]。她用一种不偏不倚的轻薄对待每一个被俘获的男人，把所有人都称作“亲爱的”[注]——可能是因为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处于一个永远在寻找灵感和素材的社群中，特怀斯登有当缪斯的资质——她同时散播着满足与危险。圈里圈外的很多人都相信，在商业小说作家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1924年的一篇小说《绿色的帽子》（*The Green Hat*）[注]中，蛇蝎美人艾瑞丝·思多姆（Iris Storm）的原型就是杜芙夫人，不过另一位旅居巴黎的英国贵族、婀娜多姿的南希·丘纳德更有可能是这一人物的灵感来源。[注]现代主义作家玛丽·巴茨（Mary Butts）也曾构思过一本书，虽然部分受到了特怀斯登形象的启发，却发现它“难以成形”[注]。看来，不久就又会出现一位雄心勃勃的作家，真正琢磨出来该如何把她的形象付诸笔端。这只是时间问题。从文学创作上讲，杜芙夫人是枝头上伸手可及的果子。

即使酒吧里的其他男士时刻准备着拥到她身旁，哈罗德·勒布却就是无法鼓起勇气接近她。但她确实让他寤寐思服，只要一走进酒吧或咖啡厅，他就要环顾房间，看看她是不是也在那里。只要她在，从来都是被那一帮男跟班前呼后拥。而勒布就会流连于人群外，远远地注视着。

“她没有美到令人窒息的地步，但她的长相中有什么地方特别吸引我。”他回忆说。她的脸让人过目难忘。“我曾漫不经心地尝试着忘记她的影像，但是没有成功，”勒布写道，“它似乎刻在了我的心灵之镜上。”[注]

烦恼紧接着就来了，他很快发现，特怀斯登在感情上并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她把子爵前夫留在了海峡那边，同时从英国带来了另一个男人，与他同居共酌。帕特·格思里是个和特怀斯登一样沉迷酒色的英国人，据传也有贵族血统：据说他母亲拥有巨额财富，并在苏格兰拥有一座城堡。在这个社交圈中，格思里是得过且过的“上流穷人”典型。他也像杜芙那样纵饮无度，可惜不能像她那样驾驭酒精。正如旅居者莫里尔·科迪所说：“可怜的帕特喝到第二杯就会酒后吐真言了。”他有时也很好斗，所以不等入夜就要被拖出酒吧。每到这种时候，特怀斯登就会“转战至其他地方，和其他人继续喝酒”。[注]

虽然格思里和特怀斯登同床共枕，但有人认定他是个双性恋，或者同性恋，另一些人则对此不很肯定。斯图尔特感觉，“杜芙确实是相公（fairy）[注]的菜，而且一直也都和相公在一起”[注]。他依稀记得，有一次自己和格思里光顾过西班牙的妓院，但好像又不是和格思里。另外一些人认为特怀斯登和格思里就是情人关系，也许这是蒙帕纳斯最好的一桩恋情之一。[注]

勒布讨厌他的潜在对手，认为“在某种让人难以苟同的爱尔兰式眼光中，格思里是帅气的”，但除此以外，很难说他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优点。“他是那种典型的英国上流人士，那一小撮人把寄人篱下当作一种营生。”勒布断定。

这样评判格思里在杜芙那里的地位，虽然无情，但并非一己之见。唐纳德·斯图尔特说，如果“杜芙·特怀斯登夫人是一棵树，格思里就是树干上的一个木瘤”[注]。但是从财政上说，其实是特怀斯登在依赖格思

里。邻里都知道，格思里是个靠汇款过活的男人，他家会间或从海峡那边寄钱来。有传言说（勒布本人还编造过其中的一个）特怀斯登和格思里一收到汇款，就会搬进丽兹酒店住一段，换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特怀斯登穿白裙戴白手套，格思里穿压花晚礼服）。他们会大啖鱼子酱和香槟，直到那沓法郎所剩无几，然后回到蒙帕纳斯，回到靠人接济的境地。从丽兹回来以后，特怀斯登和格思里经常连吃饭的钱都不够，全仰仗酒吧招待的好心，赊账、借款或是免费给他们一杯酒喝。[注]两人常常光顾勒布常去的几家左岸酒吧和夜店，他们的社交圈开始重合。一天晚上，勒布去参加朋友的鸡尾酒会，发现特怀斯登和格思里也在。勒布很不自在地一杯杯喝酒。酒并没有给他勇气，反而让他越喝越迷糊，他突然开始为自己当天早上没有刮胡子一事烦恼。他离开聚会，跌跌撞撞地来到附近的一家理发店。“我摸索着往前走，直到来到一根彩条柱子[注]下面。”他后来回忆道。[注]一进店，他就瘫倒在椅中，任由理发师往他脸上打泡沫，给他刮脸。一有压力总会不停地打扮，这显然是勒布的脾性——海明威已经注意到了，并且不久之后就会在文章里将之大肆渲染。

不久，勒布就回到了精英咖啡馆的吧台，喝了一杯加苏打的威士忌。特怀斯登也在，正和几个仰慕者聊天。他透过吧台后面的镜子盯着她，直到仰慕者们都走了。这一回，她终于是独自一人了。

“我还没回过神来，她就转向我，说：‘这是唯一的奇迹。’”

勒布愣了一下才发觉她是在对自己说话。虽然不知道她的意思，但是他振作精神，努力找到了一个温文尔雅的回应。

“所以这才难以置信。”他回答。（“就好像我在扮演某个角色似的。”后来他回忆说。）

他站起来，坐到她旁边的一张凳子上。他们透过镜子望着对方，很快，他们轻抚着对方的手，约定第二天在某个偏僻的酒吧见面。帕特·

格思里出现时，勒布离开了。

第二天，杜芙夫人和勒布在富瓦约餐厅（Restaurant Foyot）见面了。橡木板装饰的墙面上画着英国人打猎的场景，这似乎是个十分恰当的背景，向勒布诉说着特怀斯登的过去——这是巴黎全城急切想知道的事。她出身白金汉宫的传言让人们津津乐道，有人认为她是英格兰斯图亚特王室的后裔，特怀斯登对这种说法也不加反驳。“她幼年的记忆，是晨雾、欧石楠和马，是丘峦中的峭壁，和前来喝下午茶的邻居。”勒布写道。[注]

但是另一些传言也不可忽视：有人说，她父亲是酒铺的小业主，在英格兰北部某处做生意[注]；她的家族已经破产，但仍然有在社会上攀龙附凤的野心；还有人说，她为人放荡、阅男无数。对于即将失去的贵族头衔，她似乎并不觉得可惜。这是婚姻带给她的一张标签——1917年她嫁给了罗杰·特怀斯登，第十代准男爵。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成功的结合。杜芙夫人告诉勒布，结婚那天她拉着在场一个最好的男人要求私奔，但最后还是嫁给了罗杰男爵。他们生育了一个孩子，但她发现罗杰是个醉鬼；他们根本无法在一个屋檐下相处。她婆家的贵族亲戚想赶她走，目前在拿她的儿子当人质。

“我过得一团糟，”特怀斯登对勒布说，“但是我并不愧疚。”[注]

接下来的那一天他们又见面了。这次他们谈到了一起出行的计划。正好，格思里正要奔赴英格兰，再去哄哄他的母亲，多搞些钱。特怀斯登提议去圣让德吕（Saint-Jean-de-Luz），那是比亚里茨（Biarritz）[注]南边不远处的一个钓鱼小镇。

“我来订票。”勒布说。[注]

同时，另一个美国人也想用花言巧语赢得杜芙夫人的芳心，他就是海明威。家里有妻子，据说还和弗吉尼亚·菲佛有奸情，不知他怎么会

有多余的时间来追求特怀斯登？但是那年春天，越来越多的人见到了他们两个相伴出行。

多年后，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声称：“我把海明威介绍给了杜芙夫人，他好像被她的贵族头衔震撼到了。”注那之后，人们常常在蒙马特区看见海明威，他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花钱给特怀斯登和格思里买酒喝，即使他自己也穷困潦倒。有时候哈德莉也和海明威、特怀斯登一起去，但是这对她来说并不是开心事。她常常哭，这种时候海明威会请求麦克阿尔蒙或者另一位朋友约瑟芬·布鲁克斯（Josephine Brooks）把她送回家，而他则和特怀斯登继续喝酒。

“他们看上去相爱了，或者至少有那个意思，”麦克阿尔蒙觉得，“哈德莉并不是由我和约瑟芬·布鲁克斯送回家的。要不要和她分手，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的酒还没喝痛快，朋友还在，为什么要离开？”注

哈德莉的眼泪也没有触动海明威。他开始把特怀斯登带到他们锯木厂楼上的公寓中。因为他逐渐小有名气，地位很高的女士也开始青睐他了。

随着那些富裕的新朋友对他钟爱有加，各种轻浮的享受扑面而来，海明威显然乐在其中。哈德莉曾经坚持说，她依然让海明威引以为荣，依然对他保有吸引力，但是在1925年的晚春，海明威描述他们两人的关系时，语气带上了一丝冷淡的味道。

“我们仍然像过去一样喜欢对方，”他在给舍伍德·安德森的信中写道，“而且相处得很好。”注

很难说这是个激情的誓言。杜芙夫人以及菲佛姐妹，成了海明威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

那年春天，海明威给贺拉斯·利夫莱特寄去他签了名的《在我们的时代》的出版合同。在随寄的信中，他要求保有任何改动建议的最终决定权。他坚持认为，小说集中的每一篇都“写得很精短、很努力”，所以改动其中的任何一个字，都可能会使整部作品偏离原意。他预计，这本书会卖得不错。不像那些同时代的实验作家，他的作品针对面很广。他向利夫莱特保证：“我的书是雅俗共赏的。只要你是高中毕业，就不会读不懂。”[注]

这条路很难走，需要有很强的悟性，很少有实验作家能够做到。不过艺术领域有一些先行者确实鼓励这种理念，巴黎最显赫的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就是践行者之一。

“我总是觉得，即便是通常不看图像的人，你也要用这幅画在他们心里激发些什么。”毕加索曾对他的情人弗朗索瓦斯·吉洛说。“正如莫里哀的剧作总能让雅俗同乐，莎士比亚也是如此。正如莎士比亚那样，我的作品里面也有一些荒诞滑稽、相对粗俗的东西，这样就顾及了每一个人。并不是说我想讨好公众。我为每一种思想水平的头脑都带来一点感悟。”[注]

海明威此时希望把一种类似的雅俗共赏手法应用到文学领域。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诗人E. E. 卡明斯这些人，也许能用实验性的语言雕琢出精致、引人深思的书，但是“如果不是读过大量‘现代’作品的人，就读不懂他们的书”，海明威对利夫莱特写道。[注]他不会加入这些人的行列，而且希望能尽快成为博尼-利夫莱特的一笔重要“财富”。

过了不到一周，海明威去西尔维娅·毕奇的书店拜访她。一如既往，她把接到的一摞寄给海明威的信件交给他，其中两封是麦克斯韦·柏金斯[注]的约稿信，他是纽约著名出版社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的一位编辑。海明威失落地发现，这两封信是一个多月之前写的。第一封信的落款日期是2月21日，道出了他梦想从一家主流美国出版社

那里听到的一切。柏金斯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知海明威在写一些了不起的东西。他找到了一本海明威在巴黎出版的小书《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肯定花了不少功夫才寻得——对其内容印象深刻。他本能地理解海明威的文风。

“显然你的技法可以让你用很短的篇幅说清你要表达的东西。”他写道。(注)

海明威可以再提供一部作品给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出版吗？紧接着柏金斯补充说，《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本身太干瘪了，斯克里布纳这样的商业出版社不能拿这种书去买——这可能在暗示海明威，要是有一部长篇作品，他们会很感兴趣。

但是因为收信地址不够具体，这封鼓舞人心的信件寄丢了。万幸，一个中间熟人成了救星，他让柏金斯通过西尔维娅·毕奇联系海明威——毕奇的书店实际上就是“这伙人”的邮局。柏金斯几天后又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里面还提到，他听说海明威“可能不久就会写出足以成书的文字”(注)。

来信的时间令人不能再沮丧了。海明威迅速回信柏金斯，解释说自己收到约稿信非常兴奋，但他如今已经受制于人：他刚刚和贺拉斯·利夫莱特签了下一本书的合同——不仅如此，利夫莱特还拥有他接下来三本书的优先选择权。

“看来，想出名，没有一个清楚的地址是不行的。”他写道。(注)

不过海明威已经开始琢磨合同的漏洞了。他告诉柏金斯，如果利夫莱特不接受他的下一本书，按照条款，利夫莱特出版社就会失去对他再下一本的优先选择权。所以，未来他还是有希望和斯克里布纳合作的。他向柏金斯描述了自己另外的一些写作计划——包括创作更多的短篇小说，可能还会写一本非虚构的介绍斗牛的书——并且做出了一句怪异

的、口是心非的声明。“我不打算写长篇小说。”他写道。他还说，长篇小说是一种“刻意得可怕、已经被穷尽了的文体”。尽管如此，他还是迟疑地说，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已经超过一万两千个词了，所以他可能还会写出长篇小说。

“情况就是这样。”他无奈地总结道。

他和柏金斯都不想屈服于他们“坏透了的运气”(注)——用柏金斯在回信中的话说。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保持着友善的书信往来。信中，海明威从来没有问过柏金斯是如何接触到他的作品的，可能是默认自己的名声已经尽人皆知了吧。如果他得知真相，可能会大吃一惊，因为向柏金斯介绍海明威的人正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自从斯克里布纳出版了菲茨杰拉德的首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后，5年间他成了出版社最重要的文学明星，一个闻名全美国的人。他也充当着柏金斯的编外文学星探。(注)流行体育专栏作家、小说家林·拉德纳他曾被同为幽默文学大师的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称为“最幽默的男人”(注)，也是很早就影响过海明威的作家之一，而发掘林德纳，就是菲茨杰拉德对斯克里布纳作者群的一个杰出贡献。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也把他文学生涯的起飞归功于菲茨杰拉德，是后者首先把斯图尔特引荐给了《名利场》的编辑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

菲茨杰拉德把一位作家成功地拉进斯克里布纳的作者群后，并不会就此放手，他会密切参与到这位作家的文学生涯中，他所发现的新秀们书籍的销售数据，柏金斯甚至偶尔还会拿给他看。菲茨杰拉德对作家同僚的仁爱之心几乎令人不可思议，毕竟文学界的竞争向来激烈。有人怀疑，他在别人的生涯里下注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尊心，但是多数人觉得他的动机很纯粹。约翰·多斯·帕索斯早年就认识菲茨杰拉德，他曾写道：“他对别人的作品慷慨而无私。”(注)

1924年秋天，菲茨杰拉德决定把他的慷慨分给海明威一些。他偶然读到了《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于是毫不耽搁地给柏金斯写了信，说柏金斯应该去找一位住在巴黎的美国作家，叫“耳欧内斯特·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把Ernest拼成了Earnest，然后又把a画去了），他刚刚出版了一本了不起的书。

“他真有两下子。”菲茨杰拉德说。[注]

既然菲茨杰拉德认准了海明威，说明他很可能看到了海明威作品中闪烁的商业价值：终于，从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埃兹拉·庞德的圈子里走出了一位普通美国读者也能欣赏得了的实验作家。斯泰因那本《美国人的成长》（*The Making of Americans*），菲茨杰拉德抱怨它近乎“完全让人看不懂”[注]。（柏金斯赞同他的看法：斯泰因的风格精彩、让人印象深刻，但是他怀疑“没有或者少有文学雅兴的读者，可能不会对她的文风有耐心”[注]。）海明威就完全不同了。

虽然海明威多年来都在读菲茨杰拉德的书和文章——他那一代人无不如此——但其实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新守护神。而且对于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他似乎也没有什么溢美之词好说。

“欧内斯特似乎对菲茨杰拉德的早期作品不置可否，”海明威在《多伦多星报》的同事莫里·卡拉汉回忆，“也不是他不愿意表达观点……他明确地讲过，菲茨杰拉德没有什么令他激动之处。”[注]

看来海明威是少数派。自从5年前菲茨杰拉德凭借自己的首秀之作在文坛一炮打响，他越发多产，赞誉越来越多，名声也愈加响亮。他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长篇《美与孽》（*The Beautiful and Damned*）还被拍成了电影。《人间天堂》也有被改编成电影的打算。单是在1920年和1921年，就有三部电影是由他的短篇小说改编的。[注]

“任何在巴黎的人，做梦都想不到一个作家能赚那么多钱。”旅居诗人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曾说。[注]

就好像这样的成功还不够振奋人心，菲茨杰拉德还获得了最令人垂涎的“文学大奖”：一家媒体在介绍他时说，早在1921年，他就成了“年青一代公认的发言人”[注]。新作家能有如此的感召力，也少不了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定调之功，在营销时把菲茨杰拉德吹捧为“初升一代的小说家”。在书里，他是一位忠实的观察者：战后的社会氛围和同代人的心态，已经和他们的父辈全然不同。

菲茨杰拉德后来承认：“我的制高点在两代人的交界线上，我就栖居于这里——大约是有意这么做的。”[注]

在《人间天堂》中他写到，自己这代人长大了“才发现所有的神明都死了，到处都在打仗，一切关于人的信念都动摇了”。不过他也紧随战后的浮华风潮：媒体认为他和妻子泽尔达一手造就了“飞女郎”文化。他们让自己活成榜样，他们香槟飞溅的世界是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用约翰·多斯·帕索斯的话说：“他们是名流，出现在报纸周末特刊上的那种名流……而且也乐此不疲。”[注]

无论怎么看待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海明威一定把菲茨杰拉德视为了一个尤其令人不快、令人嫉妒的存在。海明威自己承认，他写上几段话都还有困难，更别说用五年写三本轰动文坛的长篇小说了。但至少他可以安慰自己，菲茨杰拉德在风格上并不善于标新立异。“现代”“实验”这种词很少和菲茨杰拉德扯上关系，他的作品常常被形容为“生动”“形象”。即使他的写作主题现代得令人耳目一新——飞女郎、私酒贩、爵士乐……但他的文风更接近伊迪丝·沃顿而非格特鲁德·斯泰因。菲茨杰拉德却认为自己就是先锋作家，随他去吧。

“我想写点新东西——别具一格、美妙而简单+[注]细致编织起来的

东西。”菲茨杰拉德曾给柏金斯写信说。[注]

当他的小说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在该年4月面世时，菲茨杰拉德认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小说出版不久他告诉柏金斯，他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形式、观点和结构上的真正创新之作——是乔伊斯和斯泰因始终在摸索的、康拉德[注]始终未能找到的时代象征”[注]。他说T.S.艾略特也同意他的看法：“他写信说他把《盖茨比》读了三遍，认为它是自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小说迈出的第一步。”[注]

但在实验作家看来，这一步并没有迈出多远。现代生活并不是只要记录就能表现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作家必须采用现代的、革命性的书写方式。《盖茨比》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拿菲茨杰拉德的挚友、当时的批评家领袖埃德蒙·威尔逊的观点为例，他认为菲茨杰拉德终将会被当作“这个历史时期美国文学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威尔逊不觉得菲茨杰拉德是一个文学上的激进派。[注]也就是说，眼下还剩一尊“大奖”无人问鼎：一部作为“一代人之声”的长篇小说，既是现代作品，又是开文风之先的作品，它将出自谁手？

菲茨杰拉德和妻子近来放弃了纽约的生活，来到欧洲。他们最终降临巴黎，在凯旋门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在右岸的富人区，两人很快“让他们和他们的爱好成了社会上特立独行的一类”——用《纽约客》的作者珍娜·弗兰纳的话说。[注]他们的大度和挥霍成了传奇。

“可怜的司各特，作品让他赚了太多的钱，他和泽尔达只得不停在蒙马特喝香槟才能摆脱那些钱。”西尔维娅·毕奇回忆说。[注]

为了把钱花掉，他们除了去丽兹酒店的客房烧钱外，什么都干过。毕奇说，菲茨杰拉德曾经拿着一张出版社开的支票，用所有钱给泽尔达买了一串珍珠项链，而她转手就把项链送给了夜店里“一个和她一起跳舞的黑人女子”[注]。据说他们曾在自家公寓门厅的托盘上留下一沓钱，

以便前来收账和送货的人自取。虽然司各特作风轻浮，但是“这伙人”立即热情满满地向他敞开了胸怀。“我们很喜欢他，谁不喜欢呢！”毕奇说。她深情地回忆起菲茨杰拉德“蓝色的眼睛和帅气的外表，他对别人的关爱……还有他堕落天使式的魅力”[注]。旅居作家们光顾的咖啡馆和酒吧就那么几家，所以菲茨杰拉德碰见海明威只是个时间问题。

果然，那年的一个春日，海明威和杜芙·特怀斯登、帕特·格思里（在海明威的回忆中，他是“某个完全无关紧要的人物”[注]）在蒙帕纳斯的丁戈酒吧小坐。战前，丁戈是一家底层工人的咖啡馆，直到被弗洛西·马丁（Flossie Martin）发现——她从前是齐格菲尔德[注]手下的舞女，此时是蒙帕纳斯的非官方情色吉祥物。一旦她开始光顾这里，丁戈就成了旅居者必去的景点，他们很多人在这方小吧台上醉到六亲不认，不时有人倒在树林里或者倚在街边的灯柱上不省人事。

海明威、特怀斯登和格思里正在酒吧里坐着，可能已经喝上了，有两个人上前去搭话。第一个人是菲茨杰拉德，他可能一眼就认出了海明威。他介绍了自己和他的朋友丹克·查普林（Dunc Chaplin），然后请几个人喝了香槟。

菲茨杰拉德的相貌让海明威感到不自在。太英俊了，他想，尤其是那张精致的嘴。菲茨杰拉德接着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讲话，更使得海明威心神不宁。

“他讲的全是我的作品，说它们有多么多么了不起。”海明威后来回忆说。[注]

海明威觉得这样赞美另一个作家的作品很丢脸。菲茨杰拉德接着开始探问海明威的性生活，气氛更诡异了。菲茨杰拉德想知道他和哈德莉结婚前有没有做过爱，海明威说他想不起来了，菲茨杰拉德继续追问。

“别学英国佬说话，”他寸步不让，“严肃点儿，再想想。”[注]

就在这时，海明威发现菲茨杰拉德开始出汗了。他的嘴唇上方积起了豆大的汗珠。突然，他脸上血色全消，在吧台上晕倒了。海明威害怕菲茨杰拉德要死了，但是查普林向他保证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两人将菲茨杰拉德抬出酒吧，塞进了一辆出租车里，吩咐司机把他运回家。

海明威初次遇见他著名的“恩人”时发生了什么，至少他自己是像上面这么说的。故事还有其他版本——比如，菲茨杰拉德和一个朋友说，自己当时只是“抬头看了一眼海明威”[注]——但是后来人们都把海明威的版本当作真的。

不论这次命中注定的初遇是怎么发生的，在1925年6月海明威写给麦克斯韦·柏金斯的信中，他说自己和哈德莉已经“相当经常”[注]见到菲茨杰拉德了，而且这两位作家甚至还一起组织了一次自驾游。菲茨杰拉德需要去里昂取回他和泽尔达留在那里的一辆雷诺车。泽尔达本来想要一辆敞篷车，所以要求他把这辆车的顶棚锯掉。但是湿冷的天气让他们只能暂时放弃这辆刚刚被“斩首”的车。菲茨杰拉德邀请海明威一起去取车：他们坐火车去，然后开雷诺车回来。

海明威看到了一次机遇。虽然他感觉菲茨杰拉德有不少无聊、文笔拙劣的作品——而且菲茨杰拉德有时修改小说的动机，只是为了更好地把它们卖给主流杂志，海明威甚至因此公开地把菲茨杰拉德称为“文学婊”——但是如果跟菲茨杰拉德去了里昂，他会“和一位更年长的成功作家”相处，“一定会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注]。

他接受了菲茨杰拉德的邀请。在海明威的讲述中，这次旅行完全是一场灾难。菲茨杰拉德接二连三地冒犯他，包括把海明威一个人丢在火车站（他们后来又在里昂会合了），始终怀疑自己要犯病，还曾让两个人耽误在一顿丰盛得毫无必要的旅店大餐上。菲茨杰拉德似乎成功地用他那不受欢迎的长篇大论填满了假日活动，喋喋不休地说他们两个都可以从迈克尔·阿伦那里学点东西。他还重演了一次昏厥的桥段，晕过去

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像一个牺牲了的小战士”，海明威写道。[注]

不知怎地，这次旅行结束之后他们还可以做朋友。在海明威眼里，菲茨杰拉德可能是一个糟糕的酒鬼、一个文学娼妓，但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娼妓，不能简单地弃之不理。

很快，菲茨杰拉德的妻子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了。泽尔达和海明威一相识，便恶言相向，用菲茨杰拉德后来的情人的话说，那是“第一眼就生恨”[注]。海明威和泽尔达第一次见面是在菲茨杰拉德巴黎的公寓里——蒂尔西特路（rue de Tilsitt）上一座阴暗、不透气的房子。据海明威回忆，泽尔达当时宿醉未消，不停地责难着菲茨杰拉德，而菲茨杰拉德则把一本账目拿给海明威和哈德莉看，上面具体写着他近年来赚到的钱。那是一次十分紧张、尴尬的聚会。

泽尔达和海明威似乎生来就注定了要互相仇恨。即使她的传奇美貌也没有对他产生任何效果；他反而说她有猎食的鹰隼的眼睛，还对泽尔达的“薄嘴唇”大加挞伐。哈德莉在她与海明威的婚姻中扮演的是一个支持、服从的角色（她四处跟随着海明威，“沉默得像个印第安小娘们儿[注]”[注]，泽尔达的一个朋友说），泽尔达则是一个强势、不屈从的人。海明威在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后，认定菲茨杰拉德还是有潜力的——但如今见到了泽尔达，海明威认为菲茨杰拉德如果想继续写出更好的书，就需要一个人来守护他。海明威不加多想就认定，泽尔达会精神阉割了她的丈夫。她显然嫉妒菲茨杰拉德的成绩，极尽所能让他变得无能。海明威发觉，菲茨杰拉德只要一喝酒，泽尔达就特别开心。

“渐渐地我理解了那种微笑，”海明威后来写道，“那意味着她知道司各特写不了东西了。”[注]

这些初期的评价就足够刻薄了，但海明威很快觉得，泽尔达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他毫不避讳地把自己想到的一切都和菲茨杰拉德讲

了。

据说，一天下午菲茨杰拉德向海明威倾诉，说泽尔达认为他能力不太行。海明威说：“泽尔达疯了。”[注]在圣日耳曼区一家叫“米烧”（Michaud's）的餐馆（詹姆斯·乔伊斯经常带家人来这里吃饭）的厕所里，海明威还观摩了菲茨杰拉德的“器械”。“你没什么毛病，”他说，“泽尔达只是想毁掉你。”海明威毫不回避自己的观点。菲茨杰拉德“应该在五六年前就把泽尔达‘处理’了，那个时候她虽然疯得最厉害，但是还卖得出去，不像现在，她的脑子已经坏得彻底不可救药了。”后来他写信对柏金斯这么说。[注]

海明威的魅力虽然俘获了许多人，但是在泽尔达这里却一点也不管用。她说海明威是“装出来的硬汉”（he-man）、“长胸毛的娘炮”[注]——之后几年她把这些评价重复了很多遍，每次只是稍微换一下表达。她知道海明威正在努力破坏她的婚姻；夫妻俩开始因为海明威吵架，正如从前哈罗德·勒布和凯蒂·坎奈尔那样。菲茨杰拉德和勒布一样迷恋海明威，毫不动摇。

“欧内斯特……是和我一样的人，我眼中的理想主义者。”后来他努力向泽尔达解释。[注]

如约翰·多斯·帕索斯所说，菲茨杰拉德“对运动员兼散文家、拳击手兼讲述者海明威的文学执着”[注]很快就被巴黎“这伙人”中的所有成员注意到了。很快，菲茨杰拉德就顺从地接受了“惯例”，和海明威走上了拳击场，也和海明威去见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后者客厅墙上的那些画，菲茨杰拉德并没有像海明威那样留意，但他觉得斯泰因是个有趣的人，两人变得很要好。爱丽丝·托克拉斯注意到，菲茨杰拉德开始独自拜访花园街27号，并且从不在酒后来访，她觉得这显示了他对斯泰因的尊敬。[注]

与此同时，菲茨杰拉德并没有放松宣传海明威的力度。5月22日，他愉快地告诉麦克斯韦·柏金斯，自己的新朋友是“一个有魅力的好伙计”。海明威进入了柏金斯彀中，菲茨杰拉德对此十拿九稳。“如果利夫莱特不讨好他，他就会到你这里来，”他向他的出版商保证，“而且他前途无量。”注

---

1. Loeb, “Hemingway's Bitterness,” 119.
2. Allan, *Americans in Paris*, 131.
3. Charters, *This Must Be the Place*, 4.
4. Nathan Asch, quoted in Cowley, *A Second Flowering*, 60.
5. Ibid., 61.
6. Ibid.
7.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214.
8.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63.
9.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17.
10. 科尔·波特（Cole Porter，1891—1964）：美国音乐家。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1883—1939）：美国演员、导演、剧作家。谢尔盖·达基列夫（Sergei Diaghilev，1872—1929）：俄国流亡艺术家，“俄国芭蕾舞团”是他创立的一家演艺公司，“十月革命”后他不再回到俄国，转而在世界各地演出。——译者注
11.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17-18.
12.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63.
13. Calvin Tomkins,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September 10, 2014.
14. Ibid. 墨菲夫妇的孙女劳拉·唐纳利（Laura Donnelly）指出，他们不仅是那种“喂饱你，倾听你，给你买唱片”的人，还会“在你遇到困境的时候借给你100美元，并说上一句‘别还给我们啦，帮你渡过难关是我们的荣幸’”。Laura Donnelly,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September 22, 2014.
15.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64.
16. Sokoloff, *Hadley*, 78-79.
17. Ibid.
18. Loeb, *The Way It Was*, 247.

19. 海明威在塑造《太阳照常升起》的人物时，借鉴了史密斯的这些特点。——译者注

20. Ibid., 245-47.

21.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6. 这只是关于这次会面的说法之一。勒布的版本是，他邀请海明威夫妇去喝一杯，庆祝《杜达布》和《在我们的时代》双双签约。当海明威夫妻俩到达勒布家时，碰巧坎奈尔也在，正在和菲佛姐妹聊天。

22. 菲佛姐妹的父亲在堪萨斯州的皮戈特市（Piggott）及周边地区拥有大片地产。她们慷慨的叔叔奥古斯塔斯·菲佛，别名“格斯”（Augustus “Gus” Pfeiffer）和别人共同拥有一家跨国制药公司，也是理查德·哈德纳特（Richard Hudnut）的香水公司的老板之一。后一家公司的业务在20世纪20年代刚刚拓展至欧洲。

23. Kay Boyle, in McAlmond,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180.

24. Callaghan, *That Summer in Paris*, 112.

25.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6.

26. Pauline Pfeiffer, “Handkerchiefs a Lady Loses,” *Vogue*, July 1, 1922, 72.

27.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6. 多年来，众多传记作家把坎奈尔的一时之言当作了恒常真理，把宝琳描写成因青春所剩无几而沉迷于社交的撩汉高手。卡洛斯·贝克甚至形容她“矮小、坚定，就像一条小猎犬”（*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65）。“红颜见老的猎男高手”——尽管这种描写很老套，但是有证据显示菲佛当时确有紧迫感，一如海明威期待写出长篇小说时体会到的那种紧迫感。比如说，三年之前，宝琳曾经自告奋勇，去为一种激进的抗老化疗法当“小白鼠”。她在《时尚》的一篇文章中记录下了这一有趣而又丢脸的治疗过程。细看自己的脸，她说，“眼睛周围和额头上，是我历经时光摧残的地方。我的头发似乎突然变少、变稀了”。Pauline Pfeiffer, “Madame in Search of Her Youth,” *Vogue*, January 1, 1922, 51.

28. 宝琳·菲佛的传记作者露丝·霍金斯（Ruth Hawkins）写道：“弗吉尼亚是姐妹俩中更健壮的那个，她觉得他的故事很有意思，跟着他进了厨房，差不多整个晚上都在求他多讲些——海明威也很乐意聊。” Ruth A. Hawkins, *Unbelievable Happiness and Final Sorrow:The Hemingway-Pfeiffer Marriage*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2012）, 3.

29.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6.

30. Ibid.

31. Sokoloff, *Hadley*, 82.

32. 宝琳·菲佛的传记作者露丝·霍金斯为了证明这桩可能存在的恋情，举了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事例。第一次见面后不久，弗吉尼亚和海明威去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爱丽丝·托克拉斯家吃饭。据说饭后他们是一起离开的，海明威声称要护送弗吉尼亚回家。几十年后，霍金斯采访了弗吉尼亚几位还在世的朋友，他们说弗吉尼亚曾暗示过，她和海明

威见面不久后就开始了交往，而菲佛家的财富是海明威看上她、后来又看上宝琳的根本原因。Ruth Hawkins, *Unbelievable Happiness* and *Final Sorrow*.弗吉尼亚的一位朋友回忆，他曾问过弗吉尼亚一个问题："所以，成为海明威夫人的也许会是你？"她的回答是："格斯不也是我叔叔吗，对吧？"格斯叔叔就是菲佛姐妹慷慨而富有的叔叔奥古斯塔斯·菲佛。Ruth Hawkins,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October 13, 2014. 海明威和宝琳的次子帕特里克·海明威认为，父亲和小姨之间早期曾存在恋情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像这样美貌、亲密的姐妹，"想让男人娶了其中一个却对另一个没有意思，这太苛刻了"。Patrick Hemingway,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September 26, 2014.帕特里克还指出，即使开始的时候海明威和弗吉尼亚之间有点儿浪漫的情调，但是"那段感情是没有什么未来的"，因为弗吉尼亚很快表明自己是个同性恋——或者用霍金斯的话说，"喜欢和女人在一起"。

33. Loeb, *The Way It Was,* 249.

34. 虽然人们通常暗示杜芙·特怀斯登在男性追随者中鹤立鸡群，但是她的一位友人回忆，特怀斯登站起来时，身高大概是一米七左右。不过她修长的四肢确实吸人眼球：一位旅居法国的"富二代"南希·丘纳德（Nancy Cunard）曾形容她"*beaucoup de cran and beaucoup de branche*"[很有胆量，枝干（指四肢）也很长]。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44, 588. 不要把特怀斯登的发型和飞女郎的波波头搞混，她留的是伊顿式短发（Eton crop）——一种使人想起伊顿公学体育场中男孩的发型。那一年伊顿式短发成了最时髦的发型。Hamish Bowles,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April 16, 2015; and Valerie Steele,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March 6, 2014. 据说特怀斯登总是俏皮地戴着一顶男帽。她的一位倾慕者形容这种帽子是"介于巴斯克贝雷帽（Basque beret）和苏格兰圆扁帽（tam-o'-shanter）之间的样式"。James Charters, "Pat and Duff: Some Memories," *Connecticut Review* 3, no. 2 （1970）, reprinted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243. 在其他人的记忆中，特怀斯登更喜欢戴男式软呢帽。无论是"一顶男式毡帽还是一顶斗牛士帽，甚至可能是灯罩形帽子（lampshade）……她身上的那种潮流感使她无论戴什么都很时尚、高贵"，唐纳德·斯图尔特说。St. John, "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197.

35. Loeb, *The Way It Was,* 250. 在勒布的回忆录中，他给特怀斯登取了一个形同虚设的假名：杜芙·特威切尔夫人（Lady Duff Twitchell）。而她的情人帕特·格思里化名为"帕特·斯瓦齐"。

36. Loeb, The *Way It Was,* 250.

37. St. John, "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70-71.

38. 关于特怀斯登的个人卫生问题，卡洛斯·贝克引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W. B. 史密斯、约翰·罗杰夫妇（Mr. and Mrs. John Rogers）提供的证言。*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588.

39. 特怀斯登的羊毛衫行头在20年代中期被她的仰慕者们倍加推崇。那些年，女人穿羊毛衫是颇为新潮且备受争议的，接着羊毛衫被法国设计师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推广。时尚史学家瓦莱丽·斯蒂尔指出，"香奈尔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男士的穿衣风格"，20世

纪20年代以前，“毛衣仍然是男人的服装，而毛衫尤其如此”。在衣着上征用男性元素，这是一种性别越界的尝试。Valerie Steele,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March 6, 2014.

40. Morrill Cody, “*The Sun Also Rises* Revisited,” *Connecticut Review* 4, no. 2, 1971,reprinted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267.

41. Loeb, *The Way It Was*, 274.

42. “绿帽子”这一意象只在中文语境里有“妻子出轨”的含义，而在这本小说中，绿帽子是当时时尚的象征。——译者注

43. 南希·丘纳德的传记作者洛伊丝·戈登（Lois Gordon）主张，艾瑞斯·斯多姆的形象完全是以丘纳德为原型的。“阿伦仰慕她，对其他女人视而不见；她是他的女主角，他的女神。”洛伊丝说。Email from Lois Gordon to the author, April 4, 2014; and Lois Gordon,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April 25, 2014.

44. Mary Butts, journal entry, June 24, 1932, in *The Journals of Mary Butts*, ed.Nathalie Blonde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90.

45. Loeb, *The Way It Was*, 250-51.

46. Cody, “*The Sun Also Rises* Revisited,” 267.

47. 这是一句俚语，指男同性恋。——译者注

48. St. John, “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195.

49. 酒吧招待吉米·查特斯和两人走得很近，他认为特怀斯登和格思里的关系是“蒙帕纳斯区里最有名的浪漫恋情”。Charters, “Pat and Duff, Some Memories,” 246. 作家莫里尔·科迪说它是“神之间的浪漫，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愿意看到”。Cody, “*The Sun Also Rises* Revisited,” 267.

50. St. John, “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195.

51. Loeb, *The Way It Was*, 270. 吉米·查特斯常常在特怀斯登和格思里破产的时候出手相助。“帕特和杜芙要酒、要烟、要吃的，我从来无法拒绝，即使这让我很有压力，因为他们赊的账很大一部分是我自己掏腰包还上的。” Charters, “Pat and Duff, Some Memories,”244. 他声称格思里一度欠他8000法郎。但即使是查特斯也有耐心耗尽的时候，当他威胁不再赊账时，格思里就会往裤兜里装满卫生纸——这些纸摩擦起来“像5元纸币一样沙沙响”——然后说：“詹姆斯，我觉得自己富得可怕！”（“吉米”是“詹姆斯”的简称。——译者注）也许查特斯败给了他的魅力，但是格思里的房东却没有那么好骗：据说几年后，格思里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另一家酒吧的老板在自己店里给他腾了个地方住，枕头是一条面包。特怀斯登和格思里绝不是城里仅有的两个虚有其表的游手好闲者。查特斯指出，“丁戈酒吧9年之间给人赊下的账总计50万法郎，这还是严加管控之后的数目”，晚间乐队的经理“泽里”（Zelli）有“整整一抽屉的空头支票”。Charters, *This Must Be the Place*, 68, 13,24.

52. 彩条柱子即理发店前常有的标识。——译者注

53. Loeb, *The Way It Was*, 248, 253.

54. Ibid., 254.

55. 特怀斯登前夫的妹妹艾琳·特怀斯登（Aileen Twysden）告诉传记作者伯特兰·萨拉森（Bertram Sarason），杜芙·特怀斯登的父亲“在达林顿（Darlington）开酒铺”——这是达拉谟郡（Durham）的一个地方，后来她又改口说是在约克郡的里士满（Richmond,Yorkshire）。萨拉森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位里士满当地人记得曾有一户开酒铺的人家姓斯默思韦特（Smurthwaite）——这是杜芙·特怀斯登婚前的姓——但是萨拉森最终认定这条线索仅仅提供了一种可能，无法得出定论。Bertram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34.

56. Loeb, *The Way It Was*, 254.

57. 比亚里茨：法国西南部城市。——译者注

58. Ibid., 255.

59. Robert McAlmon to Norman Holmes Pearson, quoted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227.不少人声称自己介绍了海明威和特怀斯登认识，其中就包括作家迈克尔·阿伦。他的儿子描述了自己和父亲多年后在纽约21俱乐部遇见海明威的事。“我仍然欠你一笔人情债，迈克尔。”海明威说。什么人情债？阿伦的儿子问。阿伦回答：“在巴黎，有一年秋天，我把欧内斯特介绍给了一个和我同行的女孩，杜芙·特怀斯登。欧内斯特后来的那本书主要就是写她的。” Michael Arlen, *Exil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0）, 226.

60. Robert McAlmon to Norman Holmes Pearson, quoted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227.

61. Ernest Hemingway to Sherwood Anderson, May 23,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40.

62. Ernest Hemingway to Horace Liveright, March 31, 1925, reprinted ibid., 295.

63. Gilot and *Lake*, *Life with Picasso*, 73.

64. Ernest Hemingway to Horace Liveright, March 31,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295.

65. 麦克斯麦韦·柏金斯：全名麦克斯韦·埃瓦茨·柏金斯（Maxwell Ewoarts Perkins），有时也被人昵称为麦克斯。因为发现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和托马斯·沃尔夫，他常被尊为出版界的伯乐。他也是电影《天才捕手》的主人公。——译者注

66.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February 21, 1925,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67.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February 26, 1925,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68.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April 15, 1925,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69.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April 28, 1925,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70. 菲茨杰拉德并非唯一一个为自己签约的出版社搜寻人才的作家。出版社常常让自己的作者充任调查员，尤其当作者身在国外时，出版社会依赖他们探知前沿趋势。比如说，哈罗德·斯特恩斯和舍伍德·安德森都曾介绍过作者给利夫莱特。但是菲茨杰拉德显然是一位尤其热心的介绍人，他甚至想为演员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他后来因为在1939年的电影《乱世佳人》中饰演艾希礼·威尔克斯而闻名）铺路，好让他进入文学创作圈，同时告诉柏金斯，霍华德有“可观的创作天赋，目前正在着手尝试短篇小说”。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May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71. Groucho Marx, “My Poor Wife,” *Collier's*, December 20, 1930, reprinted in *The Essential Groucho Marx: Writings By, For, and About Groucho Marx, ed*. Stefan Kanfer （New York: Vintage, 2000）, 138.

72.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76. 菲茨杰拉德的外孙女埃莉诺·拉纳罕（Eleanor Lanahan）说，外祖父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冲动深根于他的“宽广包容之心，希望寻找到人中龙凤”（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September 15, 2014）。

73.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ca. October 10, 1924,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74.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ca. December 27, 1924,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75. Maxwell Perkins to F. Scott Fitzgerald, October 18, 1924,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76. Callaghan, *That Summer in Paris*, 31.

77. 由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改编的三部电影是《女伶情事》[*The Chorus Girl's Romance*，改编自《头与肩》（“Head and Shoulders”）]、《猎夫者》[*The Husband Hunter*，改编自《媳妇上门》[“Myra Meets His Family”）]、《近海海盗》（*The Offshore Pirate*，改编自同名短篇小说）。Matthew J. Bruccoli, Scottie Fitzgerald Smith, and Joan P. Kerr, eds., *The Romantic Egoists: Scott and Zelda Fitzgerald*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4）, 74. 《美与孽》1922年被华纳兄弟拍成电影。《人间天堂》卖出了影视改编权，但最后并没有被拍成电影。Ibid., 98.

78. MacLeish, *Reflections*, 60.

79. “Fitzgerald, Flappers and Fame: An Interview with F. Scott Fitzgerald,” *The Shadowland*

（January 1921）, reprinted in Bruccoli, Smith, and Kerr, *The Romantic Egoists*, 79.

80. F. Scott Fitzgerald, “Early Success,” quoted ibid., 76.

81.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47.

82. 原文如此。——译者注

83.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July 1922, quoted in Bruccoli, *Fitzgerald and Hemingway*, 10.

84.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波兰裔英国作家，著名小说家，其行文风格影响深远。从劳伦斯、福克纳、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到马尔克斯和鲁西迪，都受到了他叙事风格的影响。他最有名的长篇小说包括《黑暗的心》《吉姆爷》等。康拉德于1924年8月去世，没能看到1925年4月《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译者注

85.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May 1, 1925, reprinted in *F. Scott Fitzgerald: A Life in Letters*, ed. Matthew Bruccol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4）, 108.

86.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February 20,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87. Edmund Wilson, foreword to F. Scott Fitzgerald, *The Last Tycoon* （New York:Penguin Classics, 2010）, ix.

88. Flanner, introduction to *Paris Was Yesterday*, xviii.

89. Beach,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116.

90. Ibid., 116-17.

91. Ibid., 116.

92.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125.

93. 小弗洛伦兹·齐格菲尔德（Florenz Ziegfeld Jr.，1867—1932）：美国百老汇著名剧团经理。——译者注

94. Ibid., 126.

95. Ibid., 127.

96. F. Scott Fitzgerald to Edmund Wilson, May 1925, reprinted in Bruccoli, *F. Scott Fitzgerald: A Life in Letters*, 110. 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对于此事的记述可能是经过修饰的，甚至是由他编造的。海明威说自己首次遇见菲茨杰拉德时，菲茨杰拉德由朋友丹克·查普林陪伴，但查普林后来声称，自己1925年甚至没有去过巴黎，而且他也从来没有见过海明威。Bruccoli, *Fitzgerald and Hemingway*, 1. 莎拉·梅菲尔德（Sara Mayfield）是菲茨杰拉德当时的一个朋友，她回忆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会面其实是唐纳德·斯图尔特事先安排的。Sara Mayfield, *Exiles from Paradise: Zelda and Scott Fitzgerald*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71）, 105. 菲茨杰拉德的研究专家马修·布鲁克利（Matthew Bruccoli）

说，在《流动的盛宴》的原稿中发现了几种不同版本的有关此事的记述。在其中一个版本中，海明威和哈德莉正在丁戈吃饭时菲茨杰拉德出现了。另一版草稿中泽尔达·菲茨杰拉德也在，海明威觉得她本人看上去没有吸引力，不过当晚却做了关于她的春梦，第二天他把梦如实告诉了泽尔达。据说她听了以后很开心。Bruccoli, *Fitzgerald and Hemingway*, 23, footnote. 因为布鲁克利没有进一步提供他的资料来源，我们无从确认他引用的是什么材料。但是在保存有关草稿和零碎材料的约翰·肯尼迪图书馆的欧内斯特·海明威资料库中，和《流动的盛宴》有关的档案似乎并未显示这段故事有多种版本。瓦莱丽·海明威（海明威写作《流动的盛宴》期间的助手）表示她不记得有其他版本，不过她确实记得海明威后来讲过梦见泽尔达的事，并没有说这件事的具体时间（email to the author, September 21, 2014）。即使最终出版的《流动的盛宴》在真实性上疑问重重，但是经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同代人回忆，故事的部分情节确实是真实的，尤其是菲茨杰拉德探问海明威的性生活那部分。“司各特针对别人最隐私的感情问错误问题（实际上是正确的问题）的方式着实离谱——一般人都不会那么问。”唐纳德·斯图尔特回忆说（*By a Stroke of Luck!* 87）。而且，也没有人否认饮酒会暴露菲茨杰拉德最难看的一面。布鲁克利说：“酒精使他变得愚蠢、暴力、好斗而且幼稚。”（*Fitzgerald and Hemingway*, 12.）

97.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June 9,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48.

98.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131.

99. Ibid., 141. 菲茨杰拉德喝酒的时候无法保持泰然——或者干脆无法保持清醒的意识，这使海明威很震惊。“他视之为软弱，”瓦莱丽·海明威说，“欧内斯特讨厌软弱。”（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December 20, 2014.）

100. Sheila Graham, *College of One: The Story of How F. Scott Fitzgerald Educated the Woman He Loved* （Brooklyn: Melville House Publishing, 2013）, 178.

101. 原文为squaw，是美国人对印第安女性的蔑称。——译者注

102. Mayfield, *Exiles from Paradise*, 108.

103.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154.海明威对泽尔达的描绘至今困扰着她的后人。“这是人格诽谤。”菲茨杰拉德的外孙女埃莉诺·拉纳罕说（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September 15, 2014）。

104.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163.

105.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July 27, 1932, reprinted in Baker,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364-65.

106. Zelda Fitzgerald quoted in Matthew J. Bruccoli, *Scott and Ernest: The Authority of Failure and the Authority of Succ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21.

107. F. Scott Fitzgerald to Zelda Fitzgerald, summer 1931, reprinted in Bruccoli, *F.Scott Fitzgerald: A Life in Letters*, 187.

108.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76.

109. 菲茨杰拉德没有像海明威那样对斯泰因的艺术收藏品感兴趣，也不觉得斯泰因的作品有商业价值，但是他对斯泰因的文学理论很感兴趣。另一方面，斯泰因也很喜欢菲茨杰拉德，并记住了他——他会“始终被读者们铭记，而他同时代的著名作家们将会被遗忘”，斯泰因后来说。她还称赞了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人间天堂》“在公众中创造出了新的一代人”。（Stein,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218.）

110.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ca. May 22, 1925, reprinted in Bruccoli, *F.Scott Fitzgerald: A Life in Letters*, 113.

7
伊甸园的夏娃

6月中旬海明威静下心来开始写作。他拿出一个本来用作备忘录的速记本，本子后面有一些他“必须写的”[注]信件的大纲，收信人包括埃兹拉·庞德、西尔维娅·毕奇和“格蕾丝姨妈”（Aunt Grace）[注]，最后还列出了他最近投寄给各个刊物出版的短篇小说的标题。

这天，他打开小本，翻到新的一页，用铅笔潦草地在顶端写下：

随青春而去

一部小说

他开始写一个海上探险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18年一艘运送士兵的船上，主角是海明威短篇小说里经常出现的一个人物——尼克·亚当斯（Nick Adams）。小说开头是亚当斯和船上几位波兰军官的对话，背景中有人漫不经心地弹奏着曼陀铃。就在两个月前，海明威对柏金斯说，他觉得长篇小说是一种刻意且已经被穷尽了的文体，但他就这么开始了，再次尝试冲击一部长篇小说。结果这又是虚晃一枪，再无下文，草稿在第27页戛然而止。不过，海明威显然有意回到长篇的事业中去。

7月很快就要来了，对海明威来说，7月就等于西班牙，首先从潘普洛纳开始。他预订了车票和金塔纳旅馆（Hotel Quintana）的房间。这家旅馆坐落于潘普洛纳镇中心的主广场上，店主是狂热的斗牛爱好者华尼托·金塔纳（Juanito Quintana）。

海明威着手组织“节庆观光团”。他在给利夫莱特的信中说，他已经渐渐有了一些很不错的人选。唐纳德·斯图尔特将会重出江湖，并带上一位阿尔冈琴圆桌会的同志，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一位幽默作家——前一年冬天海明威一家在奥地利时，本奇利就在附近，这年夏天他来到欧洲，为《生活》（*Life*）杂志写一些报道。建筑师保罗·费舍尔也有兴趣前往。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并没有出现在早期的成员名单里，看上去不太可能出行：按照海明威对庞德所说，那年6月菲茨杰拉德处于一种“长醉不醒”的状态。㊟

这次，有一位潘普洛纳的常客显然被排除在了计划之外，他就是罗伯特·麦克阿尔蒙。一行人启程前不久，麦克阿尔蒙和凯蒂·坎奈尔一起吃晚餐，席间他们聊到了“海明威和他的马屁精们”——这是坎奈尔对“观光团”的称呼。他们决定吃完饭去海明威的“锯木厂老巢”一趟，看看旅行安排得怎么样了。

“我想看看我送给他们的那只小猫，所以我们就去了。”坎奈尔写道。

到了海明威的公寓，麦克阿尔蒙打算和他开个玩笑。

“我在考虑下周带凯蒂一起去潘普洛纳。”他面无表情地对海明威说。海明威的脸突然涨得紫红，怒不可遏。

“他朝我扑过来，抓住我肘边桌子上一盏点燃的油灯，扔出了窗外，砸在堆满木板和易燃物的院子里。”坎奈尔回忆说。㊟

两位客人赶忙离开。在后来的采访和记录中，他们两个都没有解释为什么海明威对这个玩笑的反应如此激烈。但扔油灯的事是真的，他对坎奈尔和麦克阿尔蒙的厌恶之情终于大白于天下，并且是恨得刻骨铭心。事后，坎奈尔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麦克阿尔蒙显然对这次拜访的结果很满意，他为自己遭到的冷遇向海明威复了仇。

哈罗德·勒布倒没有像坎奈尔和麦克阿尔蒙那样被冷落，有幸能一起去潘普洛纳。海明威寄给他一封友好的信，通篇叮嘱他旅行需要注意的事，还向他保证潘普洛纳“真他妈的好”[注]。不过勒布有个秘密没让海明威知道：他和杜芙·特怀斯登已经秘密地去了一趟圣让德吕。勒布后来说，这次旅程极尽风流。为了采摘结合的果实，他们甚至等不及抵达圣让德吕，在巴黎时就从一个朋友那里借了一间狭小的公寓。到达圣让德吕后，他们住进了一家可以看到比利牛斯山风景的小客栈，继续做在巴黎没有尽兴的事。

“我们疯狂地做爱，”勒布写道，“就好像想把一辈子的性事都塞进这短短的三天。”[注]

他们就生活在床和阳台之间，在阳台上吃饭、一直聊到深夜。聊到海明威时，特怀斯登出奇地缄默，这让勒布大失所望。

她只是简短地说：“海明威是个不错的人。”

勒布还想让她多挤出几句话。他说，在他看来，海明威精力旺盛，很懂得生活之乐，但是为了追求他所要的东西，他活得太辛苦了。

“喜欢就多努点儿力，这我毫无异议。”特怀斯登回答，并没有继续谈海明威。[注]

据勒布说，当他们的幽会接近尾声时，特怀斯登央求和他再出行一次——这回是去南美洲。（“我们能去吗，亲爱的？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切都是新的，不一样的。去过你想过的生活。搭艘船，说走就走，行吗？”[注]）但他推辞了：他不会西班牙语，智利下雨太少，等等。第二天，特怀斯登要勒布为她买一张回巴黎的火车票。格思里马上就要从伦敦回来了，她必须在巴黎火车站接他。

勒布也回到巴黎，白白错失了和特怀斯登幽会的机会，他懊恼不

已。三天后她寄来一封信，潦草地写在丁戈酒吧的信纸上。信里说，没有他，她生不如死，她“用全部的力量爱着他”。接着她话锋一转，说自己有一些“欣喜而顾虑的念头”。“我想和海姆还有你们这帮人同去潘普洛纳……当然，帕特也去，”她告诉他，“你能忍耐一下吗？”如果他接受不了，她可以答应不参与这次旅行——但是她确实想去想得要死。至少旅途中她能够和勒布一路相伴，尽管要忍受帕特·格思里嫉妒的眼光。注

接着，海明威的信来了，确认特怀斯登和格思里成了“节庆观光团”的成员。

“帕特寄信去苏格兰要鱼竿，杜芙寄信去英格兰要钱。”海明威在信中说。注

这是一封春风得意的信——海明威说了三次他最近真是“过得很快活”，但这让勒布有了一种“挥之不去的低落感”注。等他收到特怀斯登的下一封信，这种低落被一种真正的不祥之感取代了。

“我想我会花一点儿功夫把事情安排好，”她写道，“海姆保证他不会闹的，我们一定会玩得很开心。”注勒布彻底懵了——海明威保证他不会闹的，这是几个意思？他如今是不是也睡了杜芙？有可能。勒布得出了这个无情的结论。

特怀斯登和格思里起先是如何受邀参加潘普洛纳之行的，我们并不清楚。她从圣让德吕回来后，有可能就在和海明威约会了，他可能是那时邀请的她，她也可能是不请自来的。

无论如何，海明威听说了她和勒布私通的事。圣让德吕的秘密在左岸的“八卦论坛”里传开了。比尔·史密斯和海明威一个共同的朋友告诉了他们这个消息。据史密斯回忆，海明威勃然大怒。不只是勒布，左岸的每个人都开始怀疑海明威是不是已经和杜芙夫人睡过了——对于这个

问题，大家从未得到过心满意足的答案。[注]

即将到来的潘普洛纳之行越来越像一只即将点燃的火药桶，但是没有人退缩。海明威、勒布和特怀斯登都戴上了他们最和颜悦色的面具。

“无论如何一定要来。”勒布用含情脉脉的轻松口吻回复了特怀斯登。[注]他甚至请求先在圣让德吕与她和格思里见面，然后陪着他们去潘普洛纳。同时，海明威和哈德莉把邦比和他的保姆送去了布列塔尼，然后收拾行装离开巴黎，前往博古特，用一周的钓鳟鱼之行拉开了假期的大幕。

庆典就要开始了。

海明威和其他人已经对博古特向往好几个星期了。去年他发现它是一处未被污染的天堂，有起伏的丘峦、茂密的树林、波光粼粼的小溪和河流。受够了左岸城里人的戾气和勾心斗角，博古特是一剂再好不过的解药。唐纳德·斯图尔特和比尔·史密斯在那里和海明威会合。史密斯带上了一套五颜六色的钓饵，为了引诱伊拉蒂河里的鳟鱼乖乖上钩，真是煞费苦心。

可是，今年的伊拉蒂鳟鱼却无法上钩了：一年来所有的鱼都被杀光了。一家当地的木材公司毁掉了那里的水塘，拆毁大坝，在河上运送木材。看到这样的情景，海明威感到绝望。这对他们的远行来说不是一个吉利的开始。

同时，勒布没有去博古特，而是转赴圣让德吕，和特怀斯登、格思里碰头。看到杜芙夫人走下火车的那一刻，他便心生失望。她并没有戴寻常戴着的男士软呢帽，而是戴了一顶贝雷帽。[注]

“我不喜欢她戴贝雷帽，”勒布发过牢骚，“老海就总戴贝雷帽。”

对特怀斯登而言，帽子可能是一种煽风点火的工具，暗示着她乐于在情人之间制造一些摩擦。格思里也已经知道了勒布和特怀斯登的那点儿事；但和海明威不同，他不想权当这事不存在。

“喔，你来了，哈？”他和勒布打了招呼。[注]

三个人很快在火车站的酒吧中歇脚。几个星期之前，勒布和特怀斯登就是在这里见面的。三杯马天尼下肚，格思里起身去了厕所。勒布抓住机会审问了特怀斯登。她对他的态度变了，他说，发生了什么？

“帕特发现了，”她径直告诉了他，“他煞费了一番苦心。”

“我知道了。”勒布平静地说，这就是对话的全部。[注]

这里距离潘普洛纳还有50英里，三人租了一辆车。经过漫长、劳累的驾驶，他们到达了金塔纳旅馆。特怀斯登和格思里住一间房，勒布住另一间。博古特一行人第二天早上到达，带着同样紧张的气氛。钓鱼不成，海明威始终心情阴郁。

一轮苦艾酒，一顿丰盛的西班牙午餐，一次城中散步，气氛总算轻松了一些。但事实也很清楚，去年的激情应该不会重演了。潘普洛纳首先也不一样了。和巴黎的情况类似，潘普洛纳也挤满了游客，一行人常常惊恐地看到本国同胞的身影。

“我们不再是仅有的‘与会外宾’了，”斯图尔特观察到，“第二次到访的时候，大部队已经追上了前锋。”

搭载马德里和法国各界名流的劳斯莱斯，现在正闲置在他们入住的旅馆外。美国大使本人出现在一辆豪华轿车里，在海明威看来，他的出现尤其扎眼，最能标志一种转变的发生。小城突然让人感觉“杂乱而平庸”[注]，“潘普洛纳似乎正准备成为艾尔莎·麦克斯韦（Elsa Maxwell）的

玩物”[注]——她是那时一位最有名气的八卦专栏作家。

但事实证明杜芙夫人将会是最扎眼的闯入者。“有人忘记了锁门，结果夏娃走进了男人的伊甸园。”斯图尔特写道。转眼之间，只要她在场，“欧内斯特就变了，哈德莉也不一样了……乐趣正在从每个人身上溜走”[注]。

这种敌意显然是特别针对特怀斯登的。第一天上午，她戴着宽檐的西班牙帽子，显得冷艳非常。众人拥到小城的火车站，去看公牛装车的场面。无酒不尽兴，格思里在附近的酒馆里买到了一个羊皮酒袋，酒从他嘴里喷了出来，把他的脸和衬衫染成了血一样的深红色。每个人都笑了。特怀斯登也想多来几口。

勒布觉得论酒量，“杜芙肯定不会拖大家的后腿”[注]。

第二天早上，海明威“观光团”的每个人都踊跃起床，准时去看公牛从牛栏里被赶到场地中。和往年一样，一群人跌跌撞撞地跑在牛群前面。

牛群的声音如雷鸣一般震耳，犹如上帝亲自降临。牛群追得太紧，就有人翻出围栏去。有个人被尖刀般锋利的牛角顶到了。海明威一行人谁也没有加入奔牛团，但到了斗牛场上的互动环节，海明威、勒布和史密斯便跳入场中。[注]媒体团队就在旁边，他们闻风而动，摄影师端好了相机。

海明威当时穿着白裤子，头戴贝雷帽，一入场就吸引了公牛。一头牛撞翻了史密斯，然后转向勒布，后者这时已经脱下了汗衫，正朝公牛挥舞。牛冲了过去，但只用角剐走了汗衫。牛的脸被蒙住了，它冲到了场地的另一边。勒布追在后面，想把衣服拿回来，但发现它已被从中间撕开，只能当作他第一次斗牛冒险的纪念品了。

那天下午，真正的斗牛开始了。就在海明威一行人面前，一头公牛用角刺穿了一匹马。垂死挣扎时，那匹马跑遍了场地，踏着它流出的肠子。还有一回，一头牛想跳过场边的围墙逃跑。“可能是觉得它不该来这场聚会吧。”勒布不怀好意地冷嘲道。他越来越对这场传说中的盛会感到失望，甚至“想为那些不愿冲锋的公牛呐喊鼓励”，他回忆道，“整个场面，怎么讲呢，真的很尴尬”。

斗牛表演结束之后，海明威的“观光团”在一家咖啡馆的天台上会合了。周遭的节庆活动已经轰轰烈烈地闹开了。主广场上聚集了上千人，鼓手们拼了命一般地打鼓，横笛的声音大得几乎把人的耳膜撕裂。几支小游行队伍努力在人群中穿行。格思里喝够了葡萄酒，换上了苦艾酒，现在又在品尝芬达多——一种西班牙白兰地。海明威问勒布第一次斗牛感觉如何。勒布回答说他不是“特别热衷这种事”。可想而知，海明威不会赞赏这个答案。“我们最后都得死，”勒布对他说，“但是我不想一天之内被提醒上好几次。”(注)

“净扯淡。”海明威转身不再理他。看来勒布每天都能给海明威带来一点儿新的冒犯。对斗牛稍有不敬，就足以得罪海明威。唯一比这更严重的冒犯是抢海明威的风头。

后来，海明威、格思里和斯图尔特被卷入了一支没完没了绕着广场走的游行队伍里，勒布抓住机会开始盘问比尔·史密斯。

“老海怎么了？似乎很不爽的样子。”他借机问道。(注)

史密斯直接告诉了他：勒布和特怀斯登的几日风流，让海明威很恼火。“当乔·班奈特（Jo Benett）告诉他你和杜芙坐上了卧铺火车（wagon-lit）的时候，你真应该看看他的脸。”史密斯对勒布说——卧铺火车，就是那种包厢里有床位的火车。

当勒布追问史密斯，海明威是不是也和特怀斯登有私情时，他没有

直接回答。对话戛然而止，因为勒布注意到，坐在长桌另一头的特怀斯登和哈德莉已经陷入了沉默。勒布赶忙改变了话题。就算哈德莉确实听到了刚才那番话，印证了自己对丈夫和杜芙夫人私通的怀疑，她显然也只是把这些想法藏在了心里。

第二天上午，海明威、勒布和史密斯再次进入斗牛场，加入了业余斗牛士的队伍。为了避免衣物再遭不幸，勒布这回拿上了一条旅馆的毛巾。

这回当一头公牛向他冲来时，勒布没有机会躲开了。他丢下毛巾，当牛低下头准备将他挑起时，他瞅准时机一转身，抓住牛角，骑在了牛的头上。这头牛从场地的一边蹦到另一边，最终把勒布甩了出去。勒布奇迹般稳稳地双脚落地，好像在进行一段舞蹈特技表演。观众沸腾了，摄影师们捕捉到了他的光辉瞬间。

接着海明威溜到场边，从后面接近了一头牛。他捉住了它，然后成功地抓到两只牛角，把牛扳倒在地。其他的业余斗牛者也一拥而上。

“那一刻他们就好像要把这只动物五马分尸了。”勒布带着惊恐的语气记录道。但是斗牛场的管理员上去把牛救了下来。[注]

然而，即便海明威使出了赫拉克勒斯[注]的本事，勒布还是当天的斗牛之王。散场后，全城的人都把他当作英雄对待。即使是勒布常去刮脸的一家理发店，也不再收他的钱。[注]

显然，当地人最敬重的是第一个骑到牛头上的人（或者是第一个斗牛的外国人）。勒布的光辉事迹漂洋过海，被传回了美国：勒布扒在牛头上、双腿在空中叉开的照片，最终出现在了纽约媒体上。海明威被一个嘲笑过斗牛运动的人比下去了。

但是，这些英雄式的行为无法再将特怀斯登带回到他的床上。那天

午饭前，特怀斯登来到勒布的房间，说她非常抱歉让他受了很多委屈。为了她一切都值得，勒布说，并且想拥抱她，但又一次被她推开了。下午众人喝苦艾酒时，勒布问比尔·史密斯他是不是应该离开潘普洛纳了。

“干吗要压抑自己的决定呢？”史密斯的回答对他没有一点儿帮助。注

很多年以后，熟悉这件事情来龙去脉的人都在疑惑，勒布为什么还是留了下来？海明威很明显已经对他妒火中烧，特怀斯登是一个如此不可靠的盟友，而格思里可能也希望勒布永远消失。

“固执心让我留了下来。”勒布后来解释说。注格思里的仇恨只是坚定了他留下来的信心，而且他还想对海明威和特怀斯登的秘密刨根问底。他还解释说，如果此时他离开了，那就像是逃跑了一样。

那天晚上，他在广场某处堵下了特怀斯登，最终说服了她，她同意和他单独喝上一杯。他们离开人群，来到一家小咖啡馆，接着被拉去了一场小聚会中。聚会在一栋能俯瞰整个广场的大楼中举行，觥筹交错，一个戴单片眼镜、蓄着山羊胡的男人在钢琴上弹着流行乐曲。一群男人一如既往地围在特怀斯登周围，她用法语讲着斗牛的故事，以取悦她的追求者们，而勒布站在一扇窗边，一个人独酌到天荒地老。他曾试图把特怀斯登从节日欢庆中揪出来，但最后还是放弃了。第二天早上他在自己的床上醒来，完全不记得他是如何回到金塔纳旅馆的。

勒布跌跌撞撞地走出房间，和其他人一起吃午饭。格思里的脸色非常难看，史密斯的神情也是冷冷的，甚至哈德莉的脸上也没有了她善良的微笑。特怀斯登晚到了一会儿，这回她的佩饰不是贝雷帽或软呢帽，而是眼眶周围的青肿和额头上的擦伤。勒布想知道她是怎么弄的，但还没等她回答，就被海明威拦住了，说她是跌倒摔伤的。没有人再做更多解释，包括特怀斯登本人。勒布也没有再问。他又一次打算离开节庆活

动，但仍然害怕被视作懦夫。他没有离开。

一如平时，勒布记录道，“眼前是吃不完的午餐”[注]。

那个星期，在潘普洛纳最博人眼球、讨人欢喜是一个叫卡耶塔诺·奥多涅兹（Cayetano Ordóñez）的人，一位19岁的斗牛士，他让全西班牙的斗牛爱好者为之疯狂。

“他就像真诚与纯粹之灵本身披了件斗篷的样子。”海明威后来写道，并说他“看上去就像斗牛运动的救世主，几乎没有什么人能拯救斗牛运动了”[注]。

在某种奇特的意义上，此时奥多涅兹——他通常被叫作“帕尔马的尼诺”（Niño de la Palma）——和海明威算是同道中人。两个人都被视为有革命潜力的奇才，也许能为各自领域中古老的传统注入新活力，但是他们都还需要进一步证明自己。观众和评论家都盼望着奥多涅兹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斗牛士；但是，他仍然需要积累起一些足以服人的口碑，以显示自己属于大师之列。

在潘普洛纳那一周，奥多涅兹和著名斗牛士胡安·贝尔蒙特（Juan Belmonte）并肩作战。贝尔蒙特是斗牛界巨星，如今虽已英雄迟暮，但仍然有不少的观众。他和奥多涅兹是十分有趣的一对：奥多涅兹英俊得人见人爱，而据一位和贝尔蒙特同台竞技过的美国斗牛士巴纳比·康拉德（Barnaby Conrad）回忆，贝尔蒙特“十分矮小丑陋”，他下颚突出，说话口吃，但是他有自己的特别之处。“你会看到这个矮小的家伙走出去，驼着背，脚像崴了一样，”康拉德说，“然后他就像突然长高了十多厘米。”[注]

不过，一跃成为潘普洛纳万人空巷的瞩目焦点的，是奥多涅兹，而非贝尔蒙特。“贝尔蒙特能做到的，他都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海明

威在给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爱丽丝·托克拉斯的信里说，“每一个在西班牙的人都为他疯狂——当然，除了那些心里容不下他的人。”[注]

据说，节庆那一周，海明威下了很多功夫想结交奥多涅兹。[注]也许他得仰仗旅馆老板华尼托·金塔纳的引荐，因为海明威和后者已经很熟络了。“这个男人的学习速度之快，让我非常惊异，”后来金塔纳这样评价海明威，“他对于斗牛场中的赛况有非凡的眼力，一下就能反应过来。他离开西班牙的时候，对斗牛的了解不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差。”[注]

海明威的殷勤显然奏效了。在一场尤其精彩的斗牛比赛结束后，奥多涅兹获得了一只牛耳作为奖品，然后转手将它送给了哈德莉。“她用一条手帕把它包了起来，感谢上帝那是唐·斯图尔特的手帕。”海明威在给斯泰因的信中说。[注]不过，当奥多涅兹赞扬勒布在场上的表现时，海明威可能就没那么高兴了。勒布的“牛头大秀”当晚，奥多涅兹对海明威说：“人们会以为他为了这一刻专门练习过。”[注]

节庆的后期，奥多涅兹在场上的表现尤其好。在节庆倒数第二天的晚上，海明威向整个“观光团”宣布，奥多涅兹已经私下里向他保证，明天出场的公牛是全西班牙最好的。他们当时坐在广场上的一张咖啡桌前，刚吃过晚饭，在喝白兰地。根据勒布的回忆，海明威说完后转向了他：“我想你会更乐意他们运点儿山羊来吧。”

勒布差点当场发作。他回答说，自己不是不喜欢斗牛，只是觉得那些被杀的牛值得同情。

显然，紧张的情绪被压抑了一个星期后，海明威和格思里都想挑点儿事。格思里耻笑说：“我们多愁善感的老兄非常会体贴牛，但怎么不体贴一下我们的感情呢？”

“哈罗德很体贴，”海明威回应说，“你应该看看他和凯蒂在一起时的样子。我知道他每分每秒都特别珍惜。”

勒布仍然保持着镇定，但是气氛很快变得更加糟糕。海明威指责他毁掉了整场庆典的乐趣。有了海明威撑腰，格思里也立马应和道："你怎么还不走？我不想再在这儿看到你了，海姆也不想，谁都不想，只不过有些人顾及体面，没有明说。"

"我会走的，"勒布回答，"只要杜芙让我走。"

特怀斯登静静地转向他，说："你知道我不想让你走。"

这让海明威无法忍受了。"你这个无耻浑蛋，抱女人的大腿！"

勒布站起来，让海明威离席。海明威照做了。勒布威胁要和海明威找个黑灯瞎火的地方打一架——他看不到海明威的眼睛，也就无法预见海明威会不会出拳。也许更让他迷惑的是，为何如此之快，海明威就从一个亲密的朋友和同行变成了一个"出言不逊的仇敌"。

两个男人肩并肩地走着，穿过广场，进入一条黑暗的街。他们来到广场的边缘，没几步就走进了一条光线昏暗的小路。勒布脱下外套，把眼镜放进衣兜里。他环顾四周，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放衣服。

"我的眼镜，"他局促地对海明威说，"要是打坏了在这儿可没法修。"

让他惊讶的是，他抬起头时发现海明威在对他笑。这是一种小男孩一般的、感染人的笑——而且即使在那一刻，这笑也令勒布对他恨不起来。他甚至主动想接过勒布的外套，勒布也想帮他拿外套。他们之间的怒火突然一扫而空。接着，两个人松开紧握的拳头，穿上外套，穿过广场往回走。(注)

回到咖啡馆的时候，"观光团"剩下的成员继续喝着酒，就好像刚才的事没有发生。勒布和格思里互相当对方不存在。至于特怀斯登，勒布意识到，也许不值得因为她惹出这些敌意。突破某条界限之后，他突然

对她没有一点儿感情了。

此时的勒布心意已决。“杜芙，已经不再重要了。”

第二天早上，勒布收到海明威的一张便条。

“昨晚我太刻薄、太浑蛋了。”海明威写道。他希望两人能尽弃前嫌，还说他对自己昨天的所作所为，对自己昨天说的“不公平、没道理的屁话”感到无地自容。[注]

午饭时勒布出现了，并在饭后接受了海明威的道歉。勒布对他说，希望能像之前一样做朋友。

“但我知道我们回不到从前了。”勒布后来写道。[注]

任何方法——哪怕是做出一个真诚的道歉——都已无法抹去已经做出的事、已经说过的话。那一天，勒布可能认为他和海明威会就此分道扬镳。他怎么也想不到，海明威之后做的事，会使他们之间扯不断的联系维持终生，死后也无法摆脱。

好消息是，离开的时刻终于到了。随着大家一个个从金塔纳旅馆退房，剩下的就只有付不起房钱的特怀斯登和格思里了。可能是格思里最近一次回英格兰时没能筹够必要的资金，或者他们是在等别人买单。海明威对此十分气愤：特怀斯登和格思里这么做，是在他的朋友华尼托·金塔纳面前羞辱他。金塔纳已经把他俩视为酒鬼，在这栋为斗牛而造的伟大建筑里，特怀斯登和格思里是该遭天谴的存在。斯图尔特最后掏了钱，过了这最后一劫，他说，任何残存的“同志友谊都碎成了齑粉”[注]。

勒布、史密斯、特怀斯登和格思里租了一辆车同去圣让德吕。海明威和哈德莉准备去马德里。在所有人离开前，勒布注意到，海明威情绪

高涨得有些可疑，“热心得用力过猛”[注]。至此，庆祝活动结束了。

“结束的只是部分人的庆祝。”后来勒布闷闷不乐地回忆道。

唐纳德·斯图尔特启程前往昂蒂布[注]，到莎拉和杰拉德·墨菲在当地的庄园里恢复元气。他后来写到，在路上“我突然意识到，过去一周发生的事情，当作一部长篇小说的素材，也蛮有意思的”[注]。

他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

---

1. Ernest Hemingway, *Along with Youth* manuscript, item 239a,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2. “格蕾丝姨妈”应指海明威的母亲格蕾丝·海明威（Grace Hemingway）。——译者注
3. 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 ca. June 8-10,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46. 最终本奇利和费舍尔都没有去。“观光团”最终的成员有海明威、哈德莉、哈罗德·勒布、比尔·史密斯、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杜芙·特怀斯登和帕特·格思里。
4.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8-49.
5. Ernest Hemingway to Harold Loeb, June 21,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53.
6. *The Way It Was*, 276. 勒布的一个朋友后来回忆，勒布那个星期因“剧烈的牙痛”饱受折磨，这可能妨碍了他性事上的发挥，但是勒布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一点。Cody, “*The Sun Also Rises* Revisited,” 267.
7. Loeb, *The Way It Was*, 272.
8. Ibid., 275.
9. Ibid., 280-81.
10. Ernest Hemingway to Harold Loeb, June 21, 1925, paraphrased in Loeb, *The Way It Was*, 281, and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53.
11. Loeb, *The Way It Was*, 281.
12. Lady Duff Twysden to Harold Loeb, 1925, reprinted ibid., 282.
13. 接下来的这些年，海明威的很多同代人逐一加入了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海明威和

特怀斯登之间到底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哈德莉向传记作家们表示，她相信他们的关系一直是柏拉图式的。比尔·史密斯告诉一位传记作者，他感觉特怀斯登“为海明威痴狂”，但他不认为他们发生过性关系（quoted in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50）。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告诉另一位传记作者，两个人之间似乎确实有事，但他也不能确定（paraphrased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70）。特怀斯登的第三任丈夫克林顿·金（Clinton King）称，特怀斯登曾表示，海明威和她没有做过爱，她首先声明“海明威不是她喜欢的类型”，再说为了哈德莉和邦比她也不会这么做的（Clinton King to Bertram Sarason, quoted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42-43）。凯蒂·坎奈尔则笑称，这只是特怀斯登礼貌地稳住海明威而不激怒他的手段（Cannell to *Sarason, paraphrased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54）。海明威的朋友A. E. 霍奇纳强调，他们两人的恋情已接近圆满，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性关系（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December 11, 2013）。总之最后的结论是，用瓦莱丽·海明威的话说，“我们无从得知”（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December 20, 2013）。

14. Loeb, *The Way It Was*, 281.

15. Loeb, “Hemingway's Bitterness,” 120.

16. Loeb, *The Way It Was*, 283.

17. Ibid., 284.

18. St. John, “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191.

19.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44.

20. Ibid., 143-44.

21. Loeb, *The Way It Was*, 286.

22. 斯图尔特对去年肋骨骨折一事记忆犹新，所以没有跟着他们一起跳进场地；格思里也拒绝进场。“老帕特喝得太紧（醉）做不了那种事。”斯图尔特后来说。St. John, “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194.

23. Ibid.，290.

24. Ibid., 290, 291.

25. Ibid., 292.

26. 赫拉克勒斯：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英雄，力大无穷，完成了12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编者注

27. Ibid.

28. Ibid.，293.

29. Ibid.

30. Ibid.，294.

31. Hemingway, *Death in the Afternoon*, 88-89. 在《死在午后》一书中海明威还写到，他在一本书里尝试描写过“奥多涅兹的长相，以及他参加的几场斗牛活动”，这指的是他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把奥多涅兹塑造成了佩德罗·罗梅罗。在后来的一本书《危险的夏天》（*The Dangerous Summer*）中，他又提到自己为奥多涅兹“描绘了肖像”，并且“在《太阳照常升起》中讲述了他的斗牛故事”。Hemingway, *The Dangerous Summer*, 50.

32. Barnaby Conrad,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November 12, 2012.

33. Ernest Hemingway to Gertrude Stein and Alice B. Toklas, July 16,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60-61.

34. Reynolds, *Hemingway: The Paris Years*, 304.

35. Juanito Quintana, quoted in Michener, *Michener's Iberia*, 2:493.

36. Ernest Hemingway to Gertrude Stein and Alice B. Toklas, July 15,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60.

37. Loeb, “Hemingway's Bitterness,” 121.

38. Loeb, *The Way It Was*, 294-97.这并不是海明威唯一一次把人逼到动手的边缘，又在事态失控前唐突地把事情了结了。莫里·卡拉汉回顾了他和海明威在巴黎一次恶心至极的拳击比拼，海明威一再被莫里击中嘴部：“他的嘴流血不止。他大声地把所有的血都吮在嘴里……突然朝我喷了过来。一口血，喷到我脸上。我太震惊了，扔掉了拳击手套……我们就这样怒视着对方。‘斗牛士受伤的时候就会这么做，这是一种表示轻蔑的方式。’他一本正经地说……突然就笑了。显然他觉得我们友好依旧……但我一直纳闷，究竟有多阴暗的内心，才会做出这种野蛮的事？”不过，和勒布那回的情况一样，海明威成功维护了对方与他的友情。卡拉汉回忆，那天晚上他们俩坐在酒吧里，“我感觉和他更亲近了”（*That Summer in Paris,* 125-27）。

39. Ernest Hemingway to Harold Loeb, ca. July 12,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59-60.

40. Loeb, *The Way It Was,* 297.

41.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44.

42. Loeb, *The Way It Was,* 297-98.

43. 昂蒂布（Antibe）：法国港口城市。——译者注

44.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44.

8
制胜一击

就算唐纳德·斯图尔特曾严肃构思过该如何把潘普洛纳的惨剧写成文学作品，他也很快就忘记了。据他讲，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他只是待在里维埃拉的海滩上“使劲晒黑自己的皮肤”，同时思考着他最近发表的讽刺小说的续篇。

“《哈道克夫妇在国外》（*The Haddocks Abroad*）的成功，召唤着一本续作，叫作‘哈道克夫妇在法国巴黎’。”斯图尔特回忆。这显然意味着他那本“潘普洛纳小说”的未来到此为止了。[注]

但是对海明威来说，上周的事情确是千金难买，这就是他期盼已久的天赐良机。

“就让压力一点点积聚，”他曾对自己说，“这部长篇，当我必须要写的时候，它就成了当务之急，没有别的选择。”

现在，他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周围挤压着他的力量积累到了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所有那些穷困引起的哀愁，被遗忘、被超越的恐惧，令人窒息的作家圈——正在这时，救星杜芙·特怀斯登来了。她到达金塔纳旅馆的那一刻，海明威需要的一切都齐了。之前在巴黎，人们就猜想她有一天会成为搭起一部长篇小说的好砖。直到海明威见证了她加入节庆——她化身一位阿卡迪亚[注]的耶洗别，像玩牵线木偶一样操纵着她的所有追求者——他意识到自己终于找到了谜底。在海明威心中，一个故事开始成形，这是一则紧凑、尖酸的故事。突然之间，节日庆典

上的每一次对抗、冒犯、宿醉，两性之间的紧张与疲惫，点点滴滴，都染上了文学价值。小说几乎要自己涌出笔尖了。[注]

奔牛节之后，海明威和哈德莉坐火车去了马德里，在那里又观看了卡耶塔诺·奥多涅兹的斗牛表演。去马德里的路上，他们和几位牧师、国民警卫[注]喝酒聊天；但是也有可能，海明威在向南疾驰的火车上忙着记录奔牛节的事。[注]他一开始编排潘普洛纳的故事就停不下来。夫妻俩住进了马德里的阿圭勒膳食公寓（Pensión Aguilar），海明威每天上午都在旅馆里疯狂地写作。到了下午，他就和哈德莉一起去看斗牛。第二天早上再重复这样的作息。写出一段话不再需要半天的时间。即使他在这段日子里发了一场烧，疑似得了一次痢疾，也挡不住他的冲劲。

奔牛节“观光团”解散后一周，海明威在给比尔·史密斯的信中提到自己“一直在走火入魔一样地干活”[注]。在紧接着的一封信中，他告诉史密斯，从离开潘普洛纳时算起，他每天大概能写1200个词。

“有些好得很！”他还说。[注]

此时海明威仍然把他的新作称为“故事”[注]，并且没有向史密斯透露它的内容，不过他也曾暗示，故事是建立在真实事件上的，会有一些从真实生活中借鉴来的人物。他对史密斯说，他“从这次旅行中收获了一些非常棒的东西”。

不过到了8月初，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自己要加入“长篇小说俱乐部”了。西尔维娅·毕奇第一个得知了这一消息。

“我已经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前六个章节，目前进行得很顺利。”海明威在给她的信中说。[注]

此时，海明威和哈德莉已经身在巴伦西亚，他们看了17场斗牛，而海明威写出了15000词的草稿。他写了33张活页纸，流畅、稳健、不假

思索的笔迹，显露出故事宣泄而出时的那种紧迫感。[注]

目前，海明威的故事基本上只是刚刚发生在潘普洛纳的对话和事件的摘录——其中有他和金塔纳、奥多涅兹的对话，有他对美国大使的反感，有特怀斯登和勒布的私通："勒布爱上了特怀斯登，帕特远在苏格兰时，她和勒布上了床，并将此事告诉了帕特。好像并没有什么要紧，不过帕特每次喝醉总是重提此事。她以前也和别的男人睡过，但他们和哈罗德不是一类人，事后也不再有什么交往。"[注]

稿子里也写到了勒布和格思里之间的摊牌：

> 帕特站不稳当。"……你不受欢迎，勒布，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走远点儿……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滚吧。别摆出那副犹太臭脸。你没意识到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吗？"
>
> 勒布只是坐着……透过眼镜片的目光十分凝重。他，和一个有贵族头衔的女人私通了。
>
> "我不会走的，帕特。"勒布说。[注]

至于自己和勒布打架的事，海明威草稿中的情节和现实中发生的一样：这场较量在双方出手前的最后一刻被制止了。

这一稿中，所有潘普洛纳"观光团"的成员都本色出演。帕特被描绘成一个好斗的酒鬼，不断对卡耶塔诺·奥多涅兹念叨着"公牛都是没种的"[注]。[注]唐纳德活像随队的小丑，不断叫当地的鞋童来给帕特擦鞋。杜芙只用她的目光，就把帅气的奥多涅兹挑逗得欲火难忍，主动宽衣解带；她可能给年轻的斗牛士带去了堕落，还有她引人堕落的一般潜质，这几乎给了小说的情节无限的潜力。

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海明威写道："我不会评判潘普洛纳的这些人。"

[注]但是作为作者的海明威却把每个人都赫然陈列于纸上，让后世的一代代读者去评判。

没过多久他便将这份活页稿丢在一边，不过其中的大部分素材最后都移植到了正式成稿中。海明威的思路从最开始就惊人地清晰。在稿子中，他操纵那套“雅俗共赏的句式”时也已经轻车熟路——同年春天他向利夫莱特描述过的一切，如今已完全实现。正如之前那本《在我们的时代》，这则潘普洛纳记事新作也准备了一些所有读者都能欣赏的东西：其紧凑、新颖的行文，会挑起文人雅客的兴致，而其简洁的语言风格，则可以被主流读者接受。如果这种欺骗性的简洁不起作用，这个故事也能够被简单视为一部“用假名写真事”的纪实小说，透视那个充斥着财富和野心的世界，描绘其代表人物的放荡丑闻。

“这里面有关于上流社会的很多内情，这些总是很有意思。”海明威讽刺地写道，但这句话后来被从稿子里删掉了。[注]

在巴伦西亚，海明威放弃了活页纸，余下的故事写在了一本法国学生用的笔记本[注]上，本子不大，是沙黄色的，最后一共写了7本。封皮上海明威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巴黎的住址，可能是受到了“火车大盗案”的影响。他可不想再牺牲一部初生的长篇小说。

在第一本笔记本上，他把新小说的背景移到了巴黎。小说最终会引出奔牛节上刚刚发生的一切，但他写道：“要理解潘普洛纳发生的事，你必须先了解巴黎那群人。”[注]接下来，他毫无保留地描绘了一幅巴黎市景，不禁让人想起早先在《多伦多星报》当记者的海明威，以及他那些鄙夷地描绘蒙帕纳斯的报道。

“这个阶层中没有丝毫浪漫，也没有多少美丽。”[注]他写道。每个人都憎恨着余下的人，作家、批评家、画家，无不如此。这是个冷酷的地方，消磨人的地方，随处可见“相公”和把堕胎当儿戏的女人[注]。这个世

界中唯一快乐的居民就是酒鬼，但即使是他们也无不被阴郁的气氛压抑着。堕落的旅居者挤满了左岸，海明威给出了具体的典型——只要是在多摩或者丁戈招惹过海明威的人，都逃不了被写进小说的命运。草稿处处都是对一方万象毫不客气的揭露：一个从前的夜店舞女，成了圈子里一家咖啡馆的守护神（这说的当然是弗洛西·马丁）；一位异常活跃的希腊小个子画家齐齐（Zizi，现实生活中他叫“密齐”，据酒吧伙计吉米·查特斯说，他是“蒙帕纳斯全盛时期最有名的人”注），自封为公爵；一位不修边幅、嗜酒如命的过气学者，迈着醉步徘徊在街区几家著名酒吧之间，路边塞过来的小广告他都拿在手里（任何住在蒙帕纳斯的人都会一眼认出，这是旅居作家哈罗德·斯特恩斯）。海明威似乎决意要把长篇小说处女作写成一本左岸名人录。

在这个布景中，海明威放置了已经在活页纸序篇里被试写过的主要人物：杜芙、帕特和勒布。唐纳德·斯图尔特和比尔·史密斯将被合并成一个人物——比尔·戈顿。在活页纸版的潘普洛纳记事里，海明威把叙述者称作“海姆”；而在笔记本中的这一版里，他就成了“杰克·巴恩斯”。注

初看上去，杰克和海明威有很多相似之处。杰克是一位年轻的美国驻巴黎记者，交际面广，爱好斗牛。这位小说人物苦笑着说，他和很多新闻记者一样，早就希望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而如今他正在写，“这本书会有那种类似‘实地报道’的糟糕品质，媒体人开始写书时，都会受此影响”注。

不过，为了创造这个人物，海明威也需要跳出个人经历。他从《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的出版商比尔·伯德的履历上借来了一段，让杰克成了一家电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注杰克不像海明威那样受妻儿之累。哈德莉在活页稿上简短地出现过，但没再被带进棕色笔记本中。（真实的哈德莉似乎并不介意自己被从作品中抹去，她后来说，她觉得完成后的作品“棒极了”，她感到“开心”注。）杰克将是自由身，唯一的

束缚是他对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女性的向往。

当其他主要人物登场时，我们可以发现海明威偷偷积累了这些人物原型多少的信息。据说他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自己“讨厌报纸的工作”，因为他“太害羞，不愿意打探人们的私人生活”[注]；不过，海明威虽然反感自己的职业，关于小说的几位“受害人”，他却掌握着详尽深入的情报。“想好好修理他们一下，你必须先有他们的料。”他私下对庞德说。[注]所有积攒起来的“料”，尤其是关于勒布和特怀斯登的，现在都有了用武之地。真实生活的细节，他没有因为太过赤裸，就不往笔记本上写。

“当你写作关于真人的故事时，”海明威对一位编辑朋友说，“你应该编排好这些人除了电话、地址之外的所有细节。”[注]

小说以一段关于女主角的长篇介绍开场。海明威最终把这个人物称为“波莱特·阿施利夫人”[注]，但在小说的第一稿中，杜芙通篇都是以真名出现的。对她的塑造不是很顺利，尤其是在最开始的几段里。

海明威在开篇写道，“杜芙曾经也是个人物”，然后又画掉了这句话，再次尝试开篇：“杜芙从前有两下子。”但在如今的版本里，她是“蒙帕纳斯典型的酒鬼，除了给祈求为她画像的人摆摆姿势，让他们巴结巴结外，什么事都不做”。为了不让人产生错觉，以为她仍然很抢手，海明威把这些画家都归为无名之辈：到了34岁这个年纪，已不再有一流的艺术家去敲她的门。[注]

说到这个人物的过去，海明威几乎照搬了现实生活中杜芙夫人风流不羁的履历。海明威笔下的杜芙已经离过一次婚，第一任丈夫发现“他自己的那点儿东西供养不起她”[注]，如今她离开了英格兰，在巴黎游荡，正等着和第二任丈夫离婚。这第二任丈夫是一位第九代准男爵，给了她贵族头衔——和现实世界中的第十代准男爵罗杰·特怀斯登相差无

儿。和现实中一样，夫妇俩育有一子，小说中的杜芙弃儿子不管，和一个叫帕特的人优哉游哉地来到了欧洲大陆。

不过这个人物也有一些优点，挽回了一点儿形象：小说早期版本中的杜芙，“血统纯正，慷慨，说话总是精彩犀利”[注]——这大概很符合人物原型语言机敏、体型优美灵活的特点。之后海明威会进一步修改这些描写：“波莱特可真他妈好看。她穿着一件紧身运动套衫和一条苏格兰粗呢裙子，头发像男孩子那样朝后梳。是她发明了这种装扮。她的身材曲线如同赛艇的船身那样优美流畅，那件羊毛衫让她的曲线暴露无遗。”[注]

不管怎么说，现实中的杜芙在海明威这里得到了一点儿提升：虽然海明威笔下的杜芙（波莱特夫人）和她的原型衣着风格类似，但现实中杜芙·特怀斯登的套衫和短发只是那时的潮流，这种装扮不是她起的头，而且她也并不十分放荡。不过在区区49个单词中，海明威把杜芙塑造成了一个先锋的，亚马孙女战士一般强势的人物，一个女人看了希望模仿、男人看了会燃起欲望的人。[注]

接下来是帕特·格思里。在海明威的“笔记本版”小说中，他是一个懦弱的破产者，一个总惹人尴尬的酒鬼。除却这些冒犯，海明威还把他写成了一个同性恋：“他有一些习惯让杜芙很感难堪，她觉得一个男人不应该是这样的，想时时盯着他，用她彼时还很坚定的意志把他掰回来。”[注]

海明威笔下的帕特和现实中的帕特·格思里一样，依赖一笔从海峡对岸断断续续汇来的钱维持生活。小说中，他和杜芙白天几乎都窝在床上，夜里则在酒馆和聚会上通宵喝酒。小说中的杜芙喝得太醉时，会依次失去视觉、表达和听觉能力。而帕特呢，海明威写到，在这种场合他会做出一些让人讨厌的行为。即便如此，他仍是“一位魅力非凡的同伴……是那些最最迷人者中的一位”。最终海明威把这个角色命名为“迈

克·坎贝尔”。[注]

勒布和别人不同，他在早期手稿中就得到了一个假名——“杰拉德·科恩”[注]，最后被改成了“罗伯特·科恩”。

勒布遭受了和特怀斯登相同的待遇，海明威深挖了勒布的家世背景，将之完完整整地摆在纸面上。“杰拉德·科恩，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东部犹太家族中最富有的一支，从母亲那里加入了最古老的一个。”他写道。科恩碰巧和勒布一样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反犹的同学们让他吃尽了苦头，于是他开始练习拳击，想给诋毁他的人多少还以颜色。

在海明威的小说第一稿中，科恩的拳击教练斯拜得·凯利（Spider Kelly）说：“这个犹太兔崽子多么讨厌打架呀，真是位仁慈的拳击手。”[注]这句话后来被删掉了。

现实世界中，勒布在普林斯顿大学练的是摔跤，而非拳击，但海明威的故事和真实情况相差无几：科恩和勒布一样从父亲那里得到了5万美元，抛弃了妻子和家庭，创立了一份文学杂志。不过海明威小说中的《扫帚》并没有反映出该杂志实际上的复杂特质，也没有提及那些给《扫帚》投稿的高端作者。科恩被描写成一个在文学界无足轻重的闯入者，缺乏经营文学杂志的资质。科恩的杂志和《扫帚》一样，创刊不久就垮了。

勒布和凯蒂·坎奈尔吵吵闹闹、分分合合的爱情要是不写进小说就太浪费了。坎奈尔作为“弗朗西斯·克莱恩”[注]，被化上了一层有点儿泼妇气质的文学妆，成了一个“不说闲话就不能活”[注]的女人，死死缠着她那个三心二意的情人科恩。“围绕着她的，是流产、猜忌……肮脏的流言，更肮脏的记者，和无比肮脏的怀疑。”弗朗西斯·克莱恩和杜芙一样是大龄女士——这显然意味着她正徘徊在绝望边缘。克莱恩和她的原型

凯蒂都是巴黎的游荡者，等待着离婚，同时千方百计想套住科恩/勒布作丈夫。但是，克莱恩又每每用醋意满满的絮叨和诘问羞辱科恩，强压他的男人气概——有一次就当着杰克的面。（“为什么他还能安坐在这儿？”杰克纳闷，“为什么他一直那样忍着？”[注]）这样的人物描写绝对能在蒙帕纳斯的八卦界产生热烈回应。

勒布和坎奈尔之间的事情被原原本本地搬进了小说里：科恩甩了克莱恩，爱上了小说里的杜芙·特怀斯登。在海明威的手稿中，科恩也和杜芙/波莱特私奔了，不过他们去的地方不是圣让德吕，而是圣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án）。这件事使科恩和杰克之间起了隔阂，因为杰克也爱着杜芙。不过，对杰克和杜芙来说，在海滨小村来一段狂热的性爱假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这不是因为杜芙对他没有欲望——在海明威重新构想的整个事件进程中，她不仅有欲望，而且是难以遏制的欲望——而是因为杰克在世界大战中受了伤，没有了能力。

小说很巧妙地设置了一位男性叙事者，对海明威来说这样的设定尤其巧妙——怂恿朋友和同仁跳进斗牛场、拳击场互相残杀，和在小说世界里旁观他们勾心斗角，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海明威并没有真正使用“性无能”（impotent）一词，直到情节发展得相当深入时，这个词才在相隔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两次，仅此两次，也都不是直接指向杰克的。杰克的状况大部分要靠读者推测，海明威在对话和人物的内心独白中给出了一些暗示。

“唉，这是种让人腐烂的伤。”杰克一度默想道。他从黑色幽默中寻找安慰，机智而又落寞地回想起他在医院的时候，一位满心同情的上校联络官去探望他，对他讲了一番话：“你，一个外国人……做出了比牺牲生命更大的贡献。”[注]

这一构思完美示范了海明威的“冰山式”省略法。多年后他谈到了杰克的伤具体是什么。“我负伤后在意大利的医院里产生了这一想法，”20

世纪50年代中期，他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也是小腹受了伤，肚子肿得像足球那么大……但显然我没有像杰克·巴恩斯那样失去性能力。我被抬进了所谓的泌尿生殖病房，里面有很多人都是腹股沟附近受了伤，伤情很严重。”[注]海明威还曾告诉过一个朋友，他是被弹片划伤了阴囊，但病房里其他一些“可怜的小崽子”，一整套东西都被炸没了。[注]

在另一次采访中海明威说，他必须让读者意识到杰克的睾丸是完好无伤的，并且他“可以感觉到男人所有的正常感受，但是无法释放它们”[注]。海明威用简洁、反复的意识流心理描写，刻画了杰克对杜芙夫人/波莱特夫人的欲望煎熬。这样的手法会让格特鲁德·斯泰因深感欣慰：

> 嗯，说得可真好——不要去想它。哦，好一番大道理。今后就试试看吧。试试看吧。
>
> 我睡不着，只顾躺着琢磨，心意四处跳跃。我控制不住，开始想起波莱特来，于是其他所有的念头都消逝了。我想着波莱特，思绪不再跳跃，好像开始顺着柔波浮游。突然我哭了起来。[注]

一些学者和海明威的友人猜想，也许真实世界中的杜芙·特怀斯登拒绝和海明威上床，海明威把他的挫败转化为纸上的另一种挫败。无论动机究竟如何，杰克的战争创伤既贬损了他，同时也升华了他，使他成了一个完美的观察者。他是一行主要角色中唯一一个不会行为不轨的人——至少从肉体层面上来说是这样的。

海明威后来决定不把这一主题看得那么庄严。“相比战争、爱或者传统的人生挣扎（lucha por la vida），性无能并不是什么有意思的主题。”一年后他在给麦克斯韦·柏金斯的信中写道。[注]

但是杰克的性无能明显意味着海明威已做好了承担一切风险的准备——甚至是牺牲他个人尊严的风险，因为他本人在战时负伤的往事已经

尽人皆知，所以当然会有人怀疑他和杰克有着同样的伤情。虽然他一贯享有近乎带有侵略性的男性形象（事实很快证明这是有理可依的），但如果于艺术有益，他仍会不假思索地挑战这一形象。

在结束巴黎的序幕、揭开西班牙的新章节之前，海明威也给“这伙人”里的其他名人分配了几个小角色。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以“布雷多克斯”（Braddocks）的名字进入了小说（修改自最初的假名“Bradox”，这可能是海明威使用的最暴露的假名了[注]），他沉重的鼻息、难看的坏牙、红彤彤的脸、海象胡子，活像一个小丑却常常炫耀自己的成功，全在故事里表露无遗。在第一稿里，布雷多克斯对咖啡馆里的一位伙计呼来喝去，并当着杰克和一个“名叫多斯·帕索斯的朋友”的面，说起了另一个人的坏话。[注]布雷多克斯后来再次出现在手稿中，这次是与他和善又倔脾气的夫人在一起。他夫人说法语时特别有激情，“有可能她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注]。和现实世界中的福特夫妇一样，布雷多克斯夫妇晚上也会在舞厅办聚会，旅居者们趋之若鹜。最终出版的小说对福特的刻画相对中规中矩一些，很多贬低其长相的描写都被删掉了，但海明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把这些删掉的材料用在了好多本书里。

在第一稿中，埃兹拉·庞德和西尔维娅·毕奇暂时逃过了一劫，格特鲁德·斯泰因也只被简单提及，罗伯特·麦克阿尔蒙被完全忽视，但海明威可能认为缺席是比成为一个不被恭维的小角色更严厉的惩罚。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名字被杰克·巴恩斯提及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但前者并没有成为书中一个角色。[注]不过，海明威似乎想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拿出一个人物——爱打马球、爱沾花惹草的汤姆·布坎南[注]——作为杜芙夫人/波莱特夫人曾经的一个情人。手稿里杜芙夫人/波莱特夫人和帕特/迈克闲聊时，说到杜芙曾经征服的男人，其中有个人让人感觉似曾相识：

“杜芙见识过多少男人，但他们没有一个是犹太人，后来也没

有再回来紧追不放。”（迈克说。）

“都是好得很的小伙子，”杜芙说，“你还记得汤姆吗？”

“一个美国人，”迈克说，“你知道吧？打马球的伙计。”(注)

这段话后来被删掉了。不过即使没有了这处引用，菲茨杰拉德很快也会以更显著的方式在小说中留下印记。

离开潘普洛纳后，海明威夫妇从马德里前往巴伦西亚，又回到马德里，然后去了圣塞瓦斯蒂安。最后他们来到昂代伊，这是巴斯克地区的一个法国港口小镇，位于圣让德吕西南方向的不远处。到达那里时，海明威的新书已经写了十多章。

“一本长篇小说该有多长？”他写信问一个朋友。他手边的唯一一本书《战争与和平》，有令人望而却步的1563页。相比之下，过去两周海明威只堆叠出了200多页——但它的分量一定不亏，他说。(注)

几天之后，他把写小说的事告诉了埃兹拉·庞德，但又请求后者：“看在基督的面子上，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注)这话的真实意思可能是：“请你给能见到的人都宣传一下。”海明威自己正是这么做的。如今两块大陆上的文人屏息凝神，准备迎接欧内斯特·海明威即将到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不过8月，书中所有人物的原型就可能都知道海明威要有所行动了：从潘普洛纳归来后一封较早寄出的信中，海明威托比尔·史密斯向哈罗德·勒布和唐纳德·斯图尔特问好，随问候送去的总会有些新消息——自从他们分别后，海明威就在发疯一般地创作一本神秘新书。不久，他又告诉史密斯，“故事像野火一般蔓延”，他不停地写作，即使有段时间肠胃有些不舒服。(注)

8月中旬，他把写作长篇小说的事告诉了《多伦多星报》的前同事莫里·卡拉汉，保证它“应该是好极了”㊟。那时候小说已经完成了一半多，那些小笔记本上已经密密麻麻写了4万多字，但海明威丝毫没有慢下来的意思。他兴奋地对一位编辑欧内斯特·沃尔什（Ernest Walsh）讲，这本书里有太多见不得光的事，可能“发布当天就会被抵制”㊟。很快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爱丽丝·托克拉斯也被拉了进来。海明威告诉两位女士，他并没有特别拼，也就是有时会熬到天亮而已。即使筋疲力尽，他常常还是睡不着，总会爬起来继续写。

最自以为是的信大概是寄给《小评论》副主编简·西普（Jane Heap）的那封。“小说优秀得难以置信”，海明威强调，并说它笔风历练，饱含动感㊟。“我想它会是决胜的一招，那些杂种评论我时不是常说‘是啊，他能写点儿优美的小段子’吗？让他们看看自己是多么有眼无珠。”

他毫无顾忌地宣称，自己躲过了很多小说新手常常会落入的陷阱：把小说写成自传。此外，以后不会再有批评家拿他类比他人了。还有，这本书也是幽默的。美国作家写出过多少逗笑的东西？拿舍伍德·安德森来说，他是一个幽默的人，但是一到纸面上，他的幽默感就干涸了。

“准备好迎接这本书吧。”海明威写道。㊟

海明威知道这本书会成为抢手货，所以绝不贱卖。海明威对西普说，自己一直是“为了纯粹的热爱”工作的，还没有做好谈生意的准备。如果不预付1000美金㊟，哪家出版社也别想碰这本书：“我知道自己手中这件东西的价值，我不会将它拱手相让。”海明威的理论是，出版社买一本书时掏的钱越多，就越有动力推广它。

几周后，海明威写信告诉母亲，小说有了一个新名字——《节庆》

（Fiesta）——但他仍然没有拿定主意。他还提到，有人愿意预支1000美元买下这本新作——不是利夫莱特，而是另外一家出版社。“当然，我还是会遵守合同条款的。”他说。[注]

海明威这段时期的其他信件，都未能证实他真的收到了这样的报价。但是在他心里，手稿虽然没有完成，未经编辑，却已经把他带到了一个拍卖场上，里面如饥似渴的竞拍者在疯狂叫价。

海明威原本打算一直待在昂代伊把书写完，不过他最后在1925年8月18日回到了巴黎。即使在这座熙熙攘攘的城市，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从小说上分心。他仅仅写了一个月，就已经接近收尾阶段了。

“我只想现在就了结它，然后抛开不管，之后再回过头重新读一遍。”他在信中对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爱丽丝·托克拉斯说。[注]

海明威身在巴黎，心却还在西班牙，和杜芙·特怀斯登以及其他的潘普洛纳友人在一起。小说已经有了主干，从此时直到出版，没有再经受实质性的改动。现在的这本书，记录了几位旅居者的生活，他们在巴黎相遇，然后为了参加潘普洛纳的圣佛明奔牛节，踏上了一场暗流涌动的观光之旅。无尽的纵酒、斗牛以及围绕杜芙夫人/波莱特夫人的争风吃醋，在这样的背景中，“观光团”成员之间很快一改开始时的恭敬客气，互相辱骂、嫉妒、大打出手，一发不可收拾。

去潘普洛纳的路上，书中有些人物还在博古特和伊拉蒂河稍作停留——那年夏天，这个地方曾让海明威大失所望。也许真正的伊拉蒂河因为伐木公司的“入侵”而风光不再，但是海明威在小说中把它变回了1924年那个田园牧歌般的想象王国，那片他和唐纳德·斯图尔特、比尔·伯德、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前往朝圣过的净土。这是海明威写给博古特的一封情书，一首未遭污染的田园诗，与书中左岸居民之间的复杂纠葛形成了鲜明对比。[注]这也是给塞尚的一封情书，在斯泰因家的客厅和巴黎的卢森堡博物馆，海明威都曾瞻仰过他的画作。“我们走在这些粗大的

老山毛榉之间，阳光穿过枝叶星星点点洒在草地上。树枝粗壮，树荫浓密，但林子里并不幽暗。这里没有灌木丛，只有青翠欲滴的平坦草地；灰色的大树排列整齐，像公园里那样。”[注]

正如塞尚用宽大、厚实的笔法描绘树木茂盛的景色，海明威也用文字做了同样的事。小说展示了三年来他师承和自学的所有技巧。

对博古特的描写也给了比尔·史密斯抛头露面的机会。在书中稍早的巴黎情节中，海明威引入了一个人物“比尔·戈顿”，他是比尔·史密斯和唐纳德·斯图尔特的混合体。开始的时候戈顿更像斯图尔特，应该是一位著有一系列畅销书的小说家。但随着情节的发展，他有了更多史密斯的特点，尤其是后者那种特有的机智。比如在博古特的一幕场景中，戈顿和杰克一边钓鱼一边分享冰啤酒和冷烧鸡野餐，戈顿的一小段古怪独白就像牧师布道：“比尔一手拿着鸡腿，一手拿着酒瓶，比画着。‘为上帝的赐福而欣喜吧。让我们享用天空中的飞禽。让我们享用葡萄园的佳酿。你要享用一点儿吗，兄弟？’”[注]接着，他和杰克“享用”了好多他们专程带到河边的葡萄酒。“享用”这一说法是海明威直接从史密斯口中借来的，和海明威去博古特时，他一路上都在玩味这个词。

“我那时就是觉得它朗朗上口，不知怎么，”史密斯后来回忆道，“我想我们都有过这种经历。人在自得其乐的时候会显得很傻。”[注]

虽然比尔·戈顿的傻气能活跃气氛，但是他的话并不总是讨人喜欢。戈顿针对科恩说了一些反犹的话——称科恩为“那个犹太佬（kike）”[注]，还指责他“像犹太人那样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注]。

后来唐纳德·斯图尔特惭愧地承认，比尔·戈顿的反犹言论和谩骂，责任应该在自己。“毫无疑问，那些年我基本上是厌恶犹太人的，海明威很可能也是如此。”斯图尔特说。他还澄清，自己的反犹情绪不是那种会造就纳粹的根深蒂固的仇恨，而是“一种势利，一种当时的人们都

认为理所当然的情绪”。据斯图尔特回忆，自己没有当着勒布的面为难他，但是“在他背后却刻薄尤甚”[注]。

核心人物在博古特钓完鱼后，海明威把他们都派往了潘普洛纳，入住金塔纳旅馆——小说中化名为“蒙托亚旅馆”（Hotel Montoya）。当海明威开始动笔写节庆时，那传承了几个世纪的节日盛景，此刻似乎全是为了展示他新近练就的富有韵律的文风而存在的：“节庆活动正式开始了。它将昼夜不停，持续七天。舞乐不停，畅饮不休，喧闹不止。发生的这些事，也只能在奔牛节期间发生。所有一切，最后都变得不真实了，似乎做任何事都不必承担后果……这是一场嘉年华，绵延七天的节日。”[注]

在现实中，潘普洛纳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参加盛大游行的舞者，脖子上挂了一圈大蒜的农民，还有扮成摩尔人、国王和王后的高大人偶。在海明威的小说中，一些跳舞的人在杜芙夫人周围围成一圈，杜芙想和他们一起跳，他们却要求她站着不要动：“他们希望她扮演一樽圣像，可以绕着她起舞。”[注]

但是，海明威的隐忧也渗入了文字之中：潘普洛纳距离被旅居者们玷污可能只有一步之遥，很快它将步巴黎的后尘。这在海明威的活页纸初稿中就早有显现：美国大使及“比亚里茨和圣塞瓦斯蒂安的上层社会人士”[注]涌上虚构世界里的潘普洛纳广场，虽然这和实际发生的情况一样，但是在纸上他们几乎成了罪愆的象征。年轻纯洁的斗牛士卡耶塔诺·奥多涅兹尤其无法抵挡他们的腐化。“那些情色女魔头为了过一个香艳的假期，会把他毁掉。”海明威写道。他还说，像他那样纯洁、优秀的斗牛士，应该远离“这种大酒店的事情[注]……直到功成名就”[注]。但即使是到了潘普洛纳，海明威也警告人们要提防这种毒害人心的旅居者群体。他举了斗牛士胡安·贝尔蒙特的例子（在最初的草稿和最终出版的书里，贝尔蒙特都以真名出现）来说明一个斗牛士如果任由自己追逐时尚，最终会遭遇什么后果。贝尔蒙特被塑造成了一个面色灰黄、长着痔

疮的骗子，他的表演只是为了讨好对斗牛一窍不通的社会大众，他愿意斗的牛，都是斗牛学校用来训练小孩的。[注]

在海明威小说的最后，最凶猛的毒药并非来自被人嫌恶的大使或比亚里茨人，而是一点点从虚构的杜芙夫人身上散开的。和现实中一样，小说中的她使“观光团”成员们人同室操戈。勒布对应的人物科恩对杜芙夫人/波莱特夫人说，她是一个现代的喀耳刻[注]。她被这话逗乐了，将它转述给了帕特/迈克。

“他说她能把男人变成猪。”后者又把科恩的话讲给了整家咖啡馆里的人听。[注]

不管是在海明威的书里还是在现实中，杜芙夫人/波莱特夫人的在场确实能唤起“观光团”里每个男人心中的蠢猪。科恩是在愚蠢境地中陷得最深的那一个。海滨度假之后，书中的杜芙甩掉了科恩，正如现实中的特怀斯登甩掉了勒布。那之后，节庆期间的大多数时候，科恩都在纠缠杜芙，甚至在杜芙和杰克散步时，他也在黑暗中尾随。唯一能把他从她的塞壬之歌中解救出来的方法，就是让他到镇上的理发店走一遭——海明威笔下的科恩和勒布一样，压力越大，越顾忌个人形象。

文思如泉涌，海明威的小本子也越堆越高。写到节庆接近尾声的地方，他终于把故事和现实显著地分开了。至少在纸面上，他和勒布必须打一架：杰克和科恩没有在最后一刻一笑泯恩仇，而是毫不含糊地打了一架。（或者说，科恩把杰克打昏在咖啡馆里，帕特/迈克也被击倒在地。）小说中的杜芙并没有像现实中那样试图修补大家的情谊，而是完全扑进了卡耶塔诺·奥多涅兹对应的虚构人物[注]的怀里。（现实中，这两人唯一的一次身体接触，据说是在金塔纳旅馆的楼梯上握了一次手。）在海明威的书中，妒火中烧的科恩在一场重要的斗牛表演开场前夜把奥多涅兹痛打了一顿[注]，后者挺了过来，在第二天的表演中展现出不凡的高雅，当场把割下来的牛耳当作战利品送给了杜芙夫人/波莱特

夫人。

相比现实中杜芙夫人在那个夏天的所作所为，海明威笔下的杜芙夫人在潘普洛纳表现得更为优雅：没有拖欠旅店房费、等着别人帮她付钱，而是径直离开了潘普洛纳，和奥多涅兹一起去了马德里。在早期的文稿中，海明威把奥多涅兹称作“帕尔马的尼诺”，或是简单称他“尼诺”。帕特·格思里的财务丑闻则被海明威安排在小说最后：海明威不仅把帕特/迈克写成了一个嗜酒、完全破产、无可救药的人，甚至让他在节庆结束之后被迫承认从旅店老板金塔纳那里借了钱。杰克和比尔把他扔在了圣让德吕（路上负担了他那一份的租车费，还有他的酒钱），在那里他打算赊账度日，直到下一笔生活费寄来。

终于，故事中的奔牛节结束了。比尔·戈顿最为精准地概括了它：这整整一周“就像一场妙不可言的噩梦”[注]。

1925年9月21日，海明威完成了手稿，在第7个小本子上写下了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写作时他辗转5个城市和城镇，用时2个月，写下了8万多词。

---

1.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44.

2. 阿卡迪亚：希腊神话中一片不受恐惧、贪欲玷污的田园乐土。——译者注

3. 甚至有人猜测，海明威还在潘普洛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这篇最终会成为《太阳照常升起》的故事了。卡洛斯·贝克认为最早的素材——小说的头两章——“可能早在6月6日至12日就在潘普洛纳定下了”，不过他也表示这只是“推测”（*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589）。

4. 国民警卫队（Civil Guards）是西班牙历史悠久的军事化警察机构，常负责维持乡村治安，参与国际维和任务，是区别于国家警察的另一支警察力量。——译者注

5. 海明威开始构筑这部小说的具体时间已经难以确证。他在后来的书中提到，自己是在26岁生日那天（1925年7月21日）开始动笔的，但这很大程度上像是矫饰之词，给已经快得不寻常的小说创作速度再增添一点戏剧性。后来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提到，从7月13日离开潘普洛纳起，他就开始写这部小说，每天最多花5个小时创作，“也包括在火车上的日子”——他和哈德莉在西班牙四处游览，参加各种各样的斗牛表演和宗教节日。

Ernest Hemingway to Grace Hemingway, September 11,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88.

6. Ernest Hemingway to William B. Smith, July 21, 1925, reprinted ibid., 364.

7. Ernest Hemingway to William B. Smith, July 27, 1925, reprinted ibid., 365. 在一封8月5日寄给史密斯的信中，海明威又把每日写1200词夸大到了每日写2000词。

8. 我们无法确定海明威开始构思这部作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写的是一本长篇小说。海明威的朋友A. E.霍奇纳透露，海明威曾说他动笔时本来只把作品“当作事实记录”，但后来就写成了虚构作品（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December 11, 2013）。也可能他最初把这部作品当作了一部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不过到了仲夏时节，海明威已经明显在构思一部长篇小说了。

9. Ernest Hemingway to Sylvia Beach, August 3,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68.

10. 在不同的传记中，这部分活页草稿被说成了31页或者32页，说法不一。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的海明威档案（编号193）中，草稿共存有33页。第一页上是一句卷首语，第二页是用打字机打出的人物列表。剩下的31页是手写稿，大标题是“卡耶塔诺·奥多涅兹，帕尔马的尼诺”，加了下画线。草稿完全是海明威的风格：他在每页的左上角标出了页码，在数字外面画了圈，一直标到了第31页。

11. Ernest Hemingway, early handwritten draft of *The Sun Also Rises*, item 193,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2. Ibid.

13. 原文为“Bulls has no balls”。这句话可以解读为“公牛都是没有睾丸的”或者“公牛都是没有胆量的”。斗牛中使用的公牛当然不是被阉过的，斗牛本身就是一种弥漫着雄性荷尔蒙的运动。但在奔牛节中，有时几只阉牛会和公牛关在一起，好使公牛平静下来。——译者注

14. Ibid.

15. Ernest Hemingway, first draft of *The Sun Also Rises*, Notebook I, item 194,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6. Ernest Hemingway, early handwritten draft of *The Sun Also Rises*, item 193,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7. 他用的第一本笔记本是那种有网格纸内页、棕色封皮的，而非通常传言中的蓝皮小本。小说的全部草稿写在了7个类似的本子上，有的是法国的，也有的是西班牙的（很可能是他在巴伦西亚时得到的）。1、5、6、7号笔记本是法国的，封皮上印有“神奇牌100页笔记本”（L’Incroyable, 100 Pages, Cahier），尺寸是8.8英寸×6.8英寸（即22厘米×17厘米，大约相当于16开。——译者注）。本子背面印着“乘法表”、“时间换算表”（“1世纪=100年”之类的）、“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对照表”，真是有用极了。2、3、4号笔记本是

西班牙的，背后印着“文具，E. Bort Pellicer，横格本，萨拉戈萨，18——巴伦西亚”（Papeleria,E. Bort Pellicer, Libros Rayados, Zaragoza, 18 — Valencia）。西班牙本子和法国本子一样是棕色或者焦糖色的，基本一样大。这些草稿本的颜色和尺寸信息由约翰·F. 肯尼迪图书馆的海明威档案提供。这7本笔记本就是编号194档案的全部内容。

18. Ernest Hemingway, first draft of *The Sun Also Rises*, Notebook I, item 194,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9. Ibid.

20. 众所周知，“恐同”和“厌女”是海明威作品的特征。——译者注

21. Charters, *This Must Be the Place*, 72.

22. 在创作和修改过程中，海明威反复犹豫着是要使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在后来的一稿中，杰克滑稽地告诉读者：“我本不想用第一人称讲述这个故事，但发现我必须这么讲……所以这个故事终究不会那么绝妙好听、不偏不倚。”Ernest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final galley, chap. 2, item 202,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23. Ibid.

24. 一些后来被删去的第一稿材料显示，海明威可能还使用了比尔·伯德履历上的其他信息。其中，杰克正式向读者介绍了自己的背景，他是一个“一战”老兵（1916年从一家英国医院康复出院），是一位记者，还与别人共同创建了一家名为“大陆新闻协会”（the Continental Press Association）的企业联合机构，是该机构的欧洲总理事。Ibid. 现实中，比尔·伯德在1920年与人合伙创立了“团结社”，接着成为巴黎办事处的总管。

25. Sokoloff, *Hadley*, 82.

26. Jack Goodman, John Milton, Alan Graber, and Bill Tangney, “Hemingway Tell of Early Career; States That He ‘Won't Quit Now,’ ” *Daily Princetonian*, April 14,1955, reprinted in Bruccoli, *Conversations with Ernest Hemingway*, 100.

27. 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 ca. November 14,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143.

28. Ernest Hemingway to Ernest Walsh, January 2, 1926, reprinted ibid., 10.

29. 在为女主角起名字这件事上，海明威似乎颇为踌躇了一番。小说完整的第一稿中依然通篇使用着“杜芙”这个称呼，但作者知道他最终还是要另起一个假名。“多丽丝夫人”（Lady Doris）是个被否定的选项。海明威还曾想出过一个高贵而冗长得犹如一串珍珠项链般的名字：伊丽莎白·尼尔·波莱特·穆雷（Elizabeth Neil Brett Murray），最终，其中的“波莱特”被取了出来，换掉了“杜芙”。她的姓氏似乎也引起了创作者的犹豫。她贵族丈夫的名号同样被修改了多次：达拉谟勋爵（Lord Durham）、兰伯特勋爵（Lord Lambert）、亨利·马洛勋爵（Lord Henry Marlowe），它们一一被否决，最后定为“罗伯特·阿施利勋爵”（Lord Robert Ashley）——不过在小说的第一稿中，他还是“约瑟夫·安东尼

爵士”（Sir Joseph Anthony）。（起出“安东尼”这个名字应该不需要什么想象力：特怀斯登的儿子叫就安东尼。）海明威最后给自己写了一条备忘注释，说杜芙的“通用名”应当是“波莱特·阿施利”，不过要等到做通篇修改时再替换。Ernest Hemingway, first draft of *The Sun Also Rises*,item 193,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30. Ernest Hemingway, first draft of *The Sun Also Rises*, Notebook I, item 194,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31. Ibid.

32. Ibid.

33.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18.

34. 从海明威刻画波莱特的几行文字中，还可以看出他有着敏锐的时尚感，注意到了她的羊毛衫——当时，羊毛衫刚刚被设计师用作女性服装。纽约时装技术学院（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博物馆馆长瓦莱丽·斯蒂尔介绍说，在20世纪20年代，穿羊毛衫是独立新女性的标志之一（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March 6, 2014）。

35. Ernest Hemingway, first draft of *The Sun Also Rises*, Notebook I, item 194,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36. 帕特·格思里在小说后来的一稿中得到了“迈尔·坎贝尔”的名字。在第一稿中，他被称为“帕特里克”“帕特”或者“迈克尔·戈登”。

37. 有人猜测，海明威是从杰拉德·墨菲那里借用了“杰拉德”这个名字，但对于一个住在纽约的犹太人来说，这个名字的爱尔兰味道太重了。

38. Ernest Hemingway, first draft of *The Sun Also Rises*, Notebook I, item 194,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39. 坎奈尔与其他人不同，在小说中，她从未被冠以本名。在第一本笔记本中，海明威就起好了“弗朗西斯·克莱恩”这个名字。“克莱恩”（Clyne）也许脱胎于“坎奈尔”（Cannell），这两个姓氏有四个字母是一样的。

40. Ernest Hemingway, first draft of *The Sun Also Rises*, Notebook I, item 194,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41.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42.

42. Ibid., 25.

43. Fraser Drew, “April 8, 1955 with Hemingway: Unedited Notes on a Visit to Finca Vigia,” *Fitzgerald/Hemingway Annual, 1970*, reprinted in Bruccoli, *Conversations with Ernest Hemingway*, 95.

44.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48.

45. Plimpton, "The Art of Fiction: Ernest Hemingway," 77.

46.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26.

47.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December 7,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179.

48. Bradox与"马多克斯"（Madox）拼写相似。——编者注

49. 这一情节在小说出版时被删去了，但是仍然出现在《流动的盛宴》中，用于刻画福特不堪的形象。约翰·多斯·帕索斯的角色后来也被删掉了。不过，在被完全删除之前，多斯·帕索斯在草稿中得到过一个假名"亚历克斯·穆尔"（Alex Muhr）。

50.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15.

51. 海明威/杰克在谈到夺去自己性能力的伤时，提到了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他讲到菲茨杰拉德曾经建议他只把失去性能力一事"当作一个幽默的主题"。Ernest Hemingway,first draft of *The Sun Also Rises*,Notebook I, item 194,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52. 汤姆·布坎南：《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黛西的丈夫，盖茨比眼中抢走了黛西的富家子弟。——译者注

53. Ernest Hemingway, first draft of *The Sun Also Rises*, Notebook IV, item 194,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54. Ernest Hemingway to Barklie McKee Henry, August 12,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 : 371.

55. 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 ca. August 19-20, 1925, reprinted ibid., 378.

56. Ernest Hemingway to William Smith, August 5, 1925, reprinted ibid., 369.

57. Ernest Hemingway to Morley Callaghan, August 13, 1925, reprinted ibid., 373.

58. Ernest Hemingway to Ernest Walsh, August 17, 1925, reprinted ibid., 377.

59. 前文提到过，海明威初见庞德时和他达成了一项共识，就是少用描写和形容词，这其实就意味着对动词和动态的注重。——译者注

60. Ernest Hemingway to Jane Heap, ca. August 23, 1925, reprinted ibid., 383-84.

61. 1925年的1000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3500美元。

62. Ernest Hemingway to Grace Hemingway, September 11,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88.

63. Ernest Hemingway to Gertrude Stein and Alice B. Toklas, August 20, 1925,reprinted ibid., 381.

64. 对博古特的描写昭示了海明威自己在城市生活和田园生活之间的选择。这是"他真正

喜欢的”，他的儿子帕特里克·海明威说，“山峦，远离尘嚣，钓鱼。他更偏爱哪一种生活是毫无疑问的”。（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uly 30, 2014）.

65.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94.

66. Ibid., 98.

67. St. John, “Interview with Hemingway's ‘Bill Gorton,’”183.

68.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131.

69. Ibid., 77. 比尔·戈顿并不是书中唯一一个爆粗口骂犹太人的角色：迈克·坎贝尔让科恩“别摆出那副犹太哭丧脸”（ibid., 142），杰克·巴恩斯评价科恩有“典型的犹太人执拗性格”（ibid., 9）。

70. St. John, “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201.

71.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124.

72. Ibid.

73. Ernest Hemingway, early handwritten draft of *The Sun Also Rises*, item 193,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74. 维吉·鲍姆（Vicki Boum,1888—1960）：奥地利作家。她的小说《大酒店》发表于1929年，并于1932年被改编为影响巨大的同名电影（女主角是葛丽泰·嘉宝）。鲍姆小说中的酒店位于柏林，并不是雅各-丹格列特酒店。但小说（以及由它改编成的电影）奠定了一种“大酒店主题”，这类文学、影视作品有多条独立线索，人物在大酒店、轮船一类的繁忙场景中活动，并发生戏剧冲突。——译者注

75. Ibid.

76. Ibid.

77. 喀耳刻（Circe）：希腊神话中的巫术女神。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她把奥德赛一行人变成了猪。——译者注

78.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115.

79. 这里指佩德罗·罗梅罗。——译者注

80. 华尼托·金塔纳坚称，哈罗德·勒布和卡耶塔诺·奥多涅兹确实打过一架，但是奥多涅兹并不像书里所写的那样毫无还手之力。“观光团”的其他人并未提及这件事。Leah Rice Koontz,“‘Montoya’Remembers *The Sun Also Rises*,”reprinted in Sarason,*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210.

81.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177.

9
突围的季节

稿子完成后，海明威似乎染上了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说的那种“对完成之物的忧伤”。在写给编辑欧内斯特·沃尔什的信中，他说自己“心里累得要死”，严重透支，而且“孤独透顶”[注]。他每天去塞纳河里游泳，纵酒无度。但是他实在太过疲惫，连威士忌都无法把他灌醉。

意大利在召唤，他等不及要踏上一次复健之行，“让他的头脑恢复正常”[注]。但哈德莉不能和他同去了，因为邦比刚刚被送回了巴黎。海明威对沃尔什开玩笑说，他本来觉得去威尼斯“浪漫地打上几炮”可能很有益健康，但是想到会留下一群私生子，抚养费也是笔不小的开支，就没有另带一个姑娘去。

现实中的潘普洛纳“观光团”成员们，已经分散到了世界各个角落。杜芙·特怀斯登夫人一直靠赊账住在一家乡下旅馆里，最终她会回到蒙帕纳斯，重新成为那里的塞壬。在海明威小说的最后几段，主人公杰克·巴恩斯去马德里拯救杜芙：那个斗牛士——“帕尔马的尼诺”——意识到她其实很让自己丢脸，他们就各奔东西了。（“他想让我留长发，”她向杰克坦白，“我，长头发，你想象得出吗？我会是什么鬼样子啊。”[注]）结尾处他们又回到了小说开篇时的那种关系中——相互爱慕，注定痛苦：

> “哦，杰克，”波莱特说，“我们要是能在一起该多好呀。”……

“是啊，”我说，“单想想就真他妈的美啊。”(注)

虽然故事里的杜芙和杰克永远分不开了，但现实中的杜芙·特怀斯登似乎在这本书完成后就永远退出了海明威的生活。大概在这时，海明威收到了她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海明威台启”。倦怠的字迹，内容是求他借给她一点钱。

“我想要3000法郎，但是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能给多少就给多少吧。”她写道。(注)

这是个厚脸皮的请求，特别是考虑到海明威仍在依靠妻子的信托基金生活。（可能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特怀斯登尤其周全地把信寄给了丁戈酒吧的招待，托他直接交给海明威，而没有寄到海明威家里。）特怀斯登还补充说，钱的事，事出紧迫：她在乡村旅店里面赊的账实在太多了，不敢不给钱就逃跑。

“我现在是一时困窘，仅此一次，只是暂时的，我肯定会还给你。”

他是否把钱借给了她，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发生了什么，似乎他们一度亲密的关系在那个秋天走到了尽头。这种分裂并不是一刀两断，他们可能只是发现，两人的相通之处并不像先前以为的那样多——或者如今特怀斯登的用处耗尽，海明威对她不再感兴趣了。可能海明威和勒布一样，只是发现她“已经不再重要了”。海明威也许没有像勒布那样把特怀斯登弄上床，但是她最后给他的东西，远远比给勒布的重要得多。

现在他在书里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她，文学世界中的那个她更加听从作家的摆布，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也更受作家的青睐。

与此同时，唐纳德·斯图尔特被叫回了洛杉矶。从里维埃拉回到巴黎时，他收到了出版社拍来的一封电报，告知他，他的一本书被米高梅（MGM）选中，电影公司希望在编剧的时候有他在场。斯图尔特带着

顾虑接受了邀约。

“我知道，多数作家朋友一提到好莱坞，言语中就满含鄙视，”他后来说，“但是我说服自己，这能让我找到一批新的、更广泛的观众。”注

当他回到纽约，看到自己的头像出现在《镜报》（*Mirror*）头条时，一切迟疑都涣然消释了。“被当作一个重要的‘猎物’，这真让人激动。”能在火车上和人说自己要去好莱坞编电影，同样挺有面子的。

哈罗德·勒布和比尔·史密斯也决定回美国。他们俩之间的友谊是从潘普洛纳征程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奔牛节之后，当海明威忙于记录节庆期间的事件以创作小说时，当斯图尔特在里维埃拉晒日光浴时，勒布和史密斯一起骑自行车探索了莱茵河和沃尔姆斯（Worms）——该城是勒布父族的故地。接着他们回到巴黎，一起加入了另一场很不同的狂欢，这回陪同的还有两位夜总会女招待。注

对勒布来说，这场狂欢更像是一场终曲。《扫帚》已停刊，与海明威的友谊如梦一场，和杜芙夫人的恋情也在一个最不和谐的音符上告终。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勒布说到自己回纽约的决定时这样写道，“我的书《杜达布》就要出版了。我将回到远方的故土，相隔重洋，它望上去是一片闪耀着白塔青山的土地。”在巴黎的时光给了他很多教训，包括“对于一个朋友，有什么可以指望，有什么不能指望”注。

勒布很快会意识到，一刀两断、再不往来是不可能的。海明威从西班牙回巴黎之后，勒布还和他打过一次网球。即使友谊显然已走到了尽头，勒布还声称他特意让了海明威几盘，想借此修补他们的友情。但这种让步也只是给海明威的新作添砖加瓦罢了：在小说中，爱上波莱特夫人之后，罗伯特·科恩的球技一落千丈。知道自己的好意打了水漂，勒布开始迁怒于海明威的写作。

“人啊，什么事情都臆想得出！”几十年后他愤怒地说。[注]

勒布和史密斯买了同一艘客轮的船票回纽约。随着归期渐近，有人安排了一些小规模的饯行晚餐。客人包括海明威和哈德莉、勒布和史密斯，还有凯蒂·坎奈尔。虽然不清楚这些小聚会是由谁发起的，但是很明显，它们的目的是埋掉争斗的斧头[注]。席间其乐融融的气氛仿佛使他们回到了奔牛节之前的时光，潘普洛纳争斗的各方小心地达成了某种休战。

海明威才不会因为勒布的离开而愧疚，也不会因为比尔·史密斯将回美国而悲伤。海明威曾私下对一个朋友抱怨说，史密斯太容易意志消沉了，史密斯严重的情绪问题，是夏天节庆结束后海明威久久不愿返回巴黎的原因之一。他担心史密斯会影响他的写作。

“我宁愿他在第一次抑郁的时候就把自己解决掉。”海明威写道，并说史密斯曾经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注]。

讽刺的是，据勒布回忆，在饯行晚餐上比尔·史密斯是情绪最高涨的一个。海明威“满嘴都是马德里和斗牛”[注]，但是关于新书他却三缄其口。哈德莉和坎奈尔自顾自地聊天。勒布没有加入谈话，只是看着大家。一切进展顺利，但中间一位服务员在分鸭肉的时候，把鸭胸肉给了勒布和坎奈尔，却给海明威端上一盘“下水”。众人都看到海明威怒瞪了一下双眼，但是并没有把事情闹大。晚餐别别扭扭地继续着，最后大家互相道了别。

各自回家之前，坎奈尔从海明威那里得到了一个她不愿听到的消息。他们两个一起走着，谈到海明威的写作，便聊了起来。坎奈尔喜欢他的文风，但是觉得他的作品中缺了些什么。她和勒布一样热心，费了些心思考虑这个问题，感觉可以提供给他一个解决方案。

“如果你把描写情绪的功夫用在刻画生活上，你肯定已经写出一本

畅销书了。”她建议道。(注)

海明威回答说，他接受她的建议。

“我正在写一本书，它有一条情节主线，里面什么都有，”他告诉她，“我们每个人都在里面，而且我要撕了那两个混小子。”说着，他朝不远处的勒布和史密斯比画了一下，他俩正各走着各的路。

然后他指着勒布说：“勒布那个犹太佬是大反派。”(注)

如果“每个人”都在书里，这就肯定意味着坎奈尔也在里面。海明威可能觉察到了她脸上的慌张。

“我不是说你，凯蒂……我不会把你放进去。我总是说，你是一个好女孩！”海明威朝她咧嘴笑了一下——和勒布在潘普洛纳的街上打架前，他向勒布展示的就是这种笑容，开朗的、小男孩似的笑容。

坎奈尔后来写道，那个笑容“让你想给他一只苹果——或者你的心”。不过她仍然无法放心。(注)

9月5日，勒布和史密斯启程返回纽约，从此这些人再也没有聚在一起过。不过他们很快将被永远地联系在一起，和海明威也无法分离，无论是否情愿。

9月末，海明威还是成功出游了一趟，他并没有如愿去意大利，而是去了巴黎西南的古城沙特尔。他曾想带一个女人同去，但真正捎上的是他的书稿，他在那里继续写作。

小说的标题还需要琢磨。现在的标题“节庆”不行，毕竟海明威觉得不应该用一个外语单词当书名(注)。再说，“节庆”一名可能会让人错误地把这本书视为肤浅的作品。它不是要把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笔下那种滑

稽做作的上流社会搬到西班牙或者巴黎，为了让人相信这一点，它需要一个更有分量的名字，为整本书创造一种肃穆的氛围。

在第8本笔记本的封皮上，海明威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以及写作地点和时间：沙特尔，9.27，1925。在本子的内页上，他写道：

《迷惘的一代》

一部小说

前言（注）

格特鲁德·斯泰因还是注定要成为该书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前言里，海明威记叙了一件斯泰因刚刚告诉他的小事。她最近去了一家汽车修理厂，想整修一下她那辆上了年头的福特车。车厂老板有四个年轻的机械师帮忙，其中一个的技术尤其精湛。斯泰因不禁问老板，他从哪里找到了这样的好帮手。

“我以为小伙子们都不再乐意工作了呢。”她说。

车厂老板回答说，现在都招不到20多岁的人。

“*C'est un generation perdu*（注），”他讲，“没有人要他们。他们不好，被惯坏了。”

虽然这么说，22岁以下的男人还是值得收割的麦子，他继续讲道。

那“废掉”的这一批人以后会成为什么样子呢？斯泰因问。

“什么也成不了，他们明白自己废掉了。”（注）

这件逸事使她想起了和海明威同岁的这一群人。（注）

“这就是你们，”她宣告，“这就是你们。所有在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你们是迷惘的一代。”[注]

她还说，这群不幸的人非常容易分辨，他们不懂得尊重，喝酒不惜命。

海明威推想，这件事完全改变了整本书的视角。有了这一层意思，他可以把自己塑造的人物看作一群典型的迷失灵魂之人。这就直接升华了他们放荡、越轨的行为：他们醉酒、涣散、消沉，但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被一场不光彩的战争毁了，那些可敬的社会体制曾经给人以生命的意义，现在却把他们荒废了。剩下的东西，还有什么能给他们指明方向呢？海明威在前言中发问。他们这一代人在天主教、达达主义、保皇派和电影中寻求慰藉，却都没能成功。[注]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别的领域，他们都没有得到指引。海明威承认，固然有其他的作家在探索这一撼动历史的话题，但是他自己的文学考察将展示其无比重大的意义。

“这不是飞女郎怎么做母亲的问题，也不是波波头会把我们引向何方的问题。”他在前言中写道，显然是在批判菲茨杰拉德狭窄的视野。[注]又一次，完美的素材在完美的时间降临。“迷惘的一代”的新视角使他得以把自己定位为开一代文风之先河的革命者，一个记录有趣畅销故事的人；现在他为一代人代言，和菲茨杰拉德的功绩如出一辙。当然，他们关于同代之人记录了迥异之事，但是写得一样好。这已经足够使海明威一鸣惊人了。

海明威后来讲到，他听到“迷惘的一代”这一说法时，心里顿生抵触，至少他不同意斯泰因的观点。她告诉他这件事的当晚，他从花园街的工作室走路回家，路上他认定，无论是哪一代人，都自有其“迷惘”的地方。

“我想到斯泰因女士、舍伍德·安德森、自我中心主义、精神懒散，这些不都是自律的对立面吗？到底谁应该把谁称为‘迷惘的一代’？”他后

来写道。让斯泰因“肮脏、轻率的标签”和“迷惘的一代”的说法都见鬼去吧。㊟

也许他憎恶“迷惘”的标签，但最后还是拿来用了。他最终砍掉了“迷惘的一代”这个标题，甚至把那篇宣言般的漫长前言删掉了。但是他坚守了前言传递的精神，把它缩减成一句凝练的格言，却增加了它的冲击力：

“You are all a lost generation.”

——Gertrude Stein

“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格特鲁德·斯泰因）

他的直觉正中靶心。最终，六个简简单单借来的词，就把这本书从一部拿丑闻当看点的小说提升为一场定义一代人的大事件。

海明威觉得，这本书还有再加重分量的空间。即使他曾写到他们这一辈人拒斥教会，也不妨碍他在《圣经》中寻找可能的题目。就在他单独用来写前言的那个笔记本上，他罗列了从《传道书》（the Bookof Ecclesiastes）中搜集来的标题，包括“入海之河”（*River to the Sea*）、“两人同睡”（*Two Lie Together*），“旧酵”（*The Old Leaven*），以及“太阳照常升起”。“太阳照常升起”是他从“生命的虚空”（“Vanity of life”）这一段落中提炼出来的：

One generation passeth away, and another generation cometh: but the earth abideth for ever.

The sun also ariseth, and the sun goeth down, and

hasteth to his place where he arose.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死亡与重生的主题和“被毁掉的一代人”这一主题同样深刻，而且前者切合海明威的信念——每一代人都同样迷惘。这种想法将萦绕他一生。[注]在给庞德的一封信中他执著地谈论了《传道书》。他请从前的导师再读一读这篇文字，虽然庞德“对所谓的基督教信仰怀有正当的厌恶”，但不应因此无视《传道书》的价值。[注]很快，他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叫它‘太阳照常升起’。”一周后他在给勒布的信中写道。[注]

但是海明威拒绝透露书的情节和人物信息。勒布只能在好几个月后自己去了解那个“罗伯特·科恩”了。

正当海明威纠结于该为这本即将轰动文坛的小说取什么名字时，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正在准备首发《在我们的时代》，这本书将让更广泛的美国读者认识海明威。几个月来海明威一直在和贺拉斯·利夫莱特通信，交流这本书的校订问题。

“重读时我发现它比我印象中的样子还要好。”海明威对他的出版商写道。[注]不过，海明威不断写信宣传新小说的存在和进展，利夫莱特显然被排除在了这热火朝天的状况之外。

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为《在我们的时代》准备了“牛气十足”的封面：几乎整个封皮上都是海明威强力支持者们的推荐语，似乎出版社在挑衅批评家，看看有谁胆敢对这本书说半句坏话。

“海明威先生年轻、有力、笑意盎然，而且善于写作。”——舍伍德

·安德森的许诺就飘在书名旁边。他们甚至不知用了什么手段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那里哄骗来了一段话，即使后者和海明威关系紧张。福特向即将读到这本书的人保证，海明威是“此时美国最好的作家……最认真细致，最善于他的匠艺，最臻于完善”。封面左下角是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的推荐语，他把这本书比作吃惯了生菜三明治后的一顿文学大餐。

当这本书在纽约出版时，海明威大约正在沙特尔。[注]利夫莱特的印刷厂能拿出来的成书只有1300册，但这仍然是海明威之前任何一本书印数的四倍多。

如果说海明威的师友们想把他捧成一位独树一帜的新星天才，评论者们可能最多只愿意把他视为一个有天赋的新手。有几篇评论把他的文风和舍伍德·安德森、格特鲁德·斯泰因比较。至少有两篇评论说，他的短篇小说“明显”[注]受到了斯泰因的影响；而《新共和》的批评家说，海明威“用最简单的词制造出精致、了然的效果”，他的作品明显有安德森的余音，却缺少安德森的温度。[注]

但是，有一位评论者看到了这本书深层次中令人振奋的东西。

“在美国文学圈，欧内斯特·海明威是前所未有的人物。”《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罗伯特·沃尔夫（Robert Wolf）说。确实，海明威受到了斯泰因和安德森的影响，但后面这两位是“一战”之前的作家，而且“论及文学传统的不连贯性，1920年和1925年之间的差异要比1920年和1914年之间的大”。海明威是战后作家群体中出现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注定会把文学带往人们始料未及的新方向。斯泰因和乔伊斯发起了这种转向，自从他们获得了一些进展，“用旧方式写作便不再可能了”——但是海明威将稳稳地成为这股新潮流的先锋。他的风格是“依照一台机器的模式构造的……反映了我们现代的、按部就班的机器文明”。在评论的结尾他最终认定：“欧内斯特·海明威有天才的潜力。”[注]

这种尊敬并不是相互的，海明威后来把沃尔夫形容为一个“愚蠢的好心人”[注]。不过沃尔夫的评论确实说中了部分要点：海明威如果是在战前出书，可能就不会有资格当战后一代人的发声者了。只有一个新来者，一个20多岁的、属于“被毁掉一代”的人，才有资格承担这种荣誉。幸运和海明威的天才又一次合谋。

《在我们的时代》卖得不尽如人意：上市的前三个月，只有大概500本书成功地被读者从书商的货架上买走。但是海明威的名字在纽约出版圈已经为人所知。同年秋天，出版商阿尔弗雷德·哈考特（Alfred Harcourt）[注]写信给作家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Louis Bromfield），聊到了海明威和《在我们的时代》。哈考特认为，这本书预示着了不起的事情将要发生。

“海明威是个有主见的人，靠的都是真才实学。”哈考特还预言说：“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可能会震动全国。”[注]

他的预言很快就会成为现实。

与此同时，哈罗德·勒布也回到了纽约。他的新书发布，如果他期待着欢庆和吹捧的话，就真的会大失所望了。

“在纽约，没有一篇像样的书评，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多少。”11月，他在写给海明威的信中说。[注]书籍销售惨淡。即使他们的友谊已开始松散动摇，勒布仍然继续充当着海明威和利夫莱特出版社之间的联络人。不幸的是，关于《在我们的时代》，他带给海明威的消息同样消沉。

“在办公室里他们对我讲……短篇小说集，想要畅销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写道，“你的书也不例外。”

可以说，此时此刻海明威和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的合作终结了。一开始和该社合作海明威就不是特别开心。这年夏天，贺拉斯·利夫莱

特甚至还让他在巴黎物色别的作者推荐到社里，这让他更加气愤。“我是个头脑简单的乡下小伙子，不懂得什么拉拢作者的技巧。”他对他的出版商说。[注]

出版社显然不情愿营销他的书，这一下子点燃了海明威的怒火。他给勒布回信说，利夫莱特的团队一定事前就决定好了：一本短篇小说集不值得他们费心经营。他指出，他们甚至不会为已有的订单发货：在巴黎，西尔维娅·毕奇订购了12本《在我们的时代》，但只收到了这个数目的一半。她不像利夫莱特那样对怎么卖海明威的书一无所知。海明威声称，她一天就能把那6本卖掉，并且会再订更多。顺便提一下——海明威写道——已经有三家出版社出价购买他的新长篇小说了，都是高价。眼下，他不打算对利夫莱特变卦，但是“还要看他们是否让我开心”，这意味着出版社要“好生对待”《在我们的时代》，同时给他的新小说一笔可观的稿费。[注]

“他们肯定在大操大办舍伍德的书。”海明威愤愤不平地说，安德森最近出版了畅销小说《暗笑》（*Dark Laughter*），有很多促销推广活动。他想象着安德森不费力气就赚了一大笔钱。现实确实如此。这是利夫莱特出版的第一本安德森的书，出版社为了展示它的文学新星，投入了大量精力。《暗笑》和海明威的书大约同一时间上市。《在我们的时代》即使首印量不多，年底之前也只卖出去了这个数的三分之一，《暗笑》却大卖22000余本。[注]

“销量涨了又涨”，安德森回忆说，自己都不敢相信他新建的功绩。“我去了一趟纽约，发现自己的脸正从报纸的广告版上，公交车上和地铁站的墙上盯着我。”[注]

如果说《太阳照常升起》是战后海明威对这个时代的交代，那么《暗笑》就是安德森的交代。它和《太阳照常升起》一样，是奋笔疾书的产物。“整本长篇小说是去年秋天马不停蹄地写下的，”这年春天安德

森对利夫莱特说，“从开始到完成用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我从来没有如此专注于一件事。它是当今这个世界的故事，是美国的战后生活，尤其是中西部的战后生活。”安德森说这将是他至今最好的小说。

“它将用口碑证明自己，”他敬告利夫莱特，“把宝压在这本书上准没错，贺拉斯，等开售的时候它一定会一鸣惊人。”[注]

安德森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的成功，加上批评家们无休止地把他和海明威各自的风格拿来比较，正让海明威生着闷气。“我敢说，不止一位批评家……暗示过我的写作风格对海明威有强大的影响力，”安德森后来写道，“我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我认为他有自己的天赋，那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注]

反过来，海明威却没有心情去夸奖安德森的创作天赋。他给母亲写信说，《暗笑》是一本虚张声势、矫揉造作的书，里面只有少数几个片段的写作是合格的。其他一些人和他的观点相同。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信对麦克斯韦·柏金斯讲，“安德森最近的两本书让每个相信他的人都失望了”，还说这两本书“低劣”、“假”、“糟糕”。[注]话虽这么说，菲茨杰拉德并没有把他的蔑视之情变成公开的指责。

可是海明威这么做了。《暗笑》是“如此糟糕、愚蠢、做作，我忍不住要写一篇戏仿之作批判它”，他后来写道。[注]当年11月，他开始构思一篇居心叵测的小故事，讽刺安德森的长篇小说。这部接近三万字的中篇小说，他只用大概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起名“春潮”（*The Torrents of* Spring）。[注]

海明威辩称，他写这篇小说是有高尚初衷的。安德森挥霍了自己的才华，这令他愤怒：老作家需要匡扶，讽刺文是传统悠久的文体，可以用来把安德森唤醒。[注]多年后，海明威会把戏仿贬为“失意作家最后的庇护所”，还说“比写讽刺文更近一步，就是在墙上写‘不可随地大小

便’了”，但是1925年，在匡正舍伍德·安德森写作前途的事业上，讽刺文显然是一个高尚的武器。

《春潮》的批判锋芒直指安德森文风上的矫情作态。《暗笑》的故事核心围绕着一家制轮厂，海明威就将讽刺小说的背景设在一家制泵厂中。他模仿了安德森碎片化的语言和重复问问题的习惯（“她会抱着他吗？她会抱着他吗？”），并且在小说各处加上那种早已过时的，章末直接与读者对话的段落，显得十分自命不凡。在一个段落中，叙述者告诉读者，前一章自己只用两个小时就写成了，午餐时还把它拿给多斯·帕索斯看，后者读罢宣称：“海明威，你造就了一部杰作。”小说中还有一段，含沙射影地指出安德森有盲目自大的倾向，“就在这个地方，读者请看，我将进入最精彩的篇章，昭示这本书的伟大”。

安德森是《春潮》批判的首要目标，但海明威也将枪口瞄准了其他几位作家。他指责小说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抄袭了1915年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和战争有关的情节。文中的一处写到，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烂醉如泥，一屁股瘫在壁炉边的椅子上。在这段话末尾，海明威再一次转向了读者：“关于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我所说的没有让你愤怒或失望吧？我希望没有……我得说明，读者啊，我最为尊敬菲茨杰拉德先生，如果有别的什么人攻击他，我会第一个跳出来为他辩护！”格特鲁德·斯泰因也被“戳了一下”。《春潮》的第四部分题为“一个伟大民族的逝去，以及美国人的成长和受伤”，其中包含了斯泰因《美国人的成长》一书标题。有段话描写了一个人物在思考斯泰因的重要性，海明威模仿斯泰因的著名文体写出了那个人的想法：“格特鲁德·斯泰因……啊，是那个女人！她的文字实验会把她带到哪里呢？最后等待她的是什么呢？巴黎发生的一切，巴黎，巴黎……现在的巴黎是什么时候？早上的巴黎。晚上的巴黎。午夜的巴黎。晨光里的巴黎。巴黎在正午，也许吧。谁说不是呢？”

刚刚12月2日，《春潮》就写成了。

海明威开始把作品拿给几位同道看。文学的戏仿在当时是稀松平常之事：唐纳德·斯图尔特的《戏仿世界史纲》戏弄了10位著名作家，包括菲茨杰拉德、伊迪丝·沃顿、辛克莱·刘易斯和林·拉德纳；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写诗戏仿了埃兹拉·庞德和T.S.艾略特的文风（据说庞德对此并不高兴）。在这个人们成于笔端，也败于笔端的世界里，所有在文风上标新立异的人都很容易被模仿、嘲笑。

不过《春潮》最初的几位读者觉得它残酷得有些过头了。哈德莉觉得，对于一个如此无私地支持他们来到巴黎，并为他们写了所有介绍信的人，这样嘲弄他是“可憎的”[注]。她力主海明威不要发表小说。约翰·多斯·帕索斯远不像海明威文中所写的那般觉得《春潮》是一部杰作，他告诉海明威，它“单单作为一部讽刺作品并不够好”，并坚持认为有了“《在我们的时代》这么好的一部作品，必须要等到海明威写出另一部重磅作品后才能发表”。多斯·帕索斯同意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看法，认为《暗笑》太过沉溺于情感，“必须有人提醒（安德森）”；但他觉得，该这么做的人不是海明威，因为安德森过去对前者是那么善良。

“我想这他妈的才不是我该管的闲事，但那个年代的朋友都是实实在在的朋友。”多斯·帕索斯后来写道。[注]

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在讽刺作品上的成功可能启发了海明威，不久后他还会在推销《春潮》手稿时用斯图尔特的例子作为一个卖点。但是斯图尔特和哈德莉、多斯·帕索斯一样，都对这本手稿感到惊愕。“它的尖酸刻薄和笨拙的幽默”无不令斯图尔特十分嫌恶。他相信戏仿作品应该有趣，而非刻薄——海明威没有领悟这一点。[注]

海明威还想继续寻求赞美。一天晚上，他来到杰拉德·墨菲和莎拉·墨菲的公寓[注]，那时他们已经准备上床睡觉了。结果觉睡不成了，他们用了整夜的时间听海明威朗读新作，让他读完了全篇。杰拉德觉得《春潮》“在品位上有点儿问题”[注]。莎拉不大有资格判断这部作品的好坏：

她虽然“在沙发上坐得笔直”，但在海明威的朗读过程中基本上都睡过去了。海明威对此似乎没有察觉，读到嗓子都哑了。

他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位忠实的支持者，宝琳·菲佛。那年秋天，他和哈德莉经常见到她。[注]宝琳的妹妹弗吉尼亚在巴黎过了一个长假之后回到美国，同时大概也结束了与海明威之间任何可能的风流韵事，留下宝琳无所事事。孤独的宝琳现在常常在闲暇时去海明威夫妇家做客。[注]他们渐渐成了宝琳的临时代理家人，尽管最初宝琳对他们的生活环境心怀恐惧，还嫌弃海明威本人。宝琳通过哈德莉进入了海明威夫妇的生活。不管这有多么不可能，她俩成了亲密的朋友。

不过宝琳显然也成了海明威在创作方面的一位知心朋友。他把她拖进了《春潮》的读者群，她觉得那是“她读过的最好笑的东西之一”[注]。宝琳敦促海明威出版这部作品，此举正合他的心意。这招致了哈德莉的不满，她觉得，如果不是宝琳的鼓励，海明威可能就把手稿束之高阁了。[注]看来，哈德莉对丈夫的影响力正在减退，而宝琳正变得更有分量。

12月7日，海明威把《春潮》的稿子寄给了贺拉斯·利夫莱特，并附上了一封匪夷所思的信介绍这部作品。信件开头，他简短概述了讽刺文体业已逝去的黄金时代。海明威说他听到过很多批评家哀叹，说美国没有自己的优秀讽刺作家。

“可能读了这本书，你就会觉得他们没有必要哀叹。”

现在我们有了一部“非常完美的美国讽刺作品”，足够和唐纳德·斯图尔特、罗伯特·本奇利、林·拉德纳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并肩而立。海明威接着说，如果利夫莱特还不愿意相信这些话，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很快会寄来另一封信，肯定它的价值。他还转达，作家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认同《春潮》是“他读过的最有趣的书之一”。

如果利夫莱特想要这本书，就应该准备一笔可观的款子（海明威要求的是一笔500美金的预付款，他还说，本来应该要1000美金的），并且立誓全力推广这本书。海明威提醒利夫莱特，出版社没有为《在我们的时代》做什么广告，还给它定了一个糟糕的封面，这些他都“没有追究”——海明威抱怨说，封面上所有推荐语只会把这本书的潜在读者推向持保留意见的一边，而不会吸引他们读它。他指导利夫莱特要在来年春天发布《春潮》，让拉尔夫·巴顿（Ralph Barton）来画插图——唐纳德·斯图尔特的一本书，以及安妮塔·卢斯[注]1925年的畅销幽默作品《绅士都爱金发女郎》（*Gentlemen Prefer Blondes*），都是由巴顿来配插图的。他预测《春潮》注定会卖到20000册以上——当然，这需要出版社的认真对待。[注]

当然，舍伍德·安德森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博尼-利夫莱特出版了《春潮》，就相当于对自己最赚钱的一位作者捅了一刀。“我认为任何事业有成的人都不会被讽刺作品伤害到。”海明威争辩道。这是在暗示，如果安德森感觉受到了冒犯，他就太脆弱了。

海明威催促利夫莱特尽快做决定。“如果你不打算出版这本书，我还可以提供一些别的选择。”他也对利夫莱特明说，自己已经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正在修改稿子，但海明威没有提及《太阳照常升起》也在暗中“阴”了另一位利夫莱特的作者哈罗德·勒布——那个当初勤勤恳恳介绍海明威进入这家出版社的人。

海明威让利夫莱特把回信寄到施伦斯的陶博旅店，他和哈德莉打算在那里待上三个月。几天后，海明威一家前往奥地利，第二次在施伦斯小镇度过了冬季假期。很快宝琳·菲佛加入了他们，最后约翰·多斯·帕索斯也去了。

一家人一到那里就陷入了两英尺厚的雪中。在陶博旅店安顿好后，海明威读书、滑雪、打扑克，同时等待着一段在所难免的人生剧情渐渐

展开。

海明威可能真心认为《春潮》是一部讽刺佳作，不过用他的朋友迈克·施特拉特尔（Mike Strater）的话说，这本书更有可能“是用来破坏合约的，很冷血”[注]。

“我一直都明白，（利夫莱特）不可能也不能够出版这本书，因为它拿（出版社）最畅销的王牌作者开了拙劣的玩笑。”海明威在施伦斯时致信菲茨杰拉德说。他又赶忙补充道：“不过，我当初写它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注]在过去的一年中，海明威无休止地提示朋友们，如果博尼-利夫莱特出于任何原因没有接受他的下一本书，那么该出版社对于他后续作品的优先选择权也就失效了。所以说，如果利夫莱特拒绝了《春潮》，它也就失去了关于出版《太阳照常升起》的任何权利。这样一来，海明威就可以投入一家更有名望的出版社的怀抱，也就是麦克斯韦·柏金斯所在的斯克里布纳出版社。他给利夫莱特的信既表现了一位饥渴的年轻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莫名自信，妄想自己的书能够大卖；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视作一封居心叵测的信，旨在挑战一家出版社的底线。

海明威摆脱利夫莱特的计划，可能离不开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出谋划策。两人那年秋天在巴黎再次见面，一起喝了香槟（应该是菲茨杰拉德买的单）。[注]他们两个交往“甚厚”，菲茨杰拉德告诉柏金斯。[注]他开始继续提携海明威，为《在我们的时代》写了一篇书评，想让这本书卖得更好一些。同时他还（用约翰·多斯·帕索斯的话说）“不知疲倦地从中搭桥，请求麦克斯·柏金斯把海明威弄到斯克里布纳去”[注]。到了12月，菲茨杰拉德读了《春潮》，果真致函贺拉斯·利夫莱特和社里的一位编辑，赞美了这本书的优点。

“至少在我这个目中无人的读者看来，《春潮》大概是美国人写过的最好的一部幽默作品。”菲茨杰拉德对他们说。话虽如此，他却并不

希望利夫莱特会喜欢这本书："我算是一个为斯克里布纳赚吆喝的人，我希望看到的是，有一天我敬重的这一代人都能会集到同一屋檐下。"[注]

海明威在施伦斯时，每周都和菲茨杰拉德通信。等待利夫莱特的回音时，他得了重感冒，但还是把力气都花在了滑雪和打台球上。他也开始修改《太阳照常升起》，多年后描述说这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重写工作"[注]。他在施伦斯所做的一些加工包括让故事剥离杰克的第一人称视角，但不久海明威就放弃了这一努力。不论怎样，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这部小说，想让它"好得要命"。[注]

不久，帮他修改小说的人来了——宝琳·菲佛在圣诞节期间到达了施伦斯。12月初，凯蒂·坎奈尔曾在巴黎的一条街上见过这样的奇景：身材娇小的宝琳拖着一副雪橇，身上还穿着路易斯·布朗热（Louise Boulanger）设计的时髦套装。

宝琳告诉坎奈尔，自己要和海明威一家人共度冬季假期。坎奈尔吃了一惊，"我没意识到他们已经这么熟了。"她后来写道，并担心宝琳会在滑雪坡上跌断她"小鸟一样脆弱的骨头"。坎奈尔可能是多虑了，宝琳比她看上去的样子坚强多了。

后来海明威称，宝琳不是去施伦斯滑雪，而是去"谋杀"[注]他的婚姻。她蓄谋已久，早就开始了把他从哈德莉那里抢走的计划，起初是"渗透"。海明威在书里说这是最古老的手段："一个未婚的年轻女人暂时成了另一个已婚年轻女人的朋友，进入了夫妻俩的生活，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貌似无辜而又毫不留情地把那个丈夫据为己有。"

他和哈德莉尤其禁不起这种手段：当时海明威花了大量时间修改《太阳照常升起》，这意味着在海明威工作的时候，哈德莉需要一个伙伴，而宝琳确实貌似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每天工作结束后，就有两

个女人同时勾引他。他后来写道："其中一个是新颖、特别的，如果他运气特别差的话，会同时爱她们两个。"

"所以，两人之中谁更无情，谁就能取胜。"

虽说是勾引，也要双方你情我愿才能成功。宝琳早就名声在外，是远近闻名的"猎男者"，专门拆散别人家庭。不过她也有一些优势，明显鼓舞了海明威反过来去追求她——她是富家女[注]，而海明威始终穷得毫无翻身之力。她在海明威家愈加频繁地出现，正值哈德莉的重要性下降之时：海明威即将取得突破（终于！），栖身文学的上流，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终于可以不再依赖哈德莉了。她那点儿正在缩水的信托基金，甚至无法支持两个人曾经创造的那个"简单快乐的世界"；海明威可能还感觉到，哈德莉不适合更大舞台上的生活。[注]

不知海明威和宝琳是在施伦斯的时候就有了肢体交流，还是在几周之后才苟合的。但当宝琳离开奥地利时，她和海明威夫妇至少在感情上已经形成了三角关系。自从她赞美《春潮》，得到了海明威的信赖后，宝琳如法炮制，也成了《太阳照常升起》修稿工作的重要参与者。每天晚上，海明威都把修改的部分读给她听，她则提供一些编辑修改的意见。[注]对于他的事业进展，她投入了越来越多的情感。

我们不清楚哈德莉是否也参与了这些"晚间研讨会"（虽然她一向会评论丈夫手头的作品）。此时的她似乎生活在一种愉快的无知中，不过那年冬天她或许也意识到了，她周围的棋局似乎正在重新排布，自己似乎也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回到巴黎后，凯蒂·坎奈尔在路上偶遇哈德莉，"若无其事地"问她宝琳去施伦斯后他们玩得怎么样。哈德莉认定坎奈尔知道事情原委，坎奈尔推说不知道。

"她要夺走我的丈夫了。"哈德莉说。[注]

圣诞节过后的第五天，海明威最好的圣诞礼物到了。12月30日，贺拉斯·利夫莱特发来电报：

拒绝春潮

恭候太阳照常升起全稿[注]

在随后的信中，利夫莱特毫不留情地告诉海明威，过去几周，《春潮》在博尼-利夫莱特闹得沸沸扬扬，社里每个人都被叫去读稿。出版社甚至还招来了几位“完全中立”的外界读者对这本书发表意见。客气地说，汇总的意见并不正面。

“你觉得到底有谁会买这本书？”利夫莱特问，“你的看法，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看法，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和多斯·帕索斯的看法，我们不同意，这不是一部优秀、幽默的美国讽刺作品。”

利夫莱特还说，《春潮》“粗糙得过分”，“居心叵测”，“品位极其败坏”，也许最坏的一点是，它“毫无感情”。[注]

海明威预测这本书能轻易卖出20000本，但是利夫莱特难以想象会有七八百位读者舍得为这本书掏腰包。另外，书商们订购《在我们的时代》的唯一原因，就是封面上那些备受海明威诟病的推荐语——这给了海明威一个警示：至少在他的出版商眼中，此时他身上最具销售价值的仍然是那些更有名的作家的支持。还需要明确的是，缺乏宣传并不是《在我们的时代》销量不好的原因；说白了，是大众读者并不买账。

“等你有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后，《在我们的时代》会畅销的。”利夫莱特预测。[注]

一如既往，所有的一切都被归结为海明威缺少一部长篇小说。利夫莱特阐明心意，仍然希望海明威能把《太阳照常升起》交给博尼-利夫

莱特出版。毕竟，这家出版社投资了他的“长远前途”：出版《在我们的时代》，正是为了拿到那只下金蛋的鹅。

但是，海明威却无意把小说交给他们。

“我解放了，”他立即写信告诉菲茨杰拉德，从利夫莱特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感觉好极了，“接下来我该如何做，就随你安排了。”注

他告诉菲茨杰拉德，现在还有其他出版商对《太阳照常升起》感兴趣，其中包括阿尔弗雷德·哈考特，后者由衷期望这是一本能够震动全国的书。海明威还说，还有一位编辑找过他，这位编辑来自另一家参与竞争书稿出版权的出版社，克诺夫出版社。海明威认为哈考特尤其是个“靠得住”的选择，因为阿尔弗雷德·哈考特实际上为他提供了十分优厚的条件，认定海明威的作品可以不经评估，直接全收。但即便如此，海明威仍觉得他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

“我不会背叛你和麦克斯·柏金斯，我和你们已经有言在先了。”他写道。

海明威建议菲茨杰拉德写信给柏金斯，告诉后者目前的情况，并且再次为《春潮》说好话（就像他之前在写给利夫莱特的信中所做的那样）。他还得告诉柏金斯，海明威正在打磨《太阳照常升起》，它“好得要命”，修改工作用不了几个月就能完成，到秋天就能出版。

“当然，我只能这样冒昧、直率地依赖你的好意。”海明威带着歉意对菲茨杰拉德说。

菲茨杰拉德热情洋溢地把事情转告了柏金斯。这就是他们一直期待的时刻：海明威带着他的重磅长篇小说闪亮登场。但是，还是有件不愉快的小事要说。

“那部讽刺作品必须先出版，他寸步不让。”菲茨杰拉德告诉柏金

斯。注

它可能只能卖出1000册，菲茨杰拉德预测，但这是值得的，因为那部长篇小说确乎是个“了不起的东西”。竞争的出版社是有的，但是菲茨杰拉德有信心，海明威将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彀中之物。

收到利夫莱特退稿信的一周后，菲茨杰拉德又一次给柏金斯发电报，催促他赶快出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哈考特已经给出了最终的出价。

出版糟糕讽刺作品即可得到海明威长篇终稿……勿谈条件，立即出价注

柏金斯迅速行动。他给菲茨杰拉德回电报：

出版长篇百分之十五注且预付金可商议 同时出版讽刺作品 海明威小说

极好 无价格异议即可出版注

紧随电报而来的是柏金斯的一封信，信中他很懊恼，因为觉得可能错失了争取到海明威作品的机会。《春潮》不加审议就予以出版，出版社内部对此有所顾虑，因为“某些种类的书显然不符合斯克里布纳的出版政策”，但他现在认为这个风险是值得冒的。如果不是因为上述情况，他本该立即回电报的，现在他害怕这一延迟可能是“致命的”注。

“如果我们能得到那本小说，”他写道，“那该多好！”注

柏金斯的处境很奇特：他在努力争取一部他从来没有读过的作品，而作者在美国出版的唯一一本书销量惨淡。柏金斯对这本书的把握，纯

粹依赖菲茨杰拉德的十足信心，以及柏金斯自己在《在我们的时代》中大略翻看过的短篇小说和故事片段。即便如此，他也发觉这些故事“构思精巧”，“读起来如沐清风”[注]。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感受。用罗伯特·沃尔夫的话说，不论是在纽约还是在巴黎，海明威着实是前所未有的。

“人们开始谈论他的作品，”柏金斯对菲茨杰拉德说，“那些能从他的作品中获取所需，并不只是关注作品的纯粹文学价值的人，才是真正务实的人。”[注]

虽然《太阳照常升起》目前还在修改中，施伦斯的三角恋情也还在继续，但是关于这部小说的消息已经让海明威从一个无人问津的时代旁观者变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海明威决定亲自去纽约坐镇所有的谈判。他有商人般的精明，知道不能让场面冷下来。如果他在施伦斯干等，讨价还价之间可能几个星期就白白耗费掉了。成了抢手货的他最好出现在事件中心。火已经点燃，要继续煽风加油。海明威即将来到纽约的消息会继续增添他的传奇色彩，也能让他的小说更加令人期待。另外，海明威在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表明，他感觉利夫莱特打算攥住自己（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所以最好能和贺拉斯当面把事情解决了。

纽约之行的准备工作，需要高风险军事入侵那样的精密部署。海明威写了一封严肃的信，明确告知利夫莱特，他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后续作品的优先选择权。海明威对利夫莱特团队的判断力说了一些决绝的话。

“贵社对哈罗德·勒布的一本小说《杜达布》也情有独钟，我觉得它是一本名噪一时的作品，它的成功甚至只是依靠声誉取得的。”为了提醒利夫莱特他拒绝《春潮》的决定有多么短视，海明威还说：“你也知道，我会继续写作……我可能把自己努力的成果托付给任何一家出版社，最终也可能从任何一家出版社那里赚得大笔财富。”[注]

但同时，他也不想让利夫莱特就此放弃他的小说，在自己忙着鼓弄一本畅销大作的同时让利夫莱特作壁上观。既然开了局，就要所有人都进来。因此，他通知利夫莱特他不久会到达纽约，期待与对方见面。

同一天，菲茨杰拉德请麦克斯韦·柏金斯做好准备，迎接海明威。他告知编辑，利夫莱特可能会力争保住海明威，但利夫莱特的立场是，《春潮》不算是一本真正的书——这是一个不稳固的立场，菲茨杰拉德提醒说，利夫莱特显然“疯狂地”想弄到海明威的长篇小说。但话说回来，海明威也同样疯狂地想摆脱利夫莱特。[注]

“听他的口气，你会以为利夫莱特砸了他家，抢了他几百万美元。”菲茨杰拉德说。

另外，菲茨杰拉德还提醒柏金斯，他应该知道海明威变化无常的脾气。

“他很容易激动，”菲茨杰拉德写道，“而且我不能保证下个月他来的时候是头脑清醒的。”在另一封信中，菲茨杰拉德提醒柏金斯，海明威可能“会在生意上意气用事”，所以强烈建议柏金斯为《太阳照常升起》“弄一份白纸黑字的合同”。[注]

这里应该再补充一句，他们的交往注定会名垂青史。

“你会忍不住喜欢他的，”菲茨杰拉德向柏金斯保证，“他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伙计之一。”[注]

---

1. Ernest Hemingway to Ernest Walsh, ca. September 21,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90-91.

2. Ibid.

3. Ernest Hemingway, first draft of *The Sun Also Rises*, Notebook VI, item 194,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4. Ernest Hemingway, first draft of *The Sun Also Rises*, Notebook VII, item 194,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显然，海明威琢磨了一番结尾的这句话究竟该怎么写。在同一页底部，他用了另一种说法：“就这么想想不也挺美吗？”（最终稿里他也是这么的写的。——译者注）

5. Duff Twysden to Ernest Hemingway, undated, series 3, Incoming Correspondence,“Twsyden, Lady Duff,”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6.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45-46. 当斯图尔特到洛杉矶的米高梅工作室报到时，没有一个人“关于我是谁有丝毫的概念”，斯图尔特说。这给他的激情泼了一盆冷水。Ibid.,146.

7. 勒布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两位女士，她们是一家白俄俱乐部的女招待，勒布称她们为“维拉女公爵和克里奥佩特拉亲王夫人”。这是一场为时两周、以鱼子酱和伏特加为“燃料”的“大派对”。Loeb, *The Way It Was*, 299. 正如圣佛明奔牛节给了海明威写作《太阳照常升起》的灵感，勒布后来也把这两周的经历写成了一部小说——《喜爱伏特加的教授》（*The Professors Like Vodka*）,1927年由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出版。

8. Ibid., 300.

9. Loeb, “Hemingway's Bitterness,” 125.

10. 这是一句谚语。埋掉斧头是一种印第安风俗，打仗之后，战斗双方会一起埋掉各自的斧头，表示和平修好。——译者注

11. Ernest Hemingway to Howell Jenkins, August 15,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74.

12. Loeb, *The Way It Was*, 300.

13.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9.

14.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54.

15.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9-50.

16. “节庆”的原文“fiesta”是一个从西班牙语引入英语的词。——译者注

17. Ernest Hemingway, foreword to *The Sun Also Rises*, “The Lost Generation: A Novel,” item 202c,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8. 法语，意为“这是迷惘的一代人”。——译者注

19. Ibid.

20. 海明威在写于沙特尔的前言中称，斯泰因是在1925年9月21日他完成《太阳照常升起》初稿之后告诉他这番关于“迷惘一代”的车库对话的。我们难以确定，在小说初稿完成前，他是否也曾透过“迷惘一代”的棱镜重新审视过他的故事材料。Ernest

Hemingway,foreword to The *Sun Also Rises*, “The Lost Generation: A Novel,” item 202c,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21.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61.

22. 起先“共产主义”也被加入了这一系列遭受否决的信仰中，但后来他改变主意，把它画掉了。Ibid.

23. Ibid.

24.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62.

25. 在数十年后写成的《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又回到了这个主题上，写到轮转的命数和更替的世代。在海明威的葬礼上，《传道书》甚至被大声朗读了出来。Gregory H. Hemingway,M.D., *Papa: A Personal Memoi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6），119.

26. 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 ca. late September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96.

27. Ernest Hemingway to Harold Loeb, ca. early November 1925, reprinted ibid., 407.

28. Ernest Hemingway to Horace Liveright, May 22, 1925, reprinted ibid., 339.

29. 传记作者们通常认定《在我们的时代》的出版日期是1925年10月5日，但是据一本较早的海明威官方传记（由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于1951年出版成书）所说，《在我们的时代》的出版日期是1925年9月15日。Samuels, *A Hemingway Check List*, 9. 在1925年9月末寄出的两封信中，海明威分别告知自己的父亲和埃兹拉·庞德，该书的出版日期是10月1日，后来他又对父亲说是10月10日。

30. 指出海明威和格特鲁德·斯泰因的风格之间存在“明显”关系的媒体包括《新共和》和《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Reynolds, *Hemingway: The Paris Years*, 328.

31. The New Republic, quoted ibid.

32. Robert Wolf, review of *In Our Tim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February 14, 1926.

33.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April 8,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34. 哈考特与友人唐纳德·布雷斯（Donald Brace）共同创立了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该社曾出版过辛克莱·刘易斯、弗吉尼亚·伍尔夫、T.S.艾略特等英文名家的作品。——译者注

35. Alfred Harcourt to Louis Bromfield, late fall 1925, quoted in 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December 31, 1925-January 1, 1926,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459. 显然布罗姆菲尔德把哈考特信中的内容抄寄给了海明威，而海明威又告诉了菲茨杰拉德。

36. Harold Loeb to Ernest Hemingway, undated, series 3, Incoming Correspondence,“Loeb, Harold,”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37. Ernest Hemingway to Horace Liveright, June 21,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52. 关于利夫莱特请求海明威做文学猎头一事的具体内容，参见Gilmer, *Horace Liveright*, 122。

38. Ernest Hemingway to Harold Loeb, ca. early November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407-8.

39. 《暗笑》问世于1925年9月15日。有关它的出版时间和销售数据，参见Gilmer, *Horace Liveright*, 114-15.

40. Anderson, *Sherwood Anderson's Memoirs*, 363.

41. Sherwood Anderson to Horace Liveright, April 18, 1925, reprinted in Jones,*Letters of Sherwood Anderson*, 141-42.

42. Anderson, *Sherwood Anderson's Memoirs*, 474-75.

43.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December 30, 1925,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对安德森新作的负面评论，可能是一场更为广泛的抵制安德森风习的具体征候。虽然凯·博伊尔曾说安德森就像是旅居作家群中的一位文学偶像，但是西尔维娅·毕奇后来也回忆道，“年轻作家对舍伍德·安德森的评价很苛刻，他的追随者数量减少，自己蒙受了很多的批评”。但不管怎样，“他是一位先行者，无论20年代的那一批作家是否承认，他们都欠着安德森很大的一笔恩情”。Beach,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32.

44.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60.

45. 在《春潮》的正文中，海明威告诉读者，这本书是在10天的时间里写成的。不过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写这本书实际上只用了6天。Ernest Hemingway to Isidor Schneider,June 29,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91.

46. 海明威在1926年3月30日写给艾德温·L. 彼得森（Edwin L. Peterson）的信中解释了他对于安德森的想法。Reprinted ibid., 44-45.

47.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70.

48. 让小说的叙述者直接与读者对话，这是某些传统小说的常用写作手法。比如《简·爱》（1846）的经典结尾：“亲爱的读者，我嫁给了他。”《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则在叙事进程中转向读者：“亲爱的读者，请你想象一下自己的亲人将被卖作奴隶时的焦急。”直观上说，这种手法在文字情感的传达上比较刻意，过于赤裸地显露作者对于故事情感、情节乃至阅读行为的操纵，在现代作者看来确实有矫情和自命不凡之嫌。——译者注

49. Ernest H emingway, *The Torrents of Spring: A Romantic Novel in Honor of the Passing ofa Great Race* （New York: Scribner, 2004）, 68.

50. Ibid., 76-77.

51. Ibid., 75.

52.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59.

53.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76-77.

54.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57.

55. 墨菲夫妇常常会做“这伙人”作品的听众。菲茨杰拉德曾说，他尤其渴望莎拉的赞许；唐纳德·斯图尔特也常常会带着稿子去墨菲夫妇家，在写《哈道克夫妇在国外》的时候他经常把稿子念给他们听。“我每个晚上都会带上一天所成去墨菲家的公寓，吃完晚饭就读给他们听，”他写道，“我仿佛依旧听得见莎拉沙哑得刚刚好的笑声。” Ibid., 130.

56. Tomkins, *Living Well Is the Best Revenge*, 25.

57. Ernest Hemingway to Harold Loeb, ca. early November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408.

58. Hawkins, *Unbelievable Happiness and Final Sorrow*, 44.

59. Ibid.

60. Sokoloff, *Hadley*, 83.

61. 安妮塔·卢斯（Anita Loos，1889—1981）：美国著名作家、演员、影响力极大的电影编剧。——译者注

62. Ernest Hemingway to Horace Liveright, December 7,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434.

63.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60.

64. 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December 31, 1925-January 1, 1926,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459.

65. Ernest Hemingway to Harold Loeb, ca. early November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407

66.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ca. December 30, 1925, reprinted in Bruccoli, *F. Scott Fitzgerald: A Life in Letters*, 133.

67.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76.

68. F. Scott Fitzgerald to Horace Liveright and T. R. Smith, December 1925, reprinted in Bruccoli, *Scott and Ernest: The Authority of Failure and the Authority of Success*,29-30.

69.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118.

70. Ernest Hemingway to Isabelle Simmons Godolphin, December 3,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426.

71.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215-16.

72. 大约这个时候，宝琳的信托基金刚刚被她的叔叔格斯加码到了60000美元，这相当于如今的815000美元。根据露丝·A.霍金斯的描述，宝琳信托基金的收入每月大约有250美元，约合如今的3400美元（*Unbelievable Happiness and Final Sorrow*, 47）。

73. 用瓦莱丽·海明威的话说："哈德莉不喜欢众人瞩目的生活。她不喜欢每天晚上都出门。她养育了海明威，他却成长到了她无法承受的地步。然后宝琳来了，说：'我要和欧内斯特在一起。'宝琳有的是钱，保姆、管家之类的，完全不在话下。"（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December 20, 2013.）

74. Hawkins, *Unbelievable Happiness and Final Sorrow*, 46. 虽然宝琳的具体意见已经无从查证，但是据霍金斯说："这本书很可能因宝琳受益颇多，这不仅是因为她的编辑技巧，还因为她不曾参与过潘普洛纳奔牛节，所以可以用一种旁观者视角来审视这本书。"（Email to the author, March 7, 2015.）

75.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6.

76. Cable from Horace Liveright to Ernest Hemingway, December 30, 1925, reprinted in Gilmer, *Horace Liveright*, 123.

77. Horace Liveright to Ernest Hemingway, December 30, 1925, reprinted ibid., 12325.

78. Ibid.

79. 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December 31, 1925-January 1, 1926,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459-61.

80.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ca. December 30, 1925, reprinted in Bruccoli, F. Scott *Fitzgerald: A Life in Letters*, 134.

81. Cable from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January 8, 1926, F. Scott Fitzgerald Files,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82. 这里指百分之十五的版税率。——译者注

83. Cable from Maxwell Perkins to F. Scott Fitzgerald, January 8, 1926, F. Scott Fitzgerald Files,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84. Maxwell Perkins to F. Scott Fitzgerald, January 13, 1926, F. Scott Fitzgerald Files,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85. Maxwell Perkins to F. Scott Fitzgerald, February 3, 1926, F. Scott Fitzgerald Files,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86. Ibid.

87. Maxwell Perkins to F. Scott Fitzgerald, February 3, 1926, F. Scott Fitzgerald Files,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88. Ernest Hemingway to Horace Liveright, January 19,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22.

89.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ca. January 19,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90.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ca. March 1,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91. Ibid.

10
多萝西·帕克的威士忌

等待着海明威穿越大西洋的冰海，麦克斯韦·柏金斯心中一定十分忐忑不安。他并非担心海明威的脾气——往后的很多年，柏金斯将会表现出与善变作者相处的出色能力——而是担心自己为了把这样一位现代作者纳入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社，会引发多少内部争斗。

“这是所有出版社中最文雅、最中规中矩的一家，从维多利亚时代营业至今。”如作家马尔科姆·库利所说：“不适合一个年轻女孩阅读的内容，不会在斯克里布纳出版的书里出现。”[注]

这一评价或许夸张，但并非无稽之谈。早期的斯克里布纳出版的是宗教书籍：《新教徒和他们的教义》就是1846年由斯克里布纳印出来的第一本书，紧接着出版的书目中也是一些时兴的讲道者[注]作品。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的继承者们逐渐进入虚构写作的领域，拢络了一些声名显赫的作家。伊迪丝·沃顿1899年在该社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说《高尚的嗜好》（*The Greater Inclination*），此后一直是斯克里布纳的明星作者。她的加入表明斯克里布纳虽然有清教的根源，编辑们还是会偶尔打破一下社会的常规伦理——毕竟沃顿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写的是社会丑闻、通奸和毒品滥用。

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即使沃顿也褪去了现代的色彩。用旅居作家凯·博伊尔的话说，战后的一代人认为沃顿和她那些同辈已经变得“沉闷”而“衰竭”。[注]沃顿为出版社拍的照片——盛装打扮，仿佛准备参加舞会，满身珠玉，用一条维多利亚式的头巾利落地挽起头发——就透露

了你需要知道的一切。“过去那个世纪最受尊敬的作家，也很难逃脱这样的命运。”博伊尔说。沃顿进了过时者的名单。对于博伊尔和她那些年轻的作家同仁来说，詹姆斯·乔伊斯是入时，而亨利·詹姆斯是过时。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已成为过去时，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是现在时。时运变迁就是如此迅速。

20世纪20年代的10年为麦克斯韦·埃瓦茨·柏金斯和他比较有前瞻性的同事带来了很大挑战。这就像走钢丝一样，既要让传统读者满意——沃顿的书每年仍能卖出成千上万本——同时也要引入新一代的作者，而这些人大部分会公开挞伐有维多利亚味道的作品。

乍看上去，麦克斯·柏金斯不像一个可以革新一家出版社的人，更不像一个为主流读者带来现代文学新时代的人。

“麦克斯是一个混合体，他极其文雅，有着女性的敏感、岩石的顽固、清教徒的严格，是清教徒和骑士的混合。”柏金斯在斯克里布纳的前同事约翰·霍尔·惠洛克回忆说。(注)

正如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社本身，柏金斯的家世背景非同一般，他出身于新英格兰的高门大户，其家族一度占据了《美国名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中的14页，学术界、政界要人辈出。柏金斯1884年生于纽约，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校时参加过非常精英化的社团。他的一大特点是说话时似乎达不到应有的力度——他只用半边嘴说话，如今他还有至少一位后裔继承了这种面部抽搐的特征。

即使家世显赫，有光鲜的履历，早年的柏金斯仍然做好了迎接人生中所有可能性的准备，对一切怀有广泛的兴趣。在哈佛完成学业后，他成为《纽约时报》的见习记者。他刊载于报纸的报道，透出一股对莽撞、冒险精神的偏爱。在一篇报道中，他跟随一位赛车手打破纪录。一时间车里冒出的烟和火，成了柏金斯文章中的重头戏。在另一篇报道

里，他自愿体验新新监狱[注]的电椅。若说海明威的记者履历为他的小说提供了素材和风格方向，那么柏金斯做过的报道则让其懂得了普通人的情感：象牙塔里的人和大街上的人，他们喜欢的都是什么。即使柏金斯不用亲自去冒险玩命，他也钟爱零距离的观察。对超凡乃至离奇的技艺，他总会不假思索地予以报道。

最终，柏金斯觉得自己应该活得正常点儿，他的未婚妻也这么认为。刚刚加入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时，他担任营销经理——这一经历将和他在《时报》的冒险经历一样意义非凡。如果说报道工作教会了他如何辨别好故事，那么营销上的悟性则让他可以辨别那些能够热卖的故事。他不仅拥有“绝佳的（编辑）直觉，就像音乐家的耳朵一样灵敏，他还有经商的性格”，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三世说。[注]柏金斯默默无闻了将近10年，但接下来的一件事将表明，他是一位带来变革的使者。

斯克里布纳的编辑团队每月开一次例会，会上每位编辑要展示一本他想出版的书。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最后拍板的当然是老查尔斯·斯克里布纳（Charles Scribner Sr.，即“老C.S.”）和儿子小查尔斯·斯克里布纳（Charles Scribner Jr.）[注]。1919年9月的一个下午，柏金斯带来了一本他希望出版的书。公司已经否决了他两次，但是他和该书作者密切合作，不懈修改，现在手稿又准备好接受审议了。柏金斯认为，这是一部非常新颖的作品。书名是“人间天堂”，作者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编辑们立刻分裂成了几派。

“如今看来，《人间天堂》似乎纯真无邪，但在当时，它是新时代令人胆战的声音。”作家马尔科姆·库利回忆说。[注]斯克里布纳的一位编辑看过之前版本的手稿，“完全无法忍受它”[注]。但是另一位社员觉得它虽然有“严重的缺陷”，但“确实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属于一个新的时代”。[注]

老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属于不信服《人间天堂》的那一派。

“这是一本轻浮的书，”会议中他表示，“我不会让一本轻佻的书出现在我的出版书目里。”

柏金斯一直站在他身后，后者仰起头看他：“你觉得它怎么样？”

柏金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他特有的沉静语气说：“我觉得，斯克里布纳先生，如果我们错过一本这样的书，我们就应该散伙关门，退出出版业。”

这话令斯克里布纳很不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柏金斯回答，公司的业务不能简单依赖“传统卫道士作者”来维持，只出版西奥多·罗斯福[注]、理查德·哈丁·戴维斯[注]、亨利·凡·戴克[注]的作品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需要与时代共进。”[注]

据说这一逻辑触动了斯克里布纳，他对柏金斯说，他需要再考虑一下。最终，他批准了柏金斯出版这本书，但是手稿中的一些内容必须修改。于是，柏金斯把现代文坛的第一位“文学坏小子放入了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出版堡垒”中。[注]很快，他又放下吊桥迎来了另一位“坏小子”，作家林·拉德纳，后者是菲茨杰拉德早年在长岛的朋友兼邻居。社里就拉德纳1924年的作品《怎样写短篇小说》（*How to Write Short Stories*）产生了争执[注]，然后又针对是否接受《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烽烟再起——这本书里面有“狗娘养的”一类难听的脏话，以及其他引发争议的内容。两次争论柏金斯都占了上风。

但如今，第三位“坏小子”来了，这一位明目张胆地宣扬现代情怀。先前，菲茨杰拉德笔下的虚构世界可能烦扰到了社里一些比较古板的编

辑，但他的文笔至少还带着那种令人安心的浪漫主义风格；而拉德纳是一位明白易读的幽默作家，是读者心目中早已久违的喜剧人物。

但海明威是一个来自陌生土地的陌生人，想把一个震撼人心的现代世界蓦然摆在大众面前，不加任何抚慰人心的风格修饰。用野蛮、褪尽了浮华的文体，写出赤裸、血腥的内容。他的文字中没有荫凉，没有一个形容词能为读者遮挡炽烈的太阳。而且和波莱特·阿施利夫人相比，菲茨杰拉德笔下的黛西·布坎南和乔丹·贝克简直纯洁得如同圣女。

如果柏金斯能成功地从贺拉斯·利夫莱特那里挖走海明威，并击败其他竞争对手，他还得面对自己出版社内部的质疑。如果他真能出版这部长篇小说，就可能会把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推到一片严酷、陌生的20世纪疆域，那里还不曾有其他的美国出版社冒险涉足。

1926年2月9日，海明威乘坐“毛里塔尼亚号”（the *Mauretania*）抵达纽约。整座城市覆盖在将近一英尺厚的白雪之下，但什么也挡不住他去践行使命。

来到曼哈顿，海明威就踏进了菲茨杰拉德的领地。虽然菲茨杰拉德已经离开这里一年了，但是他的痕迹在这座城市中依然随处可见。一出改编自《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戏剧刚刚在百老汇上演，派拉蒙公司（Paramount）也有一部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电影即将上映。柏金斯观看了戏剧的一场预演，回去报告菲茨杰拉德，观众们将这出戏称为“奇迹”和“天才作品”。(注)

和巴黎一样，纽约的社交界也由一些互不重叠的圈子组成。富裕的曼哈顿上城区就如同繁华的巴黎右岸，富豪大酒店（Regal Plaza Hotel）像丽兹酒店般守护着这片富人区。格林威治村则好比巴黎的左岸，洋溢着相似的不拘常规的灵感、魅力和腐坏。

海明威来到位于第五大道南端的布雷武特旅馆（Hotel Brevoort），它地处格林威治村的心脏地带，旅馆的露天茶座就好比多摩咖啡馆在蒙帕纳斯文学圈内分演的角色。和多摩一样，布雷武特旅馆常常沦为文人们装腔作势、卖弄品位的第一现场，不过它仍然备受纽约文坛高层和来访的国际名人青睐。如果运气好，顾客可以看到《名利场》杂志的创办者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在餐厅吃饭，不远处的一桌坐着时尚编辑卡梅尔·斯诺（Carmel Snow）。光顾这里的还有支持女性解放的红发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以及形形色色的欧洲王室成员和政客。这里确实应该是有志青年小说家初次登上社会舞台的地方。

海明威要办的第一件事，是和博尼-利夫莱特一刀两断。他不顾积雪，从布雷武特旅馆出发，穿越了40个街区，径直赶往利夫莱特办公的那座褐色砂石楼。海明威对《春潮》的处境感觉不妙，因此，人们都觉得他和贺拉斯·利夫莱特会来一场血腥的拳击，用决斗的方式解决问题——或者至少是一次激烈的对峙。但是他们最终的会面却格外文明。几位出版社的编辑——可能正是那些贬低过《春潮》的人——友善地迎接了海明威。注

贺拉斯·利夫莱特本人坚定而友善地重申了他拒绝《春潮》的理由。他告诉海明威，等《太阳照常升起》写成，他仍然希望该书能由他来出版。

这显然是想多了。海明威也坚定地回答，利夫莱特对于自己的其他作品没有合法索求的权利。在利夫莱特那些促成此次会面的信件中，他的语气就好像要真刀真枪留住海明威似的；但是一旦他真的和海明威面对面坐下，声势似乎就退去了。利夫莱特退让了，海明威正式获得了自由，分开之前两个人甚至还喝了两杯酒。

“现在我们互称彼此为‘贺拉斯’和‘欧内斯特’了。（我）对他说我是

如何遗憾，云云。”事后海明威在给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的信中写道，并没有丝毫遗憾之情。[注]

不过，贺拉斯·利夫莱特很快就会感到非常非常后悔。在1926年那寒冷的一天中为了舍伍德·安德森而放弃海明威，这对出版社来说确实是看似安全的选择，甚至是明智的选择。这一步错棋的严重后果，在10年之后才显现了出来。到20世纪30年代初，海明威成了一个文学偶像人物，而安德森的星光已经近乎隐匿于无形。

利夫莱特自己的星光注定沦落得更深。到了1930年，积年的无序管理和失败投资之后，他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出版社（虽然出版社保留了他的名字）。之后，他退化成了一个破落的名人。

“最后他成了一个装模作样的人，你能在阿尔冈琴会找到他，看他坐在桌前掸烟嘴，先前信心满满的利夫莱特，只剩下一个淡影。”同为出版商的贝内特·瑟夫[注]回忆说。

三年后，利夫莱特死于肺炎和过度饮酒的并发症，享年46岁。只有几位他从前的作者参加了葬礼。海明威没有去。

“这是一个传奇生涯最凄凉的落幕。”瑟夫说。[注]

见过利夫莱特的第二天，海明威又一次踏雪去了上城区，这次是去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的办公室，位于纽约第五大道和48街的交叉口。这家出版社正如整个纽约一样，被所有关于菲茨杰拉德的东西占据了，后者的第三本短篇小说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All the Sad Young Men*）马上就要出版了。海明威走进大楼和柏金斯见面，经过的一楼商店里陈列的都是菲茨杰拉德的书，橱窗上贴满了百老汇戏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剧照。[注]

海明威本打算挑起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和哈考特之间的竞逐，但在他

离开柏金斯的办公室时，已经放弃了这一想法。柏金斯读了《春潮》，谈话中，他给《春潮》和《太阳照常升起》各开出了1500美元的预付金，并给出了百分之十五的版税率。

“他写了一份非常漂亮的合同，他这个人真是太他妈的好了。”海明威在给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的信中说。注

海明威不仅当场接受了报价，甚至还提出柏金斯可以买断他未来的作品，不过柏金斯推辞了。注这两个男人的会面大概并没有以几杯小酒结束，不像海明威和利夫莱特的商谈；海明威可能摆出了自己最文雅的举止——柏金斯家族的新英格兰式仪态一贯使得作家们以礼相待。

柏金斯很享受这次会面。他的新作者令他很高兴。“一个有趣极了的伙计，又是斗牛啦，又是拳击啦。”他向菲茨杰拉德写道。注而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他牵线搭桥的两个人如此投缘，这样的结果很让他激动。“你得到了海明威我很高兴。”菲茨杰拉德回信说。他带给柏金斯的是福是祸，现在仍然难见分晓。

“海明威将决定我的引荐究竟是在帮忙，还是在添乱。”菲茨杰拉德还说。注

和柏金斯谈妥了生意之后，海明威给比尔·史密斯和哈罗德·勒布各寄了一封喜气洋洋的信，大谈他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新合同细节。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具体内容他却还是绝口不提，但谈到自己一定是“疯了”，竟让朋友们读了《春潮》。他还告知勒布，《在我们的时代》反响蛮好，实际上《杜达布》也不错。“齐头并进，”他写道，“我们作家就应该相互扶持。”注

海明威也局促地拜访了阿尔弗雷德·哈考特。“我本应该扮演生意人的角色，尽管去打探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针对斯克里布纳的报价会做出什么相应举措，”海明威在给布罗姆菲尔德的信中写道，“（但是）我

却直接告诉柏金斯我接受他的报价，然后又去把这件事告诉哈考特先生。”㊟

如果斯克里布纳像利夫莱特那样把海明威拒之门外，哈考特的大门仍会向他敞开。哈考特出版社已经有了一些美国中西部的作家坐镇，比如格连威·威斯考特㊟——哈考特本人十分敬仰他——但是再多些人气总是更好。

当哈考特说到威斯考特时，海明威就把自己的礼貌扔出窗外了。海明威在巴黎见过威斯考特，从看见后者的第一眼起就开始讨厌他的一切，尤其是他装出来的英国口音（威斯考特其实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实际上，海明威的厌恶是如此深切，以至于威斯考特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成一个配角——一位让人难以忍受的小说界新秀，名叫罗伯特·普利斯考特（Robert Prescott）——讽刺的是阿尔弗雷德·哈考特还想买下这部小说。后来在柏金斯的要求下，海明威把这个人物的名字改成了罗伯特·普伦蒂斯（Robert Prentiss）。海明威对哈考特说，他觉得威斯考特的作品并不好。

“话一出口便后悔了，”海明威后来向布罗姆菲尔德坦白，“但是我明白地知道，他写的是怎样的伪文学。”㊟

就这样，海明威和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短暂的暧昧结束了。

于是，海明威抛弃了一家本身就是现代产物的出版社㊟，却选择了一家依靠推行清教伦理发家的老牌出版社，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毕竟最开始海明威那一代人决定去欧洲，部分动力正是躲避消磨人心的美国清教伦理。

无论如何，事情已经决定了。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将由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一家曾出版过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伊迪丝·沃顿和西奥多·罗斯福作品的出版社。

对于一位决绝的、“自我硬化”了的现实主义者来说，这家出版公司的风格可能有点儿太浪漫了。但是海明威终于得到了他一直想要的：一场“大跃进”，一家大出版社，一次向大好前程冲刺的机会。

命运攸关的文学事业如今有了定论，海明威准备搞一场堪比酒神节的庆祝。过去，他对纽约没什么好感，几年前在写给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信中，他提到高楼遮蔽下暗无天日的街道，还有面无表情的市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个人笑，”他写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住在那里。”[注]不过，身为一位有魅力的年轻作家，此时他为最重要的首部长篇小说找到了一家顶级出版社，海明威再看纽约时感觉完全不同了。《太阳照常升起》出版在即，禁酒时代中，这座城市的迷乱成了庆祝活动的完美背景。[注]可能纽约的每一个人都在偷偷地饮酒，但那年冬天他们似乎喝得比以往都多，而且突然之间偷卖酒精饮料的地方多了一倍。1920年禁酒令生效时，纽约有15000家地下酒馆；没几年，这个数字就翻了一倍还多。[注]甚至有地位的家族都有自己的私酒贩子，据说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家的那位私酒贩子很不错。[注]

现在，海明威不仅没有了贺拉斯·利夫莱特的牵制，也没有了对妻儿和情人的挂碍，足足喝了一个星期的庆功酒。后来他对一个朋友说，“每个人都喝成了斗鸡眼，我自己也是”[注]。到处都是私酒贩子和鸡尾酒、啤酒、香槟，还有多萝西·帕克[注]的苏格兰威士忌——最后这样东西最为有力地证明了海明威已径直落入纽约城最腐败的聚会中。正如刚去巴黎的时候，海明威怀揣着城里最迷人文学殿堂的敲门砖，此时他一到纽约就被纳入了这座城市的文学万神殿，即阿尔冈琴圆桌会。这也多亏了海明威和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罗伯特·本奇利之间的友谊。用海明威自己的话说，他见了“鬼知道多少人”[注]，其中也包括帕克女士。

纽约文学群体的小圈子心态和巴黎的一样盛行。阿尔冈琴圆桌会的成员们——包括批评家亚历山大·伍尔科特（Alexander Woollcott）、海伍德·布朗（Heywood Broun），以及剧作家乔治·卡夫曼（George Kaufman）——都是凶猛的狼，但离群太久又无法生存。无论是在阿尔冈琴酒馆（他们最喜爱的地下酒馆），还是在画家奈伊莎·迈克梅因（Neysa McMein，圆桌会为数不多的女性成员之一）的画室中，阿尔冈琴圆桌会的成员都在吃喝玩乐，“直到他们累得趴下”，罗伯特·本奇利的儿子纳撒尼尔·本奇利回忆说。(注)

“（他们）从来不会感觉到孤独或者忧虑，因为大家总是不离左右，时刻准备着继续。只有跟不上的人才会觉得孤独。”纳撒尼尔还说。

这个小团体之所以如此团结，可能是由于缺乏安全感，也可能是不想和低俗的平凡之辈为伍。他们也许只是想在团体的智慧中享受生活，而不愿意把时间花在睡觉、独处或者开低俗的玩笑上。不管他们究竟怀有怎样的心态，这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一群人，外人几乎不可能打入其中。

没错，不可能，除非你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成员们口无遮拦的习气丝毫没让海明威困扰，而且他在造访纽约的两周里，立即吸引了这座蜂巢里的蜂后。多萝西·帕克可能评判过百老汇一半的人——编剧、导演和演员会战战兢兢地等待着她内容丰富又不留情面的剧评——但她一见到海明威就肃然起敬。这完全是难以预料的——说到巴黎左岸知识分子的沙龙和生活方式，帕克和她的同道常常投以白眼，而海明威就是左岸来的大使。

“在所有那些事情中，只有一点值得称道——你知道的，只有那么一点。”帕克后来写道。(注)

阿尔冈琴人其实就是对斯泰因的团体没有太大兴趣。在前者看来，

幽默才是压倒一切的。帕克曾说，要是“格特鲁德·斯泰因……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我们会齐声说，耶！我们迷惘了。”[注]

海明威的第一本美国出版物也没能带给人们什么好印象。用帕克的话讲，《在我们的时代》“在文学圈造成的震动，就好比河畔北路上的两条狗打了一架造成的震动”[注]。美国的书商、评论家和读者没有心情去关心这样一本书。他们要的是长篇小说。

“他们觉得受骗了。”她解释说，“文学成就，现在看来，是通过唯一一条标准来衡量的。”

不过，新消息传开了：海明威新书有主，还在纽约城最重要的几家出版社之间精明地挑起了争端。他的性格让帕克着迷，那袒露无遗的男性气概，和她的同仁们对比鲜明——比如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就是一个敦实的纨绔子弟，爱系领结，挥舞着长烟嘴，在媒体的照片上总摆出斜倚某物的姿势。帕克翻来覆去地问海明威他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她惊奇地发现，他们两个都觉得自己的写作进程慢得难以忍受。即使海明威拿《太阳照样升起》的写作速度向她吹牛，她仍然觉得他俩有相似的灵魂。[注]帕克和阿尔冈琴人可能会取笑巴黎的文学青年，但是他们当中一些人——包括帕克自己——也怀有严肃的文学志向。[注]她还没有出版过书，并且与海明威同病相怜，深感出版长篇小说带来的压力。

“写部长篇，写部长篇，写部长篇——他们只会说这个，”后来她向罗伯特·本奇利诉苦，“唉，有时候，我觉得好累好难受。”[注]

海明威到访期间和帕克讲了左岸的事，让她深感着迷。帕克放下怀疑，当即决定去国外看看。[注]

而海明威似乎并没有从帕克身上得到什么启发，不过1925年他写过一句俏皮话，致敬多萝西·帕克一首如今家喻户晓的小诗。原诗如下：

Men seldom make passes

At girls who wear glasses

（女孩要是戴着眼镜

男人才不会来调情[注]）

当年海明威回到巴黎以后，仿照帕克写了一首：

Mr. Hemingway now wears glasses

Better to see to kiss the critics' asses

（海明威先生现在戴上了眼镜

给评论家舔脚不如多看看清）

海明威发现，帕克是一位强大的同盟。与她建立友情是明智之举：她的影响力强，在文娱界有广泛的人脉，再说《太阳照常升起》也快要被搬上舞台了。接着那几年，很多赞美海明威的文章和书评都出自帕克之手。纽约之行告终的时候，海明威对多萝西的称呼已经成了“多蒂”（Dotty）。[注]

那个星期，其他几位评论名家也多少受到了海明威魅力的感染，比如赫伯特·戈尔曼（Herbert Gorman）和埃德蒙·威尔逊。（海明威在写给莫里·卡拉汉的信中透露，这两位批评家还向他求教，该如何看待其他文学新秀。[注]）一天晚上，海明威来到《名利场》杂志的编辑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创办的“咖啡屋俱乐部”（the Coffee House）。对海明威来说，它无异于交际天堂，而且不需要引荐人就能加入。（这是一条“装腔作势地反对装腔作势”的规矩：说是不需要引荐人，但其实俱乐

部的所有成员都已经非常有名、有影响力了，他们一出现就会被认出来，本来就是生活在这个阶层里的人。[注]）俱乐部成员包括出版界和娱乐界的大佬，例如科尔·波特、P. G. 伍德豪斯[注]、查尔斯·斯克里布纳[注]、麦克斯韦·柏金斯、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和康得·纳斯[注]。换句话说，这又是海明威长名声、赚眼球的一个重要平台。

海明威也参加了一些文化活动，包括在百老汇看了一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戏剧演出。他对一个朋友说，戏里有好几个地方让他宁愿交点儿钱逃离剧场。他也考察了一番纽约的文学景观。令他不快的，很可能是他得知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在纽约文人圈中颇受欢迎。同样令人不悦的是，安妮塔·卢斯刚刚推出了讽刺小说《绅士都爱金发女郎》，震撼了文坛。海明威闷闷不乐地说它是“我读过的最无聊的书之一”，并且把它的流行比作流感疫情。[注]

海明威还一度沉溺于一段暧昧之中，对方是文学圈中著名的“冰雪皇后”，埃莉诺·怀利（Elinor Wylie）。他和一个朋友说，“双方一见钟情”[注]。在文人眼中，怀利是一位不可亵玩的缪斯，她也有着人们津津乐道的“思想女孩”（thinking girl）的典型形象：卷发中分，脸旁的头发特意梳成大波浪。约翰·霍尔·惠洛克认为她“貌美倾城，却又是那种冷傲的类型”[注]。怀利和海明威一样有种独特的个人魅力，吸引了一批死心塌地追随她的人——他们被作家托马斯·沃尔夫[注]称作她的“信徒”[注]，不过沃尔夫本人不在此列。海明威显然受到了感召，但是并没有真正加入怀利的崇拜者中。我们不清楚他们两个是否成了情人，不过海明威登上轮船回法国之前，怀利送了他一路，中间还在几家私酒馆稍作逗留。

在离开纽约之前，海明威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签了合同，此时出版社已经开始为《春潮》排版了。然后，海明威登上“罗斯福号”，终于踏上了返回欧洲的旅程，身边还多了罗伯特·本奇利和多萝西·帕克。帕克是一时冲动就去了法国。讽刺的是，帕克这场受海明威启发、说走就走的旅行，花的是从贺拉斯那里赚来的钱，后者签下了她的一本诗集。所

以说，这位出版商还是从海明威的纽约之行中得到了一点儿小实惠。注 一行人准备出发时，又一场暴风雪吞噬了纽约城，轮船甲板上的冰闪闪发亮。大家办了一场喧闹的送别会，畅饮从黑市买来的香槟。与会者有怀利和阿尔冈琴人马克·康奈利注。一个来蹭酒的人偷走了帕克的苏格兰威士忌，直到起航之后酒才被一些旅客发现。欢闹的气氛持续到开船之后。本奇利没能弄到正规的包房，只能在一间女佣房里凑合。注

“第四天他（从女佣房里）出来，说很好玩。不过就在这时他感觉自己长了阴虱，”海明威在写给布鲁姆菲尔德的信中说，“到第六天，他真的长了阴虱。”

航行结束后，帕克透露了一件事：大家一起吃饭时海明威曾服用硝石，据说这种东西有抑制性欲的功效。这暗示了在场的人，他必须控制自己对性事的需求。注

对于海明威来说，这算得上衣锦归来，伴他同行的还有美国最受人爱戴的一位文学名人和一位备受敬畏的批评家。两人如今都是他的朋友，对他死心塌地。本奇利和海明威的友谊将会维持多年，而帕克对他的忠诚近乎崇拜。这样的崇拜之情虽然远不是相互的，但不久却要派上大用场。

---

1. Malcolm Cowley, “Unshaken Friend — II,” *The New Yorker*, April 8, 1944, 30.
2. 在斯克里布纳工作过的编辑约翰·霍尔·惠洛克介绍说：“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在1864年初创时，在神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出版了一些布道内容的书。布道书在那个时代很畅销，程度不亚于如今的悬疑读物。”他还讲到，祖父的布道词曾经在斯克里布纳出版过：“受欢迎的牧师会把他们的布道词出版成书。” John Hall Wheelock, *The Last Romantic: A Poet Among Publishers*（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2）, 77.
3. Kay Boyle, afterword to 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336.
4. Wheelock, *The Last Romantic*, 66.
5. 新新监狱：美国纽约州监狱。——编者注

6. Charles Scribner III, intervew with the author, June 20, 2014.

7. 老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即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二世（C.S.Ⅱ），小查尔斯·斯克里布纳有时也被称为“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三世”（C.S.Ⅲ），但与前文提到的那位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三世（Charles Scribner Ⅲ）并非同一个人。在本书中，“斯克里布纳”通常指斯克里布纳二世。他的儿子通常被称为“小斯克里布纳”，而“斯克里布纳三世”指Charles Scribner Ⅲ，即出版社创始人的玄孙。——编者注

8. Cowley, “Unshaken Friend — II,” 30.

9. A. Scott Berg, *Max Perkins: Editor of Genius* （New York: Berkley Books, 2008）,12.（该书中译本《天才的编辑》已出版。——译者注）

10. Wheelock, *The Last Romantic*, 58.

11.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relt, 1858—1919）是美国的第26任总统，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曾在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过《狂野骑士》（The Rough Riders）、《奥利弗·克伦威尔传》（Oliver Cromwell）、《一位美国猎人的户外消遣》（Outdoor Pastimes ofan American Hunter）等非虚构作品。——译者注

12. 理查德·哈丁·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vis,1864—1916）：美国记者、小说作家。——译者注

13. 亨利·凡·戴克（Henry Van Dyke, 1852—1933）：美国作家、教士。——译者注

14. Ibid. 根据另外一个版本的记录，与会者关于是否接纳《人间天堂》举行了一场投票，结果倾向创新的编辑和守旧的元老们打成了平局。Berg, *Max Perkins*, 16.

15. Cowley, “Unshaken Friend — II,” 30.

16. Ibid.

17. Maxwell Perkins to F. Scott Fitzgerald, January 28, 1926, F. Scott Fitzgerald Files,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改编自《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戏剧由乔治·丘克（George Cukor）策划，1926年2月2日在大使剧院（Ambassador Theator）首演。派拉蒙制作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发布于当年8月，由沃纳·巴克斯纳（Warner Baxter）饰演盖茨比。

18. 两名利夫莱特出版社的员工，唐纳德·弗里德（Donald Friede）和伊迪丝·斯特恩（Edith Stern）后来告诉贺拉斯·利夫莱特的传记作者沃克·吉尔莫，他们“友好地接待”了海明威，利夫莱特在拒绝《春潮》时也显得“既彬彬有礼又坚定”，并表示希望得到《太阳照常升起》。Gilmer, *Horace Liveright*, 125.

19. Ernest Hemingway to Louis and Mary Bromfield, ca. March 8,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36.

20. 贝内特·瑟夫（Bennett Cerf, 1898—1971）：企鹅兰登书屋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21. Gilmer, *Horace Liveright*, 235-6.

22. Maxwell Perkins to F. Scott Fitzgerald, February 6, 1926, F. Scott Fitzgerald Files,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3. Ernest Hemingway to Louis Bromfield, March 8,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36.

24. Maxwell Perkins to F. Scott Fitzgerald, March 4, 1926, F. Scott Fitzgerald Files,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5. Ibid.

26.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February 25, 1926, F. Scott Fitzgerald Files,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7. Ernest Hemingway to William Smith and Harold Loeb, February 28,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30.

28. Ernest Hemingway to Louis and Mary Bromfield, ca. March 8, 1926, reprinted ibid.,36.

29. 格连威·威斯考特（Glenway Wescott, 1901—1987）：美国诗人、小说家。20世纪20年代曾旅居巴黎。——译者注

30. Ibid.

31. 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05年成立于菲律宾马尼拉，最初是出版英语教育材料的出版社，相当于美国殖民菲律宾的产物。——译者注

32. Ernest Hemingway to Gertrude Stein and Alice B. Toklas,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55.

33. 1920年至1933年间，美国政府立法禁止全美酒精饮料的生产、进口、运输和销售。这一禁令有深刻的社会道德考量和新教背景，主要旨在控制社会的腐化、病态。禁酒时代的迷惘是庆祝《太阳照常升起》出版的完美背景，这样的说法意味深长：小说中一群纵情酒色的年轻人的迷失，以及现实中美国人对于社会道德的矛盾心态，互相之间有着深沉的回响。——译者注

34. 有资料显示，那几年中纽约酒吧的数量从15000家增加到了32000家。Pete Hamill,introduction to *The Speakeasies of 1932*, ed. Gordon Kahn and Al Hirschfeld（Milwaukee: Glenn Young Books/Applause, 2003）, 11.

35. 约翰·多斯·帕索斯证实了“斯各特家的私酒贩子很不错”这一说法（*The Best Times*,145）。（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就是一位靠贩酒暴富的私酒贩子。——译者注）

36. Ernest Hemingway to Isabel Simmons Godolphin, February 25,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32.

37. 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ker, 1893—1967）：美国诗人、小说家、批评家，阿尔冈琴圆桌会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38. Ernest Hemingway to Louis and Mary Bromfield, ca. March 8, 1926, reprinted ibid.,37.

39. Nathaniel Benchley, *Robert Benchley* （New York: McGraw-Hill, 1955）, 162.

40. Dorothy Parker, “Reading and Writing: A Book of Great Short Stories — Something About Cabell,” *The New Yorker*, October 29, 1927, 92.

41. Marion Capron, “Dorothy Parker: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 *Paris Review 13*（Summer 1956）, http://www.theparis review.org/interviews/4933/the-art-offiction-no-13-dorothy-parker.

42. Parker, “Reading and Writing,” 92.

43. Marion Meade, *Dorothy Parker: What Fresh Hell Is Thi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163-64.

44. 比如罗伯特·本奇利，虽然他已经获得了成功和名誉，却常常“觉得自己对人类的进步没做出什么重大贡献，难以释怀”。Benchley, *Robert Benchley*, 81.

45. Meade, *Dorothy Parker*, 164.

46. Dorothy Parker to Robert Benchley, November 7, 1929, reprinted in *Letters from the Lost Generation: Gerald and Sara Murphy and Friends*, ed. Linda Patterson Miller（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1）, 46.

47. 这首小诗最初发表在一份名为“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的报纸上，标题是“News Item”（新闻条目）。这首诗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影射当时的男性不喜欢有学识的女性，而偏爱头脑简单的女性。这首诗在美国成了一句类似俗语的话。——译者注

48. 在海明威大约于1926年3月8日写给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和玛丽·布罗姆菲尔德的一封信中，他讲述了自己纽约之行的近况，同时称呼帕克为“多蒂”。Reprinted in Sanderson,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37.

49. Ernest Hemingway to Morley Callaghan, March 5, 1926, reprinted ibid., 34.

50. “惯例是他们从不需要引荐人，因为俱乐部默认大家都互相认识……因为每一位成员都已经非常声名显赫了……这就是这家俱乐部的自负。求人推荐会遭受白眼。”俱乐部成员、历史学家比尔·雷（Bill Ray）在与作者的访谈中表示。

51. P.G.伍德豪斯（P.G.Wodehouse, 1881—1975）：全名佩勒姆·格伦维尔·伍德豪斯，英国作家。伍德豪斯常常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读者最广泛的幽默作家之一”，活跃于美国的文学、影视和戏剧界。——译者注

52. 查尔斯·斯克里布纳：此处应指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二世。——编者注

53. 康得·纳斯（Condé Nast, 1873—1942）：康泰纳仕集团（Condé Nast Publications Inc.）的创始人。康泰纳仕是一家影响力巨大的国际期刊出版集团，旗下刊物有《纽约

客》《时尚》《名利场》等。——译者注

54. Ernest Hemingway to Louis and Mary Bromfield, ca. March 8,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37.

55. Ernest Hemingway to Isabel Simmons Godolphin, February 25, 1926, reprinted ibid., 32.

56. Wheelock, *The Last Romantic*, 94.

57. 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90—1938）：美国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天使，望故乡》是另一本由柏金斯发现并出版的名作。——译者注

58. Thomas Wolfe, quoted in Stanley Olson, *Elinor Wylie: A Biography* （New York: Dial Press/James Wade, 1979）, 246.

59. Meade, *Dorothy Parker*, 165.

60. 马克·康奈利（Marc Connelly，1890—1980）：美国剧作家。——译者注

61. Ernest Hemingway to Louis and Mary Bromfield, ca. March 8,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37.

62. Edmund Wilson, *The Twenties: From the Notebooks and Diaries of the Period*, ed.Leon Ede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5）, 347. 帕克的传记作者马里恩·米德写到，帕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和朋友提到硝石一事时，还是会“笑个不停”。（*Dorothy Parker*,166.）

11
你死我活

在施伦斯，哈德莉空等着海明威的来信：纽约一行中，他一次也没有联系过她。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常常远足，或者练习钢琴，却越来越孤独、焦虑。海明威已经离开将近一个月了。注

“罗斯福号”的一行人抵达巴黎后，海明威并不急着和家人团聚。他在巴黎耽搁了一些日子，与多萝西·帕克、罗伯特·本奇利及菲茨杰拉德夫妇一起吃饭喝酒。

迟迟不回家还有另一个原因，海明威和宝琳·菲佛的私情木已成舟，当时她甚至提出要陪他去纽约。他独自启程后，她便在巴黎耐心守候，张开双臂准备迎接他的归来。虽然海明威最后会感到懊悔，但此时他们的私情带给他的是“不可思议、按捺不住的幸福”，这既可怕，又“无法抹杀”。宝琳现在已经拿下了他“一半”。宝琳仍然是哈德莉的朋友，定期往施伦斯寄信给她——这样就能轻易地在海明威一家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海明威后来写到。注

过了几天，海明威强迫自己回到施伦斯。哈德莉在火车站接他，她的脸被冬天的阳光晒成了金黄色，红发闪闪发光。敦实的小邦比站在她身边，一头金发，样子有点儿像日耳曼人。海明威看见他们等在那里，“觉得自己宁可死”也不能背叛他们，但他对自己偷情的事只字不提。注一旦回到巴黎，海明威就会继续偷偷和宝琳幽会。但这会儿，在陶博旅店，他又回归了日常的家庭生活。不久，约翰·多斯·帕索斯和墨菲夫妇也来了。每个人都打算庆祝一番。海明威能把《太阳照常升起》

卖给斯克里布纳，尤其让杰拉德·墨菲惊叹不已。

“给他的报酬确实优厚。”墨菲来施伦斯之前曾在信中对哈德莉说，“我的天啊，这个功利的世界！”[注]

奥地利的时光，就是接连不断的熊熊篝火、轻软的床，还有翻山越岭的滑雪远足。到处都是不要钱的樱桃白兰地。“我们滑雪，每到一个地方，老乡就给我们拿来樱桃酒擦身取暖，”多斯·帕索斯回忆道，“同时我们笑得太厉害，几乎吃不下饭。”[注]

在施伦斯，海明威也会安坐下来修改《太阳照常升起》。他在信中许诺柏金斯，小说能赶在秋季出版。他还有5个章节需要修改，但是柏金斯5月份应该就可以看到书稿了。[注]柏金斯回信说，自己已经急不可耐了，并且央求海明威“又是旅游又是斗牛的”，小心别把命搭进去。[注]

这次海明威用上了打字机，开始重新组织最后几个章节。在这一稿中，潘普洛纳“观光团”终于披上了虚构的外衣，例如特怀斯登夫人全程戴上了“波莱特·阿施利”的面具，帕特·格思里正式成为“迈克·坎贝尔”。

8个月，7本笔记本，数百页纸，海明威终于摆脱了现实的束缚，得以全权决定他笔下人物的行为和命运。他们服从他的笔与想象。卡耶塔诺·奥多涅兹获得了一个高贵的新身份，到了3月，他成了“佩德罗·罗梅罗”，是全书中备受崇拜的人。真实的奥多涅兹沉溺在弗拉明戈舞会、妖艳的女人和西班牙雪莉酒中，而小说中他仪态端庄，周身环绕着高贵精神和传统道德的光辉，这使得波莱特·阿施利夫人对他的勾引更不光彩了。不过，佩德罗·罗梅罗也和他的创造者一样，务实得残酷。罗梅罗说：

“公牛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把这句话翻译给波莱特听。

“那你杀死你的朋友？”她问。

“这是常事，”他用英语说着，笑了，“这样它们就不会杀死我了。”㊟

“佩德罗·罗梅罗”这个名字对斗牛爱好者来说有着特殊的含义。这里，海明威又一次借用了现实中发生的事——这一次是斗牛史上的事。真实的佩德罗·罗梅罗是18世纪西班牙的英雄人物，他曾经出现在戈雅（Goya）的画中，受到千万人的喜爱。现代西班牙斗牛艺术（Toreo）被认定是他和他的家族开创的。㊟他的名字完美地为海明威创造的新角色披上了一层宿命之色，正如把波莱特、杰克等人视为“迷惘一代”的代言人，从而升华了他们。

在施伦斯的修改稿中，杰克和波莱特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第一稿中，刚刚与奥多涅兹分手的杜芙夫人把杰克叫到马德里安慰自己。杰克用了几页的篇幅苦思冥想，思考自己面对的事情是多么不正当，英国贵族普遍的处境又是多么糟糕。辗转反复，很久才释然。在施伦斯的修改稿中，海明威大刀阔斧地删掉了杰克那些不能释怀的苦恼，只留下了克制的一耸肩。杰克收到波莱特的求助电报，回电报说自己已经在路上了。后来，他流露出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样处理就算完事了。事情就是这样，送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出走，又把她介绍给另一个男人，送他俩出走，现在又去把她接回来。还要在电报的落款上写上‘爱你的’。事情就是这样。我进去吃中饭。”㊟

有所改动的还有小说的最后一个场景。波莱特和杰克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驶过马德里的街道，波莱特想象着过去之事的其他可能性。海明威写道：

“哦，杰克，”杜芙说，“我们要是能在一起该多好呀。”

前方一位穿着卡其色制服的骑警……指挥着交通。轿车突然放

> 慢了速度，杜芙身子一倾，和我贴得更近了。
>
> “是啊，”我说，“单想想就真他妈的美啊。”[注]

看来海明威对最后这句话不太满意。现在他自己觉得有了更好的回答：

> “是啊，”我说，“就这么想想不也挺美吗？”[注]

这一改动，把一个自暴自弃的陈述句，变成了一个融合了愤世与失落的反问句，为读者留下一缕心酸的感情。

修改工作虽然繁琐、累人，但把整部小说的螺丝、链条都上紧了。每到夜晚，海明威就把新作读给多斯·帕索斯和墨菲夫妇听，正如冬天早些时候他将作品读给宝琳听那样。如果说杰拉德·墨菲对《春潮》反应冷淡，这回他被《太阳照常升起》“炸了出来”。[注]

海明威喜欢墨菲的赞美，虽然后来他因为自己只顾扬扬自得而自责——他觉得自己应该多反思一下，“如果这些兔崽子都喜欢它，它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他后来写道。[注]回想朗读小说的经历，他觉得这是非常不专业的行为，甚至对写作有害。不过在当时，受到鼓励的海明威十分感激，他的朋友们也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但后来他们会为这些赞美付出代价。

“相互道别的时候，我们都亲如兄弟姐妹。”多斯·帕索斯回忆道。在欧洲生活的篇章里，这将是多斯·帕索斯回忆中和海明威、哈德莉度过的“最后一次无忧无虑的好时光”。[注]

3月底，海明威回到巴黎，还给柏金斯带去了好消息。“《太阳照常

升起》我已经修改完成了”，他在4月1日的信中说。接着他倾诉，这次修改困难重重；但是整体来看，花了不长时间就把一篇一挥而就赶工出来的草稿变成了精雕细琢的杰作。成稿目前已经被送去打字员那里做专业录入，总共近9万词——比《战争与和平》还差得远，但在任何人眼中也是不容轻视的篇幅。成稿几周内就能送到柏金斯手上。(注)

海明威也认真考虑了文前的献词，然后暂时写定了这些：

这本有教益的逸闻集

送给我的儿子

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尔(注)

虽然编辑还没有见到稿子，但海明威觉得是时候考虑一下宣传推广小说的事了。他给足了柏金斯自己的照片，斯克里布纳的宣传团队一定用得着它们，他还添上了一张邦比的照片——说不定媒体会对他的家庭生活感兴趣。

一周后，他寄给了柏金斯一份名单，里面是一些大名鼎鼎的评论家和作家，他认为《春潮》有了试读本以后应该给他们各寄一本，信中甚至附上了他们的住址和签约出版社。名单中的人包括巴黎“这伙人”和阿尔冈琴圆桌会中的大人物，有的还是海明威刚刚在纽约结交的。(注)

这段时间，他也在和一位叫柯蒂斯·布朗的代理人商谈，打算把作品卖到英国和欧洲大陆。他也已经和英国的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商谈妥当，由它们出版《在我们的时代》。(注)（“我没把乔纳森·凯普当作英国最好的出版社，但是他们也不坏。”海明威在给柏金斯的信中说。(注)）凯普也有《春潮》和《太阳照常升起》的优先出版权。(注)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这次海明威没有把出版《春潮》算作获得《太阳照常升起》出版权利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凯普本来就不打算要《春潮》。和利夫莱

特、斯克里布纳如出一辙，所有出版社想要的都是长篇小说。

与此同时，柏金斯迫切地希望看到《太阳照常升起》。他匆匆忙忙地把《春潮》送入印刷厂，安排它在5月底出版；现在，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接下来的长篇小说上。海明威完成修改稿仅仅两周后，柏金斯就通知他的这位新作者，斯克里布纳的同事已经为书设计出了封面，尽管他们还没有读过。推广人员已经整装待发，5月1日就可以拿到假书[注]。

“事实上，除了里面的文字，这本书很快就能做成，”柏金斯说，“内文我等得望眼欲穿。”[注]

4月底，等待终于有了结果。海明威在信中预告，“太阳照升（这头你戳了一下就决定买下的猪）”已经在运送途中了。[注]焦急等待回音的同时，海明威愁眉苦脸地给菲茨杰拉德写了一封信，说自己“低落得要死”，他的情绪从此只会更坏。[注]在另一封给菲茨杰拉德的信里，他坦言自己又感到了孤独，还把署名写成了“欧内斯特・M． 狗屎”[注]。

《太阳照常升起》稿件的越洋之旅没出岔子，它安全抵达了柏金斯的办公桌。柏金斯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它。确实，这本书和曾经的《人间天堂》一样，注定要在出版社里掀起一番波澜。小说毫无遮拦地使用着那个四个字母的单词[注]，人物没有节制地饮酒，还有对性事很开放，但情感麻木的女主人公。《太阳照常升起》是一场道德风暴，全然是对斯克里布纳更保守编辑的价值观的正面冲击。

回到家，柏金斯把他的担忧讲给了妻子露易丝·桑德斯（Louise Saunders），她也是一位作家和诗人。虽然桑德斯后来对海明威好感尽失，但是此时她支持了这部饱含争议的长篇处女作。

“麦克斯，你要站出来维护它，而且要保卫它的完整性，不要把脏话删掉。”露易丝对他说。㊟

这让柏金斯陷入了非常苦恼的境地。“他总是坚定地维护着作者书写自己本色的权利，但他也是个实际的人，”柏金斯的外孙女珍妮·菲利普斯说，“这本书在当时太让人震愕、不安了。”㊟

实际上，柏金斯也认为《太阳照常升起》“几乎不可能出版”㊟，他在那年春天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吐露了这一想法。但无论如何，他准备立项。当斯克里布纳的编辑们开会讨论这本书时，柏金斯走进会议室，带着保卫该书的决心：它不是下流小说，而是不容轻视的文学作品。

“这就是一本粗俗的书，”老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宣布，“书里有那四个字母的词。一家面向绅士读者的出版社，永远不该印有那个词的书。”

柏金斯先让了一步。

“好吧，海明威愿意删去一些这样的词。”他想冒险一搏。（蒙在鼓里的海明威肯定不会愿意删改，但眼下更重要的是让出版社为这本书开绿灯。）

“哪样的词？还有哪些？”斯克里布纳追问。

这样的词柏金斯没法大声说出口，他赶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回来的时候拿了一张纸，上面潦草地列出了一些词，把它递给斯克里布纳。斯克里布纳厉声一笑，答道：“麦克斯，如果海明威知道你不敢在我面前说出这些词，他会和你绝交的！”㊟

斯克里布纳起了兴趣，但是并没有被说服。柏金斯又试了另一种方

法。他提醒同事们，出版社的声誉需要持续革新：虽然菲茨杰拉德和拉德纳的作品出现在了他们的出版书目里，但是年轻的作家依然认为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极端保守”[注]，如果拒绝了海明威的书，这一恶名就板上钉钉了。

这一论点曾说服出版社出版了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但是轮到《太阳照常升起》时，斯克里布纳就是不愿让步。讨论走到了死路上，柏金斯后来说，当时那种气氛，“人间困苦大抵如此”[注]。于是，资深编辑约翰·霍尔·惠洛克被叫来表达自己对此事的意见。

等待同事开口时，柏金斯一定如坐针毡。在柏金斯看来，惠洛克是某种隐士一样的人物，住在“他那远离尘嚣的阳台上”。他虽然很年轻，但是对“文学的现代性”基本漠不关心。

惠洛克走进会议室，给出了自己的裁定。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他认为这本书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应该出版。”柏金斯后来告诉小斯克里布纳。[注]

终于，历尽千辛万苦，这本书终于通过了裁定，但是反对者们并没有打消深深的不安。流言先是在社内兴起，后来又传遍了文学圈，说老C.S.本来是反对出版这本书的，而柏金斯以辞职相胁。[注]

一旦《太阳照常升起》正式加入了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出版日程，整家公司就准备像曾经支持菲茨杰拉德那样助力海明威。当然，《太阳照常升起》能够出版，首先是柏金斯的功劳，但是如今出版这本书成了整个出版社的一场集体赌博。老C.S.往往被视为拒斥变革的独裁者，但是他也开始看到（透过柏金斯的眼睛）现代思维在某些领域确实占了上风。老一辈编辑对《太阳照常升起》的厌恶也有所缓和，甚至开始把出版它视作另一次实验。

“我应该这么想……我们试试往前走，看看会发生什么，”他们中的一位在出版社相关辩论的内部备忘录中写道，“犯一个错误也不至于致命。”㊟

这本书出版后的几年中，它有时难免会受到一些惊恐读者的批评，这也印证了老编辑们的担心。柏金斯亲自回复了其中一封愤怒的读者来信。这时的柏金斯已经有机会打磨他的想法，清楚表达他和斯克里布纳最初决定出版《太阳照常升起》的原因了。不是每部作品都必须反映出版者的口味，他指出。

不仅如此，“（出版人）有一种职业责任”，柏金斯写道，“迫使他推出在文学世界的评判体系中价值不凡的作品，以及针砭时弊、批判当下文明的作品”。㊟

换句话说，出版者有责任推进艺术的事业，而《太阳照常升起》正代表着艺术的新疆界。

5月中旬之前，海明威没有收到柏金斯的任何消息，在焦虑中煎熬。他也在准备着保卫《春潮》，这本书过几天就会在书店里陈列出来了。5月18日，柏金斯终于给这位新作者回信了，但并没有告诉他社里围绕他的小说争斗了一场。

“我觉得《太阳照常升起》是一出最精彩的戏，”柏金斯为海明威感到高兴，“谁也拿不出一本比它更有生机的书了。”读者感觉身临其境，尤其是在博古特的田园风光里。书里的幽默与讽刺，尤其是杰克和比尔·戈顿口中的妙语，真是绝了。这是一件动人心魄的艺术品，融入了“丰富多样的经历与情感，以最娴熟的技巧把它们编织在一起，其精妙的手段被出色地隐藏起来，浑然一体。”㊟

他建议接下来要开始编辑。虽然柏金斯在这第一封信中把话说得很

委婉，不过还是讲明了一件敏感的事：书稿暗箭中伤了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一位合作伙伴——这已经成了海明威的习惯。这次，中箭的是亨利·詹姆斯。书稿中，比尔·戈顿暗示，詹姆斯和杰克一样，在一场意外中失去了性能力。不过詹姆斯的不幸是一辆自行车造成的——戈顿开玩笑说也可能是辆三轮车——而并没有在战争中光荣负伤。柏金斯要求必须删掉这段内容。

“你得明白，我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我们是他的出版商。”他在给海明威的信中说。即使詹姆斯已经去世了10年，柏金斯仍然认为这样中伤他是不允许的：“他还在世的时候，这种话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付印，哪怕只是为了不吃官司；想想看，在他去世后印出这些话就可能更恶劣了。”[注]除了这些事，是时候全速推进，把手稿编订成书了。

不过，他们首先必须克服《春潮》出版之后的“减速期”。5月28日，这本书以下面这个名字推出：

春潮

一部浪漫小说，纪念一个伟大民族的逝去

出版社似乎没有特别花费精力去宣传这本书。之前海明威对贺拉斯·利夫莱特预测，这本书至少会卖出20000册，这纯属虚张声势，对此斯克里布纳妥当地首印了1250本。这本书的出版流程非常轻率，以至它甚至没有被加入出版社的春季书目，广告宣传也十分有限。[注]

不过出版社把这本书当成了引出《太阳照常升起》的一个契机，也准备为海明威的出场搭起舞台。用柏金斯的话说，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正在积极地把他树立为“现代写作”的新领袖。在春季书目的补充材料中，出版社宣传“海明威反抗柔和、暧昧的思维与表达，而今日美国的一些小说家正在走向这样的极端”，他的文字“直截了当”、“无所畏惧”，会使读者“如落入冷水一般精神一震”。《春潮》将让我们一瞥“这位作家

的超凡天分，而这种天分将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充分展现。《太阳照常升起》，秋季即将问世”。㊟

实际上，《春潮》并没有怎么展示海明威的革命性写作，因为它是在模仿安德森的笔法，没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出版社稍后发出的广告也秉持着上面的宣传思路，盛赞海明威的才华、前途和年轻。

事与愿违，书评人即使乐意费心去谈论这本书，多数也没有上这些广告的当。至少有一位评论者表示，他就是不理解《春潮》用意何在：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中那种紧凑、直白的文风，怎么摇身一变成了这种东西？㊟另一位评论者——《纽约世界》的哈里·汉森（Harry Hansen）——觉得海明威写作讽刺作品的尝试不值一提。

“戏仿是诸神赋予的礼物，”汉森写道，“拥有这种天赋的人很少，海明威不幸没有得到诸神的祝福。”

汉森还把这本书视作对安德森的公然背叛：“海明威出版《在我们的时代》时，是舍伍德·安德森在奔走吆喝，把这位新人迎入美国作家的伟大行列……现在海明威就这样报答他。”㊟

不过，就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关心的事情来看，正面的消息也是有的：海明威对安德森明目张胆的攻击成了流言蜚语中的热议话题——这让海明威也连带着成了风云人物。《堪萨斯城星报》（*Kansas City Star*）刊登了战争时期海明威一些精彩但并不完全属实的背景往事，说这本“胆大妄为的小书”的作者，曾经“志愿加入意大利军队，光荣负伤”。㊟《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书评人评论道：“海明威先生的名字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他（可能）比他的文字更有名。”㊟等到《太阳照常升起》出版时，这些议论都很好地提升了海明威的公共知名度。

海明威的一些熟人被《春潮》震惊了，它蓦然揭露，海明威是可能

公开背叛朋友的。即使是巴黎“这伙人”的外圈成员也为之愕然。海明威是承蒙特别关照才得以进入核心文学圈的绝少数，现在他却反咬了自己人。在多摩咖啡馆的露天茶座里背后说朋友或导师的坏话，如果偶尔为之，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找到美国的一家主流出版社、一家如饥似渴地想把事情搞大推上头条的出版公司，再背后捅刀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本书尤其触怒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大概在1925年之前，海明威和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络，但是后来他渐渐开始反感她——海明威作为一位风格上独具创意的作家、一位公众人物，他的发迹之路和谁有关，他就会和谁起摩擦。她决然拒绝评论《在我们的时代》，这已经令海明威愤愤不平。（她显然盼着他在第一部长篇小说上出丑，他对庞德说，她不想冒险在公众面前和他走得太近。）还有，海明威认为她“懒惰得出奇”，而且她总是在扮演“左岸创作群老祖母”的角色，已令他看得不耐烦了。[注]据传海明威后来说，巴黎的旅居作家们，包括他自己，原本都没想找一个“妈咪”带领他们走向文学上未经探索的土地。[注]海明威称，斯泰因太过看重自己，乃至她根本不是因为《春潮》攻击了安德森而生气；她的怒火实际上源自海明威“攻击了一个她手下的人”[注]。《春潮》事件预示着一场师徒之间的公开决裂即将上演。

当然，没有人比舍伍德·安德森本人更震惊、更心寒了。《春潮》出版的一周前，海明威寄给柏金斯一封密信，嘱咐他给安德森寄书时连带这封信一起寄去。柏金斯虽然惊讶，但同意了。“我好奇他（在信里）说了什么？”柏金斯向菲茨杰拉德写道[注]，不过还是尽职地把信寄走了。

安德森认为海明威这封信是“最自大的，可能也是史上最具屈尊俯就之态的”[注]。海明威告知安德森，《暗笑》显示他已走上了“下坡路”，因而海明威在道义上有责任拯救他：“像你这样能写出伟大作品的人，却写了在我看来……腐坏的东西，我应该警醒你。”

海明威觉得自己有资格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位“同道的匠人”。他知道这本书可能伤害安德森的感情，但这无关个人恩怨。毕竟，谁会被一部小小的讽刺之作伤害？海明威接着转移话题，琐碎地聊起了巴黎的天气，并且向安德森的妻子送上了最友好的问候。㊟

安德森读了书。他的结论是，《春潮》是一次失败的幽默尝试。若是由更有天赋的讽刺作家，例如马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来写，并且把篇幅缩到12页左右，这本书可能会成功。不过海明威的信对他的伤害比那本讽刺之作更深。

“信里有种自视甚高的作态，”安德森后来回忆说，“就好像是一篇我坟墓之前的葬礼演说。它是如此口无遮拦、自命不凡，俨然以恩公的姿势对人讲话，在一种令人厌恶的意味上还挺好笑的。”㊟

他给海明威回了信，想小心翼翼地修复他俩之间一触即溃的关系。

“你……对我说话的语气就好像师父在教导徒弟，”他写道，“别这样，老弟。我也有我的几招，我也曾是一个中量级的胜者。你是不是忘记这些了？”

安德森预计《春潮》伤害的只会是海明威自己，而不是他。不过这种强装出来的自信，恰恰透露了安德森真正的心痛与震惊。

“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并不是（这样的），”他写道，“一定是巴黎——文学界的生活（改变了你）。”㊟

《春潮》的出版结束了两人的友谊。几个月后，安德森到访巴黎时曾和海明威短暂地见过面。据安德森回忆，巴黎的最后一天，他正待在自己的旅馆房间里，听见有人敲了一下门。打开门，走廊里赫然站着海明威。

“喝一杯吗？”海明威说。

两个人来到街对面的一家小酒吧，各要了一杯啤酒。海明威举起他的杯子。

“嗯，我们就这样见面了。”

“见面了。”安德森回答。

然后海明威喝干了啤酒，大步离开了。“他这是证明给自己看，自己打完拳之后也是能够向对手鞠一躬的。”安德森是这么想的。[注]

有关这次重逢，海明威给柏金斯描绘了一幅更温馨的画面。“我们一起度过了两个愉快的下午，”海明威写道，“他并没有因为《春潮》感到难受，我们相处愉快。”[注]

实际上安德森因为《春潮》感到难受，并且多年无法释怀。他和格特鲁德·斯泰因将大谈特谈这位恩将仇报的门徒。

“海明威是我们两个造就的。”斯泰因后来回忆说。他俩都“对这个（我们）思想的造物有一点儿引以为傲，又有一点儿引以为耻”。他们认定海明威就是一个懦夫、一个装模作样的骗子；他们不接受海明威极具男性气概的形象。

“怎样一本书才展现了真正的海明威呢？”斯泰因写道，“我俩一致认为，不是他写的那些小说，而应该是他的忏悔录。”[注]

最后，斯泰因和安德森也不认为海明威真正明白他们在文体风格上的创新之处。他努力让自己显得现代，但在斯泰因看来，他“有博物馆的味道”。

十多年之后，海明威的背叛仍然压在安德森心头。1937年，安德森

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说到海米[注]，他总有需要打消的欲望。"这是因为海明威"心里无法容忍其他人也是艺术家"，也因为他总想主宰整个领域。[注]但是安德森依然尊敬海明威的笔上功夫。读了海明威在一本叫"一刻"（*the Quarter*）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后，安德森向斯泰因表达了自己的赞赏之情。"那是一篇漂亮的故事，"他兴致勃勃地说，"好笔法。"

"老天爷啊，"他说，"这个人还真会写。"[注]

那年4月，海明威一家人从施伦斯回到巴黎，哈德莉又收到了邀请：宝琳和从美国归来的弗吉尼亚·菲佛邀她一起去游览卢瓦尔河谷（Loire Valley）的酿酒区。这是一趟成员仅限女士的旅行，她们打算经停凡尔赛和查特斯，那里最好的旅馆有可口的餐食和舒适的住宿环境。哈德莉要是能放下家庭责任，休个假，不是很好吗？宝琳甚至提出要为整趟旅程买单。

哈德莉考虑着，一次不以晒太阳和滑雪为主题的旅行挺不错的，于是她接受了菲佛姐妹的邀约。

她很快就后悔做出了这个决定。三个人坐进弗吉尼亚的汽车后，一路上宝琳都摆着一副臭脸。只要哈德莉问个问题，或者发句感叹，宝琳就会不怀好意地顶一句回去。哈德莉尽力避免与宝琳发生直接的冲突，但宝琳的怒气根源何在，她必定也明白了一些。一天晚上，她找到弗吉尼亚，还是一如既往地温和。

"你有没有感觉，宝琳和欧内斯特两个人有点儿太要好了？"她问。"嗯，我觉得他们挺喜欢对方的。"弗吉尼亚回答。[注]她的语气已经告诉了哈德莉想要知道的一切。小群体中的气氛更阴沉了。回程的一路上只有紧绷的沉寂。哈德莉怀疑，菲佛姐妹计划这场旅行，就是为了破除有关宝琳和海明威的流言蜚语。有人猜测，宝琳对哈德莉的敌意源于

宝琳已经意外怀孕一事（拜哈德莉的丈夫所赐），需要马上去打胎。[注]不过这种说法的证据并不充足。不管有什么隐情，“挺喜欢对方的”这一说法让哈德莉不能继续“毫不知情”[注]地缄默下去了。无论之前她是不是真的意识到了海明威的外遇，这次在宝琳和弗吉尼亚逼迫下，哈德莉必须直面现实了。

“你有两种生活的方式，或者是把另一边脸也给人打，或者是把敌人完全摧毁。”[注]海明威的儿子帕特里克的这句话，暗示哈德莉属于前一种人，而宝琳属于后一种。长痛不如短痛，海明威可能很快就要在两个女人中做出选择，而宝琳显然觉得自己处在优势地位。

回巴黎后，哈德莉和海明威摊了牌。海明威勃然大怒。是，他承认自己出轨了，但他接着掉转矛头，咬定哈德莉才是给他们的婚姻带来无法修补的裂痕的人，因为她挑明了这件事。如果她不把事情拿到台面上来，一切都会安然度过——至少在哈德莉的理解中，这就是海明威的立场。[注]我们不清楚他的意思是这段私情会自然而然地结束，还是他会继续幸福快乐地享受着妻子和情人共同的关爱。哈德莉在哭，海明威愤然冲出了家门。

夫妇俩决定不分开。不过，很明显海明威没想让宝琳离开自己的生活。这次争吵后不久，宝琳通过海明威转交给哈德莉一封信，要求和她来一场女人之间的交谈，哈德莉拒绝了。宝琳·菲佛的邀请，她已经受够了。[注]

摊牌之后没多久，海明威搭上了开往马德里的火车。他和哈德莉计划再来一场“西班牙之夏”，但是邦比突然咳嗽不止，哈德莉就留在了巴黎照顾孩子。海明威一个人踏上了旅程。到马德里后，他便一如既往地住进了阿圭勒膳食公寓。海明威元气满满，投入写作，找回了去年夏天那种超人的写作速度。仅仅一天，他就写出了三篇短篇小说。[注]

“我积攒了太多的能量，我以为自己总有一天会疯掉。”他回忆说。

旅馆的服务员受到海明威写作狂热的感召，把食物和葡萄酒送到他的房间，帮他振奋精神。海明威告诉服务员他累坏了，服务员就用责备的目光看着他。

“就因为三篇磨人的小故事，看把你累的。”服务员喃喃地说。[注]

还有一件事可能也让他精神疲惫：宝琳大概和海明威在同一时间离开了巴黎，名义上是去意大利走亲访友，但是有人猜测，她实际上可能去了马德里，找海明威做流产手术。[注]不管这一猜测是否属实，这年夏天海明威的私生活正处于剧变之中，同时他焦心地等待着柏金斯对于《太阳照常升起》的意见。

海明威出发去马德里后，哈德莉带上邦比南下前往里维埃拉——莎拉·墨菲和杰拉德·墨菲提议把邦比送到他们位于昂蒂布的庄园[注]中照顾，这样哈德莉就可以去西班牙和海明威团聚了。司各特和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已经在庄园附近度暑假了。

墨菲夫妇的美利坚庄园（Villa America）共有14个房间，坐落于一片7英亩[注]的园子里，俯瞰着地中海——杰拉德·墨菲说它犹如一块“打磨光亮的蓝钢”[注]。花园是在小山坡上开辟出来的露台花园，缓缓地向下延伸到海里，园中长满了含羞草。阳光晒暖的空气中，弥漫着向日葵、桉树和番茄的味道。棕榈、柠檬树和阿拉伯白枫在海风的吹拂下沙沙作响。[注]

乍看起来，美利坚庄园的生活衣食无忧，总是高朋满座。莎拉常常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去海滩，人们去看歌剧时才会戴那么长的珍珠项链。[注]鲁道夫·瓦伦蒂诺[注]、科尔·波特、巴勃罗·毕加索都是墨菲家的常客。墨菲家100英尺长的双桅帆船“天气鸟号”（the Weatherbird）在不远

处的海面上漂着，漂亮极了。

不过，奠定墨菲夫妇形象的，还是他们的简单、率真。他们没有半点儿捞金者和暴发户的炫耀之风。在崇拜者们看来，他们高人一等，有非凡的涵养。如果说菲茨杰拉德夫妇在奢靡中日益堕落，墨菲夫妇的生活则在考究中尽显荣华。莎拉的午餐会诠释了什么是精益求精的漫不经心：今天她准备的也许是黄油搭配炖得刚刚好的土豆、密斯卡岱白葡萄酒、面包；明天的菜单上则是白煮蛋、自种的玉米和番茄，餐桌摆在室外一棵沙沙作响的椴树的树荫下。夫妇俩有时也会做些出人预料的事，尤其是杰拉德，他喜欢准备点儿精致的法式小点心，先盛一些在意大利瓷盘里喂他们家的狗，然后再拿一些给客人吃。[注]

“盛年不重来，他们就是要享受好的生活，”墨菲夫妇的朋友，诗人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回忆说，“但他们也知道怎样避免胡乱撒钱。”[注]即使是哈德莉，即使她不喜欢在旅行时和邦比分开，也可以毫无顾虑地把小儿子寄养在美利坚庄园一夏天——那里就是小孩子的天堂。整个美利坚庄园的人常常围着墨菲家的三个小孩儿转，莎拉和杰拉德打定主意要给他们最别致、最异想天开的童年。孩子们整个夏天几乎都是在庄园的私人海滩上度过的，在里维埃拉的艳阳下一丝不挂地疯跑。陪他们玩的有巴黎最显赫的艺术家。有一次，墨菲家的孩子们办了一场艺术展，评委是毕加索；还有一次，菲茨杰拉德夫妇为他们设计了一场别出心裁的藏宝游戏，菲茨杰拉德的女儿斯科蒂（Scottie）也参加了。

邦比跟着哈德莉到达美利坚庄园时，咳嗽得更厉害了。墨菲夫妇看到他和自家的孩子在海滩上玩耍，不安地叫来了医生。诊断的结果很糟糕，邦比得的是百日咳[注]。

邦比和哈德莉立刻被从“伊甸园”里赶了出来。幸运的是，他们可以搬去若安乐潘[注]的一栋小别墅里居住。它本是菲茨杰拉德夫妇租住的，后来夫妇俩放弃了那里，选了另一处更豪华、有私人海滩的庄园。杰拉

德写信给身在马德里的海明威——赶走了海明威的妻儿，杰拉德要给自己打圆场。他声称这样一来哈德莉就听不到那么多孩子的尖叫声了，她大概会因此更开心呢；而且有一位最好的英国医生照看邦比，庄园每天都会给他们送去新鲜蔬菜。海明威大可放心，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邦比的保姆也从巴黎赶到了里维埃拉，她、哈德莉和邦比就在这栋小别墅里开始了隔离病房般的日常生活。墨菲和菲茨杰拉德“远远躲开我们这些有毒的人”，哈德莉告诉海明威，虽然菲茨杰拉德一家一直在给他们送来生活必需品，比如鸡肉、鸡蛋，还有花；墨菲家也派厨师送来了食品。[注]孤独和不确定折磨着哈德莉，有时她去镇上转转，喝杯威士忌，压抑和不快就会减轻一点儿。[注]

不过不久之后，陪伴她的人来了，哈德莉又想念孤独了。

“星期三菲佛要来看一看。”哈德莉在一封信中告诉海明威。

哈德莉后来指出，她并不知道宝琳为什么会突然来到里维埃拉，她甚至向一位传记作者断言，可能是海明威央求宝琳的，让后者去若安乐潘帮助这个小家庭排遣孤独[注]，而宝琳幼时得过百日咳，有免疫力。但事实上5月21日哈德莉曾写信告诉丈夫，她希望宝琳“如果愿意的话顺路来坐坐”[注]，还提到“如果你、菲佛和我一起在里维埃拉过一夏，就跟全世界开了一个大玩笑”[注]。她似乎在努力淡化这桩难解的三角恋情。不过也有可能，哈德莉只是害怕宝琳会趁自己不在西班牙时去找海明威，于是才邀宝琳过来。无论如何，宝琳来到里维埃拉，住进了小别墅。名义上她是来安慰哈德莉的，把后者从服侍病人的工作中稍稍解放出来。

“她对我抱有歉意。”哈德莉向海明威写道，但又补了一句风凉话：其实宝琳“真正抱歉的是把海明威先生一个人留在了马德里。我敢肯定，她一定会让马德里成为一个快活的地方，令它不再是你独处时那一连串无聊的街道”。[注]

宝琳没有去马德里，倒是海明威不久之后来到了若安乐潘。这就凑成了文学史上一幕最诡异、最憋闷的家庭场景。一栋两间卧室的小别墅，一个情人，一个愤怒的妻子，一个生病的幼童，还有一个不知所措的保姆，任何一个男人都宁死也不会住进去吧？但是海明威后来说，那个环境“特别适合写作”[注]。

他们的计划是在里维埃拉待三周左右，等邦比病好了，就开始原计划的西班牙之旅，其中也包括了参加潘普洛纳奔牛节。墨菲和菲茨杰拉德两家人在附近的小赌场里办了一场小型香槟酒会，欢迎海明威来到里维埃拉。之后，海明威一家就一直待在别墅里隔离，但昂蒂布的一行人决意要让海明威家感受到他们日日笙歌的氛围。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把聚会开到海明威家门口，但也差不多了：一般是傍晚时分，两对夫妇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在海明威家门前院子的篱笆周围晃悠。每次游玩结束时，他们就把空酒瓶头朝下立在篱笆桩上。等到海明威一家和宝琳几周后离开时，所有的篱笆桩上都竖着他们留下的酒瓶，就好像一圈五彩的玻璃花环，在昂蒂布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注]在这里，菲茨杰拉德和墨菲两家可以直接围观海明威家不寻常的状况，或者用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的话说，他们的“困难家事”[注]。

在表面的同志友谊之下，厌恶也在悄悄孵化。这让人想起一年前的夏天，潘普洛纳“观光团”中的紧张关系。海明威喜欢莎拉，但是和杰拉德相处得并不融洽。“（我父亲）不太能像阿奇[注]·迈克利什和约翰·多斯·帕索斯那样，和（海明威那种）‘硬汉’式的语言相处融洽。”墨菲的女儿霍诺丽亚（Honoria）回忆说。她描述那种硬汉话语“包含简短有力的句子和单音节词汇”。[注]杰拉德是个爱打扮的富家子弟，而且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都怀疑他掩饰着自己的一种（用墨菲的朋友加尔文·汤姆金斯的话说）“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菲茨杰拉德常常旁敲侧击地试探他，问他一些“为什么你这么迷恋腰带扣呢？”之类的问题。[注]这种尴尬疏远了几个男人的关系，但是杰拉德支持海明威的才华，始终没有动摇

过。

那年夏天，墨菲一家对菲茨杰拉德夫妇的耐心也在消磨。随着交往的深入，墨菲一家发现，他们无意间又摊上了两个更加费事的“小孩儿”。夏天司各特的所作所为把他们的友谊逼到了翻脸边缘。几个月前，菲茨杰拉德还向海明威盛赞里维埃拉，说那是个平静、使人恢复元气的地方，许诺自己会度过一个轻松愉快、有益身心的假期，有愉快的日常活动：写作、游泳、晒日光浴，并且一天只喝两杯开胃酒。

海明威到达的时候，发现事实根本不是这样，菲茨杰拉德一天到晚都喝得烂醉。菲茨杰拉德的一个朋友觉得，他“正在安稳地实施慢性自杀的计划”[注]。泽尔达事后描述道，“那一夏，带有一种狂欢节，或者末日将至纵情享乐的色彩”[注]，泽尔达自己也喝了不少。夫妇俩酒后的出格举动，搅得整个里维埃拉鸡飞狗跳。有一回，他俩绑架了一个酒吧招待，菲茨杰拉德威胁要剖开这位人质的肚子，看看里面有什么，泽尔达说会有一些铅笔头和碎碟子，还有一些没什么意思的东西。另一次，他们吃完晚饭开车回家时，把车开上了火车铁轨，然后醉得睡过去了。一个路过的农夫救了他们。若没有被及时叫醒，再晚一会儿火车就会把他们压扁。菲茨杰拉德在海明威的欢迎会上也闯了祸，他喜欢向别的餐馆顾客扔烟灰缸，莎拉因此暂时禁止他进入墨菲家的大门。这是个严厉的惩罚，因为司各特特别崇拜莎拉。[注]

“我们，杰拉德和我，都到了这个年纪，生命都到这个阶段了，不能再像昨晚那样，为孩子气的事情烦心了。”莎拉在信中如此斥责菲茨杰拉德。[注]

万般恳求之下，菲茨杰拉德终于回到了“伊甸园”。但是他又开始明目张胆地研究墨菲夫妇，为他的新小说做准备。于是事态又恶化了。菲茨杰拉德想写一篇比《了不起的盖茨比》更轰动的小说，巩固他作为重要文学新声的地位；他决定将莎拉和杰拉德当作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

项工作和写出一本轰动的处女作一样重要——也是海明威迟早必然需要面对的压力。在1934年出版的《夜色温柔》中，菲茨杰拉德最终把墨菲夫妇塑造成了迪克·戴弗和妮可·戴弗——一对富有但是结局不幸的夫妇。他在现实生活中对夫妇俩的探究持续了好几年，厚着脸皮询问他们的财政状况、性生活和家庭背景。莎拉和杰拉德被他的聚光灯照得汗毛倒竖，但又无法下定决心把他永远赶走。

杰拉德曾说，“司各特让我们喜爱之处，是他心中涌出才华的那块地方”，而且无论任何事情都不会完全埋没它。[注]

与此同时，海明威和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始终在勾心斗角。泽尔达如今倒打一耙，指责海明威鼓励菲茨杰拉德喝酒，妨碍了他的写作。不过在菲茨杰拉德眼中，海明威不会做错事，泽尔达的仇恨也没有改变他的看法。他们共同的朋友开始觉得海明威的才华超越了菲茨杰拉德，但后者对海明威的信任毫不动摇。墨菲夫妇认为“司各特是一位成功的商业作家”，加尔文·汤姆金斯说，“他们盛赞《了不起的盖茨比》，但是（他的作品）并没有像海明威的那样敲准了时代的音符。海明威作品的诞生，就像时代精神的一次爆发”。[注]

并非只有墨菲夫妇如此认为。“人们观察着海明威，观察着海明威所做的事，深感关切——我就是这样——但是他们对菲茨杰拉德就不是那么专注”，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回忆，那年夏天他也在里维埃拉。“当谈话到了毕加索和斯特拉文斯基的那个高度时，就没有了司各特的地位。”[注]但海明威即将达到那个高度，他的同伴们已经预见到了。

不过，对此没有人比菲茨杰拉德的感受更为真切，而他依然引导着他的朋友度过事业起飞期的每个阶段，即使酗酒渐渐抽走了司各特宝贵的活力，他也不改对海明威的支持。那年夏天，虽然里维埃拉艳阳高照，但是他的皮肤渐渐染上了淡淡的青色，眼睛周围留下了黑圈，手指

染上了尼古丁的焦黄色，长出了啤酒肚，身上的几处地方患上了神经性痉挛，而且陷入了灵感枯竭的泥潭。[注]海明威的创作受到逆境困扰，而菲茨杰拉德则不可救药地停了下来。

“司各特正在写一本惊天动地的小说，但是写得太慢，应该在《大英百科全书》上连载[注]。”泽尔达向一个朋友抱怨道。[注]

当海明威到达昂蒂布时，菲茨杰拉德为了关照他放下了自己的写作。虽然海明威并没有回馈早期帮助他之人的名声，但他后来常常心怀感激地回忆起此时的菲茨杰拉德，“他对我的前途真心比对他自己的还专注”[注]。

到了6月初，海明威自豪地告知柏金斯，菲茨杰拉德已经读了《太阳照常升起》，并且表达了赞赏。不过菲茨杰拉德私下写信给柏金斯，说他对这本书的赞赏“是有所保留的”。他不喜欢波莱特·阿施利这个人物，但这可能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个人物的原型”，也就是现实中的杜芙·特怀斯登。他觉得杰克的性能力缺陷这一设置“有点儿不够耐人寻味”，这个主题被写得“有些不合情理”。但是司各特希望柏金斯留些情面给海明威。

“务必只让他做最少的、最必要的改动，麦克斯，”他写道，“之前为了说动出版社和杂志编辑接受自己的作品，他已经十分厌烦了。”[注]

可是菲茨杰拉德也向海明威提出了自己对《太阳照常升起》的批判意见，这些意见绝对是不留情面的。如果海明威曾经斥责舍伍德·安德森“走了下坡路”，现在海明威也要体验一番被人教训的滋味了。菲茨杰拉德读了稿子以后，给海明威写了一封信，鼓励他多练习写一些常见的华丽词句，把自己再提高一个层次。菲茨杰拉德感到小说的一些段落“漫不经心”、“可有可无”；他说他读到大概30页的时候才勉强能接受它。[注]

“欧内斯特，小说的开篇真是个天大的玩笑，我都不愿提及它让我有多失望。”他写道。

菲茨杰拉德严厉地指出，整个开篇，像导览手册一样逐个介绍着巴黎文学圈的人物，这不是文学。堆积在一起的是难以卒读的嘈杂。一部开篇就这样拖沓的小说，读者很难保持足够的好奇，一直专注地读下去。海明威需要打磨情节，让作品更吸引人才行。《太阳照常升起》目前的样子只是业余水准，它谜一般地“冷嘲热讽、自命不凡，也不知道在鄙夷什么”。就像是潮流作家迈克尔·阿伦写的东西一样。这一批评足以刺激海明威大刀阔斧地删减开篇。

“看到人们不全力以赴地做事，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菲茨杰拉德略带歉意地补充说。

这和海明威给安德森的建议一样是在“把关质量”，但是本质上仁慈得多。菲茨杰拉德的批判没有恶意，不像《春潮》是事后才公开指责的马后炮。这是出于友善的严厉——在所有编辑和作家曾经寄给海明威的信中，也许只此一封。海明威能够一举成为一位重要作家，这封信功不可没。菲茨杰拉德列出了详尽的修订建议。这样的指导有种备战体育赛事的感觉，仿佛菲茨杰拉德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球员的教练，在帮他备战首场比赛。菲茨杰拉德提醒海明威，参与赛事的选手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写得好的人太多了，竞争又如此激烈，你怎么能把前20页写得如此草率？”他说。

从现实中照搬过来的有关波莱特夫人的冗长背景介绍也要删减，菲茨杰拉德认为，海明威已经在后文中给出了读者想知道的一切。海明威对战后英格兰贵族的议论是老生常谈，同样得删。菲茨杰拉德注意到，有几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仍然顶着真名出现在小说里。这是记“贱招”，他告诫海明威，尤其是有的人物其实还是名人。任何让人感觉“这是个

真实故事”的元素，都应该立即消失。为了避免这些修改意见羞辱或者激怒海明威，整封信里菲茨杰拉德不停说着鼓励的话。他建议，上面所说的都要删去，这样才能把小说内在的光辉显露出来。

“要记住，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并且我认为你写得好极了，”他还说，“这本小说太他妈的精彩了。”

这是一封高尚的信，显露出菲茨杰拉德期盼海明威成功的迫切心情。它也揭示了菲茨杰拉德对写作技艺的精深钻研，他希望海明威用勇敢的新方式发扬这一技艺。他内心的想法是，他和海明威绝对不能像迈克尔·阿伦那样，通过装扮成文学的商业糟粕来抵达自己想要的位置。成功必须来自创新和对技艺的精研。看着海明威出版一本有缺陷的处女作，等到事后再说风凉话，这不是菲茨杰拉德的心意。他希望看到海明威一飞冲天。

对于菲茨杰拉德的忠告，海明威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如何，他在行动上立刻接受了建议。忍受凯蒂·坎奈尔的反馈是一回事，而接纳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建议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后者提出的删减意见刚好吻合海明威自己的“冰山理论”。他立即告知柏金斯，他要砍掉小说的前两章（虽然他暗示这一改动是出于自己的本意）。

“我觉得，那样我能开始得更快一些，”他写道，“司各特同意我的想法。”[注]

他解释说，菲茨杰拉德建议把一些元素从那两章里剔除，但是他觉得最好直接砍掉那两章。他说自己本来就不喜欢那一部分。现在，这本书会从介绍罗伯特·科恩（勒布对应的人物）和他的背景开始，然后直接讲述巴黎的那一部分故事。海明威说，菲茨杰拉德可能会另给柏金斯写信，表达他对“这本书总体上”的兴奋之情。

菲茨杰拉德从未在公众面前承认过自己那个夏天在昂蒂布对《太阳

照常升起》做出的贡献。10年之后回首往事，他淡化了自己的角色，说他和海明威常常互相提出很多意见，有些能说到点子上，有的则不。

“我对海明威的唯一影响，是令他进入了闻过则喜的状态，然后对他说　　‘我们把这之前的都删掉吧’，”菲茨杰拉德对作家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说，“于是出版时就没有了之前那一段，后来我们一致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删减。”

生性爱拐弯抹角的菲茨杰拉德又说：“事实其实不是那样，不要把它当作海明威神话的一部分公之于世。”[注]

虽然这么说，海明威私下里确实感激菲茨杰拉德的帮助，也如实对他说过。同年秋天，小说出版后，海明威写信告诉菲茨杰拉德，说他想出来了一个表达谢意的合适方式。他开玩笑说，他已经通知了斯克里布纳的编辑，给书加一两个副标题，可以反映出菲茨杰拉德在小说锤炼成型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以，当时这本已经加印了七次的书，此后的封面上应该这么写：

太阳照常升起（若你体会得到的话，一如你的晨勃）

一个更了不起的盖茨比

（受助于我的朋友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爵士时代的先知）[注]

麦克斯韦·柏金斯不太可能会准许这样一个下流的玩笑。毕竟，他的一项工作就是削弱《太阳照常升起》中过于俗艳的描写。小说因为描写不检点的性爱和无节制的饮酒，激起了读者、书商以及全美大量保守人士的反对；不仅如此，因为小说中不时会冒出来某些不合适的字眼，必然会在一些地区遭到禁止。

不过柏金斯没有像菲茨杰拉德那样大幅删改原稿，只是带着调和者的愉悦大略改了改。临近7月底，他给海明威寄去了小说校样。“我几乎

只字没动。”他信誓旦旦地说，不过立即关于菲茨杰拉德主张的删减一事讲出了自己的顾虑。柏金斯明白删掉波莱特夫人贵族背景的介绍合乎海明威的“理论”，但是他担心这会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理解负担。

他提醒他的作者：“你的写作风格是前所未有的，有时常常令人费解。”再说，主流的读者还不熟悉海明威的作品，会乐意让那些开篇的章节做个铺垫。手把手教他们适应，才能走入海明威的世界。(注)

海明威坚持他的立场，他认为删掉这一部分之后会好很多。“毕竟我致力于写一本没有废话的书，我最好还是坚持这个原则。”他回信写道。(注)在后来的一封信中，他坦言删掉一些“关于波莱特的好料”确实可惜，但他还是觉得，如果保留这些的话会损害小说的整体艺术效果。(注)

开篇章节就这样被砍掉了。柏金斯照办了，但还是不能安心。几个月之后，他又回到原地，小心翼翼地提议插入一篇前言或者序幕，恢复关于波莱特夫人的解说，方便读者“最终能够更好地读懂她”。一方面，这个人物必然会引发议论，为《太阳照常升起》吸引有益的公众关注；但另一方面，在道德领域这本书受到的广泛压制（一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遭遇）可能会影响它的销售。(注)海明威又一次拒绝了。波莱特的背景信息会渐渐渗入情节中，就好像一个谜语的提示，所以像这样做就可以了。（而关于波莱特的放荡行为遭到的道德非议，海明威后来向庞德指出，至少“所有的性交都不是在舞台上公然发生的，这和莎士比亚的剧作一样”。(注)）

在其他问题上柏金斯就更固执了。他坚持认为，《太阳照常升起》处处都可能吃官司。他重提了有关亨利·詹姆斯的情节，海明威必须删掉它。“亨利·詹姆斯……已经死透了。”海明威抗议道，还说詹姆斯没有后代，没人会被这几行短短的对话冒犯到，所以不用顾忌诽谤诉讼那种事。而且，谁都知道詹姆斯遇到过那样一场意外，海明威争论说。(注)柏金斯不愿退让。詹姆斯的确已经去世，但是文学界的很多人还鲜活地

记得他。“在我这间办公室里就有四位是他生前的朋友——两个是好朋友。”[注]最终，柏金斯占了上风。海明威提议把这个人物的名字改成“亨利，或者，叫什么来着，随便一个你觉得合适的名字”[注]。

在最终出版的版本中，比尔·戈顿只说了“亨利”。熟悉亨利·詹姆斯自行车事故传言的读者，才会明白比尔在说什么。

柏金斯还列举了其他出于法律考量的删改建议。在开头部分海明威提到了一则关于法裔英国作家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的逸闻。“一个英格兰人轻轻一激就会去告官”，柏金斯提醒他的作者，说英国人“对个人隐私的在意程度，美国人是感受不到的”。[注]话是这么说，但柏金斯从来没提及这本书侵犯了杜芙·特怀斯登夫人的隐私，而她可是个如假包换的英国人。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都特别向柏金斯说明过，波莱特·阿施利夫人是在真实人物的基础上塑造的。秋天的时候，海明威向柏金斯承认，这个人物的生平“不是想象出来的”，他刻画的这个“女孩”，在他看来，“和真实生活中的原型如此相近，使他深感内疚”。[注]不过海明威怀疑，杜芙其实从不看书，这样他的歉意就减轻了一点。

柏金斯和海明威也没有讨论哈罗德·勒布和唐纳德·斯图尔特的隐私权——这两个人都和柏金斯一样行走于纽约文学圈中。编辑和作者之间的斤斤计较一直集中在书中无关紧要的人物上，最终，多数人物都被删去或安上了假名。这本书的主要人物形象都公然建立在不难识别的真人原型上，即使柏金斯顾忌过这个，也没有提出来。给他们套上假名，应该就足够在法律上维护出版社了。这就够了。海明威当然觉得他们已经得到了恰当的“保护”，他也是这么对柏金斯说的。[注]

最后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脏话。柏金斯明白，海明威需要真实、现代感，但是类似“bitch”[注]、“balls”[注]之类的词还是一个问题。这里，柏金斯机智地批评起了没见过世面的读者大众。

他辩称：“这样新颖的一部作品，如果被下贱、好色、愚蠢的庸人贬低了价值，那岂不是太可惜了？”[注]

柏金斯还指出，海明威在欧洲住得太久，忘记了美国人是多么容易被这种东西激怒。海明威在回信中摆开架势为“bitch”展开了一场辩护，说服力直逼柏拉图，革新力度堪比乔叟——乔叟做了与他类似的事，让文学界接受了“fart”（放屁）这个词。“我从来没有只为了修饰的需要而使用（‘bitch’）这个词，从来都是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用，”海明威坚称，“我相信它出现的几处都是必要的。”海明威还指出，用词从不应该只是为了语出惊人，那样就会打乱行文的流畅。比如——海明威举了一例——“放屁”这个词用在一段话里常会显得太唐突，“除非整个段落是拉伯雷那种讽刺风格”。即使“fart”其实是一个“非常古典的表示‘放屁’的英文词语”，但作家也不能滥用。海明威答应他会删去没有任何必要的不雅用语，但是“bitch”并不属于这一类。[注]

不过，有关“balls”的删减还是可以商量的。它涉及的场景包括迈克·坎贝尔朝佩德罗·罗梅罗不断地喊着“公牛都是没种的”（Bulls have no balls），这些话从早期手稿开始就一直保留着，被海明威改得更文明了：潘普洛纳的公牛如今重振了雄风，但却“没有尖角”了。这是海明威愿意做出的最大让步。“也许我们应该接受，这本书就是一本不雅的书，我们只能希望接下来的一本不这么粗俗，更神圣一点儿吧。”他对柏金斯说。[注]

柏金斯接受了海明威的让步，同时也和“bitch”握手言和。毕竟，它在生物学上确实只是一种哺乳动物的名称[注]，只不过小说里使用的无疑是它更粗俗的意思。他恭敬地向海明威连连道歉。

“我知道，你用的每一个音节都有恰当的意图。”柏金斯写道。修改文稿的事，他说自己本来就不该提起，为此深感抱歉。他只是刚认识海明威不久，但已经真切感受到了对方的作家性格。

“你是不会为了制造轰动而牺牲原则的。”柏金斯说。

柏金斯和海明威一直拘谨地相处，此时他们在通信中仍然互称“柏金斯先生”和“海明威先生”。所以在那年夏天讨论《太阳照常升起》的信件中，海明威毫不意外地没有谈及他的私人生活，即使他的生活像遭受龙卷风袭击一样乱了套。

在昂蒂布，海明威一家和宝琳搬出了菲茨杰拉德的小别墅，住进了宾馆。邦比和他的保姆被打发到了一栋独立的小房子里，而海明威夫妇和宝琳住进了旅馆房间。三个人被迫开始了一段别扭的乡间生活，展开了各种各样的三人活动：打桥牌（哈德莉讨厌打桥牌），骑三人自行车，还有日常的海滩时光（宝琳教哈德莉潜水，并不愿意学习这种技艺的哈德莉差点被淹死）。[注]无处不在的宝琳令哈德莉很恼火，但她无助地处于劣势，因而忍下了所有冒犯。有一次保姆把早餐用托盘端进海明威夫妇的房间，据说宝琳也跟了进去，并且爬到了夫妻俩的床上，要一起吃。[注]哈德莉受不了宝琳的厚脸皮，她也逐渐发觉，敌人还把手伸向了墨菲家。她怀疑在这场争夺海明威的战争中墨菲夫妇是支持宝琳的。[注]这一直觉是对的。刚入夏那些日子，墨菲家还对哈德莉很友好，甚至赞扬了他们的婚姻。

“说到你们这两个孩子呀，你们为这个世界增辉，”杰拉德对海明威说，“你们是如此正确，因为你们接近根源。你们的信念直通宇宙。”[注]但是几个星期后，墨菲夫妇就暗暗对海明威说，其实他们一向觉得哈德莉作为海明威的妻子“不大合适”[注]。他们喜欢她这个人，但是感觉她和海明威是命中注定要做不同事情的人。

看到自己在那年夏天的处境，哈德莉一定发觉了，海明威在她和宝琳之间已经做了选择。这个选择是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在里维埃拉，在新朋友华美的别墅里，丈夫时髦的情人一直不离左右，痛苦的事实再清楚不过了：海明威已经离开她继续前行了。他的前程理想已经化作现

实，他们已然身处其中，那是一个明媚、辉煌的世界，远远抛开了锯木厂阁楼上画饼度日的天真和幻想。海明威和哈德莉不再一起对抗富人的游手好闲、麻木不仁，不再从温暖的床铺、简单的饭食和单纯的爱里寻找抚慰。她的寒酸从前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高贵，现在，就只剩下了不得体、不相称。猛然间，她在丈夫日新月异的生命中成了一个问题人物，不是被修理，就是被抛弃。那年夏天海明威已经无情地裁去不少东西了。

无论是私事还是业务上的纠缠，都不能阻止海明威参加圣佛明奔牛节。海明威7月初抵达潘普洛纳，高涨的情绪一如往年，还带领着一个新的“观光团”，今年的团员是墨菲夫妇、宝琳和哈德莉。此时海明威带团参加奔牛节的活动已经在圈子里大名鼎鼎了。㊟如今节日之行有了确切的项目安排：一行人住在金塔纳旅馆，海明威也要在那里和斗牛士见面。喝醉是肯定的，还必须有各种用酒囊喝酒的花样。

墨菲夫妇亲眼见证了奔牛节，被节日的盛况震撼了。哈德莉已经见过这种场面了，只是今年风头盖过她的人从杜芙·特怀斯登换成了宝琳。这一回，在上午斗牛场上的互动环节中，海明威怂恿杰拉德·墨菲跳进了斗牛场。杰拉德挥舞着他的雨衣当作斗牛红布，差点被一头冲上来的公牛撞到。这让人想起一年前哈罗德·勒布用他的衬衫挑逗公牛，然后衬衫遭了秧的事。

之前的两次奔牛节，海明威更喜欢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混进巴斯克农民之中，和华尼托·金塔纳倾心谈论最近一拨斗牛士的优劣，同时还鄙视胆敢闯入节庆的美国游客。

今年，海明威则更加主动地迎合着闪光灯。这回他终于成了互动环节中的明星。一天上午，海明威和杰拉德在场地里，海明威成功引诱了一头公牛向他冲来。

“他手上没有任何东西，”杰拉德回忆说，“正当公牛要撞上他的时

候，他跳起来越过牛角，落在公牛的背上，面朝牛尾巴，一直趴在那里。”[注]公牛摇晃着走了两步，然后跌倒了，被海明威的重量压倒了。

还有一次，墨菲夫妇被一群西班牙人围了起来，这群人不断嚷嚷着：“跳一个查尔斯顿[注]！跳一个查尔斯顿！”[注]开始时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接着就在主广场中间表演了一段这种新潮的舞蹈，一支铜管乐队给他们伴奏，一大群人围着他们看。后来他们发现，这些西班牙人是海明威背地里派来的。

节日活动中，海明威的女人们却越来越不开心。坐在伊鲁尼亚咖啡馆（Café Iruña）的桌前，哈德莉发现坐在她对面的情敌看起来很落寞。[注]节庆结束后，宝琳直接回到了巴黎和《时尚》的世界，海明威夫妇则去了圣塞瓦斯蒂安——那里也是《太阳照常升起》的叙述者杰克·巴恩斯在噩梦般的庆典之后抚慰创伤的地方。如果哈德莉同样想修整一下的话，她并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宝琳要确认自己即使远离他们，也不会被忽视。海明威夫妇动身去巴伦西亚时，她的信也追过来了。

“我想知道发生的一切，”她在一封言辞鲁莽的信中写道，“请给我回信。我是说你要回我的信，哈德莉。”[注]

那封信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离开潘普洛纳之后，在西班牙某处，海明威和哈德莉决定分开。“失去你曾经爱的人、共患难的人，（这是）多么绝望的事，”他忧伤地向一个朋友写道，“它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件大事。”[注]海明威夫妇打算先回巴黎，然后各自找地方分开居住。

回巴黎的路上，他们经停昂蒂布的美利坚庄园，把这件事告诉了墨菲夫妇。后者的宾客人数又壮大了：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回到了欧洲，领着他新婚的妻子，他近年来的成功都写在脸上。如今他在洛杉矶是个大人物了，参加他单身派对的都是好莱坞的要人，比如查理·卓别

林（Charlie Chaplin）和金·维多（King Vidor）。不过斯图尔特同样预见到，不久的将来海明威也会有高朋满座的一天，《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将会让他“名扬25个国家”[注]。

每个人都对海明威夫妇的分开表达了惋惜，不过墨菲夫妇很快就开始帮海明威开启下一阶段的人生了。杰拉德不仅出了钱，还腾出了他的画室供海明威生活。他还撂了一句和早先对海明威夫妇的溢美之词不同的话：“哈德莉的生活步伐比你更慢、更被动。”如果一直让她和邦比跟在身边，是“危险地背叛了你的天性”。[注]在后来的一封信中，他友善地向海明威保证，他和莎拉都“坚信他用正确的方法做了正确的事”。莎拉还在信的末尾附上了一些话，表达她对海明威能够拒绝“任何二流的事情、地方、观念或者人格的敬重”。[注]

几十年后，海明威会指责莫菲夫妇助长了他的“恶”，煽动他离开了哈德莉（“我曾经憎恶这些富人，因为他们在我做错事的时候支持我、鼓励我。”他在《流动的盛宴》中写道[注]），但是当时海明威接受了杰拉德的示好。他和哈德莉坐火车回到巴黎，之后海明威几乎是立即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美国太太的金丝雀》（“Canary for One”）。小说中一对即将离婚的夫妇同样坐着火车去往巴黎，一路上看见了各种衰败的景象，包括一个有三节车厢的火车残骸，若有所指。显然在海明威看来，没有什么现实中的事情是不能被写进小说的。哈德莉和海明威作为夫妇的最后一次共同旅行终于里昂车站，三年半之前，哈德莉正是在这里弄丢了海明威构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回首往事，令人一时不知今夕何夕。

哈德莉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的“锯木厂公寓”，她在博瓦尔酒店（Hôtel Beauvoir）开了一间房。这幢酒店就坐落在她丈夫的写作大本营——丁香园咖啡馆的街对面。他在那里花了无数个日夜钻研精炼、硬朗的句子，梦想着现在终于即将到来的成功时刻。海明威住进了杰拉德·墨菲在蒙帕纳斯佛罗伊德沃路69号的画室，这个地方距离丁戈酒吧、精英咖

啡馆和多摩咖啡馆只有几个街区。

一如往常，工作使人振作。海明威开始了《太阳照常升起》最后的一次修改，处理包括柏金斯提出的一些问题，还有对他自己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年春天，他根据一些初步的想法把这本书献给了邦比，并且在献词页加了一句不太相关的话，说这本书是“有教益的逸闻集”。现在他的想法更清晰了一些，改动了赠言。在一封信中他告知柏金斯，希望赠言能这样写：注

献给哈德莉·理查森·海明威和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尔·海明威

接着他又画掉了这几个字，改成：

这本书献给哈德莉和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尔

改后的献词显得既心酸又直接。乍看上去，只写名不写姓暗示着丈夫对一贯支持他的妻子的亲密之情。注这是恰当的：《太阳照常升起》应该也是属于哈德莉的胜利。除了海明威本人，没人比她为这部小说牺牲得更多。从他的文字生涯伊始，哈德莉就是他无条件的拥护者，那时海明威人生中值得称道的，仅仅还是无边的雄心壮志、无知无畏和天赐的感受力。写书时海明威编织出一个又一个点子，在一旁欢呼加油的是哈德莉。这本书终有一天会把海明威送入名人堂，那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在的地方——这个金光闪闪的男孩从报纸上、杂志上和畅销书榜上注视着海明威夫妇。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埃兹拉·庞德这样的作家，奋战于大洋彼岸遥远城市中的文学革命者，对海明威来说一度是那么遥不可及，那么天方夜谭。海明威开始结交这些作家当作导师，哈德莉在他放弃记者工作的时候鼓励他，直到他的笔法打磨得比导师们还要出色。

如今，正当海明威一家马上就要苦尽甘来，赢得史诗般的胜利时，另一个女人跳了出来，要替代哈德莉待在海明威身边。突然之间，哈德莉甚至和“海明威”这个姓氏都没有一点儿关系了：只消在她的姓上轻轻一画，5年的婚姻和信仰就这样戛然而止。海明威没有像菲茨杰拉德笔下的杰伊·盖茨比那样热衷于感伤过去[注]，至少此时他没有兴趣。黑夜最黑的时候已经在他的身后。他不会回头望。

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他看着太阳冉冉升起。

---

1. Ernest Hemingway to Isabel Simmons Godolphin, February 25,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 : 32.
2.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217-18.
3.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218.
4. Gerald Murphy to Hadley Hemingway, March 3, 1926, reprinted in Miller, *Letters from the Lost Generation*, 15.
5.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77-78.
6.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March 10,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40.
7.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March 24,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8.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149.
9. Allen Josephs, “Toreo: The Moral Axis in *The Sun Also Rises*,”*Hemingway Review*6 （Fall 1986）: 88-99; Allen Josephs,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April 1, 2014.
10.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192; Ernest Hemingway, typewritten revision of *The Sun Also Rises*,item 198,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1. Ernest Hemingway, draft 1 of *The Sun Also Rises*, item 194,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2.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198.
13. Gerald Murphy to Hadley Hemingway, March 3, 1926, reprinted in Miller, *Letters from the Lost Generation*, 16.

14.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215.

15.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77-78.

16.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April 1,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46.

17. 在1926年4月20日前后寄给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信中，海明威说他在考虑为小说加上这句献词。Reprinted ibid., 56.

18. 名单中的人包括罗伯特·沃尔夫、埃德蒙·威尔逊、赫尔曼·戈尔曼（Herman Gorman）、伯顿·拉斯科和其他很多重要的批评家。新书的收件人名单中还有埃兹拉·庞德、罗伯特·本奇利、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詹姆斯·乔伊斯和辛克莱·刘易斯。海明威还要求给埃莉诺·怀利寄去一本，他在纽约和怀利有过一段露水情缘。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April 8,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9. 西尔维娅·毕奇在回忆录中称，自己是最初介绍海明威和凯普认识的人："我记得乔纳森·凯普初次读到海明威作品时的兴奋劲儿。凯普先生是劳伦斯上校和乔伊斯作品的英国出版商，在一次到访巴黎时问我有什么美国作品值得他出版。'来，读读海明威！'我说——于是凯普先生就成了海明威小说的首位英国出版商。"Beach，*Shakespeare and Company*,82.

20.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April 24,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太阳照常升起》1927年以"节庆"的书名在英国出版，海明威后来对凯普出版社的运作表示失望。该书发行之后，他曾向乔纳森·凯普抱怨出版社不尽如人意的营销和编辑工作。

21. 乔纳森·凯普在第二年拒绝了《春潮》。柯提斯·布朗代理公司（Curtis Brown）的美国图书部主管L. E. 珀林格（L. E. Pollinger）曾向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写信说："正如你预料的，凯普觉定不接受海明威的《春潮》，而我直接致信海明威，告诉了他这一消息。" L.E. Pollinger to Charles Scribner, August 31,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2. 假书的内页通常是空白的，但封面和装帧都和最终的成书一致。假书可以早于真正的成品书制成，通常用于推销、展示或陈列。——译者注

23.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April 12,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4.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April 24,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5. 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May 4,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70.

26. 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ca. May 15, 1926, reprinted ibid., 76.

27. 四个字母的单词，指“fuck”，是英文脏话。——译者注

28. 露易丝·桑德斯的这番话由她的外孙女珍妮·菲利普斯在与作者2014年9月9日的访谈中转述。菲利普斯称她的母亲和阿姨偷听到了柏金斯与妻子的对话，并且告诉了她。

29. Ibid.

30. Maxwell Perkins to F. Scott Fitzgerald, May 26, 1926, F. Scott Fitzgerald Files,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菲茨杰拉德把这个评价转述给了海明威，海明威一个月之后又一字不差地（带着自豪）把这些话写信告诉了另一个朋友。Ernest Hemingway to Isidor Schneider, June 29,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 : 92.

31. Wheelock, *The Last Romantic*, 59.

32. Maxwell Perkins to Charles Scribner Jr., May 27,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33. Ibid.

34. Ibid.

35. 马尔科姆·库利把这则逸闻写进了《纽约客》中对柏金斯的介绍里，引用了一位斯克里布纳匿名前员工的信。Cowley, “Unshaken Friend — II,” 33. 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三世认为社内围绕《太阳照常升起》的争论并没有升级到这个层面，这种戏剧性的辞职威胁“完全不符合柏金斯的性格”。他说：“柏金斯是一个有耐心的人，摊牌不是他的风格。他会展开强有力的号召和游说。”Charles Scribner III,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une 20, 2014.

36. William Cary Brownell, “Report by Brownell on Hemingway's 1st book,” undated but filed under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37. Maxwell Perkins to M. J. Levey, May 4,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38.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May 18,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39. Ibid.

40. 《春潮》的宣传计划开始于1926年3月，结束于1927年10月。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在主要报刊上登了广告，包括《星期六文学评论》《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大西洋月刊》，当然还有出版社自己的刊物《斯克里布纳杂志》（*Scribner's Magazine*）。宣传活动仅限于纽约和波士顿。Advertising Records, “Hemingway, E: The Torrents of Spring,”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41. “Charles Scribner's Sons Supplement to List of Spring Publications — 1926,”reprinted in Robert W. Trogdon, *The Lousy Racket: Hemingway, Scribners, and the Business of Literature*（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3-34.

42. 1926年6月13日《纽约时报书评》中的一篇匿名文章说，《春潮》“不是大家期待中《在我们的时代》的作者会写出来的作品”。

43. Harry Hansen, review of *The Torrents of Spring, New York World,* May 30, 1926.

44. Review of *The Torrents of Spring, Kansas City Star,* excerpted in Leonard J. Leff,*Hemingway and His Conspirators* （Lanham,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1997）, 40.

45. Margery Latimer, review of *The Torrents of Spring,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Books,*July 18, 1926.

46. Ernest Hemingway, “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Hemingwa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older 265.a,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47.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49.

48.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60.

49. Maxwell Perkins to F. Scott Fitzgerald, June 18, 1926, F. Scott Fitzgerald Files,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50. Anderson, *Sherwood Anderson's Memoirs*, 475.

51. Ernest Hemingway to Sherwood Anderson, May 21,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81-83.

52. Anderson, *Sherwood Anderson's Memoirs*, 475.

53. Sherwood Anderson to Ernest Hemingway, ca. June 1926, Incoming Correspondence,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54. Anderson, *Sherwood Anderson's Memoirs*, 476.

55.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January 20,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56. Stein,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216.

57. “海米”这个昵称和“海姆”相比，更像是长辈对晚辈的爱称。——译者注

58. Sherwood Anderson to Laura Lou Copenhaver, November 9, 1937, reprinted in Jones, *Letters of Sherwood Anderson*, 392.

59. Sherwood Anderson to Gertrude Stein, April 25, 1926, box 16, Carlos Baker Collection of Ernest Hemingway,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60. 我所引述的这句话在索阔罗夫记载的基础上稍稍做了些修饰。“一天晚上（哈德莉）问金妮（她知道金妮很了解姐姐）是否觉得‘宝琳和欧内斯特有点儿太要好了’，或者是类似的问题。”（Sokoloff, *Hadley*, 86.）

61. 传记作者露丝·霍金斯主张，宝琳可能是在旅行途中发现自己怀孕一事的，这可能就解释了她反常的失控行为和情绪。Hawkins, *Unbelievable Happiness and Final Sorrow*,66.另外，第二年秋天，宝琳和海明威将在哈德莉的要求下分开三个月，其间宝琳写信对海明威说，“我想了很久，我感觉，四个月（原文如此。——编者注）比起九个月更难熬”，表明两个人可能曾在某个时间段考虑过分开九个月，或许就是因为宝琳要在孕期离开巴黎。Pauline Pfeiffer to Ernest Hemingway, October 2, 1926, series 3, Incoming Correspondence, box IC15, Hemingway, Pauline Pfeiffer,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62. 哈德莉曾对爱丽丝·索阔罗夫说，此时她仍然不知道海明威的外遇，并说她自己或者是“想得太简单了”，或者干脆“就是太笨了”。Sokoloff, *Hadley*, 86.

63. Patrick Hemingway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September 26, 2014.

64. Hadley Hemingway to Carlos Baker, August 1962, paraphrased in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68; Sokoloff, *Hadley*, 86.

65. Hadley Hemingway to Alice Sokoloff, November 29, 1970, quoted in Sokoloff,*Hadley*, 86-87.

66. 海明威后来说那一天是5月16日，斗牛比赛被取消，所以他就待在旅馆里，写了《杀手》（“The Killers”）、《今天是星期五》（“Today Is Friday”）和《十个印第安人》（“Ten Indians”）。Plimpton, “The Art of Fiction: Ernest Hemingway,” 79.

67. Ibid.

68. 露丝·霍金斯根据一些引人注目但无法自圆其说的证据猜测，宝琳可能在马德里和海明威见了面，并做了手术。Hawkins, *Unbelievable Happiness and Final Sorrow*, 65-66. 宝琳和海明威的儿子帕特里克觉得这种猜测是没有道理的，和他母亲的性格、身份背景不符：“我真的不相信。宝琳小时候在圣路易斯的圣心修道院接受了严格的天主教教育，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母亲直到快50岁时还一直坚持着她的宗教信仰……据我父亲所言，她的天主教信仰是让他俩的结合变得更为复杂的因素之一。”霍金斯的一些旁证来自海明威后来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海明威和宝琳度蜜月时，把《白象似的群山》作为礼物送给了她。故事中一对夫妇受意外怀孕之苦，对是否该做流产手术左右为难。不过，帕特里克·海明威并没有被此说服：“人们总是把我父亲写的故事当成圣诞树，往上面挂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September 26, 2014.）但是霍金斯指出，如果宝琳那年春天发现自己怀孕，就相当于走投无路了，无论是生下孩子还是堕胎，都违背了她的天主教信仰：“在婚姻关系之外，和一个已婚男人有了孩子……就相当于公开承认了她自己是个罪人。”可能问题就在于哪种选择的罪孽更小一点儿（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October 13, 2014）。

69. 正如菲茨杰拉德夫妇拥有张狂的纽约生活，墨菲夫妇被认为是里维埃拉生活方式的“发明者”，或者至少开拓了一个富有旅居者消夏的好去处。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昂蒂布还是一小片安静的水域，海明威所憎恶的比亚里茨游客不会到这里来。（比亚里茨是

大西洋沿岸的度假胜地，而昂蒂布在地中海沿岸。——译者注）“在地中海度夏被认为是不健康的，没有人到南边去”，所以在那里“不用花什么钱就可以租到任何东西”，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回忆说（*Reflections*, 43）。

70. 7英亩等于28328平方米。——编者注

71. Honoria Donnelly, *Sara &Gerald*, 18.

72.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68.

73. 墨菲夫妇的外孙女劳拉·唐纳利记得外祖母有一个首饰柜，里面就有那条104颗珍珠串成的项链。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夜色温柔》中让这串珍珠项链名垂青史，以莎拉为原型的小说人物妮可·戴弗戴着它去了海滩，项链垂到了她的背上。毕加索也画过莎拉戴着珍珠链的肖像。劳拉·唐纳利说，虽然她还保存着一些自己了不起的外祖父母的首饰，但是这件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不朽的珠宝此后就“消失了”。Laura Donnelly,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September 23, 2014.

74. 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1895—1926）：著名美籍意大利裔电影演员。瓦伦蒂诺是无声电影时代的一位巨星，20世纪20年代的性感偶像。——译者注

75. Roger Angell,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October 7, 2014.

76. MacLeish, *Reflections*, 46.

77. 百日咳是一种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译者注

78. 若安乐潘（Juan-les-Pins）位于昂蒂布镇的另一处度假胜地。——译者注

79. Hadley Hemingway to Ernest Hemingway, two letters, both May 1926, Incoming Correspondence, Hadley Richardson Hemingway Mowrer, 1926 folder,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80. “昨天我心情太差了，去了城里，花了8法郎喝威士忌，感觉有点儿后悔。” Hadley Hemingway to Ernest Hemingway, May 1926, Incoming Correspondence, Hadley Richardson Hemingway Mowrer, 1926 folder,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关于自己的孤独，哈德莉在这封信里说：“除了玛丽（保姆）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话。”

81. 哈德莉告诉她的传记作者爱丽丝，她认为海明威写了一封“可悲的信”描述她和邦比的惨状，以此求得了宝琳“好撒玛利亚人式的”来访。（“好撒玛利亚人”是《圣经》中的一个典故，指不顾隔阂与敌意，出手帮助对手的人。——译者注）Sokoloff, *Hadley*, 88. 哈德莉出于担心宝琳去西班牙找海明威而同意她来访，这一猜测参见Hawkins, *Unbelievable Happiness and Final Sorrow*, 53。

82. Hadley Hemingway to Ernest Hemingway, May 21, 1926, I ncoming Correspondence, Hadley Richardson Hemingway Mowrer, 1926 folder,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83. 言下之意，此举会让到处疯传的海明威出轨传言变成一个笑话。——译者注

84. Hadley Hemingway to Ernest Hemingway, May 1926, Incoming Correspondence,Hadley Richardson Hemingway Mowrer, 1926 folder,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85.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159.

86. Sokoloff, *Hadley*, 87.

87. Zelda Fitzgerald paraphrased in Mayfield, *Exiles from Paradise*, 112.

88. 阿奇（Archie）：“阿奇博尔德”的简称。——编者注

89. Donnelly, *Sara & Gerald*, 152.

90. Calvin Tomkins,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September 10, 2014.

91. Mayfield, *Exiles from Paradise*, 116.

92. Zelda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September 1926, quoted in Miller, *Letters from the Lost Generation*, 5.

93. Mayfield, *Exiles from Paradise*, 114-16.

94. Sara Murphy to F. Scott Fitzgerald, ca. summer 1926, reprinted in Miller, *Letters from the Lost Generation*,18.

95. Tomkins, *Living Well Is the Best Revenge*, 109.

96. Calvin Tomkins,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September 11, 2014. 杰拉德·墨菲曾对汤姆金斯说：“我们真正认真对待的是欧内斯特，而非司各特。我想这是因为欧内斯特的作品看起来是全新的、当代的，而司各特的不是这样。” Tomkins, *Living Well Is the Best Revenge*, 117.

97. MacLeish, *Reflections*, 60-61.

98. 这是莎拉·梅菲尔德的观察，那段时间她和菲茨杰拉德经常见面，见*Exiles from Paradise*,113。

99. 《大英百科全书》首次出版于1768—1771年间，至今已经推出过15版，平均每16年会推出新版。——译者注

100. Zelda Fitzgerald to Madeline Boyd, July 2, 1926, transcribed on the website of Sotheby's, which auctioned the letter in 2004（http://www.sothebys.com/en/auctions/ecatalogue/lot.pdf.N07980.html/f/65/N07980-65.pdf）, and also partly quoted in Bruccoli, *Fitzgerald and Hemingway*, 63.

101.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55.

102.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ca. June 28, 1926, F. Scott Fitzgerald file,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03. 这封大约写于1926年6月的信，其全部内容参见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256-59。

104.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June 5,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05. F. Scott Fitzgerald to John O'Hara, July 25, 1936, reprinted in Bruccoli, *F. Scott Fitzgerald: A Life in Letters,* 303.

106. 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ca. November 24,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164.

107.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July 20,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08.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August 26,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09.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November 16,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10.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October 30,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11. 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 February 13, 1927, reprinted in Sanderson,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202.

112.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June 5,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13.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July 20,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14.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August 21,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15.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July 20,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16.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November 16,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17.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November 16,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18. “Bitch”直译为“贱人”，也被海明威用作动词，大意是“像讨厌的女人那样说话”，本书中常译为“瞎咧咧”。——译者注

119. “Balls”本意是“睾丸”，可以用于表示惊叹、否定、厌恶等感情，也有“勇气”之意。——译者注

120.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July 20,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21.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July 24,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22.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August 21,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23. “Bitch”在生物学中指雌性犬科动物。——译者注

124. Sokoloff, *Hadley*, 88.

125. Diliberto, *Paris Without End*, 219.

126. Sokoloff, *Hadley*, 88.

127. Gerald Murphy to Ernest Hemingway, July 14, 1926, reprinted in Miller, *Letters from the Lost Generation*, 19.

128. Gerald Murphy to Ernest Hemingway, September 6, 1926, reprinted ibid., 22. 据加尔文·汤姆金斯所说，墨菲夫妇还是喜欢哈德莉这个人的（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September 10, 2014）。

129. 第二年，喜剧作家哈珀·马克斯（Harpo Marx，1888—1964，美国喜剧作家、演员，也是格劳乔·马克斯的哥哥。——译者注）也希望加入海明威的潘普洛纳之行。1927年杰拉德·墨菲在写给海明威的一张明信片上说：“哈珀·马克斯想去潘普洛纳。”墨菲夫妻也是马克斯的朋友，对他讲了1926年与海明威前去潘普洛纳的难忘体验。Donnelly, *Sara &Gerald*,166.

130. Gerald Murphy to Calvin Tomkins, quoted in Tomkins, *Living Well Is the Best Revenge*, 115.

131. 查尔斯顿舞是20世纪2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一种摇摆舞。——译者注

132. Ibid.

133.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72.

134. Pauline Pfeiffer to Ernest and Hadley Hemingway, July 15, 1926, quoted ibid., 172.

135. Ernest Hemingway to Henry Strater, ca. July 24,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101.

136.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55. 至于参加斯图尔特的单身派对的人，见ibid., 156。

137. Gerald Murphy to Ernest Hemingway, September 6, 1926, reprinted in Miller,*Letters from the Lost Generation*,21-22.

138. Gerald and Sara Murphy to Ernest Hemingway, ca. fall 1926, reprinted ibid., 23.

139.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219.

140.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August 26,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41. 作者并没有提到这处修改的另一个辛酸之处，即海明威删掉了儿子的姓——可能是想到离婚之后，儿子就不会再随自己的姓了。——译者注

142.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杰伊·盖茨比不得不和黛西分离，放任黛西嫁给布坎南，却对黛西念念不忘。最终盖茨比发迹后，誓要夺回黛西。——译者注

叁


LES
HALLES
Trahoir
Rue du Château
Rue Bethisy
STE OPPORTUNE
GERMAIN-
UXERROIS
ST JACQUES

12 国王有多快活

海明威一家回到巴黎，哈德莉似乎又回过神来，也许她终究不想把丈夫拱手让给宝琳。她感觉海明威只是容易被赞美的话语冲昏头脑；如果离开他的情人崇拜者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清醒过来。最后一次，她艰难地想挽救自己的婚姻。哈德莉向海明威和宝琳宣告，如果他们可以分开三个月，如果三个月之后他们还觉得爱着对方，她就同意和海明威离婚。

海明威和宝琳接受了她的条件。他们决定，度过这三个月最好的方式就是两人各自待在两个不同的大洲。9月底，宝琳登上了开往纽约的“佩因兰号”（the Pennland）远洋客船。在给海明威的信中，她吐露了自己的苦闷，但她不能容忍哈德莉的挑衅，决意盯紧自己的战利品。如果哈德莉再多说三个月，她也会忍下来。注

可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宝琳的耐性渐渐被消磨，绝望感也越来越沉重。她写信对海明威说，虽然她觉得对不起哈德莉，但同时也急于把事情做个了结。三个月一到他们必须离婚。她要求海明威，无论哈德莉在经济上提出了什么样的条件，他都得答应。注

在巴黎，海明威闭门谢客。三角关系的纠缠和《太阳照常升起》的紧张筹备工作，一定让他感到压力巨大。他告诉宝琳，他感觉自己肝肠寸断，“你是我想要的全部，菲弗，上帝啊，我如此想念你”。他不喝酒，不见客，也停止了和巴黎文学圈的交往。注

“我在做不寻常的写作实验。”他向菲茨杰拉德写道。

海明威还谈到，从之前一年的圣诞节起，他就饱受地狱般的煎熬。他承认这是他咎由自取，但地狱终究是地狱。现在，他想逃出去。

“我确信我们会像国王一样快活。”他写道，引用了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注)的一句诗。但他接着又问：“国王有多快活？”(注)

和宝琳分别6周，海明威也陷入了绝望。他怀疑哈德莉可能会故意拖延，再次延长他和宝琳分开的时间。可能她根本不想离婚。他对宝琳说，也许他应该就此自杀算了，这样就能让她从破坏他人婚姻的负罪感中解脱，也能让哈德莉从离婚的羞辱感中解放。

“我宁可在这个世界还有所残留的时候死掉，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坍塌、毁灭、耗尽。”海明威对宝琳说。(注)

同时，麦克斯韦·柏金斯在全然不知海明威低落情绪的情况下，开始准备隆重推出《太阳照常升起》。《春潮》的销量一般，但他让海明威不要因此感到沮丧。在纽约，期待《太阳照常升起》的呼声日益高涨。

“你可能意识不到人们对你的评价有多高，那些业内一言九鼎的人又是如何郑重其事地评价你，最后他们的评价都成了共识。”(注)

到了9月份，《太阳照常升起》已经编订完毕，可以付梓了。总的来说，柏金斯只对文稿做了些微小的编辑改动。他的小改进既让小说达到了公众能够接受的水准，又令其不失那种撩人的粗犷。柏金斯对此很满意。

海明威让柏金斯把格特鲁德·斯泰因那句“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以及《传道书》里“日头出来，日头落下”那段话都印在书名页上。柏金斯

为了劝他别这么做，颇费了一些力气：书名页上写这么多字，会显得非常拥挤、怪异。他把这几句格言挪到了新定好的献词页背面。这一页之后，读者便一头扎入了书的正文部分。柏金斯认为，这样的安排很好地突出了这两句格言。

“让它们独占一页，就是很好的强调。”他对海明威说。(注)

即使当时海明威在私人情感上已经精疲力竭，他和柏金斯的关系却似乎单纯得让人感动。当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准备发布《太阳照常升起》时，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越发亲近。在9月中旬的一封信里，柏金斯已经把海明威称为“我亲爱的海明威先生”了。通信中洋溢着幽默与兴奋，海明威深陷其中的绝望和焦虑，在信中一点儿也没有显露。

即便海明威整日愁眉不展，禁闭自己，他还是找到了兴致，至少光临过一次聚会。诗人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和他的妻子办过一场晚会，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带着新婚妻子比阿特丽斯前来参加，海明威也到了，带上了最新的作品——一首诗，打算读给朋友们听。诗的题目是“致悲剧的女诗人”。在大家的注目下，他读了出来：

你拿着刮胡刀片

一片新的，免得感染

左右划破了两只手腕

伤口却浅得看不见

唐纳德·斯图尔特倒吸了一口凉气：这首诗明显写的是多萝西·帕克，过去三年中她两度想要自杀。海明威继续读着，诗里描绘了不幸的女诗人最近的一次西班牙之旅：

一路上你轻蔑地翘着下巴

走过阿拉贡、卡斯提尔、安达卢西亚西班牙男人伸出咸猪手

掐了你这犹太人的圆屁股一下又一下

然后，这首诗的主人公很快回到了巴黎，“没出什么事”注，又为《纽约客》写了更多的诗。帕克与海明威、本奇利来到巴黎之后不久，确实去过西班牙。那个国度中，大概所有的事物——从国民对待动物的方式，到男人喜欢捏女人屁股的习惯——都使帕克毛骨悚然。注在巴塞罗那，她在一场斗牛比赛上目睹一头牛顶死了一匹马，走出赛场后她坚持认为斗牛士十分令人作呕。回到巴黎，帕克把这些经历告诉了海明威，对于后者来说，帕克的言论近乎亵渎神明。这首诗接下来的40行描绘了那些被帕克一路上嗤之以鼻的神圣场面，它含蓄地指出，帕克的心态高人一等，缺少观察的天分，所以只能做一名二流作家。

是什么促使海明威写下了这首不留情面的诗？不得而知。不过，尽人皆知的是，海明威丝毫不会同情一个被销蚀、被宠坏了的城里人，不会把他们的抑郁、自残当回事。但这首诗仍然令唐纳德·斯图尔特十分意外，他后来回忆，这首诗“居心叵测，既不公平，也不好笑”。他想不明白，海明威为什么要攻击帕克。在当今在世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人未曾领受过帕克的犀利评论，但海明威就是例外之一。斯图尔特当场谴责了海明威。注

“其他人都没有站出来，”斯图尔特回忆道，“（阿奇·迈克利什）或者其他人都没有。我素来被认为是一个和善的人，是所有人的‘唐叔叔’，但是那一回我让他滚蛋——当然别人是不敢那样对待海明威的。”注说出这样的话后，唐纳德有点儿难堪，他等着海明威回嘴。

出乎意料的是，海明威从容接受了他的指责，实际上“连哼都没哼一声”，斯图尔特说，“我想这件事要被载入史册了”。

无论海明威反应如何，在斯图尔特看来，这件事结束了他和海明威的友谊。不是说他们对彼此的态度不友好了；正如斯图尔特所解释的那样，“严格意义上说我们一直是朋友，但在那件事之后，关系就不像从前那样了”。他不能容忍这首诗。它揭示了海明威个性中的“卑鄙特质”，在斯图尔特看来，海明威“就像那种能把你引诱过去然后炸死你的陷阱”。

据斯图尔特所知，这首诗从没有传到帕克耳中，直到她死后才公之于世。被蒙在鼓里的帕克始终怀着不羁的热情为海明威的作品写评论，将它们发表在《纽约客》上，并称他为她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海明威是多摩咖啡馆中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他疏远了哈德莉，而宝琳又突然离开巴黎，他的热心观众们一下子吊起了好奇心。如今形单影只的哈德莉去丁香园咖啡馆消磨上午，被认识她的人淹没了，他们“好奇得要死”㊟，想知道整件事的真相。但是在10月底，大西洋彼岸发生的一件事彻底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1926年10月22日，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发行了5090本《太阳照常升起》。

在纽约，麦克斯韦·柏金斯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决意把小说的问世打造成一个大新闻。不管编辑团队曾经如何质疑海明威和《太阳照常升起》，斯克里布纳的宣传团队此时热情得近乎疯狂。无论是小说本身还是它的作者，都带给了宣传团队做不完的工作：他们把海明威“兜售”给所有人，上至高级评论家，下至小报专栏写手。他们推出的不单是又一位斯克里布纳旗下的“坏男孩”，而是一种全新的作家：混合了巴黎的喧嚣、阿尔卑斯山的粗犷、拳击场的野蛮，另外还有一种别样的才华光芒。

“我们有三位社内营销人员，每位都尤其对你作品的推广工作干劲

十足。”柏金斯在信中对海明威说。他们“贪婪地搜寻着任何能当作广告的材料，迫不及待想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注]编辑们很快意识到，这回钓上的是一条大鱼。媒体对海明威有了满足不了的胃口。柏金斯央求他的作者，“你的照片，不管是什么照片都请统统寄来”[注]。宣传人员拿到什么材料都可以利用起来。三天之后柏金斯又写了一封信，向海明威讨要他个人身世的资料，喂给那些如饥似渴的新闻编辑和专栏作者。

“不管我们给报社什么东西，只要是关于你的，他们都肯刊登，”柏金斯兴致勃勃地报告海明威，“我们手头没有足够的材料，很为难。”[注]柏金斯甚至坦白，他还从海明威的信中挑挑拣拣，选了一些通信中的小插曲投给嗷嗷待哺的公众。海明威伸出援手，寄去了一些照片用于复印和散发。其中包括一张在山中拍摄的运动照，他身后是闪闪发光的白雪。不过他愤然拒绝透露更多自己的事。

“我宁愿不介绍自己，就让读者和批评家去编瞎话吧。”他对柏金斯说。[注]

海明威可能是发自内心地选择了缄默，也可能是打着别的算盘。作为推崇“少即是多”（less-is-more）这一文学准则的新晋大师，海明威可能觉得制造一些神秘感会增加他的吸引力。他认为这一准则在《太阳照常升起》的人物身上奏效了，也在菲茨杰拉德小说的人物身上奏效了。也有可能，在展示海明威其人其事的过程中，他发现把故事交给媒体来讲更好，无论他们会讲得如何天花乱坠。毕竟，出名总是好的。

如果海明威确有这些想法，他也很快就改变了主意。收到剪报公司寄来的评论和作家介绍后，海明威发现媒体确实编造了大量有关于他的谎话，这才不安起来。《纽约先驱论坛报》告诉读者，海明威大学期间靠当拳击教练赚取生活费。（“我从没上过大学，也从没对任何人说我上过哪门子的大学。”他向柏金斯抗议。[注]）另一家报纸热情洋溢地讲述了海明威在高中时成为体育明星的事。（“我离橄榄球明星还差得远

呢。”他反驳说。）还有一份更为夸张的报纸，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儿女绕膝的人。

但是最让海明威感觉不妙的是那些报纸编造的有关他战时经历的故事。海明威担心在那些知情者看来，他成了一个“妄想狂、骗子或傻瓜”。他想澄清事实：自己不曾参加正式的战斗，只是个“不起眼的”，为意大利军队“搬物资的人”。他要求调查斯克里布纳的宣传机器是否对这些不着边际的传言负有责任。如果有，就去澄清事实，海明威命令道。

事已至此，他答应提供一份个人介绍。只要能满足媒体的好奇心，不论多劲爆的奇闻逸事，他都可以给。

“如果我摔断了一条腿，珠宝全被偷走，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在斗牛场上丧命，或者纵酒致死，我都会正式通知你们的。”海明威说。[注]柏金斯调查了这些传言和出版社的关系，写了一封没有什么特别道歉意味的解释信。

首先，他查到了流言可能的源头，至少一部分比较荒诞的传闻是这么来的：社内的三位营销人员中有一位拿到的消息得到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亲自证实”。尽人皆知，菲茨杰拉德为人物编造传奇身世的水平是专家级的。柏金斯当然可以让宣传团队节制一些，但是他不太愿意这么做。

“只要可以宣传我们的作者，什么事他们都应该做。”他向海明威解释说。如果他制止他们，就好像“压制了一个本质上善意的动机”。[注]

同时，斯克里布纳的广告团队展开了一项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大规模印刷推广工作。海明威终于不再是默默无闻的人了。

“我们在筹备更大规模的广告[注]，之前我们还没有如此推广过这本

书。”柏金斯告诉菲茨杰拉德，[注]后者素来对海明威的家事消息灵通。

广告员工和柏金斯、营销同事一样激动，都看到了《太阳照常升起》大卖的潜质。如柏金斯私下里对海明威说的，这不仅是件幸运的事，而且对海明威意义非凡。按理说，广告员工应该对斯克里布纳的所有书给予同样的关注，但实际上他们难免会为那些自己真正喜爱的书更卖力地工作。“按说不应该让自己的好恶影响工作，”谈到他曾在其中工作过的这个部门，柏金斯说，“（但是）影响当然是存在的。”[注]

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在纽约的报刊杂志上大肆宣传这本书，他们心知肚明，这座城市的阅读品味是全美国的风向标。在宣传有创新精神甚至是浮夸的战后作家方面，多亏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有多年的经验，开发的广告对于现代作品的推广总是恰到好处。它们的广告使用与读者交谈的口吻，咄咄逼人——几十年后出现的那种直截了当、语气急迫的电视广告，大概就继承自它们。出版社拿菲茨杰拉德早期的书探路：广告毫无顾忌地把书和作者推销为可供消费的产品。一则广告对读者说，《人间天堂》“不仅仅是一部畅销书”，它是“献给全国的天籁之音”，并且建议读者“怎么享受圣诞，就怎么享受菲茨杰拉德吧！”[注]

斯克里布纳的广告团队甚至狡猾地用负面书评开玩笑。阿尔冈琴圆桌会的成员、批评家海伍德·布朗曾说，看完《人间天堂》后，他感到的只有“冷漠和困惑”[注]。对此，斯克里布纳发布了一则广告，上面用超大的字体写着“海伍德·布隆鄙视又嘲笑——”[注]旁边列着其他评论者的另外5条推荐语，说这本书“好到炸裂”（cracking good），然后请求读者亲自读读这本书，自己做出判断。[注]

在广告和推广活动中，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充分利用了我们如今所谓的“错失恐惧”（FOMO，fear of missing out）。任何没有阅读新书的人都会掉队，落入历史的尘埃和蛛网里。“这本书是新作，最新力作，”斯克里布纳另一本书的广告里说，“不读你就亏大啦。”[注]

出版社同样在《太阳照常升起》的广告文案上大费周章。销售团队已经向书商们发出预警，这部小说跨越了一条文学上的卢比孔河[注]：它一旦出版，就将永远改变文学本身。这本“饱蘸着生活”的书，以“文学的叛逆精神”写就。[注]海明威本人明确说过，他对“某些流行小说”千方百计想制造轰动的现象“深感厌恶”（哪怕其中有些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的），《太阳照常升起》这头“野兽”则和它们完全不同。

出版团队从书前的献词中得到暗示，将它宣传为一部为一代人发声的巨著，“见过了太多触目惊心的现实的战后一代……幻想全部破灭，含蓄的温情全都不见了踪影”。在海明威的引领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资助下，“迷惘的一代”走上“红毯”，和读者见面。出版社的秋季书目宣传册中说，这本书中的人物是“如此真实可触……甚至可以在街上认出他们”——这不是有意的讽刺，但有些认识特怀斯登、勒布或者《太阳照常升起》中其他“受害者”的人，很快就会觉得上面这句话说得太对了。

一番苦心经营后，一浪接一浪的广告把海明威本人渲染成了一位万众期待的人物。在一张广告中，他的大头像（带着沉思、凝重的表情）所占的版面完全超过了那些赞美他的文字。柏金斯向海明威解释，广告使用了海明威的画像而非照片，只是为了能够在不同的出版物之间更好地传播它；自然咯，出版社希望海明威那年轻、棱角分明的面容传得越广越好。[注]

出版社保证：“随着（这本小说的）的出版，海明威先生本人的太阳也会高高升起。”[注]

广告团队甚至亮出了《在我们的时代》封面上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推荐语，向读者保证海明威是“当今美国最好的作家”。员工们大概不知道，正是在《太阳照常升起》里，福特被塑造成了一个小丑般的人物，而且不难被指认出来——也可能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这些广告登在了各大主流文学报刊上，从《星期六文学评论》到《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再到《大西洋》（*The Atlantic*），团队还把广告的投递范围拓展到了有关生活方式和品位的刊物，比如《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金书》（*Golden Book*）和《城与乡》（*Town & Country*）。很快，广告扩散到了芝加哥、波士顿、费城等地的报纸杂志上，也包括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出版物。任何一个人群都不容遗漏，从学生到牧师，还有初入上层社会的年轻女人，很快都会对《太阳照常升起》和它的作者耳熟能详。[注]

海明威并不认同出版社的所有营销手段。比如，他不喜欢书的封面。封面出自一位笔名为“克里昂”（Cleon）[注]的艺术家之手，作者为斯克里布纳的很多畅销书画过封面——包括司各特和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的书。《太阳照常升起》的封面上画着一个美丽却心事重重的女人，她穿着希腊风格的金色袍子，闭着眼睛倚坐在枯树下，头枕在膝盖上，用一只手拿着一只苹果；背后，一轮黑色的太阳正在升起，衬出整个人物的轮廓。书封上方书名左右也各有一只金苹果。封面上的女人穿着希腊式凉鞋，脚下的一段文案不幸把海明威的《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错拼成了“In Our Times”。

不过，让海明威恼火的小毛病毕竟数量有限：不论用什么标准衡量，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在营销上所做的努力都算得上卓有成效，比起博尼-利夫莱特对《在我们的时代》漫不经心的运作，尤其值得称赞。柏金斯往巴黎邮寄了一些广告，供海明威仔细审阅。广告上用了他的画像，海明威觉得这没问题：他心目中的杰克·巴恩斯大概就是这副样子。也就是说，海明威觉得画中人“很像一位突然失去或弄坏了某个不可或缺的‘零件’的作家”，他对柏金斯说，“可惜呀，它画的不是巴恩斯，而是海明威”。[注]

美国各地的批评家都在摩拳擦掌，等待着这部新小说。出版一周后，柏金斯让海明威摆开架势，准备迎接第一批评论。他感到，《纽约

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书评最为重要。所以，必定令两人喜出望外的是，《纽约时报》称《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备受瞩目：“这是自海明威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出版以来，人们热情期待的长篇小说。”[注]《新共和》的报道也附和道：“人们不必再担心海明威的力量被篇幅束缚。”[注]

即使是最无热情的评论者也承认，《太阳照常升起》在风格上别具匠心。如果说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常常被称为“生动”，那么海明威的作品就是“鲜活”。这位曾经前途无量的文坛新人，一跃赶超了现代主义的圈子，加冕为年轻的现代写作大师。[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可能会让埃兹拉·庞德和格特鲁德·斯泰因无比为自己的门徒自豪，乃至嫉妒。“行文的韵律与文风，情节的停顿、悬念、暗讽，还有日常话语中那种常见的简略，使这本书无比生动，”《论坛报》的评论家康拉德·艾肯[注]写道，“《太阳照常升起》让我可以这样全然自信地评价（海明威）：他在很多方面都堪称美国最出彩的小说家。”

《纽约时报》称赞这本书“精炼、硬朗、健美的叙述语言，会让很多英语文学自愧弗如”。《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是一个“历史事件”，示例了什么叫出色的写作。“分析得再多，也不能完全传达它的品质”，《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如此认为，并称这部小说的叙事本身也“引人入胜，带着美丽而恰到好处的荒谬，动人心魄”。[注]《星期六文学评论》称海明威的文风“简洁、精炼，带有恣意的新颖”，并说《太阳照常升起》包含“一些构思精湛的对话，在美国文学中堪称最佳”。[注]著名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私下致信海明威，说他的书是“惊世杰作”，也许算得上是他这一代美国作家写出的最好的小说。[注]

不久《波士顿晚报》（*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也登出了评论。这份报纸被柏金斯认为是美国国内最保守的报纸，所以它们的书评是《太阳照常升起》将会产生怎样社会影响的真正试金石。评论者并没有震惊于这本书的激进，反而称赞它是“优美而透彻的小说”。评论者解释

说，如果他赞美得太多，“只是因为这本书令他情不自禁”。另外，这篇评论注意到了海明威的记者履历对其写作事业的贡献：“海明威先生那种精干的新闻写作风格，被施展得出神入化。”评论还提醒读者，虽然海明威的“断音句式”（staccato sentences）初读上去比较恼人，但只要读上一会儿就会适应。[注]

阿尔冈琴人也加入了这场盛会。海伍德·布隆也许曾对菲茨杰拉德的第一本小说“鄙视又嘲笑”，但他在《纽约世界》的书评中称赞《太阳照常升起》迷人而真实。多萝西·帕克接着又在《纽约客》上助长了海明威的神话：接连几周，“你走到哪里都会听到人们谈论《太阳照常升起》”[注]。她还发现，周围的人已经开始认为，这正是一本伟大的美国小说，取代了《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和《红字》这样的文学经典。[注]

“星条旗将为了致敬海明威而升起，”她写道，“847位书评人列队组出了‘欢迎’的字样，乐队奏响了《向统帅致敬》[注]三重奏。”小说出版之后掀起了如潮的议论与赞叹，帕克还深情地写道：“我一生之中还从未有一本书让我如此迷狂。”（她私下里给海明威拍了一封电报，祝贺他的成功：“乖乖你的书在这儿成了洪流不是吗大爱你的多蒂”[注]）

《巴黎论坛报》（*Paris Tribune*）的文娱版块指出，一种“海明威崇拜”已经在大洋两岸掀起了波澜[注]——这些评论家其实不知道，在巴黎左岸，这种崇拜早已酝酿多年了。

批评的声音自然也是存在的——这也无妨，毕竟争议曾经是、并且依然是图书的可靠卖点。即使多萝西·帕克也承认，文学界的人对这本书“非恨即爱”[注]。据帕克说，一些报刊认为这本书“不可原谅”，其中就有《春田共和报》（*Springfield Republica*）。该报的评论者说，《太阳照常升起》的“极端道德污秽”压倒了该书作者的任何“艺术目的”，而且这本小说结构散漫。[注]艾伦·泰特[注]在《民族报》（*The Nation*）上发

文抨击海明威，说他虽然努力经营着自己的硬汉气质，但《太阳照常升起》却是这样多愁善感。[注]有些批评家虽然喜欢这本小说的写作风格，却认为波莱特夫人连同书里所写的那一群人不堪入目；有位评论者说他的不满之处在于，主人公们的全部活动只有洗澡、吃饭、做爱——并且时刻抱着个酒瓶子。还有一位评论者称这些人物为“精神破产者”[注]，另外一位则觉得他们“腐坏透了”[注]。

《新大众》（*The New Masses*）上的一篇评论一定让海明威感觉自己被踢中了要害。这篇由约翰·多斯·帕索斯所写的书评，把好友的小说简述成“一大群酗酒观光客的荒唐事”[注]。他说，作者在书前引用圣经箴言是一个错误，这抬高了读者的期待值，但是接下来的故事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期待。不过多斯·帕索斯承认，这些荒唐事写得还是很好的。[注]

不认同这本书的读者和组织也喧闹地做出回应，有一些直接向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抗议。一位来自萨拉索塔（Sarasota）的读者说这本书“下流、粗野得无以复加”，它把“（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好名声都玷污了”。他预言，这本书一定卖不好。[注]新罕布什尔州一家图书馆的管理会认为这本书“比一文不值更糟糕”，建议斯克里布纳出版社销毁它。[注]

所有这些关于《太阳照常升起》是如何违背道德的争吵，实质上让这本书带上了争议色彩，但是有些激烈的言辞确实让海明威难以平静。他本来就讨厌批评家。正如柏金斯所说，多数评论都对他赞赏有加，关于海明威的革命性文风，他们也说中了全部的要点。但有些评论依然令他不爽。

宝琳竭尽所能在远方给她的情人鼓劲，像柏金斯一样安慰他。她信誓旦旦地告诉海明威，他已经被当作一个传奇人物在各地称颂。她发现，自己在和一个公众人物生活，出了名的他现在是“斗牛士海明威”、“旅居作家海明威”和“讽刺作家海明威”了。她安慰他说，至于“真男人海明威”和“艺术家海明威”这两个形象，他完成的“很完美”。[注]

但那些嘈杂之声始终在他心中挥之不去。西尔维娅·毕奇指出，虽然海明威是“对自己作品最严厉的批评家”，但是他会对“他人的批评过度敏感”。[注]他曾对菲茨杰拉德说，批评总的来说都是“马粪”，却没有粪肥那种怡人的乡土味。[注]事实表明，评论者们在“人物不讨人喜欢”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在海明威看来，这正说明大多数评论者都是毫无价值、有眼无珠的。海明威曾向柏金斯发牢骚：“你想想《尤利西斯》和《旧约》，里面的人物讨人喜欢吗？想想（亨利·）菲尔丁和其他受批评家欢迎的人，就知道（这些针对《太阳照常升起》的批评）有多可笑。”[注]（虽然这么说，海明威私下里也认可部分批评。他向一个朋友承认，小说里那些被生活“压碎”的人物“空虚而乏味”，“可这就是他们本来的样子”。[注]）

评论者们普遍坚持透过“迷惘的一代”这一视角来解读这本书——这可能是最让海明威沮丧的事。一篇又一篇的评论声称，海明威的写作目的是具现他们那一代受伤的人，他们（用其中一位评论者的话说）“像迷失在树林里一样跌跌撞撞”[注]。

“迷惘的一代”成了海明威给自己挖的陷阱，他急忙想退出来。的确，这句话升华了书的内容，增加了它的深度，如海明威对柏金斯所说，他毕竟不想让这本书成为“肤浅的爵士时代的故事”[注]——此语似乎在讥讽菲茨杰拉德。但他也不想创造一部翔实记录时代之病的“大书”。海明威愤怒地抱怨，评论者们误解了他的初衷。斯泰因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那仅仅是“夸夸其谈”，他的意图就是嘲弄这种夸张，而非证明它。为什么没人沿着《传道书》里“日头出来”那句话的角度思考呢？按海明威的想法，这本书的主旨无非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这难道不够明显吗？[注]

“没人知道他们之后的一代人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没有评判的权利，”海明威认为，“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一个空洞、苦涩的讽刺，而是一个该死的悲剧，世事万千，永恒的大地成了主角。”

几十年过去，海明威仍然在抗议。“格特鲁德只会抱怨，”20世纪50年代时他对一个朋友说，“所以她用怨言给那一代人贴了标签。但迷惘什么的都是扯淡……当时我从没见过哪个人认为自己披着‘迷惘的一代’的闪亮丝绒。人们甚至没听说过这个称呼。我们是很可靠的一群人。”[注]

抗议归抗议，海明威立即被加冕为这一偶然产物的新代言人。“迷惘的一代”这个称呼，刚好附和了公众对他们的想象。《太阳照常升起》一举言中了一种战后的病态，对此人们一直感受深刻却又无法言说——直到海明威（和格特鲁德·斯泰因）帮他们说了出来。

于是，从1926年10月22日开始，海明威就永远地披上了“迷惘的一代”这件丝绒外衣——作为买家的他即使后悔，也不能退货了。

在海明威将所有人物的真名从书稿中删除之前，麦克斯韦·柏金斯担心会遭遇诉讼。最后，一封投诉信确实送到了他的桌前。一位真名叫阿施利的夫人，她的法律顾问认为《太阳照常升起》将她的名字用在了一个“品格不端的女主人公”身上，这涉嫌诽谤。柏金斯写信给海明威和这本书的英国出版社，告知了这件事，不过他和斯克里布纳的律师都觉得这封信只是来蹭热点的，没必要小题大做。这位阿施利夫人的律师坚称，投诉人正值25岁妙龄，但是柏金斯通过权威渠道得知，这位阿施利夫人其实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在戏剧界算是一个小角色。如果这份投诉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出版社可以用它进一步推高《太阳照常升起》的名气。

“我们提议发表一份声明，澄清书中的阿施利夫人并不是现实中的阿施利夫人，”柏金斯对海明威说，“不管怎么说，这又是一个不错的广告。”[注]（海明威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她可以试着再告一下鲁滨孙·克鲁索[注]。”[注]）

那位阿施利夫人似乎没有再纠缠下去，波莱特夫人背后的真实原型

也没有向出版社抗议。但是，小说中几位人物的原型——杜芙·特怀斯登、哈罗德·勒布和凯蒂·坎奈尔没过多久就骇然得知，他们被写进了海明威名噪一时的新小说里。海明威从没有给他们一个提前预警；他们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读了这部小说后，才得知此事。

虽然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没有在巴黎的报纸上宣传《太阳照常升起》，但这并不妨碍它立即在左岸掀起了满城风雨。考虑到有些人确实想读这本书而非议论它，西尔维娅·毕奇也往莎士比亚书店里进了货。(注)在书中提到的咖啡馆和酒吧里，顾客们都热烈谈论着《太阳照常升起》。如果海明威写得没有那么露骨，猜测书里人物的真实身份也许还能成为一种流行的聚会游戏。有人开玩笑说，这本小说更贴切的名字应该是“六个寻找作者的书中人——一人拿着一把枪”，这里借用了皮兰德娄当时一部创作不久的流行剧作的名字。

当大洋两岸的媒体开始关注海明威的故事时，《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丑事就传开了。“想把海明威的书推入能够匹敌菲茨杰拉德作品的畅销专柜，这算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蒙帕纳斯的传记作家莫里尔·科迪指出。(注)自从小说首发以来，“每个人”对它的谈论就没有停止过，科迪说。海明威的朋友A.E.霍奇纳谈到，特怀斯登、勒布和其他的小说原型人物“就好像被人贴到了时代广场的大广告牌上”。(注)在美国，珍娜·弗兰纳告诉她在《纽约客》的读者，海明威的“纪实小说”中“有四个主要人物……不难被认出是美国人”。她没有明说这些人的真实姓名，不过提到“那位失势的英国贵族和她的苏格兰情人，还有那位美国人弗朗西斯和她不幸的罗伯特·科恩——后者的艺术杂志想做一把新扫帚，把人们的审美打扫干净”，这些人每天就坐在“精英咖啡馆中海明威安排给他们的位置上”。但是弗兰纳声明，她可以确定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就是那个“喜欢收集鸟类标本的比尔”（实际上，小说里的比尔·戈顿喜欢收集的是犬类标本，不是鸟类），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在书中“赫然披着布雷多克斯的伪装，一戳即破”。(注)

其他来自巴黎文学圈的报道就不那么客气了。

“几位法凡路口（Carrefour Vavin）[注]的常驻民被无情地玩弄于笔尖”，《巴黎先驱报》的“城里城外”栏目指出。《太阳照常升起》“并不是一本很赏心悦目的书”，但它讲述的故事大概是很准确的：海明威“众所周知是一位善于观察的记者，并且不尊重朋友们的感情”。[注]《星期六文学评论》向读者透露，海明威的小说人物中没有一个是基于他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来的（推动情节发展的事件也都是从现实中照搬过来的），这意味着《太阳照常升起》更像一篇深入报道的典范，而非一部伟大的文学虚构作品。[注]

有人被海明威写进小说里，对此左岸一定充满了幸灾乐祸的空气。至少有一个人说到，这本书对罗伯特·科恩的塑造入木三分。

莫里尔·科迪回忆，“（勒布）和科恩一样拘谨、玻璃心、没有幽默感”，多数蒙帕纳斯人觉得勒布带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优越姿态”。[注]不过海明威如此爽快地出卖勒布，还是让人颇有微词。“何其粗鲁的形象塑造！”《巴黎先驱报》在写到罗伯特·科恩时感叹道。[注]

《太阳照常升起》震撼了哈罗德·勒布本人。他的小说《杜达布》的反响令他大失所望，最终他离开纽约回到欧洲。海明威的小说出版之时，勒布正由一位新女友陪着在法国南部度假（后来他把这位女友描述成了一个弱不禁风、叛逆离家的荷兰女人）。这对情侣正住在一座洋蓟田围绕的农场里，勒布在写另一本小说，后来将它命名为《田芥菜》（*Tumbling Mustard*）。

一天来了包裹，是朋友寄给他的一本《太阳照常升起》。

“这本书就像一记上勾拳，把我打懵了。”他后来说。[注]

他翻看了整本书，就想看看书里是怎么描写罗伯特·科恩的。作

者“毫无必要的阴险”令他深感震惊，书中还揭了他家世背景的老底。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所有人物的身世背景，让他们不至于被一眼认出来？这对海明威来说并不是难事啊。为什么海明威把他们刻画得如此露骨？这是特意安排的一场羞辱？除了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勒布发现科恩这一人物是对自己的恶意丑化，塑造这个人物带有“冒犯性”。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他纳闷，“为什么曾经的朋友会把我写成一个不通人性、自命清高、无法控制自己的多余人？”[注]

他也震惊于其他人物遭到的“扭曲”——尤其是杜芙·特怀斯登，在勒布看来，书中的她成了一个“可恶的荡妇”。[注]据说这本书使他患上了胃溃疡，并且接受了连续10年的心理治疗，不过勒布并不承认这些。[注]

文学圈里的闲话没有要止息的意思，勒布只得去巴黎找海明威，带着子弹上膛的枪。海明威闻之很开心。

海明威在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说：“我放出话来，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4点，我就在利普酒吧（Lipp's brasserie）的门口坐着，不带枪。”只要谁愿意，就可以在那儿开枪崩了他。“省得打枪战了。”他说。[注]

后来，海明威还会文饰这件事。在另一个版本中，海明威声称自己发电报给勒布，约他去“墙洞酒吧”（the Hole in the Wall）——一个臭名昭著的毒贩聚集地，据说那里有扇可供逃跑的后门，连通巴黎下水道。海明威说他之所以选这家酒吧，是因为它的内墙上都装着镜子。“谁从门口进来，他的行动你都看得一清二楚。”海明威解释道。他声称自己在那儿守了三天，但是勒布这个懦夫始终没有出现。[注]

这则很可能是杜撰的故事一传开，勒布就又一次感到有必要维护自己的荣誉了。“我从来没有威胁要杀人，”他辩称，“也没收到过他拍来的电报，约我去‘墙洞’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注]

过了几个月，两人确实见了一面。这次相遇在勒布口中是这样的：

他正在利普酒吧小酌一杯绿茴香酒，然后海明威进来了。他看勒布没有来找他的意思，就自己坐到吧台前，背对勒布，点了一杯酒。

“我清楚地记得他脖子后面奇特的肤色，”勒布回忆，“红彤彤的，那片红色逐渐弥散开来，延伸到耳朵，直到耳朵尖。”最后海明威付了酒钱，离开了。勒布有上去搭话的冲动，但他没有那么做。

“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他说。[注]

《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也正值杜芙特别艰难的时期。她最终得以和罗杰·特怀斯登准男爵离婚，但年少儿子的抚养权还在前夫手里。另外，她和帕特·格思里的关系也岌岌可危。小说发行之后的那个冬天，格思里是和一个年老一些的女人一起度过的，她是美国作家、记者玛格丽特·林斯利，人称“洛娜”（Margaret “Lorna” Lindsley）。海明威把杜芙和格思里分手的消息透露给了菲茨杰拉德，看来海明威还在紧盯着“我书里那些精神失常的人物”[注]。海明威评说，杜芙终于自由了，但是格思里不会娶她，因为她已经失去了姿色；而格思里开始新恋情，则有一点儿被迫的意思，毕竟他因为无法兑现开出的支票差点坐牢，是林斯利帮他免去了牢狱之苦。所以现在他被她抓住了要害，只要她乐意，“随时都能让他进监狱”。可见，格思里只不过是在坐另一种牢罢了。

海明威顺带一提，说他有天晚上还遇到了杜芙。

“小说没有让她恼火”，海明威声称，还说她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其实是现实中“她没有和那个该死的斗牛士上床”。

这可能又是海明威的历史修正主义：据说杜芙是暴怒的，被《太阳照常升起》中刻画的形象深深伤害了。[注]据说后来的几年她不断说这本小说很“残忍”[注]，海明威恶劣地捉弄了她和其他人。在她看来，这本小说不过是一篇典型的“低劣报道”。不过，海明威给菲茨杰拉德讲的故事有一点可能是准确的：和斗牛士相恋的情节让杜芙大感意外，她后来曾

对一个朋友说，和斗牛士相伴“就像成了小矮人里的侏儒”，很丢脸。[注]那时她还开过一些黑色玩笑：一年之后，一个熟人在多摩咖啡馆里遇见了杜芙和格思里，发现她称呼格思里为“迈克”[注]，这是《太阳照常升起》里海明威给他起的名字。

虽然杜芙成功淡化了坊巷间关于她的争议，但是波莱特·阿施利夫人似乎侵入了她的私生活，并且阴魂不散。她感觉，海明威就好像当着她前婆家的面，粗心大意地晾出了她所有的脏衣服：英国的贵族阶层可以容忍各种行为不端，但是如此明目张胆、大失体统，是不能容忍的。据说特怀斯登家族一度想要从出版社那里买断此书，使《太阳照常升起》无法再版；出价被拒绝之后，又企图尽可能收购市面上的书，使它不能广泛传播。[注]一位家族成员之后否认了这一说法，但是杜芙成了家族中最不受欢迎的人——虽然她向来如此，但此刻尤甚。所以杜芙确信，拜海明威的这本书所赐，她争夺儿子的探视权一事变得更棘手了。据说她甚至计划劫走儿子，只为了见他一面。

次年夏天，杜芙找到新欢；而圈内有流言说她的新男友（克林顿·金，一位无足轻重的艺术家，继承了得克萨斯州的一份水果糖产业）曾经因为波莱特夫人的描写而胖揍过海明威一顿。就如勒布带枪复仇的故事，这种事虽然能在多摩和丁戈传得沸沸扬扬，但如果你认识当事人，就会知道这些传言并没有多少可信度。

“（如果这是真的）我肯定会是第一批知道消息的人。”丁戈酒吧的伙计吉米·查特斯说。他嘲笑道，“克林顿·金先生，上帝保佑他，他得用一柄大锤或者类似的武器才能揍倒海明威”，因为海明威的块头比金大太多。[注]

而另一个传言说，凯蒂·坎奈尔交到了一个身高6英尺3英寸[注]、人高马大的男朋友，他要为弗朗西斯·克莱恩的事教训海明威。后来她否认了这件事，并称蒙帕纳斯有一批酒吧招待时刻准备着为她的荣誉而

战，防止海明威再在他们面前冒犯坎奈尔。（不过，小说出版之后，海明威其实在千方百计地躲她，坎奈尔说。）仅仅一年之前，他还答应过不把她写入这本旨在“把那些浑蛋撕碎”的小说里，但现在她就在书中，和那些浑蛋一起出现。虽然坎奈尔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戏份不如某些人多，对她的刻画却格外使她伤心。读完书，坎奈尔有三天都没能下床。[注]她和勒布一样仔细研究了海明威笔下的自己：她认定，弗朗西斯的样子和习惯与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也能明显看出，她就是这个人物的首要灵感来源。

“海明威让弗朗西斯说出了我讲过的话，”她发现，“有关结婚成家的焦虑，还有我开的玩笑，等等，那些独特的语言都来自于我。”[注]

即使《太阳照常升起》的到来实属突然，但这并非完全在坎奈尔的意料之外。毕竟，她一直都感觉海明威藏着一些阴招。勒布对海明威是坦诚相待的，但她不是。如今，拜他的“天真无邪”所赐，他们两人的余生都有的受了。何况，坎奈尔被写成了一个以色谋财的拜金女，姿色上还争不过别人，这是怎样的耻辱——更别说，小说里的她攀上的还是一个怯懦、可鄙的男人。最后说一句，坎奈尔觉得这本书从审美角度讲“糟透了”。[注]

唐纳德·斯图尔特对小说的美学评价也不是很高。远在加利福尼亚的他读到这本书，不情不愿地被带回了潘普洛纳的灾难现场。

“这本书对现实中发生的事记录得太过精确了，看样子只能算一部文笔精湛的旅行笔记，”斯图尔特后来回忆说，“他可真是一个记者啊，我对自己说。”[注]

他没有料到这本书会在高端出版商中引起如此轰动，并且使他在美国东海岸的那些同仁大加议论。在斯图尔特看来，《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虚构成分（比如波莱特夫人和佩德罗·罗梅罗的恋情）刚刚达标的

纪实作品——刚好能让海明威把它称为“小说”而不遭到非难。

“我没觉得它怎么好，当然算不上一件天才的艺术作品。”斯图尔特说。[注]

不难料到的是，性格随和的比尔·史密斯最不在乎自己被海明威当作了小说的素材。潘普洛纳之行后，他自己摸索着写了一些短篇故事，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为自己的发小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史密斯和哈德莉一样，从最早的时候就见证了海明威的壮志宏图。如果海明威对他的“利用”——这是海明威从史密斯那里借来的词——能帮海明威取得突破，那就让海明威利用好了。再说，史密斯不像斯图尔特那样，认为《太阳照常升起》是对潘普洛纳之行的“通篇抄袭”[注]。他强调，书中的人物都是海明威精雕细琢出来的，自己、勒布和其他的人都只是人物塑造的跳板而已。

“海明威可不只是在记日记，”史密斯后来说，“他是一位艺术家。”[注]到了1927年新年，《太阳照常升起》销量喜人。截至1927年1月，书已经印刷了4次，售出了将近11000本。

“太阳已经升起了，”柏金斯向海明威写信说，“冉冉升起。”[注]到了4月，它的销量达到了19000本。

这并不算是一本超级畅销书，菲茨杰拉德的首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在发售的头7个月里卖掉了35000本[注]，而《太阳照常升起》直到出版了整整一年，也没有达到这个数字。[注]

不过这并不要紧。在柏金斯看来，最近这次在“坏男孩”身上押的注显然有了回报：《太阳照常升起》引发了疾风骤雨一般的响应，预示着这位新作者的无量前程。虽然人们对这本书的解读不乏批判，但它明显开始赢得了一代读者全心全意的欣赏。《太阳照常升起》很快成为一本

风靡学院的小说[注]，当初的广告也针对大学生读者群下足了功夫。《太阳照常升起》在波士顿遭到“打压”[注]的消息，可能反而会使它在大学生中更受追捧。5年前，所有人都在模仿菲茨杰拉德小说中那些彬彬有礼的人物；常青藤高才生的纵情声色，富豪大酒店的酒会风云，曾经是人人幻想的生活。而如今，每个人都想成为杰克·巴恩斯、波莱特·阿施利夫人，甚至海明威本人。

“家境优渥的年轻姑娘谈的情人一个接着一个，经历了和小说中女主人公一样的心碎历程。”旅居作家马尔科姆·库利回忆说。处于同样境况的男青年，则努力“像男主人公那样泰然地喝醉”，要不就是在和臆想中的对手打拳击，或是用罩衫晃着想象中冲过来的公牛。不久之后，这群男女转而“像海明威笔下的人物那样说话”。[注]

这些人很快接受了自己是“迷惘的一代”中一分子的观念，深信不疑。没过多久，这一称谓的首字母便成了大写——the Lost Generation。后来每一代30岁以下的人也获得了一个概括性的称呼：“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X世代”（Generation X）、“千禧世代”（the Millennials）等等。但“迷惘的一代”是现代青年叛逆的第一面大旗，而《太阳照常升起》就是他们的圣经。他们中没有人会因为“迷惘”而忧郁。能加入这一群体是种公认的光荣。

“多数自诩为‘迷惘’的人……都确知自己是在自吹自擂，”库利说，“活像吉卜林笔下放纵狂欢的贵族列兵[注]。”

菲茨杰拉德笔下的青年文化泛着香槟酒的泡沫，而“迷惘的一代”则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呈现，更阴暗、更纵欲。虽然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描写的对象有某种重合（即社会中不服管束的一代人），“迷惘一代的颓废却无关晚宴舞会或美食俱乐部，而全然是刻意的放浪。这些“苦心经营”的迷惘一代，把杰克和波莱特当作指引方向的北极星，把抗拒常规当作自己的精神义务，以醉酒为神圣，无所顾忌地尝试性爱——结局

越悲情越好。

纽约是菲茨杰拉德信徒们的圣坛，而“迷惘一代”的首善之区显然是巴黎。《太阳照常升起》的追随者很快涌向那里，来到小说中提到的咖啡馆和酒吧。老居民开始发现丁戈里冒出了新顾客：“年轻的美国人，努力模仿着杰克·巴恩斯和他那些‘让我们再来一杯’的朋友。”旅居作家塞缪尔·普特南（Samuel Putnam）回忆说。㊟

如果过去的巴黎游客会因为见到詹姆斯·乔伊斯和格特鲁德·斯泰因而惊讶得瞠目结舌，如今他们想看的是海明威小说的原型人物。有一次，凯蒂·坎奈尔在穹顶咖啡馆（La Coupole）坐着，有个人走上前来惊呼道：“这不是凯蒂·坎奈尔吗！按书里写的，你走到哪里我都能认出你。”被人揭发曝光的经历远不止这一次。“这些人上前来打探：‘你果真缠住勒布不放吗？果真拿了那么多钱，在那种地方，在那一段时间，使了那么些手段吗？’如果我有足够的钱，能给他们每个人一美元，他们也不会缠着我几年不放了。”㊟

小说上市后那几周，海明威似乎对于它所引发的热潮出奇冷静。自己的加冕之日就这样到来了。他已经开始和柏金斯讨论进一步的创作计划了。首屈一指的批评家为之狂热，两片大陆上的文人没日没夜地谈论他。青年崇拜者会聚成大军，给海明威写来了纷纷扬扬的信，他也成了一些女性读者朝思暮想的对象。总而言之，他希望达成的志向——无论是万众瞩目，还是声名狼藉，他都做到了。

可是，海明威的私事使他无法从苦闷中脱身，直到哈德莉突然认输。“三个月的分离期正式结束了。”她在11月中旬的一封信中写道，信中她没有使用两人通常的昵称。㊟

哈德莉通知海明威，应该尽早办完离婚手续，他的事业和幸福从此与她无关。一切都握在他自己手里——或者说是握在上帝手里。至于邦比，只要他想探望随时都可以去。

“带他出去玩玩，如果你乐意的话，”她写道，“这样他就会知道你是他的亲生爸爸。”

海明威当即同意了。他对哈德莉说，她的决定是勇敢、无私、慷慨的，他们始终纠缠得像“两个东倒西歪、步伐不稳的拳击手，谁也不能给出结束比赛的一击”。现在哈德莉终于打出了这一拳，大家都可以舔舐伤口、重归平静了。

海明威写了一封大体心平气和的信。信中海明威承认，《太阳照常升起》实际上是他和哈德莉一同养育的第二个孩子。所以，她理应得到这本书的全部稿酬。

“这确是你的权利，是你应得的。”他说。[注]

他同时立下了一份遗嘱，其中的条款规定，他在过去和将来出版的所有书的收入，都将以邦比的名义代管，由哈德莉来监督。他给哈德莉留下的伤，希望邦比能够抚慰。哈德莉是他所知“最善良、最真诚、最可爱的人”。

1927年1月27日，哈德莉收到了离婚的初步判决[注]，此时正值《太阳照常升起》即将开始第五次印刷。后来她说，自己当时感觉获得了解放。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但是我很有自信，”她说，“我知道我可以生活下去，还可以从音乐中找到些快乐[注]。”[注]

同年4月，哈德莉带邦比回美国见她的家人。踏上故国的土地，她感觉“腰缠万贯，自由如风”。她已拿定主意，毕竟宝琳更适合海明威，确乎具备了这一位置需要的顽强。海明威作为丈夫“就像一匹难以驾驭的马”，他的儿子帕特里克说。[注]

菲茨杰拉德从美国寄来了慰问信——他回国是为了继续推进小说的写作进程。出版社传出的"《太阳》相关"消息令他很欣慰。他也重读了小说，并告诉海明威："相比手稿，印出来的文字让他更加喜欢。"[注]（泽尔达则觉得这本小说写的无非是"斗牛、吹牛、牛屎一样的胡说八道"。[注]）听说海明威婚变的消息，他感到遗憾，但并不吃惊。"我为你、为哈德莉以及邦比感到惋惜，希望你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平和地分开，让事情不至于太艰难、太心碎。"菲茨杰拉德写道，同时他也保证会继续在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维护海明威的权益。

"这一年半以来你的友谊对我有多重要，溢于言表，"他还说，"对我来说，那是我们欧洲之行中最闪耀的东西。"[注]

多年后，菲茨杰拉德玩味了海明威的写作与女人的关系。

"我有个理论，欧内斯特每写一本大作就需要换一个新老婆"，一次在巴黎吃饭时他对莫里·卡拉汉说。《太阳照常升起》——海明威的第一本大作有哈德莉，他开始创作下一部长篇小说时，陪伴他写作的是宝琳。

"如果有另一部大作出来，"菲茨杰拉德猜测，"我们就能看到欧内斯特又找了一个老婆。"[注]

---

1. Pauline Pfeiffer to Ernest Hemingway, October 2, 1926, Incoming Correspondence,Pauline Pfeiffer Hemingway,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2. Pauline Pfeiffer to Ernest Hemingway, October 25, 1926, I ncoming Correspondence, Pauline Pfeiffer Hemingway,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3. Ernest Hemingway to Pauline Pfeiffer, November 12,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141.

4.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苏格兰小说家、

诗人、散文家。——译者注

5. 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ca. September 7, 1926, reprinted ibid., 海明威引用并发挥的诗句来自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快乐念头》（*Happy Thought*）一诗。这段时间海明威还出人意料地给舍伍德·安德森写了一封信，倾诉他心里的压力和严重的失眠症。Ernest Hemingway to Sherwood Anderson, ca. September 7, 1926,reprinted ibid., 115.

6. Ernest Hemingway to Pauline Pfeiffer, November 12, 1926, reprinted ibid., 140.

7.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August 20,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8.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September 8,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9. 原文为"ass intact"。这是一句粗鄙的双关语，可以指"没出意外"，而根据前文诗中"捏屁股"的句子，此处也可以理解为"屁股还是完好的"。——译者注

10. Meade, Dorothy Parker, 167-68. 1926年稍早些的时候，海明威在一封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提到过帕克的西班牙之行，说"她当然讨厌去西班牙"。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May 4,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71.

11.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57. 对帕克企图自杀一事不抱同情心的不仅海明威一人。泽尔达·菲茨杰拉德曾写信对一个朋友说："多萝西·帕克在这儿（巴黎）炫耀自己的伤口。"Zelda Fitzgerald to Madeline Boyd, July 2, 1926, reprinted on Sotheby's website,http://www.sothebys.com/en/auctions/ecatalogue/lot.pdf.N07980.html/f/65/N07980-65.pdf.

12. St. John, "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199.

13. Meade, *Dorothy Parker*, 170.

14. Sokoloff, *Hadley*, 91.

15.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March 2,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6.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January 25,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7.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January 28,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8.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February 14,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9.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February 19,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0. Ibid.

21.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March 2,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2. 此处及后文所说到的“广告”指的都是平面广告，即印在报纸等平面媒体上的视觉广告。在20世纪20年代，商业广播刚刚起步，而电视机还处于研发阶段。——译者注

23. Maxwell Perkins to F. Scott Fitzgerald, January 6, 1927, F. Scott Fitzgerald Files,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4.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September 8,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5. Advertisement reprinted in Bruccoli, Smith, and Kerr, *Romantic Egoists*, 62.

26. Heywood Broun in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quoted ibid., 59.

27. Advertisement quoted ibid.

28. Harry E. Dounce in the *New York Sun*, quoted ibid.

29. Press release,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Files,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30. 卢比孔河是意大利北部的河流。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它是意大利本土与山内高卢的分界线。根据当时的法律，任何出征的将领在渡过卢比孔河时都绝不能够带着自己的军队，否则就会被视为叛变。恺撒在共和国内战时期一次孤注一掷的违规渡河，被认为是罗马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渡过卢比孔河”后来成了一句俗语，意指“破釜沉舟”。——译者注

31. Charles Scribner's Sons, fall 1926 catalogue, excerpted in Trogdon, *The Lousy Racket*,44-45.

32.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November 26,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33. 参见《纽约客》上《太阳照常升起》的广告，October 23, 1926, 82。

34. 刊登《太阳照常升起》广告的完整出版物列表，参见advertising records, 1917-1965,“Howard — Hemingway” folder, box 3,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35. 这位艺术家的全名是Cleonike Damianakes Wilkins（克里昂尼克·达米安克斯·威尔金斯），她为几位“迷惘一代”的巴黎旅居作家设计了书封，这些作家都是圈子里最富创作力的核心人物，经克里昂设计封面的作品包括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和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的《给我留下华尔兹》。斯克里布纳出版社还采用了她对海明威接下来两本书所做的封面设计——《永别了，武器》和再版的《在我们的时代》，而海明威同样讨厌《永别了，武器》的封面。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October

4,1929,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克里昂为第一版《太阳照常升起》设计封面时只拿到了50美元的“包装设计费”，大概相当于今天的700美元。她最终落在了时尚后面。她的侄女诺艾儿·奥谢罗夫（Noel Osheroff）说，抽象艺术流行起来后，克里昂的设计生涯就走了下坡路。“那不是她的风格。”奥谢罗夫说。Noel Osheroff,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May 1, 2014. 更多信息参见the collection of Scribner's cover cards, Brandywine Conservancy and Museum of Art, Chadd's Ford, Pa。（“Cleon”这个名字和《太阳照常升起》的封面设计都有一种古希腊味道。——译者注）

36.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November 16,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37. “Marital Tragedy,”*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1926, 7.

38. *The New Republic*, review of *The Sun Also Rises,* December 22, 1926.

39. Conrad Aiken, review of *The Sun Also Rises*,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October 31,1926.

40. 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1889—1973）：美国作家、诗人、评论家，作品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译者注

41. “Marital Tragedy,”*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1926, 7.

42. C. B. Chase, review of *The Sun Also Rises*,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December 11, 1926.

43. Edmund Wilson to Ernest Hemingway, January 7, 1927,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44. Review of *The Sun Also Rises*, *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 November 6, 1926.

45. Parker, “Reading and Writing,” 92.

46. “伟大的美国小说”这一称谓由来已久，在心理层面上，它关乎美国刚建立时国民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其实也可以说是对于缺乏民族文化而产生的自卑感）。很多时候，批评家只是使用这一术语表达他们的个人偏好，不过在大部分人公认的“伟大的美国小说”中，《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和《红字》是较早被冠以这一头衔的作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都曾收获过“伟大的美国小说”之誉。——译者注

47. 在美国一些有总统出席的场合，乐队会演奏《向统帅致敬》（Hail to the Chief）致意总统。这里帕克是在歌颂海明威成了美国文坛的统帅。这首歌的首句歌词是：“致敬我们为国家推举出的统帅，向统帅致敬！”——译者注

48. Telegram from Dorothy Parker to Ernest Hemingway, November 23, 1926,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49. “Latin Quarter Notes,”*Paris Tribune,* December 9 and December 28, 1926.

50. Parker, “Reading and Writing,” 93.

51. Review of *The Sun Also Rises*, *Springfield Republican*, November 28, 1926.

52. 艾伦·泰特（Allen Tate，1899—1979）：美国诗人、社会评论家。——译者注

53. Allen Tate, “Hard-Boiled,”*The Nation*, December 15, 1926.

54. Review of *The Sun Also Rises*, *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 November 6, 1926

55. Review of *The Sun Also Rises*, *Chicago Daily Tribune*, quoted in James R. Mellow,*Hemingway : A Life Without Consequences* （Boston: Da Capo Press, 1993）, 335.

56. 这里多斯·帕索斯用了“cock-and-bull”一词表示“荒唐”。这可以被看作一句双关语，另一层意思是“一大群酗酒观光客关于生殖器和公牛的纠葛”。——译者注

57. John Dos Passos, “A Lost Generation,”*The New Masses*, December 1926.

58. M. J. Levey to Charles Scribner's Sons, April 28,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59. Edward M. Smith to Charles Scribner's Sons, undated,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60. Pauline Pfeiffer to Ernest Hemingway, December 18, 1926, Incoming Correspondence, Pauline Pfeiffer Hemingway,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61. Beach,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83.

62. 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April 16,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 : 56. 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社一直关注着海明威对评论的基本态度。1927年秋天，《太阳照常升起》的一位广告负责人华莱士·迈耶（Wallace Meyer）在巴黎和海明威一起吃午饭，然后向柏金斯汇报说：“文学评论对他没有什么价值，我觉得负面评论除了使他心烦，再没有别的作用……他说，他们把所有的书评卷好挂在厕所里的一个钩子上——它们的长度几乎正合适，上厕所时刚好能读完，用在这种场合对它们来说应该不是太大的恭维。”说到1927年10月9日弗吉尼亚·伍尔夫针对《太阳照常升起》和海明威接下来的一本书《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发表的一篇不客气的评论，迈耶说：“（她）确实打得他有点儿站不稳了。伍尔夫批评他滥用对话，在我看来他非常气愤——那位优秀的女士根本不会写对话，而且她大概对此有自知之明。毕竟，海明威是个独辟蹊径的人，他必须按自己的道路走。而且他是一个有限度的人，他的限度，举个例子，比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要狭小得多，但是他要在自己的限度内悠然地创作；我认为如果他做到了，就会拓展自己的边界。他可以发展的限度取决于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不自我设限。”Wallace Meyer to Maxwell Perkins, November 27,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在系统观察他们的作者时，柏金斯向查尔斯·斯克里布纳汇报了这些观点。Maxwell Perkins to Charles Scribner,December 29,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63.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December 21,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64. Ernest Hemingway to Isidor Schneider, ca. January 18-20, 1927,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189-90.

65. Review of *The Sun Also Rises*, *The New Republic*, December 22, 1926.

66.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November 16,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67.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November 19,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68.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49-50.

69.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May 24, 1928,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70. 鲁滨孙·克鲁索：《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编者注

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1867—1936）：意大利小说家、剧作家，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里说到的是他1921年的剧作《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译者注

71.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May 31, 1928,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在这封信中海明威解释，他查阅了《伯克英国贵族年鉴》（*Burke's Peerage*）和《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Debrett’s Peerage*），两本书中都没有“阿施利夫人”这个名字。

72. 《太阳照常升起》被送到莎士比亚书店的日期是1926年11月29日。Sylvia Beach Papers, Inventories, Order Records, Clients, 1926, box 65,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其实这本书还可以在巴黎的另一家英文书店“黑文鸟之徽”（the Sign of the Black Mannikin）中买到，同年11月7日到货。

73. Cody, “*The Sun Also Rises* Revisited,” 269.

74. A. E. Hotchner,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December 11, 2013.

75. Janet Flanner, “Letter from Paris,”*The New Yorker*, December 4, 1926, 90. 这篇夹在旅馆和美发广告中间的书评，颇具讽刺意味地被放在了一个宣布迈克尔·阿伦今冬到访巴黎的版面上。

76. 这是蒙帕纳斯大街上的一个路口，是几家著名咖啡馆的所在地。——译者注

77. “Around the Town,”*Paris Herald*, November 17, 1926.

78. Cleveland Chase, “Out of Little, Much”*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December 11,1926, excerpted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5.

79. Cody, “*The Sun Also Rises* Revisited,” 267.

80. “Around the Town,”*Paris Herald*, November 17, 1926.

81. Loeb, “Hemingway's Bitterness,” 126.

82. Ibid., 126-27.

83. Ibid., 127.

84. 科恩的形象“确实笼罩着他（勒布）的后半生”，瓦莱丽·海明威回忆说。她认识晚年的勒布。她记得，即使是几十年之后，勒布仍然会“靠在我的肩上哭着说‘欧内斯特为什么这样对我？’” Valerie Hemingway,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December 20, 2013.直到暮年，他始终就这一话题写文章、接受采访，甚至在回忆录中用很多篇幅记载了海明威的背叛。他查遍了海明威后来的作品和海明威自己的家族背景，寻找这位从前的朋友“没有后悔和遗憾的情感”的证据。勒布最终认定，早在他们一起在巴黎时海明威就“已经对友谊厌倦了”，而他自己只是没有发现这些兆头。Loeb, “Hemingway's Bitterness,” 126, 133.

85. 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March 31, 1927, reprinted in Sanderson,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222.

86.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48.

87. Loeb, “Hemingway's Bitterness,” 128.

88. Ibid.

89. 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March 31, and ca. September 15, 1927,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222.

90. Charters, *This Must Be the Place*, 38.

91.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43.

92. Ibid., 100.

93. 这是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的见闻，他说自己是在1927年听到这番对话的。Bertram Sarason, “Lady Brett Ashley and Lady Duff Twysden,” i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232.

94. 萨拉森透露，特怀斯登家族买断《太阳照常升起》的传闻是他从摄影师贝伦尼丝·阿伯特那里听说的，而后者由杜芙·特怀斯登亲口告之。艾琳·特怀斯登向萨拉森否认了这一传言。见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35。海明威阻碍了杜芙·特怀斯登争得探视权，或者是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了，这有可能一度是杜芙的真实想法。Sarason, “Lady Brett Ashley and Lady Duff Twysden,” 100. 1927年秋天，海明威在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声称，特怀斯登真的劫走了儿子，派了一个奶妈把他送到了法国南部。不过这是否属实还有待查证。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ca. September 15, 1927,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292.

95. Charters, “Pat and Duff: Some Memories,” 245.

96. 6英尺3英寸：约1.9米。——译者注

97. 关于男友和酒吧招待的传言，参见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24；关于坎奈尔不能下床的事，参见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79。

98.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50.

99.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95.

100. St. John, “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202.

101. Ibid.

102. St. John, “Interview with Hemingway's ‘Bill Gorton,’”155.

103. Ibid., 185.

104.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January 25,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05. Berg, *Max Perkins*, 41.

106. 《太阳照常升起》出版后的第一年售出了23000本。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86.

107. 马尔科姆·库利研究了《太阳照常升起》的社会影响，他认为“这是一本有益的小说”，在大学生这一年龄层中“成了一股风潮”。Malcolm Cowley, *Exiles Return: A Literary Odyssey ofthe 1920s* （New York: Viking, 1965）, 3.

108. 1927年6月8日，柏金斯写信告诉海明威，“这本书……在波士顿被打压了”。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09. Cowley, *Exiles Return*, 3.

110. “放纵狂欢的贵族列兵”（Gentlemen-rankers out on the spree）是著名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一句诗，写的是某些出于特殊原因（如逃离家族、自我流放、接受历练、义务服役等）以低等士兵的军衔参军的贵族，这些人在文学作品中常常以迷茫、远离故乡的年轻人形象出现。吉卜林的这一段诗大致如下：

我们是可怜的小羊，迷路的小羊，
咩！咩！咩！
我们是走失的小黑羊，
咩——！
放纵狂欢的贵族列兵，
放逐在此，直到永恒，
求上帝垂怜我类，
咩！哎哟！呸！
——译者注

111. Samuel Putnam, *Paris Was Our Mistress: Memoirs of a Lost and Found*

Generation（London: Plantin Publishers, 1987）, 69.

112.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50.

113. Hadley Hemingway to Ernest Hemingway, November 16, 1926, Incoming Correspondence, Hadley Richardson Hemingway Mowrer,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几天后哈德莉又给海明威写了一封信：“我说得还不够清楚吗？我想开始办理离婚手续——立刻。所以在我看来，你和宝琳这三个月的分隔等于白费力气了——你是否告诉了她这一安排，或告知了多少，已经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了。”她说她愿意亲自去办理离婚手续，并且建议他请一位“好律师”。Hadley Hemingway to Ernest Hemingway, November 19, 1926, ibid.

114. Ernest Hemingway to Hadley Hemingway, November 18,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151-53. 哈德莉接受了海明威的赠予。海明威于是致信告知柏金斯，他已经把自己在美国和英国赚得的版税许诺给了哈德莉，希望“它们会很丰厚”。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的相关档案中包含一个没有标题的文件，上面列明了相关款项的官方转账记录，和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版权合同存放在一起（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哈德莉从1927年8月开始接收版税。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海明威在给各路友人的信中对这项赠予大加宣传，总说那是一大笔钱，哈德莉过得很好。

115. 离婚的初步判决在1927年1月27日，最终判决在4月14日。Michael Reynolds,*Hemingway: The Homecoming*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xi.

116. 哈德莉能弹一手不错的钢琴，她母亲也是一位音乐家。——译者注

117. Sokoloff, *Hadley*, 92-93.

118. Patrick Hemingway,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September 26, 2014.

119. F. Scott Fitzgerald to Ernest Hemingway, December 1926, reprinted in Bruccoli,*F.Scott Fitzgerald: A Life in Letters*, 148.

120. Mayfield, *Exiles from Paradise*, 112.

121. F. Scott Fitzgerald to Ernest Hemingway, December 1926, reprinted in Bruccoli,*F.Scott Fitzgerald: A Life in Letters*, 148.

122. Callaghan, *That Summer in Paris*, 161.

13
太阳，已升起

《太阳照常升起》出版后不久，塞缪尔·普特南在巴黎圣日耳曼区的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碰见了海明威。人们发觉，这时的海明威正在“悄悄躲开”蒙帕纳斯和那个让他功成名就的世界。双叟有高高的天花板，空气通畅、光线明亮，是他理想的工作环境。几十年来，它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艺术巨匠的栖身之所。如今海明威也逐渐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他和普特南一起喝了几杯咖啡。

“我很快发现，我在芝加哥见过的那个有点害羞的年轻记者不见了，”普特南回忆道，“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文学名士。”

海明威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写作的艺术，甚至给了普特南一两条建议。

“至少对如今的写作者来说，最要紧的事是把语言剥干净，简化到只剩骨架，”他说，“这是需要下功夫的。”

在这件事上，他是受到了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影响吗？普特南问。

当然，海明威轻描淡写地答道，他从她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但也不是“那么”多。至于庞德，普特南记得海明威“相当愉悦而天真地把自己看得高庞德一等”。他声称，就算詹姆士国王钦定版《圣经·旧约》，对他的影响也远比庞德多。

“我就是这样学会写作的，”海明威说，“读《圣经》。”[注]

另一位朋友发现，这时的海明威就像他自己笔下的人物那样说话，一如他的很多读者那样。看上去，他仍会到故人常去的地方，亚瑟·莫斯[注]就在精英咖啡馆遇见了他，发现“那个羞涩青年已变成了出版界的人猿泰山”[注]。

很难判断这种评价是出于酸葡萄心态，还是这些旅居作家本身就像海明威一样，也习惯于狡黠地记录周围的人物。和哈德莉办结了离婚手续后，海明威冬天的大部分时间和来年春天甚至没怎么在巴黎停留。宝琳回到巴黎以后，和海明威一起前往格斯塔德[注]度了一个漫长的滑雪假期，这里也是时髦旅居者们喜爱的度假胜地。在施伦斯的小旅馆里当“黑基督”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注]——情侣二人住进了阿尔宾那大酒店。他们在瑞士待到了3月，回到巴黎没几天，他又去了意大利。

海明威总是在难熬的冬天离开巴黎，但是这一回，回望这片曾经光芒万丈的圣地，它却仿佛只是他年少时嬉戏其中的一潭死水。显然他已成长了太多，这座城市装不下他了——所有的导师、出版商以及多年前他和哈德莉初抵巴黎时支持过他们的名流，于海明威来说，已然如同过于窄小的衣物，不值得留恋了。

在那些遭到海明威背弃的大人物中间，《太阳照常升起》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反响。虽然海明威删掉了杰克·巴恩斯的人物背景中以比尔·伯德为原型的内容，伯德仍然在杰克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影子，感到忍俊不禁。海明威的另一位出版商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对这本书及其作者则没有什么好话可说。

“从《太阳照常升起》开始，我就备感他的作品华而不实、矫揉造作，人物设置过于刻意，而他自己总是主人公。”麦克阿尔蒙后来写道。[注]（这样的嫌弃之情是相互的：海明威不久前说麦克阿尔蒙“这个

狗娘养的，脑子像得了甲沟炎的脚趾头”[注]，甚至还考虑要写一篇嘲讽他的短篇小说。）

然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发现自己成了布雷多克斯这个蹩脚的配角后，他的反应堪称文雅大度。他没有计较海明威的玩笑，后来还为海明威的下一本长篇小说写了序言。文中他表示自己不怎么在乎《春潮》或《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嘲讽，并对海明威的艺术功力给予了最高的评价。

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反应则完全不同。据海明威说，《太阳照常升起》令她看不起他，因为这本书公然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翻转了：现在海明威成了老师，而斯泰因却成了学生。海明威声称，《太阳照常升起》教给了斯泰因写对话的技法，她不能容忍从前的徒弟超越了她。

海明威后来写道：“我直到多年后才明白过来，仇恨没有什么理由，只因为她是从这本小说里学会该怎么写对话的——这本书的引言还出自一位修车师傅之口。”不过海明威承认，他和斯泰因断交的原因实际上“比这更复杂”。[注]

随着小说的出版，海明威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与斯泰因绝交的真相”的讽刺性文章，一笔带过了他欠斯泰因的恩情。[注]继《春潮》之后，这又是一篇公开和前导师一刀两断的宣言。斯泰因虽然没有回应海明威的绝交书，但她对海明威自封圣贤的做法愤愤不平。

“斗牛的事他也是先从我这里听说的。”后来她在《爱丽丝·B.　托克拉斯自传》中告诉读者。[注]她长久以来一直喜爱西班牙的斗牛和舞蹈，而且是最早前去那里的一批人，有照片为证。还有，斯泰因说海明威后来写进了《太阳照常升起》中的那些对话，先前都曾和她细细地切磋过，她还和海明威“无休止地讨论过哈罗德·勒布这个人”[注]，这可能暗示着她影响了海明威在书中对勒布的刻画。一场跨越了不同书籍和出版

物的十多年的丑陋攻讦，就这样开始了。

如果说斯泰因有理由对她从前的学生感到愤怒，那么海明威也有理由怀疑她是在嫉妒。海明威并没有像斯泰因那样主动把天才的帽子扣在自己头上——他是被别人奉为天才的。他才是那个与主流美国出版社谈条件的人，而她只能自掏腰包出版作品。

实际上，如今的海明威炙手可热。其他行业的特使突然开始和他交往，试图摸清欧内斯特·海明威——这位“迷惘的一代”的统领者和代言人潜在的商业价值。咨询和邀请如雪片般飞来。1927年2月，身处格斯塔德的海明威写信给柏金斯，说他需要有人帮他应付所有的邀请信函。(注)单单在杂志领域，他就收到了《纽约客》、《名利场》（两年之前，这家杂志还拒绝了海明威投来的一篇斗牛题材的讽刺短篇）、《时尚芭莎》（*Harper' s Bazaar*）以及不少其他杂志的约稿信。《大学幽默》（College Humor）也低声下气地邀请他。海明威开始征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经纪人，但是这些工作对一个人来说实在不堪重负。给海明威干活的人越来越多，他自己都理不清了。

“现在我在英国有两个出版商，在丹麦、瑞典、法国和德国各有一个，然后显然，我在英国有两个代理人，在德国还有一个（他们都是自己找上门来的，我没有聘请他们，最后会按比例结算费用），在法国至少有两个（都是自愿为我工作的）。”1927年晚些时候，他在写给柏金斯的信中说。“所有这些大好人都喜欢给我拍电报，我需要花一些工夫去回复，整个上午的工作都被打乱了。”(注)

百老汇和好莱坞也是他的追随者。小说出版后没过几个星期，柏金斯就告知海明威，有两位“电影人”来询问《太阳照常升起》电影版权的事，不过他提醒海明威，如果小说真要改编成电影很可能需要做大量的改写。一家著名的百老汇公司发来邀约，柏金斯也建议他慎重对待。

“除去那些电影人，这些人是世界上最古怪、最难以预料的。”柏金

斯告诫海明威。[注]

海明威决定，如果价格合适，古怪难测的行为也是可以忍受的。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改，”他告知柏金斯，让对方进一步去商谈，“我认为你可以把电影改编权卖出一个不错的价钱。”至少三万美元，在海明威看来是个不错的价格。“尽力搞些钱吧。”他叮嘱说。[注]

菲茨杰拉德预言电影版权的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太阳照常升起》不会被拍成电影的，除非它成功曝出了什么大丑闻。”他对海明威说了自己的预测。[注]他是对的。即使《太阳照常升起》着实披露了巴黎、伦敦和纽约精英群体中一些难以示人的事，它还是花了30年才被搬上银幕。[注]

无论如何，单凭这本小说，海明威的名字就遍布了大街小巷。他终于结束了被人冷落的生活，他的生平被加入了一本名人录中。

他告诉菲茨杰拉德，“《名人录》寄来了一张表格让我填”，但是他的经历“太他妈复杂了”，只填了表格上的两项，并怀疑自己的回答可能会被人用作抹黑他的素材。[注]

人们渴望了解他的兴致如此高涨，乃至他在家里发生的一件糗事——他坐在马桶上，天窗掉了下来，在他头上砸出了一个需要缝针的大口子——媒体们都乐此不疲地做了报道。[注]

大洋两岸的人发来了大批电报和信函表达关切。这算是一种有争议的上头条的方式，但是国际名人海明威并不稀罕头条。几乎一夜之间，海明威的个人隐私如同舞厅四楼上他曾住过的那间阴暗逼仄的小公寓，成了遥远、蒙尘的记忆。

如今《太阳照常升起》赢得了满堂彩，那些错过了它的出版社，只

好郁闷地在场外观望。博尼-利夫莱特最后孤注一掷地想赢回海明威，为此软硬兼施。贺拉斯·利夫莱特派出了一位大使——博尼-利夫莱特公司的副总裁唐纳德·弗里德，赴巴黎面见海明威。

“他的论点是，博尼-利夫莱特在无人问津《在我们的时代》时出版了它，而我能从他们那里脱身，也是因为他（也就是弗里德）当时不在。”海明威向柏金斯透露。弗里德提议为海明威接下来的所有小说一次性出价3000美元，并提出购买《太阳照常升起》和《春潮》的版权——这显然说明海明威现在已是比舍伍德·安德森更宝贵的财富了。海明威拒绝了弗里德，并表示自己已经“完全满足”于目前的安排。[注]

毕竟，没有什么地方比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更重视他了。《太阳照常升起》刚从印刷机上拿下来，纸张还没有冷却，柏金斯就又提议他趁势在1927年春天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海明威回应说，自己手上有10篇创作完成的短篇，而且他依然有兴趣写一本关于斗牛的非虚构作品。可是，海明威担心出版的步调可能太快了。

“你不觉得我们也许应该让读者休息一阵子吗？”他提议柏金斯。海明威认为，接下来的一本书必须“好得很”，才能巩固他的地位。毕竟，“有很多人在虎视眈眈地盯着，等着我出错——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不出错。”[注]

最后，他们商定下一本书确实应该是短篇小说集，计划于1927年秋季上市。据柏金斯预测，这样就可以赶在媒体忘记海明威的名字之前出版他的下一部大作，同时也可以让《太阳照常升起》多活跃几个月。海明威提议把这本小说集定名为“没有女人的男人们”——这也算是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标题了，因为此时作者少见地没有死心塌地的女伴陪同左右。海明威向柏金斯解释，这本书中的每一则故事都会缺少“女性带来的柔软”[注]，但如果柏金斯觉得它“太低级”，再换个别的名字也没问题。[注]柏金斯觉得它“棒极了”[注]。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收到的评价毁誉参半，文学界中的两位领军女性各执一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评论毫不留情，说《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流露的是“自导自演的男子气概”，而海明威的才华则在萎缩而非增长。[注]多萝西·帕克急忙在《纽约客》上驰援，称这些故事“绝对出色”；在她看来，海明威是一个“天才”，是“在世的短篇小说家中最伟大的”。[注]

海明威和柏金斯都知道，唯有出版第二本优秀的长篇小说才能最终奠定他的地位。用菲茨杰拉德的话说，另一本“大作”是让他从一名新秀跃升为成熟大师的唯一法门。

一如往常，海明威立即开始了行动。“他一旦完成一本书，注意力就会全部集中在下一本上，过去的就过去了。”海明威的儿子帕特里克说。[注]在《太阳照常升起》还没有发行之前，海明威就开始琢磨下一部大作了，甚至还想出了一个可能的题目：《世界的市集》（*The World's Fair*）。[注]几个月后，他告诉柏金斯，打算等“事情处理好了，我的头脑平静下来了”[注]，就着手写下一部长篇小说。它不会涉及任何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因为他不太热衷于再冒这种险了。

这是柏金斯最盼望得到的消息。他还没向海明威催要一部新的小说，但是相应的需求显然已经出现了。春季，国际杂志公司（International Magazine Company）找到海明威，希望获得连载他下一部长篇小说的权利——不论那是一本怎样的小说——并且出价30000美元购买这本还不存在的小说的影视改编权。

海明威拒绝了他们。作家因为接受委托而动笔写作，这不是什么好事。他不想背负那种“额外的重量”，他向柏金斯解释。

“我看不出它现在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而且我从未见过哪个美国作家能从中全身而退。”他指出。[注]

柏金斯表示赞同，毕竟，在他看来，对方给出的条件也不算很优厚。

到了那年夏天，“事情”确实都处理好了。哈德莉得到了《太阳照常升起》的相关收入，现在带着邦比住在加利福尼亚。海明威在1927年5月10日和宝琳结婚，弗吉尼亚做了她姐姐的伴娘。菲弗家族用大把的支票祝福两位新人的结合，其中有的金额达到了1000美元之巨——几乎赶上了柏金斯为《春潮》或《太阳照常升起》提供给海明威的预付金[注]。他们在法国的一座古城度了一个月的蜜月，接着是潘普洛纳的年度庆典，最后是圣塞瓦斯蒂安的休养之行。

不出所料，夏季紧锣密鼓的旅行使海明威灵感大发。到了10月他不仅开始了新小说的创作，而且已经完成了将近三万字。最开始他以为这会是一部短篇小说，结果却写成了更大的东西。现在，他告诉柏金斯，新生的长篇小说进展得“非常顺利”[注]。这部小说一直写到了第22章，后来海明威放弃了它，开始写另一部。[注]

又一次，压力在积聚。海明威觉得，想为《太阳照常升起》写出一部令人惊叹的续作，必须选择自己熟悉的主题。毕竟这也是《太阳照常升起》的创作思路。同时，他想向柏金斯保证自己并不是在拖延，海明威知道，人们对于他的第二次冲击抱有很高的期望。这项工作有不言自明的时间约束，以稳定节奏问世的作品对作家确立地位至关重要。海明威感觉，自从《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后，菲茨杰拉德的续作已经迟到一两年了。他不愿落入这样的窘境，但也不愿匆匆交出一份平庸的答卷。

“接下来的这本书必须出彩。”他向柏金斯强调。[注]

一个月后，他的新作已经拓展到了15000字，很快它就会得到自己的名字——“永别了，武器”，这是海明威翻找《牛津英语诗歌集》

（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从16世纪一位名叫乔治·皮尔（George Peele）的诗人那里借用的句子。[注]海明威又一次借用真实人物塑造了他的女主人公：凯瑟琳·巴克莱使人联想起阿格尼丝·冯·库洛斯基，海明威在“一战”中受伤后，这位年轻的美国护士曾在米兰一所医院中照料过他，她和凯瑟琳·巴克莱惊人地相似。她和海明威一度相爱，还计划结婚。但是后来冯·库洛斯基抛弃了海明威，与一个意大利军官订了婚。也许她觉得自己永远摆脱了与海明威的干系，她想错了。

见证了《永别了，武器》写作过程的友人们，也许会有似曾相识之感。海明威再次在压力之下奋笔疾书，要么大获全胜，要么一败涂地。（“我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他对柏金斯说。[注]）而且他仍旧常常把小说的写作进度透露给朋友们，具体到字数。一如往常，有一位海明威夫人在后台提供着资金和无限的鼓励。这位夫人如今还怀上了一个男孩。

但是一切又不一样了：海明威作为文坛新人的日子结束了。他成功地精简了英语，让语言为自己所用，开始成为世界上最尽人皆知的文化偶像。海明威所有的形象都已经各就各位，今后它们将难以遏制地膨胀下去。

巴黎，也被精明强干的海明威征服了。他多次回到过那座城市，但是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到了1928年，他和宝琳决定回到美洲，作长期停留，他们首先来到了哈瓦那和佛罗里达。正如他和哈德莉7年之前从舍伍德·安德森那里听说了一个叫“蒙帕纳斯”的异国福地，他又从约翰·多斯·帕索斯那里听说了湿热的基韦斯特[注]所孕育的奇迹。1928年3月17日，海明威夫妇踏上了横渡大西洋、返回美洲的轮船。

1933年末，将近6年之后，海明威回到巴黎，认真地重游了故地。那时的他，成了从前那些年来自己一直希望成为的人。《永别了，武器》出版之后赢得了如潮好评，使他得以稳居战后一代的代言人地位。这本书曾高居畅销榜之冠，被誉为“一部现代主义的超凡入圣之作”[注]。

1932年派拉蒙公司拍摄了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电影，由加里·库珀和海伦·海丝（Helen Hayes）主演。海明威还出版了另外两本书：短篇小说集《胜利者一无所获》（*Winner Take Nothing*），以及构想了多年的讲述斗牛运动的非虚构作品《死在午后》（*Death in the Afternoon*）。他的公众形象，也随着他的文坛地位和作品销量一路攀升。《名利场》不久就刊出了那张向他致敬的幽默漫画：五个海明威纸偶，每个都代表“海明威神话”的一个侧面。

五个纸偶形象中的三个——作为嗜酒的“迷惘的一代”作家、作为狂热的斗牛士和作为伤兵的海明威，都是随着《太阳照常升起》一起闻名于世的，成了海明威形象中永恒的、核心的组成部分。

自1928年返回美洲，海明威多次重访巴黎，但是在1933年返回巴黎时他为《时尚先生》（*Esquire*）写了一篇介绍巴黎风貌的文章。（不久以后，新闻工作再次成为他生活的重心：他将着手报道接下来10年中搅乱欧洲的两场战争[注]。）回望《太阳照常升起》中那个五光十色、醉生梦死的巴黎，这篇名叫“巴黎来信”（“Paris Letter”）的文章几乎可以看作那段生活一段无情的结语。

海明威感到巴黎还是一如既往地美丽，但自己的重访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注]。1929年的股灾惊破了千百侨居者的轻歌曼舞，他们收拾细软，失落地返回故国。甚至连吉米·查特斯——丁戈酒吧那个人见人爱的招待——也撤回了伦敦。到了海明威重游故地时，只有“少数几个‘死硬派’实在无法割舍他们曾经辉煌过的地方”[注]，依然留在蒙帕纳斯。到如今，《太阳照常升起》不仅在现代文学中获得了先锋地位，而且成了一部追忆流水落花的记录。

海明威重访了自己曾流连的地方。大概是从那几个‘死硬派’口里，他得知了一些旧友的运数。有人饮弹自杀了，有一个朋友死于毒品过量，还有一个回到了纽约，从窗口一跃而下。没人保住了财富，画作也

卖不出去，每个人都很颓丧。左岸弥漫着令人不快的中产气息和布尔乔亚气息，还污染了周围的地方。多摩咖啡馆的露天茶座中曾经坐满了痛饮香槟和茴香酒的英美旅居者，如今云集着惊惶的德国人、“躲避纳粹恐怖统治的难民”注，纳粹党人也在那里监视着他们。到处都在谈论着下一场战争已不可避免。

“人们接受了它，认为现实如此。”海明威写道。

这样的场景压抑着海明威，但不足以抹去他在回顾自己的巴黎岁月时心里的温柔，甚至怀恋。他现在可以重新清醒地看待这座城市了：它如同一个不会老去的女人，不断更换着新的情人。一如这座城市，海明威不能停下脚步。

“如果年轻，这是一个好去处，也是一个人成年的必经之地，”他想，“我们都曾爱过它。”

“而且，”他还说，“说不爱，那是撒谎。”

---

1. Putnam, *Paris Was Our Mistress*, 69, 128. 普特南与海明威在双叟的对话，收录在一篇题为“年轻的硬汉前途无量（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文章里（*Hard-Boiled Young Man Going Places[Ernest Hemingway*]）。
2. 亚瑟·莫斯（Arthur Moss，1889—1969）：美国旅法诗人、杂志编辑。——译者注
3. Arthur Moss, quoted in Carlos Baker's notes on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f Moss's, “Time of the Expatriates: A Reporter's Recollections of the Lost Generation,” Carlos Baker Collection of Ernest Hemingway,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4. 格斯塔德（Gstaad）：阿尔卑斯山中的一个瑞士小镇。——译者注
5. 即使宝琳为海明威带来了财政上的安定，但在那年春天他其实常常抱怨缺钱，并问麦克斯韦·柏金斯可不可以为他接下来的一本书预支750美元，供他救急。
6. Robert McAlmon to Norman Holmes Pearson, quoted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225.
7. 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December 24,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455. 在这封信中，海明威告诉菲茨杰拉德，

他打算“为麦克阿尔蒙写一篇《艾略特夫妇》”。《艾略特夫妇》就是海明威为查尔德·鲍尔斯·史密斯夫妇写过的那篇远不算恭维、不加避讳的小说。（有关查尔德·鲍尔斯·史密斯和《艾略特夫妇》的典故，见117页。——编者注）

8.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93.

9. 《我与斯泰因绝交的真相》刊登于1927年2月12日的《纽约客》上。

10. Stein,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217.

11. Ibid., 219.

12.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February 19,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3.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October 1,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4.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December 3,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5.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December 3,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6. F. Scott Fitzgerald to Ernest Hemingway, December 1926, reprinted in Bruccoli,*F.Scott Fitzgerald: A Life in Letters*, 148.

17. 1957年，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推出了《太阳照常升起》的电影版，由泰隆·鲍华（Tyrone Power）饰演杰克·巴恩斯，艾娃·加德纳（Ava Gardner）饰演波莱特·阿施利。

18. 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ca. September 15, 1927,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292.

19.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89-90.

20.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May 27,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1.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December 6,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2.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February 14,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3.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February 19,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4.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February 28,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柏金斯或许喜欢这个题目，但是菲茨杰拉德在一封信中拿它开足了玩笑，他把这本书称作“那些没有女人的忧伤男人”（套用了他自己最近出版的

小说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以及“所有没有恋爱中的女人的悲伤男人”（套用了D. H. 劳伦斯1920年的作品《恋爱中的女人》）。F. Scott Fitzgerald to Ernest Hemingway, October 1927 and December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5. Virginia Woolf, “An Essay in Criticism,”*New York Herald Tribune*, October 9, 1927.

26. Parker, “Reading and Writing,” 93-94.

27. Patrick Hemingway,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uly 30, 2014.

28. 《太阳照常升起》上市前几个星期，海明威给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了一封信，说他“强烈预感到了一部新小说”，并且告诉了对方可能的书名。“世界的市集”也是菲茨杰拉德《夜色温柔》的一个早期备选书名。关于他构想中的新作，海明威并没有透露其他的细节。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ca. September 8,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117.

29.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December 6,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30.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June 24, 1927,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31. 帕金斯为这两本书各付了1500美元。——译者注

32.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March 17, 1928, reprinted in Sanderson,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375.

33. 这部最终流产的长篇小说原定的题目是“新死的骑士”（*New Slain Knight*），不过在草稿上这个题目被画去了。Reynolds, *Hemingway: The Homecoming*, 247. 海明威告诉柏金斯，他力图把它写成一部“现代的《汤姆·琼斯》”（《汤姆·琼斯》是启蒙时代的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的代表作。——译者注）。到了第二年三月，他告诉柏金斯这本小说已经写了22个章节，有45000词了，但是他要把它推到一边，另写一个新故事——后者最终成了《永别了，武器》。

34.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March 17, 1928, reprinted in Sanderson,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 375.

35. 卡洛斯·贝克声称海明威对家人们说明了这个书名的由来。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99.

36.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March 17, 1928, reprinted in Sanderson,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3: 374.

37. 基韦斯特（Key West）：位于墨西哥湾、佛罗里达半岛最南端的小岛，也是美国大陆领土的最南端，距离古巴首都哈瓦那只有170公里。——译者注

38. *The Nation*,October 30, 1929.

39. 两场战争：指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40. Ernest Hemingway, “A Paris Letter,”*Esquire*, February 1934, 22.

41. Charters, *This Must Be the Place*, 197.

42. Hemingway, “A Paris Letter,” 156.

尾声

对于启发海明威创作了《太阳照常升起》中那些主要角色的人们，他们的生活被分成了两个纪元：“B.S.”（《太阳照常升起》之前）和“A.S.”（《太阳照常升起》之后）。[注]下文将总结他们在“A.S.”时代的生活轨迹。有些人能够被查到的信息更为详细，但是他们每个人终究都留下了一些记录，有些人完全是因为海明威的小说才名垂史册。

杜芙•特怀斯登夫人（波莱特•阿施利夫人）

1927年杜芙遇到了克林顿·金，一位柔声细语的美国画家，比她将近小10岁。[注]他来到巴黎作画、求学。一次，画家塞德里克·莫里斯（Cedric Morris）和亚瑟·列特-海因斯（Arthur Lett-Haines）邀他出门聚会，这两位画家都是杜芙的朋友（也是《太阳照常升起》中波莱特身边快乐追随者们的原型）。杜芙的名声如雷贯耳，听说她会到场，金于是同意参加。他们相爱了，并于次年结婚。

一如杜芙上一段与上流人士的婚姻，她和金的结合最开始也被当成了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丑事。结婚两天后，《纽约时报》报道：“特怀斯登夫人的秘密婚姻今日被曝光，其夫是克林顿·布莱尔·金（Clinton Blair King），年轻画家，一位美国糖果商之子。”[注]金的家族在沃斯堡（Fort Worth）拥有一家糖果公司（它的宣传语是：“King's Chocolates for American Queens”[注]）。虽然这是一个商业家族而非贵族，但金迎娶特怀斯登时，亲戚们的抵制和当年罗杰准男爵娶她时如出一辙。据说，金氏家族的律师没能打消克林顿迎娶杜芙的决心，于是父亲断绝了

他的生活费，使杜芙（再一次）陷在了一文不名的富家子弟手里。(注)

一些同辈们在提到这对伉俪时语中也充满了不屑。杜芙又不情不愿地成了文人的缪斯：诗人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写了几首诗，让金氏夫妇俩糟糕的名声永垂不朽。他说特怀斯登是“一个消磨了名号头衔的英国女人”，而金被贬低成了“小甜甜的男孩”（a son of candy）。关于两人的恋情，宾纳写道：

> 她扑向他，于是他们说：天哪，看！
>
> 她喜欢他肉嘟嘟的小脸和肥乎乎的小翅膀，
>
> 而他喜欢她的力量。接着他们相拥，
>
> 盘旋在巴黎的天地间，
>
> 不像男孩和他的鹰，倒像是老鹰和它的野兔、它的瘪气球。(注)

最开始，夫妇俩还待在巴黎，靠杜芙的亲戚接济维生，还在罗伯特·麦克阿尔蒙的公寓暂住过一段日子。麦克阿尔蒙坦言，对于能从他们那里收到房租一事从未“抱有任何缥缈的指望”，即使房租并没有多少钱。后来，当他自己需要占用公寓的那一部分空间时，发现“打发波莱特夫人和她的男朋友（搬出工作室），仅仅温和地示意是不够的”。(注)

一如海明威和宝琳，金氏夫妇最终也放弃巴黎回到了北美，接下来的10年辗转居住于墨西哥、得克萨斯、纽约和圣达菲(注)。不过他们一直保持着蒙帕纳斯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在墨西哥的一个熟人发现，因为宿醉，这两个人直到下午才能起床。(注)在纽约他们曾经尝试创办过一家艺术学校，但是始终惨淡经营。金氏夫妇现在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要落魄。后来朋友们劝他俩离开了这个行当，把他俩安置在了一座棚屋里，旁边还有一片菜地。就在那里，他们靠菜地产出的作物生活，每天地主的朝鲜仆人会拿给他们一些杜松子酒喝。(注)

他们过着艺术家的生活，虽然贫困，但显然很幸福。杜芙为金当模特，自己也画些速写和水彩画。他们读书、参加聚会，杜芙依然会吸引众人的目光。宾纳认为杜芙是“我见过的最能喝酒的人”。

“唯一的麻烦在于，克林顿跟不上她的步伐。”宾纳发现。[注]

金氏夫妇最后搬去了圣达菲，那里相当于美国西南部的格林威治村。即便如此，圣达菲作为一个艺术家聚集地，得到的尊重常常不如格林威治村或者巴黎左岸。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曾说圣达菲的居民“大概是世上所有地方中最差的一群艺术家和作家”[注]——但圣达菲依然是个吸引人的地方。杜芙和克林顿带来了“他们纵酒和粗俗的作风”，在地方上毁誉参半。（杜芙一看就是精熟于骂人艺术的人，并且是下流音乐剧的活曲库。）不过宾纳认同杜芙是“认真聪慧的领悟者，出口成双关”，并且一如既往地“苗条、帅气”。[注]（哈罗德·勒布的看法却正相反，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曾在一场鸡尾酒会上遇见了这位昔日的情人，觉得她已经风光不再。）圣达菲的居民知道海明威以杜芙为原型塑造了波莱特·阿施利夫人。她的邻居偶尔叫她“波莱特”，甚至“那个杜芙-波莱特女人”。[注]

杜芙将在这座城市里走完她生命最后的日子。1938年，她在得克萨斯诊断出了肺结核。金氏夫妇回到圣达菲，杜芙被送入了一家疗养院。[注]“她看上去就像风干的海马一样瘦弱，但仍保持着她那不屈的光彩”，宾纳告诉一个朋友。他预测，杜芙会因为这场病在医院里待上一年，甚至因此丧命。[注]

宾纳做完这个预测仅仅28天后，杜芙就于1938年6月27日去世，时年46岁。波莱特·阿施利夫人作为不羁魅力的典范，永不老去；而“杜芙·斯特林·金夫人”（Mrs. Duff Stirling King）最后的死亡证明上，黯然写着逝者是位“家庭主妇”。[注]

这一信息最终传到了海明威耳中，他还是禁不住拿杜芙的人生随性发挥。

“波莱特死在了新墨西哥，”10年后他有一次对友人A.　E.　霍奇纳说，“你愿意把她当作杜芙·特怀斯登夫人也没问题，但想到她，我脑子里只有波莱特。”

海明威接着畅想，所有为“波莱特”送葬的人都是她生前的情人，其中一位扛棺材的绅士滑倒了，棺材摔到地上，盖子滑开了。（实际上杜芙接受了火葬，没有举行葬礼。）霍奇纳在他1966年的著作《海明威老爹》（*Papa　Hemingway*）㊟里重述了这个骇人的故事，引发了小小的轰动，也为杜芙·特怀斯登夫人已经声名狼藉的虚构人生添加了另一个不光彩的篇章。㊟

“谁知道（葬礼的故事）是真还是假？”不久前霍奇纳说，“是真是假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刻画的是讲这些故事的海明威。”㊟

克林顿·金死于1979年。他的遗物中并没有杜芙的绘画作品和书信，也没有其他个人物件。于是，杜芙死后基本只是存在于别人的记忆中，并且作为波莱特·阿施利夫人身后渐淡渐远的影子，永不磨灭。

哈罗德•勒布（罗伯特•科恩）

《太阳照常升起》问世时，哈罗德正和一个荷兰女人住在法国南部。他们后来结了婚，但勒布很快结束了这段露水情缘，因为他发现她和一个法国外籍军团的军官有染。不过那个荷兰女人在离婚之前成功毁掉了勒布留下来纪念他与特怀斯登恋情的物件：他记得，她把一张特怀斯登年轻时的照片扔出了舷窗。㊟

完成第三部长篇小说之前，勒布一直留在巴黎。《田芥菜》由贺拉

斯·利夫莱特出版于1929年。回到美国以后，他停止了写作生涯，变成了一位政府经济学家。不过在完全投身商业世界之前，勒布还写了一部未被发表的长篇小说，题目是“歪橄榄树的叶子”（*Leaf of Twisted Olive*）[注]。小说的开篇是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讲了一位旅居作家的故事——这个人物也许受了一点海明威的启发。从此以后，勒布关注的事就与从前截然不同了，他后来的作品都是这样的：《专家治理下的生活》（*Life in a Technocracy*）、《关于产能潜力的全国调查报告》（“Report on the National Survey on Potential Product Capacity”）。之后他娶了第三位妻子，育有两个孩子，一家人住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栋别墅里。他的业余爱好包括“满腔热情地做园艺”[注]，以及通过股市投资成功赚钱。

勒布从来没能逃脱“罗伯特·科恩”的阴影。他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形象、他和海明威脱不去的干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对他有何种程度的影响？勒布的后人们看法不一。他的女儿苏珊·桑德伯格（Susan Sandberg）感到，“它给了勒布一种意义，某种程度上还有一种关切”[注]；他的侄女芭芭拉·勒布·肯尼迪（Barbara Loeb Kennedy）认为，勒布乐于看到自己因为与海明威的关系而被人关注，虽然科恩的形象对他远非恭维。[注]

但勒布的另一个女儿安娜·皮特（Anah Pytte）相信，父亲更希望往事就此别过，但是世界并不容许。皮特提到，勒布1959年写成的回忆录书稿《事已至此》（*The Way It Was*）最初只集中讲述了他的年青时代以及优秀的家族，但“出版商的兴趣在于海明威”，结果回忆录最后成了一本“围绕着那件事而写”的书。她记得“人们找他总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他不能完全把它抛在身后”。[注]

在那些关于《太阳照常升起》，以及“海明威的尖酸”的写作和访谈中，勒布确实让他和海明威的关联保持着鲜活。直至20世纪50年代，勒布还暗示过，两个男人仍然在较劲，仍有一些尚未说出的话。比如说，

勒布声称海明威在写自己的巴黎回忆录《流动的盛宴》时，桌子上放着一本摊开的《事已至此》。（海明威1959年至1961年的助理瓦莱丽·海明威称这种说法“完全不属实”。[注]）勒布的侄女表示，即使《太阳照常升起》的传说挥之不去，勒布最后还是得以乐享天年。那时陪伴在旁的已经是他的第四位妻子了，他们住在康涅狄格州韦斯顿（Weston）一座特别设计的别墅里，房子的墙都是由玻璃制成的。他的女儿苏珊·桑德伯格提到，此外“他总是有一位情人”，偶尔，他的妻子和情人还会同时出现在康涅狄格别墅的餐桌上。

1974年初，勒布夫妻和桑德伯格在摩洛哥马拉喀什（Marrakech）度假。一家人住进了豪华的拉·马穆尼亚酒店，整个假期不是购物就是泡在酒店的泳池里。桑德伯格记得，1月20日，勒布的心脏突然“不行了”，他去世的时候桑德伯格就陪在他身边。他被就近葬在一座墓地里，至少有两篇讣告谈到了罗伯特·科恩，更加强化了这部小说带给勒布的影响。《纽约时报》帮读者们回忆，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无礼地对待勒布”，勒布对应的小说人物科恩是“一个有钱的犹太跟屁虫，一心想攀入上流社会”。[注]

虽然如此，在巴黎以后的年月里勒布令人钦佩地化解了这种窘境，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的。他始终“以潇洒淡然的姿态，保持着一位从20年代一路走来的时代元老风范”。50年后，勒布依然被当作”“迷惘一代”的一位官方代言者。

凯蒂·坎奈尔（弗朗西斯·克莱恩）

凯蒂·坎奈尔比海明威、特怀斯登和勒布更晚离开巴黎。她后来再婚，嫁给了法国超现实主义剧作家、诗人罗杰·维特拉克（Roger Vitrac）。这段婚姻并不长久。[注]

20世纪30年代初，坎奈尔成为《纽约时报》驻巴黎的时尚记者，也为《纽约客》和几份法国刊物供稿。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还留在巴黎，作为一个“异国敌人假释犯受到警察的监视”。此间她曾两次被盖世太保逮捕，被释放后受到禁足，四年内不能离开这座城市。她回忆说，那是个最为弱肉强食的年代：“寒冷、饥饿、灰尘、监禁、消沉、炸弹的轰鸣以及寂寞”，这些就是她战时的日常。曾经多摩和丁戈中的欢笑吵闹，成了遥不可及的喧嚣。注

在一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坎奈尔又“被法国警察盯上”，并且“很有可能要被第三次逮捕了”。为了和抑郁抗争，她开始写一部关于她少年时代的回忆录。这本书叫作“甜美的昨日：19世纪90年代末往来于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快乐童年，一本美好、无忧无虑的回忆录”（Jam Yesterday：Gay, Insouciant Reminiscences of the Late Nineties of a Happy Childhood Spent Shuttling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S.A.）——这个题目像极了备受斯图尔特和海明威嘲讽的那些维多利亚时代迂回曲折的书名。注1944年她终于获准离开巴黎，先是去了纽约，然后定居波士顿。

坎奈尔很快就开始了人生的下一篇章，成了职业上的百变女王。在她工作过的所有领域中，她都堪称成功人士。她的一家经纪公司发布过一张她围着裘皮长披肩拍摄的照片。“二战”后她尝试了多样的工作，包括在文娱广播评论员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外出度假时担任替补播音员，为布鲁克林博物馆打理公共关系，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撰写芭蕾舞评论，以及评论服装秀。她还成了广播和电视节目上的常客：她的经纪公司将她的擅长领域宣传为“从经典风尚到坐牢的一切”注。

她也是熟知海明威早年事迹的专家，她的宣传材料倒没有提及这一点。但是坎奈尔常常欣然接受传记作家们的邀约，一同谈论20世纪20年

代的巴黎，以及《太阳照常升起》写作时的那段岁月。虽然她在“后《太阳照常升起》时代”的生活丰富多彩，但坎奈尔依然因为海明威把她写成了弗朗西斯·克莱恩而烦恼。海明威的名气越来越大，影响日广，他的文学修养和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堪称典范——这让她十分气愤。面对被极度浪漫化的“迷惘的一代”时期，坎奈尔与勒布一样试图捅破这个传说。《与一个主角同台》（“Scenes with a Hero”）这篇题目中带着嘲讽意味的文章把海明威描绘成了一个妄自尊大、暗箭伤人、一言不合就动怒的人。

她刚好比勒布晚去世了四个月，在1974年5月19日去世。

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比尔·戈顿）

进军好莱坞之后的多年中，唐纳德·斯图尔特的运势一直没有减退。《太阳照常升起》出版5年后，他参与编剧的电影《笑》（Laughter）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1941年他担任编剧的电影《费城故事》（*The Philadelphia Story*）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编剧奖。

接着，他“一夜之间从好莱坞薪酬最高的作家变成了一个失业的男人”，友人凯瑟琳·赫本[注]这样简略地说道。[注]

这次跌落的原因在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针对好莱坞名流的反共产主义清理。斯图尔特坦言，他早年在洛杉矶[注]时对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没什么兴趣，他信的是喜剧之神。但他后来成了一位公民自由的公开倡导者。“据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早晨起来，会要一杯橙汁、一杯咖啡，以及唐纳德·斯图尔特当天发来的头10份抗议电文。”斯图尔特去世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写道。[注]20世纪30年代，斯图尔特是好莱坞反纳粹团的团长，也是美国作家联盟的主席，后者也是号召作家们反抗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一个社团。当时他还短暂地加入过美国

共产党[注]。

“到了1950年我正式进了好莱坞黑名单。”斯图尔特在回忆录中写道。人们逼迫他忏悔自己“‘受了蒙骗’，将左翼立场当作自己的政治和人生哲学”，如果他供出其他“受骗人”（dupees）就可以洗清自己。[注]不过斯图尔特没有这么做，他和第二任妻子——他在一场政治集会上结识的作家艾拉·温特（Ella Winter）——从美国逃到了伦敦。“艾拉和我决定，我们也许应该出来‘祸害’其他的国家，而不是纯洁的美国，”斯图尔特写道，“所以我们收拾了自己的颠覆思想和内裤睡衣，放入行囊，启程去探索那些‘不美国’的国家，比如法国、德国和英国。”[注]

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这位“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最伟大的智者，在电影、喜剧、图书领域和上层社会中制造欢笑的人”[注]，就这样淡出了公众视野。人们的品位渐渐改变了，远离了自己职业群体的他却无从见证。到了70年代，斯图尔特意识到自己招牌式的幽默已经不属于这一代人了，不再像往昔那样值得制作方一掷千金。“过去我不用犯愁，”他在1971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我还记得我在好莱坞时的秘书，她签的合同里规定，在听到我的笑话之后必须笑。”[注]

据斯图尔特的孙女达尼特·斯蒂芬斯（Daneet Steffens）说，斯图尔特并没有因为自己流亡，离开了舞台中心而苦恼。“他并不只是坐在那里长吁短叹。”她说。但是斯图尔特的儿子小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Donald Ogden Stewart Jr.）说，父亲在暮年时被一种失败的情绪所扰。斯图尔特和妻子有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活动。周日的大型野餐，从凯瑟琳·赫本等好莱坞传奇人物到当地的家庭医生都会参加。“他们和朋友们一起终老。”斯蒂芬斯说。[注]

即使斯图尔特在后半生结交了众多好莱坞的创作精英，他在1975年撰写的回忆录《神来之笔！》中依然对海明威念念不忘。那时，两个男人已淡出对方生活多年，而海明威也在十几年前去世了。即便这个时

候，斯图尔特依然不认同《太阳照常升起》达到了众人所谓的那种艺术高度。“他会说：‘它写的事情完全是事实上发生过的……它和一张照片没什么区别’，”斯图尔特的儿子说，“他不像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他觉得海明威没有那种天赋。他认为（约瑟夫·）康拉德有，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有，但海明威没有。”[注]

直到去世，斯图尔特对海明威的怨气也一直没有消退——不仅由于海明威写诗中伤了斯图尔特的好友多萝西·帕克，还因为他感觉《太阳照常升起》出版后几十年里海明威仍然在拿他当文学素材。他首次读到海明威写于1937年的小说《有钱人与没钱人》（*To Have and Have Not*），被其中一个人物震惊了：约翰·霍利斯（John Hollis），好莱坞高薪名导，深刻同情着共产党人。他确信海明威是以他为原型塑造了霍利斯。更糟的是，斯图尔特发现自己的妻子比阿特丽斯似乎被写成了多萝西·霍利斯（Dorothy Hollis），一个淫荡的女人，背着丈夫和一个有钱男人出轨。

约翰·霍利斯这一人物在书中戏份不多，却是“对他可怕的冒犯”，斯图尔特的儿子说。[注]这种挖苦也许源于积年的怨愤：斯图尔特感觉自己因为进军好莱坞而受到了海明威的惩罚——这大概也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遭受海明威反感的原因。

“有些东西你是不能出卖的，”小唐纳德·斯图尔特说，“比如好莱坞、你的妻子、酒和人生。”

“不过，”他补充说，“如果你是海明威的朋友，他可以出卖。”

这又是斯图尔特晚年在海明威及其作品中发现的“一连串怪异和尖酸”[注]的实例。斯图尔特认为，海明威有种摧毁挚友们情谊的需求，到了最后，“再没有别人可供他摧毁了，除了他自己”[注]。

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1980年8月2日在英格兰去世，死于一次心

脏病突发引起的并发症，时年85岁。

帕特·格思里（迈克·坎贝尔）

关于帕特·格思里的命运，消息基本来自酒吧招待吉米·查特斯。《太阳照常升起》出版后的那几年，查特斯和格思里的关系一直很近。

根据查特斯的记述，格思里的人生后来渐渐陷入了一场噩梦。他和洛娜·林斯利分手了。这位富有的美国女人用钱胁迫他成为自己的情人。分手之后，他的财务状况急转直下。他赖掉了一家巴黎旅馆的账，遭到警察的追捕。于是他有钱的母亲插手把他送去了南非，或者用查特斯的话说，"'送到了殖民地去'，英国的富裕人家自古以来都认为这么做对矫正败家子习气有奇效"[注]。到开普敦后，格思里谎称自己有一番事业，包括一座并不存在的农场，以及关于一笔子虚乌有的产业的股权交易。格思里的作为又引来了政府的调查，他再次让政府扑了个空。这一次他逃到了英格兰。

后来，他获准回到法国——这是母亲"通过英国大使安排的"[注]。于是格思里重新过上了放荡恣睢的生活。除了查特斯之外，格思里仅有的几个朋友包括一位出租车司机，后者帮格思里打理着他那点儿可怜的财产；同时他也交往着一个有毒瘾的女伴。一天晚上，格思里嗑了点儿不知是什么的药，被他的司机朋友丢在了一家咖啡馆中。格思里往他的汤里倒了些佛罗拿（Veronal，一种巴比妥类药物[注]），之后就陷入了昏迷。因为还没有付汤钱，他没有被送去医院，而是被扔进了警察局，警察把他放在水泥地上。最终他被送去抢救，但没能挽回性命。帕特·格思里死于1932年5月24日，时年36岁。

查特斯认为这是过量吸食毒品引起的一场意外[注]，但是邻里街坊传开消息说格思里是自杀的。"这个曾经人气颇高的男人，参加他葬礼的

宾客却寥寥无几，”查特斯回忆道，“甚至那个美国女人也没有去，而他曾为了她抛弃波莱特（杜芙·特怀斯登）！”注

格思里死后，他年迈的母亲来到巴黎，决定尽可能挽回儿子的声誉。于是她走遍全城去清还不肖子欠下的债。她找到查特斯，希望补偿他。

“我想免去他的债务，以示挚友情谊，以及对她爱子的追忆。”查特斯说。但格思里的母亲坚持要给他一张数额不小的支票，查特斯接受了。两人小酌了一杯，“作为好朋友道了别”。注

比尔·史密斯（比尔·戈顿）

比尔·史密斯经历了巴黎生活和潘普洛纳之行后，在1925年受到文学精神的感召。和哈罗德·勒布一起回到美国以后，他开始创作自己的短篇小说。但他后来还是放弃了创作，跟随勒布做了一位政府撰稿人。接下来的很多年中，他在数个政府部门工作过，还曾为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撰写过劳工方面的演讲稿。他后来娶了另一个在勒布手下工作的女人，没有子女。注

20世纪60年代末，有人找到了他，希望能采访他。此时的史密斯住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Arlington）的一座农场，距离华盛顿特区很近。虽然他的妻子玛丽恩（Marion）坚持认为海明威“在招人仇恨上和写作技艺方面有着同样的天才”注，但采访中，史密斯却满怀情谊地谈了很长时间，仍然用他们发小时代就有的外号称呼海明威“Wemedge”。多年来，海明威的朋友圈子里来了电影明星、将军、总统，两人就渐渐断了联系。是因为某些隔阂吗？采访者问。

“说是分开了，不如说是走散了，”史密斯解释说，“我们的生活只是相隔太远，总会发生某种偏离……Wemedge折腾到了世界各地。”

史密斯对《太阳照常升起》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吗？采访者问。是否仍然觉得它只是一篇对于真实事件的准确描述？

史密斯坦言，《太阳照常升起》不是海明威小说中他最喜欢的一部。最好的应该是《永别了，武器》或者《丧钟为谁而鸣》。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准确性，它只代表了海明威对1925年夏天发生之事的看法。

“我们每个人都能对此写出一本不一样的书，”他沉吟道，“结果必定是众说纷纭，这是自然的事。海明威的故事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他把一种情结写得比别人都好。”[注]史密斯于1972年3月去世。

卡耶塔诺·奥多涅兹（佩德罗·罗梅罗）

卡耶塔诺·奥多涅兹，这位“帕尔马的尼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让海明威印象深刻，被他认作斗牛运动的未来救星。但是在1932年，海明威宣称现实世界中的佩德罗·罗梅罗已经不复当年了。几年前他被严重顶伤过，“那就是他斗牛生涯的终结了”。从那以后，奥多涅兹“很难再直视一头公牛……他出剑杀牛时表现出的惊恐，令人看着痛心”——《死在午后》中，海明威这样评价自己曾经的英雄。[注]改变命运的那一顶之后的斗牛季，奥多涅兹签了一大批合同，然后献给了公众“一个可耻得前无古人的斗牛季”，海明威写道。那些年没有哪一位斗牛士像他那样，给了人们如此高涨的希望，又让他们跌入这般深重的失落。

更糟的是，奥多涅兹开始和有伤风化的人混在一起：《太阳照常升起》出版一年后，他娶了孔苏埃洛·德·洛斯·雷耶斯（Consuelo de los Reyes），一位有一半吉卜赛血统的弗拉明戈舞娘。她的吉卜赛母亲搬来和夫妻俩一起住，据说也带去了不分昼夜享乐的嗜好。斗牛批评家们很快把奥多涅兹技艺的退步和他新家里嘈杂的环境联系起来。[注]

不过，奥多涅兹的斗牛生涯并没有像海明威所判断的那样就此终结。1932年，《死在午后》问世后，他的公众声望和热情（用西班牙语说叫afición）实际上都有所回升。那年秋天他在一场斗牛中表现得十分出色，使人们“原谅了他的一切”。他收获了公牛耳作为奖赏，狂热的观众扛起他绕场游行——时间仿佛回到了多年前。

岁月流转，奥多涅兹家的另一位成员被海明威写进了作品，受到了赞扬，那就是卡耶塔诺的斗牛士儿子安东尼奥。在《危险的夏天》中，海明威细数了安东尼奥如何在卡耶塔诺“臻于完美的技艺”上做进一步提高。他回顾了自己和安东尼奥的一场对话。当时安东尼奥赛后受伤躺在床上，问海明威：“实话说，我是不是和我父亲一样优秀？”

“我告诉他，他超过了他的父亲，还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如何优秀的斗牛士。”海明威写道。

这个时代的斗牛士中，已经没有人能够和安东尼奥竞争。如海明威所说，安东尼奥是在和历史竞争。

他的父亲卡耶塔诺则已经淡出公众视野很久了。奥多涅兹和《太阳照常升起》的其他原型人物不一样：如果他在小说中的化身佩德罗·罗梅罗能一直代表着他生前身后的形象，奥多涅兹的人生可能反倒会更好一些。不幸的是，一个与罗梅罗相反的形象冒了出来。1955年，一位叫山姆·亚当斯（Sam Adams）的美国学生就读于马德里大学，一次房东问他是否介意和一位失意的老人合住。学生无奈地同意了，一个令人厌恶的老酒鬼很快过来占据了屋里的另一张床，自称“帕尔马的尼诺”。亚当斯意识到，这个人曾经是海明威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于是仔细观察了这位新室友，把与他共处的三周生活记录下来，投稿给了《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

这个海明威所描写的“我所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孩”，如今已经腐朽成了一个满面痘疤、秃顶的糟老头，鼻子上遍布着紫色的血丝，嘴里露出

浮肿的牙龈和两颗黄色的门牙。亚当斯说，奥多涅兹严重酗酒，夜里会发出“不像人类发出的干呕声”吵醒屋里的人。据亚当斯说，是奥多涅兹如今已经飞黄腾达的儿子掏钱让他躲远点。

“我只是一个老酒鬼，我的家人现在都是大人物了，住的地方周围都是树，而我吃着操蛋的救济，待在这个操蛋的地方。”他对亚当斯说。

奥多涅兹也谈到了海明威。能够出现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对他来说显然是巨大的荣耀。

“他曾经在一本书里写过我，”奥多涅兹告诉亚当斯，“在书里，欧内斯托（Ernesto）用西班牙最伟大的斗牛士的名字称呼我——佩德罗·罗梅罗……故事都发生在潘普洛纳的圣佛明节庆期间，我还和一个英国女人上了床。”

不出所料，奥多涅兹对海明威在《死在午后》中对他的描写不太热衷。“一个美国作家，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害怕？怎么会知道独自面对公牛，常常还要重振精神以便讨好那些坐在阴凉处贵宾席上的禽兽以便他们下一季还会签约你，是种什么滋味？唐[注]·欧内斯托·海明威阁下对此有什么话说？”

“我经历着怎样的恐惧啊？”他心有不甘地继续说道，“那是何等的恐惧。有时候我抖得太厉害，都控制不住自己的腿。”[注]

他于6年后的1961年10月30日去世，享年57岁。

欧内斯特•海明威（杰克•巴恩斯）

算上《太阳照常升起》，海明威一生一共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一

部中篇小说、多部短篇小说集，还有一些非虚构作品，其中成书的有两本。他作为记者记录了西班牙内战（这段经历直接促使他写成了1940年出版的《丧钟为谁而鸣》）以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的采写任务使他走遍了从非洲到中国的广大世界。［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不是说过吗？每出版一部大作，海明威身边都会出现一个新妻子——这个预测十分准确。海明威将《丧钟为谁而鸣》献给了记者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她于1940年成了海明威的第三位夫人；他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写于他的第四次婚姻中，他将它献给了玛丽·沃尔什·海明威（Mary Welsh Hemingway）。］

虽然海明威著作等身，在20世纪40年代他的事业也一度陷入低谷。他1950年的小说《过河入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小说出版前曾在《大都会》杂志上连载）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批评家认为海明威在模仿自己的前作。有人还抓住机会，故意去写文章戏仿这部本无意当仿品的小说。《纽约客》的作家E. B. 怀特（E.B. White）写了篇讽刺的故事，题为“过街进入烧烤店”：“‘施拉夫特酒吧是个好地方，我们很开心，我爱你。’皮尔尼说。他又喝了一口那杯‘1926’，小心翼翼的一大口。‘守仓库的男人很勇敢，’他说，‘但那是个很难存活的岗位。’”[注]（“戏仿是失意作家最后的庇护所。”海明威曾暗自抱怨。[注]）

20世纪20年代那个没有地位、没有钱、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的年轻作家形象不再适合海明威了，而年迈的过气大师这一角色也不适合海明威。1952年他凭借一本《老人与海》强势回归。该书的主题他虽然琢磨了很多年，但是真正的写作时间只有8个星期，使人想起了几十年前他创作《太阳照常升起》时的狂热。美国版畅销了50000本[注]，而《生活》杂志当年9月完整刊载了《老人与海》，结果杂志发行后在48小时之内就卖出了500万册。

海明威学社的主席H.　R.　斯通贝克还记得这本书是怎样席卷了整个

国家，并且在人群中疯传的。那年9月他在旅行途中，将车停在一家公路服务站边，看到女服务员站在柜台后面手拿一本《生活》。一个卡车司机大喊着让她添咖啡，“她说：‘闭嘴听我读！’”斯通贝克回忆说，“于是在半夜的服务站里，她开始朗读《老人与海》。”有一台点唱机还在响，一位司机直接把点唱机的插销从墙上拽了下来，好让大家听清楚小说。[注]此时，斯通贝克意识到海明威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有多么广泛。一如在《太阳照常升起》中那样，海明威雅俗共赏的文风再次经受住了考验。

小说一夜成名似乎在海明威意料之外。“一下子就拥有了500万的读者（或者不管究竟有多少），真让人害怕，”他在写给斯克里布纳的编辑华莱士·迈耶的信中说，“一下子看到了这么多评论自己的屁话，不论褒贬，都不好受。”[注]

这本书赢得了次年的普利策奖。到了1954年，海明威的文坛地位已经无可撼动；当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新近在《老人与海》中展现的对叙述之道的精通，以及他对同时代文学风格的影响”[注]。

海明威没有出席颁奖典礼，不过他寄去了一段很有个人特色的简短演讲词，托人代读。“一位真正的作家，”他写道，“应该不断尝试做别人从未做过的事，或者别人一次又一次失败的事。有时候，天遂人愿，他会成功。”[注]

7年后，和抑郁做着斗争的海明威终于拿起了猎枪，在爱达荷州凯彻姆（Ketchum）的家中自杀。最初的报道并没说他死于自杀。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玛丽——此时已经是他的遗孀——向媒体说了这样一番话：“今天早上7点30分，海明威先生在清理枪支的时候不慎走火身亡。葬礼没有确定时间，并且不对外开放。”[注]回忆当时，她说自己并没有“刻意说谎，直到一个月之后，我才能够面对现

实”㊟。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中，年轻时的巴黎岁月再次涌上了海明威心头。他此时写下的是他所谓的“巴黎速写”——20年代他生活中发生的故事，以及他认识的人们。1964年海明威已经不在人世，这些文章集结成《流动的盛宴》出版，这个书名是A. E. 霍奇纳向玛丽·海明威提议的。1950年霍奇纳和海明威同坐在丁香园咖啡馆的吧台，海明威对他说：“如果你足够幸运，年轻时曾经在巴黎居住，那么你此后的一生中不论走到哪里，它都会跟随其后，因为巴黎是一场不散的宴席（a moveable feast）。”㊟

瓦莱丽·海明威说，海明威在写巴黎往事的时候很开心。1959年秋天瓦莱丽是海明威的助手，陪伴他游览巴黎，核验往事。他们重访了一些故地，海明威在手稿中又让它们重现新生。他又去了丁香园，去了多摩和精英咖啡馆小酌一杯，故事里的杰克·巴恩斯和波莱特·阿施利夫人曾在这里开怀痛饮。他们重访了他和哈德莉的旧居，瓦莱丽说他们并没有进去，因为海明威想在心中保存这些地方尘封在时间里的样子。站在乐牧安主教路的老楼前，他回忆起楼下早已不知去向的舞厅，还有在那间狭小的，没有下水管道的公寓里蜗居的青年时代。

“说到没有浴室，诸多不便的日子，他只是轻轻耸了耸肩，”瓦莱丽回忆，“这是他们最快乐的地方。他对它依然满心柔情。这座房子是所有一切的开始。”㊟

霍奇纳和海明威聊过巴黎的那些年，也谈及过那些住在《太阳照常升起》世界中的人。海明威深情地说到菲茨杰拉德，虽然他在《流动的盛宴》里把菲茨杰拉德描绘成了一个乏味的庸人，一块长醉不醒的废柴。谈话中，格特鲁德·斯泰因获得的评价岂止是刻薄：海明威坚称，她的《爱丽丝. B·托克拉斯自传》“谎话连篇”；还有，她把自己当作所有蜂拥来到这个城市的青年作家的老祖母，这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至

于哈罗德·勒布和杜芙·特怀斯登的恋情，海明威说，“可怜的勒布，下半生都给毁了”注。

《太阳照常升起》带给勒布、特怀斯登和其他人莫大的苦恼，对此海明威即使曾经后悔过，也从未表露出来。

“我曾问他：那么，如果你必须重写一遍，会不会下手不那么重？”霍奇纳回忆说。

“去死吧，才不会。”海明威回答。注

---

1.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5.
2. 金生于1901年，参见John Powers and Deborah D. Powers, *Texas Painters,Sculptors, and Graphic Artist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rtists in Texas Before 1942* （Austin: Woodmont Books, 2000）。如果采信特怀斯登死亡证明上标出的出生时间——1892年，那么她就比金年长9岁。
3. “Lady Twysden Secretly Weds Clinton King, Amer ican Artist, in England, Records Reveal,”*New York Times*, August 23, 1928.
4. 此句意为：“国王的巧克力，给美国的王后们”，其中“国王的”（King’s）一词也可翻译为“金的”。——译者注
5. 有关亲友们对这桩婚事的反对，参见Sarason, “Lady Brett Ashley and Lady Duff Twysden,” 236。
6. Witter Bynner, “Expatriates,” in *The Selected Witter Bynner: Poems, Plays,Translations, Prose, and Letters*, ed. James Kraft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5）, 110.
7. McAlmon,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271, 273.
8. 圣达菲（Santa Fe）：美国新墨西哥州城市。——译者注
9.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47.
10. Sarason, “Lady Brett Ashley and Lady Duff Twysden,” 238.
11. Witter Bynner to Gladys Ficke, November 12, 1930, Witter Bynner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12. Edmund Wilson, *The Thirties: From Notebooks and Diaries of the Period*, ed. Leon Ede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0）, 92.

13. Witter Bynner to Gladys Ficke, November 12, 1930, Witter Bynner Papers,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14. Russell Cheney to F. O. Matthiessen, November 29, 1929, F. O. Matthiessen Papers, Bie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15. 杜芙入住的是圣文森特医院，一家专业治疗肺结核的医院。Clarke Kimball, *The Hospital at the End ofthe Santa Fe Trail* （Sante Fe: Rydal Press, 1977）, 100.

16. Witter Bynner to Arthur Davison Ficke, June 5, 1938, Arthur Davison Ficke Papers,Bie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17. Sayre Andrew Funeral Home, Case 787. 这些记录保存于圣达菲的贝尔拉迪内利家庭殡葬服务公司（Berardinelli Family Funeral Service），该公司不愿向作者公开档案内容，但是一位代表在电话中向作者确认了档案信息。档案内容在这篇文章中也有归纳：David Harrell, “A Final Note on Duff Twysden,”*Hemingway Review* 5, no. 2 （Spring 1986）: 45-46。

18. “Papa”是海明威晚年在古巴获得的绰号。——译者注

19.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48.一位殡葬服务公司的员工确认杜芙的档案中包括一项火化收费，她的遗体被运往阿尔伯克基市（Albuquerque）进行火化处理。不过，档案中缺失了包括一项棺材的收费，但对方解释，棺材可能只是用来运送遗体的。Gerald Rodriguez,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August 2014.

20. A. E. Hotchner,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December 11, 2013.

21.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9-10.

22. 伯特兰·萨拉森声称勒布向他展示了这部书稿。萨拉森觉得，勒布书中的一个人物——作家“汉克”使人想到了海明威，虽然勒布提醒他“不要把汉克和海明威牵扯到一起”。萨拉森认定，这个人物至少“代表了海明威的一些精髓”。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12. 在接受采访的勒布后人中，没有人在勒布遗留的手稿中见过这本书。

23. Anah Pytte,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uly 29, 2014.

24. Susan Sandberg,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May 30, 2014.

25. Barbara Loeb Kennedy,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May 7, 2014.

26. Anah Pytte,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uly 29, 2014.

27. Email from Valerie Hemingway to the author, April 15, 2014.

28. “Harold A. Loeb Is Dead at 82; ‘Lost Generation’ Figure in Paris,”*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1974.

29. 《纽约时报》发布坎奈尔的讣告时忘记了提及她与维特拉克的婚姻，但是马尔科姆·

库利曾在一本书里提到过他们的结合，参见Malcolm Cowley *The Long Journey* and cited in M. C. Rintoul, *Dictionary of Real People and Places in Fiction* （Abingdon, U.K.:Routledge, 1993）。

30. 《纽约时报》上的讣告称坎奈尔在1931年至1941年间担任该报的时尚记者，而在她的自传《甜美的昨日》中，她说自己在《纽约时报》工作了两年，“直到（敌军）占领巴黎”。Kathleen Cannell, *Jam Yesterday: Gay, Insouciant Reminiscences of the Late Nineties of a Happy Childhood Spent Shuttling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S.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1945）.

31. Ibid., 1-2.

32. 读者也许还记得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的一部讽刺名作：《戏仿世界史纲，如果让美国最具个性的当代作家们讲述，也许对美国历史事件有奇妙而无伤大雅的解读》。——译者注

33. “Kathleen Cannell, Sparkling Talks Feature Fashions from Paris to Main Street,”undated press material issued by Lordly & Dame, Boston.关于坎奈尔职业生涯的其他信息，参见Bertram D. Sarason, “Kathleen Cannell,” in Roo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4:68; 以及“Kathleen Cannell, 82, Dies; Covered Fashion for Times,”*New York Times*,May 23, 1974。

34. 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m，1907—2003）：美国著名女演员，一生中获得过4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是美国电影史上获奖最多的演员。她也是《费城故事》的女主角。——译者注

35. Katharine Hepburn, “A Note from Katharine Hepburn,”in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7.

36. 洛杉矶是好莱坞所在地。——译者注

37. “Donald O. Stewart, Screenwriter, Dies,”*New York Times*, August 3, 1980.

38. 美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USA）创立于1919年。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美国共产党一直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并在美国各种民权运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50年代受到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冲击，美国共产党迅速式微。如今美国共产党依然存在，但是影响力很小。——译者注

39. 斯图尔特的遭遇，可以反映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红色恐怖时期美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状况。——译者注

40.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295, 297.

41. Hepburn, “A Note from Katharine Hepburn,” 7.

42. St. John, “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190.

43. Daneet Steffens,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August 6, 2014.

44. Donald Ogden Stewart Jr.,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anuary 26, 2015.

45. Donald Ogden Stewart Jr.,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anuary 26, 2015.

46.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57.

47. Donald Ogden Stewart to Bertram D. Sarason, June 14, 1971, quoted in Sarason,“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107.

48. Charters, *This Must Be the Place,* 69.

49. Ibid.

50. 巴比妥类药物：一类作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译者注

51. Ibid., 70. 关于格思里的死亡日期与年龄，参见“Patrick Stirling Guthrie,”“The Peerage:A Genealogical Survey of the Peerage of Britain as Well as the Royal Families of Europe,” entry no. 54807, http://thepeerage.com/p5481.htm.

52. Charters, *This Must Be the Place,* 70.

53. Charters, “Pat and Duff: Some Memories,” 244.

54. St. John, “Interview with Hemingway's ‘Bill Gorton,’” 187-88.

55. Ibid., 158.

56. Ibid., 155-56.

57. Ernest Hemingway, *Death in the Afterno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2）, 89-90.

58. Shay Oag, *In the Presence of Death*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9）, 68-70.

59. Ibid., 73.

60. Ernest Hemingway, *The Dangerous Summer*（New York: Touchstone/Simon &Schuster, 1997）, 50, 52.

61. “唐”是西班牙语中对贵族或有地位者的尊称。——编者注

62. Sam Adams, “The Sun Also Sets,”*Sports Illustrated*, June 29, 1970, 57-60, 62-64.

63. E. B. White, “Across the Street and into the Grill,”*The New Yorker,* October 14,1950, 28.

64.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70.

65. 《老人与海》初期的销售数据来自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504。

66. H. R. Stoneback,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une 2, 2014.

67. Ernest Hemingway to Wallace Meyer, September 26, 1952, reprinted in Baker,*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783.

68.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54,” Nobelprize.org, accessed July 30, 2015,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54/.

69. Ernest Hemingway, “Ernest Hemingway — Banquet Speech,” December 10, 1954,Nobelprize.org, accessed July 30, 2015,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54/hemingway-speech.html.

70. “Hemingway Dead of Shotgun Wound; Wife Says He Was Cleaning Weapon,”*New York Times*, July 2, 1961.

71. Mary Welsh Hemingway, *How It Wa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Borzoi, 1976）,503.

72.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57.

73. Valerie Hemingway,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April 28, 2015.

74.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53, 48.

75. A. E. Hotchner,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December 11, 2013.

致谢

本书和它所记录的那部小说一样，出自集体的努力。我对很多人都心怀感激，他们帮助我描绘了书中的文学群像。

我的编辑埃蒙·多兰（Eamon Dolan）对我的帮助十分巨大，我需要首先感谢他。从我们第一次会面开始，他就批判我思考材料的方式，推动我做进一步思考，然后耐心地帮助我从一沓1400页的大纲中雕凿出了这本书。在他手中，抛光打磨成为一项高级的艺术，他犹如一位勇敢而幽默的医生，对文稿做了大幅度修改，使我很少顾惜那些来之不易的资料。埃蒙有海明威那样把复杂话题变得简单有趣的天赋。有如此精益求精的合作者和真诚的支持者，我已别无所求。

我同样感激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三世和瓦莱丽·海明威。他们二人都为这本书贡献了大量的时间，让我感激不尽的，是他们的耐心、见识、洞察、鼓励——以及最重要的，友谊。我也应就帕特里克·海明威给予我的两次绝妙访谈，向他致以最真挚的谢意，同时感谢他的夫人卡罗尔，她安排了这两场对话，同时耐心地回应了我后续的要求。安吉拉·海明威·查尔斯（Angela Hemingway Charles）也慷慨地向我提供了爱丽丝·亨特·索阔罗夫对哈德莉·海明威的采访记录。另外，感谢支持这本书的海明威学会的历任席们，无论是卸任的还是在任的：詹姆斯·莫瑞德斯（James Meredith）、H.R.斯通贝克（别名“斯通尼”）、艾伦·约瑟夫斯。

本书其他主要人物的后裔同样接受了访谈，并向我提供了家族档案和照片，他们的信息极大地丰富了这部作品。衷心感谢约翰·桑德斯（John Sanders）、珍妮·菲利普斯、弗兰克·菲利普斯（Frank

Phillips）、埃莉诺·拉纳罕、安娜·皮特、苏珊·桑德伯格、基斯·桑德伯格（Keith Sandberg）、罗杰·勒布（Roger Loeb）、芭芭拉·勒布·肯尼迪、卡罗莱·韦尔（Karole Vail）、小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达尼特·斯蒂芬斯、劳拉·唐纳利、罗宾·罗文·克拉克（Robin Rowan Clark）和诺艾儿·奥谢罗夫。同样感谢海明威的朋友A. E. 霍奇纳、南希·德莱尔（Nancy Dryer）和约瑟夫·德莱尔邀我到家中做客，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与我讨论海明威的往事，也帮助我理解了海明威复杂人格的不同侧面。肯黛尔·康拉德（Kendall Conrad）、巴纳比·康拉德二世（Barnaby Conrad Ⅱ）、温斯顿·康拉德（Winston Conrad）和玛利亚·库珀·詹尼斯也慷慨地与我分析了他们独到的记忆，以及他们的家人与海明威相处时的往事。

我同样感激引导我了解这段历史的传记作家和学者们，包括A.斯科特·伯格（A. Scott Berg）、乔亚·迪利贝托、斯科特·唐纳德森（Scott Donaldson）、洛伊丝·戈登、露丝·霍金斯、洛伊丝·鲍肯·罗德尼克（Lois Palken Rudnick）以及加尔文·汤姆金斯。桑德拉·斯潘尼尔对我的支持尤其大，她让我得以见到尚未出版的《海明威书信集》第三卷，其中很多信件是未曾公开过的。

很多学识渊博的编辑和作者告诉了我纽约出版史的情况以及其中的各色精英人物。这些编辑和作者包括尼尔森·阿德利奇（Nelson Aldrich）、罗杰·安吉尔（Roger Angell）、杰伊·菲尔登（Jay Fielden）、路易斯·拉帕姆、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和南·塔利斯（Nan Talese）。亚当·格普尼克（Adam Gopnik）、洛林·斯坦和盖伊·塔利斯（Gay Talese）与我保持联络并进一步向我介绍了业内人士，让我尤其感动。我同样应该感激汉密士·鲍尔斯（Hamish Bowles）和瓦莱丽·斯蒂尔，他们提供了对20世纪20年代时尚和时尚刊物的深刻见解。罗伯特·伊万斯（Robert Evans）为我详细讲解了1957年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的情况；朱利安·范罗士（Julian Fellowes）和蔼地与我分享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贵族的大量信息。

我对他们所有人深怀感激。

这本书有关的研究需要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珍本及特殊藏品部花费大量时间，这里收藏了海明威生平研究先驱卡洛斯·贝克的档案、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的档案、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文件、西尔维娅·毕奇的文件、帕特里克·海明威的文件、哈罗德·勒布的《扫帚》杂志社通信，以及很多其他档案。我真诚地感谢唐·C.斯凯莫（Don C. Skemer）和普林斯顿的团队，包括加布里埃尔·斯威夫特（Gabriel Swift）、桑德拉·卡拉布里斯（Sandra Calabrese）、布利安娜·格雷格（Brianna Cregle）、安娜李·保尔斯（Anna Lee Pauls）和克里斯塔·克雷顿（Christa Cleeton），谢谢他们在我在校期间对我的帮助、热情和善意。我同样感激约翰·肯尼迪图书馆-博物馆欧内斯特·海明威收藏处的苏珊·乌瑞恩（Susan Wrynn），自研究早期开始我便频繁出入此地，感谢她对我的包容。图书馆中的其他人也提供了巨大帮助、必须致谢的人员包括斯黛西·钱德勒（Stacey Chandler）、阿比盖尔·马拉格尼（Abigail Malangone）、阿曼那·阿卜杜斯-萨拉姆（Amna Abdus-Salaam）、梅丽莎·丹（Melissa Taing）、劳里·奥斯丁（Laurie Austin）、奥布里·巴茨（Aubrey Butts）、玛丽罗斯·格罗斯曼（Maryrose Grossman）和凯拉·瑞恩（Kyla Ryan）。感谢耶鲁大学拜内克珍贵书籍与手稿藏馆（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的英格丽德·列侬-普莱茜（Ingrid Lennon Pressey）和斯蒂芬·R.杨（Stephen R. Young），以及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苏珊·哈伯特（Susan Halpert）。纽约公共图书馆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允许我查阅海明威早期作品的珍贵初版以及其他有关的材料；特别感谢贝格藏室（Berg Collection）的伊萨克·戈尔韦茨（Isaac Gerwitz）和约书亚·麦基翁（Joshua McKeon），以及爱米·戈杜迪格（Amy Geduldig）的支持。为了支持我的研究，约翰·波拉克（John Pollack）还去了藏有贺拉斯·利夫莱特文件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

有几位朋友极大拓展了我对杜芙·特怀斯登夫人生命中最后几年的了解。马特·库恩（Matt Kuhn）和弗雷德·克莱恩（Fred Kline）为我查明了克林顿·金的身世，并找到了一些杜芙·特怀斯登的遗物；威廉·巴特勒（William Butler）在圣达菲地区为我找到了重要的联系人，使我得以了解金氏夫妇在那里的情况。我同样需要感谢克里斯·韦伯斯特（Chris Webster）和杰拉德·罗德里格斯（Gerald Rodriguez），他们告诉了我特怀斯登去世前后的事。

几十位朋友都已各自的方式提供了重要帮助，我衷心感谢他们所有人。他们包括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南·格拉汉姆（Nan Graham）、布兰特·朗博（Brant Rumble）和罗兹·利坡（Roz Lippel）；哈佛大学英语系的凯斯·科恩斯（Case Kerns）；路易莎·吉拉登亥·斯图尔特（Luisa Gilardenghi Stewart）;斯坦佛·J.斯摩勒（Sanford J. Smoller）;伊安·冯·弗兰克斯泰因（Ian von Franckenstein）；迈克尔·凯特基斯（Michael Katakis）；叶塞尼亚·桑托斯（Yessenia Santos）；纽约斗牛俱乐部的罗尔·莫宁（Lore Monig）；杰弗里·莱昂斯（Jeffrey Lyons）;安东尼·埃亨（Anthony Ahern）和阿兰·克莱默（Allan Cramer）；我在《名利场》的编辑团队，庞齐·赫顿（Punch Hutton）、凯瑟琳·斯特灵（Katherine Stirling）、勒诺拉·简·埃斯蒂斯（Lenora Jane Estes）和凯特·巴克利（Cat Buckley）；马克·罗佐（Mark Rozzo）;《城与乡》的杰伊·菲尔登和本·豪（Ben Howe）安排了我探访海明威的巴黎；莉莉·罗森克兰兹（Lili Rosenkranz）;利拉·拉姆兹（Lilah Ramzi）;萨蒂·斯泰因（Sadie Stein）；《巴黎评论》的克莱尔·芬特雷斯（Claire Fentress）、塔克·摩根（Tucker Morgan）和安娜·海沃德（Anna Heyward）;埃里克莎·卡萨诺斯（Alexa Cassanos）；苏珊·莫里森（Susan Morrison）;克雷西达·雷生（Cressida Leyshon）;珍妮·罗兹（Jeannie Rhodes）;法比奥·伯托尼（Fabio Bertoni）；谢丽·旺格（Shelley Wanger）；本·阿德勒（Ben Adler）；伊丽莎白·弗兰克（Elizabeth Frank）；玛丽琳·萨拉森（Marilyn Sarason）;卡罗

尔·切尼（Carol Cheney）;曼彻斯特历史协会（the Manchester Historical Society）；新墨西哥艺术博物馆的丽贝卡·伯坦斯（Rebecca Potance）；《陶斯新闻》（Taos News）的琼·利文斯顿（Joan Livingston）；玛吉·冯·奥斯特兰德（Mag gie Van Ostrand）；奥克赫斯特居民委员会的利比·威尔斯（Libby Willis）；咖啡屋俱乐部的斯蒂凡·拉克（Stefan Rak）和比尔·雷伊（Bill Ray）；“麦迪逊人”网站的萨拉·拉辛（Sara Racine）和阿比盖尔·丹尼斯（Abigail Dennis）；莱曼·帕普尔出版公司（Layman Poupard Publishing, LLC）的理查德·莱曼（Richard Layman）和吉赛拉·路比柯克（Giesela Lubecke）；WGBH教育基金会的萨姆·法瑞尔（Sam Farrell）；《经济学家》杂志的贾尔斯·特伦姆莱特（Giles Tremlett）；双桥历史协会的乔伊·戴伊（Joy Day）；沃斯堡市塔兰特郡档案管理员唐恩·杨布罗德（Dawn Youngblood）；布兰迪万博物馆的盖尔·斯坦尼斯罗（Gail Stanislow）；格林威治村历史保护协会的阿曼达·戴维斯（Amanda Davis）和雪莉·伍德罗夫（Sheryl Woodruff）；国际创意管理的珍妮弗·约尔（Jennifer Joel）;国际笔会/福克纳基金会（PEN/Faulkne）的保罗·莫里斯（Paul Morris）；多萝西·帕克学会的凯文·菲茨帕特里克（Kevin Fitzpatrick）；薇薇安·希普雷（Vivian Shipley）；帕特里夏·亚当斯（Patricia Adams）；哈罗德·奥伯协会（Harold Ober Associates）的克雷格·泰尼（Craig Tenney）；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安娜·邦德（Anna Bond）和蕾切尔·尤恩（Rachel Ewen）；埃里克·桑德伯格（Eric Sandberg）；米切尔·桑德伯格（Michael Sandberg）；安德斯·皮特（Anders Pytte）；咪咪·莱维特（Mimi Levitt）；雷伊·希波（Ray Chipault）；纽约电影论坛的霍丽·冯布伦（Holly Van Buren）；霍顿湾总商店的奇普·洛伦格（Chip Lorenger）；杰夫·桑德森（Jeff Sanderson）；艾利克斯·比尔（Alex Bier）；吉尔·夸沙（Jill Quasha）；朱莉娅·玛斯尼克（Julia Masnik）；玛利安妮·莫洛拉（Marianne Merola）；戴夫·米勒（Dave Miller）；戴维·米克

（David Meeker）；卡诺·布朗（Karaugh Brown）；布鲁克·盖恩（Brooke Geahan）；艾什利·维克（Ashley Wick）；朵拉·米利塔卢（Dora Militaru）；艾米莉·阿登·威尔斯（Emily Arden Wells）；丹增·乔基（Tenzing Choky）；卡伦·赛欧（Karen Seo）；克莱本·斯万森·弗兰克（Claiborne Swanson Frank）；萨拉·罗森博格（Sarah Rosenberg）；奥博托·吉利（Oberto Gili）；弗兰斯·麦卡锡（Frances McCarthy）；珍娜·布鲁姆（Jenna Blum）；朱迪·布鲁姆（Judy Blum）；瑞克·麦斯克和莫妮卡·麦斯克（Rick and Monica Macek）。

因为本书讲述的是一个跨越两个大洲、多个国家的故事，我需要依赖许多天才译者的协助，以理解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作品、短语及俚语。他们是苏菲·卡彭兰（Sophie Capéran）、让-卢克·谢·潘切拉（Jean-Luc Giai Piancera）、基娅拉·德·雷杰（Chiara de Rege）、艾利克斯·迪克森（Alex Dickerson）和安娜·赫雷洛（Ana Herrero）。布鲁克·沃尔（Brooke Wall）和贾森·加农（Jason Cannon）还为我解释了钓鱼方面的术语。感谢你们所有人。

没有协助我的研究团队，我不可能独自完成这些繁重的研究查找工作。他们查找档案、绝版书籍、杂志和报纸文章、讣告、未发表的诗作以及类似的资料。艾利森·福布斯（Alison Forbes）——她如我的右手一样可靠，早在这本书还是一篇杂志专题文章时就已经加入了进来——与阿比盖尔·克拉齐菲尔德·阿祖曼诺夫（Abigail Crutchfield Arzoumanov），她们永远不会空手而归，哪怕最难找的线索也总能找到。我再不可能找到比她们更好的侦查员了。我在哈佛的助手亚历山大·克莱顿（Alexander Creighton）多次前往肯尼迪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哈佛的霍顿图书馆，抄写了大量的信件与手稿资料。没有任务可以难倒他，有他在，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并且没有他不能辨识的笔迹。我深深得益于这三位研究者的帮助，我为他们做出的贡献感到骄傲。梅丽莎·格德斯泰因（Melissa Goldstein）也应得到我的感谢，她在各个图

书馆、档案馆中查到了很多数十年前的珍贵照片。

我能够完成这项工作，也多亏了我优秀的文学代理人莫利·弗雷德里奇（Molly Friedrich）以及她的团队，成员包括露西·卡尔森（Lucy Carson）、莫利·舒尔曼（Molly Schulman）、妮可·勒费布尔（Nichole LeFebvre）和艾利克斯·凯耶（Alix Kaye）。从最初构思本书开始，他们就不渝支持着我这个青年女记者解读一位最为阳刚的研究对象。并且在全部的研究与写作进程中，他们是我不竭的支持、忠告与鼓励之源。我也想感谢格林尼斯·迈克尼克尔（Glynnis MacNicol），在很多项目上她是我的记者搭档，也是她将我介绍给了上述团队。她对本书的诸多贡献值得我的深深谢意。

我也极其感激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的罗斯玛丽·麦吉尼斯（Rosemary McGuinness）、玛丽·道顿-霍夫曼（Mary Dalton-Hoffman）、玛格丽特·安妮·迈尔斯（Margaret Anne Miles）和丽萨·格罗夫（Lisa Glover），他们帮我解决了本书需要的各种难办的行政、法律、许可事务。同样感谢我们精细而耐心的文字编辑阿曼达·海勒（Amanda Heller）。

正如本书属于我那样，它同样属于我亲爱的丈夫格雷戈里·麦斯克（Gregory Macek）。所有的字句之中都不乏他的努力：他是最早的编辑、我勇敢的律师，以及支持我的最重要的柱石。每天晚上他尽职地听取巴黎“迷惘一代”的零碎往事，每轮编订完成，他都会准备两只玻璃杯和一瓶温克尔家族波本威士忌。实际上，我们那段时间同时孕育了这本书和一个女儿——倒是很像杰克·海明威（邦比）和《太阳照常升起》同时诞生的情况——我会永远记得这段艰难时世。